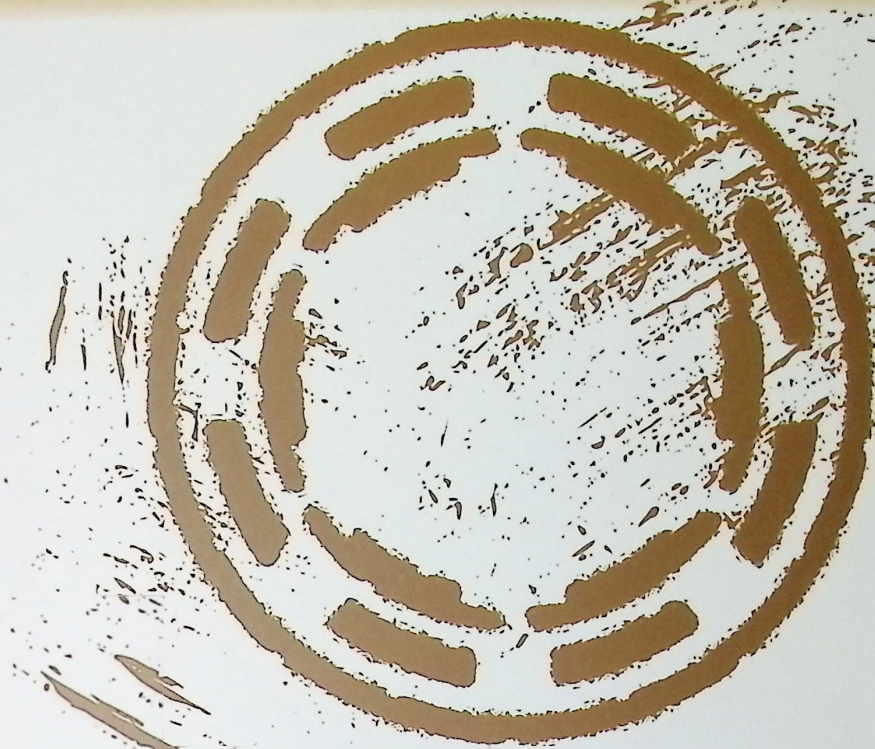


冷戰年代
世界與中國

叢書主編
沈志華

崔海智

著



世界革命的 最後努力

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
情報局的興衰

開明書店

(1947—1956)

崔海智

歷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研究館員，主
要研究領域為蘇聯史、冷戰史、國際共運
史。在《世界歷史》《冷戰國際史研究》等
雜誌發表論文數篇。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歷史文獻》（第59、60卷）、《東歐各
國社會制度轉型檔案文獻編目》（第八卷，
上下冊）等多部檔案文獻集。

冷戰年代
世界與中國

叢書主編
沈志華

崔海智

著

世界革命的 最後努力

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
情報局的興衰

開明書店

(1947—1956)

本書係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精品力作
培育項目（2023ECNU—JP002）成果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冷戰」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經流行多年，而在中國使用這一概念，基本上已經到了冷戰結束的時候。所謂冷戰，一方面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在相互對抗時期的外交戰略，即冷戰戰略；一方面是指人類世界進入了以美蘇對抗為標誌的兩極結構的歷史時期，即冷戰年代。

對於冷戰歷史的研究早在冷戰進行期間就已經在西方開始了。不過，這一研究真正全面展開和深入則是在冷戰結束之後。這不僅是因為作為一個有始有終的完整過程，冷戰此時已經可以納入歷史研究領域了，更重要的是蘇聯和東歐各國檔案的開放，為研究者提供了審視鐵幕另一邊歷史真相的豐富而不可或缺的史料。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冷戰史新研究」或「冷戰國際史研究」，而中國學者正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國際冷戰史研究隊伍的。在新史料面前大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這也是中國學者在冷戰史研究領域可以同國際學者對話的原因之一。

中國學者研究冷戰歷史十分必要。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不僅深刻影響着國際關係的演進，也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深刻影響。中國雖然不像東、西歐國家那樣處於美蘇對抗的核心地帶，但也不像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那樣處於冷戰的邊緣地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又處在美蘇兩個大國對抗的中間地帶，實在無法擺脫與冷戰的糾葛。一方面，美蘇之間的冷戰不斷影響着中國內政外交的發展演變，另一方面，中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又反作用於冷戰的進程。從某種意義上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在冷戰的環境中誕生、成長、壯大的。

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對外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來看，中國與

冷戰的糾葛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49 年到 1950 年代末。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向蘇聯「一邊倒」，全盤接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收穫是在蘇聯的大規模援助下，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一次大轉移，建立了工業化基礎。責任是充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對抗美國和西方。第二階段，整個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中國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高舉世界革命大旗，四面出擊，既反美又反蘇，還要打倒一切反動派。在國內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共和國最孤立、最困難的時期。第三階段，1970 年代初期到 1980 年代中期。中美和解並建交，從策略協調到戰略合作，聯手制蘇，建立起「準同盟」關係。中國進入現行國際體系，放棄世界革命，結束「文化大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第四階段，1980 年代中期到冷戰結束。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和不結盟政策，與美國保持戰略合作，與蘇聯實現關係正常化。對內提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着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全面開放，實現了現代科學技術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可以看出，在冷戰年代，中國無論在對外交往還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了。最重要的是處理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的理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對時代的看法從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對外部世界的認知從破壞國際體制轉向進入並維護現存國際體制；外交理念從意識形態主導轉向國家利益優先；外交方針從同盟（陣營）外交轉向不結盟的全方位外交。顯然，這其中確有很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總結，值得借鑒。

冷戰結束至今已三十多年了。現在，由於中美關係惡化乃至形成對抗，人們都在熱議「新冷戰」。大國之間圍繞利益和權力展開的對抗，國際政治中出現的對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戰年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不太贊成「新冷戰」已經形成的說法。如果說「新冷戰」就是冷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現，那麼應該看到，目前中美關係雖然已經處於對抗的狀態，但冷戰的基本特徵——因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壘而形成的世界兩極格局尚未出現。所以，說「新冷戰」已經出現或必然出現，為時尚早。當然，歷史

往往出現驚人的相似，當前中美關係的演變與當年美蘇走向冷戰的道路也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歷史究竟會走向何方還存在很大變數。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¹而目前國際社會的各種因素都在變化當中，尤其是美國和中國的政策取向，不僅取決於主觀因素，也會受到諸多客觀因素的影響。這些變化在目前尚未鎖定，尚待觀察，但是這種現象在已經結束的冷戰歷史中曾經出現，已成定數。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發現它們，讓人們了解它們，以為今天的借鑒。由於當代世界的結構性因素和重大國際問題的淵源都與冷戰時期密切相關，所以，冷戰史研究可以為理解和把握後冷戰時期的歷史運動方向、應對及管理現實的國際危機，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和戰略性評估。這也是進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強冷戰國際史研究，並在學科建設方面將這一研究提高到應有地位的現實意義所在。

有鑒於此，香港中華書局與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策劃了這套「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期待着在重新描述歷史過程，重新構建歷史事實的過程中，拓寬中國冷戰史學者的思路，開掘冷戰史研究的新材料，以推動中國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繼續拓展和深入，促進中國現代史、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學術支撐和決策諮詢。

2024年5月於上海

1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

緒 言

一、問題的提出與選題的意義

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縮寫 Коминформ）是 1947 年 9 月在波蘭華沙舉行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蘇聯、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歐洲九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成立的，也稱共產黨情報局。1956 年 4 月宣布停止活動。

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一直是冷戰史和國際共運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熱點，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後不久，也就是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就已經出現了研究共產黨情報局的論著。¹ 此後，一些學者相繼在這一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但是，總的來說，由於受到檔案材料的限制，在冷戰結束前，學者們對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都是非常有限的，甚至陷入了一些誤區。² 冷戰結束以後，隨着相關檔案材料的解密和一些研究共產黨情報局的新成果的出現，共產黨情報局的神祕面紗也逐漸被人們揭開。但是，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一些重大問題，如關於共產黨情報局與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關於蘇聯領導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等問題仍然是學者們尚未涉及的研究領域。而近年來相關俄國檔案材料的解密則為人們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提供了可能。

1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 Ulam A., *Titoism and the Cominform*, Cambridge, 1952.

2 特別是由於受檔案材料的限制，長期以來，在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問題的研究中，許多西方學者提出的一些觀點要麼完全沒有什麼證明（如博爾凱納烏），要麼是主要依靠當年蘇聯政府發表的聲明和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材料（如馬凱和拉南），在研究中陷入了一些誤區，比如他們都認為，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同蘇聯領導層內部的鬥爭有關，並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長期的爭論。但是，冷戰後解密的檔案材料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詳見：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пеще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 XXXIV.

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正值戰後初期蘇美對外政策發生急劇轉化、歐洲逐漸被分裂為在意識形態上相互對立的兩大陣營、東西關係逐步向冷戰方向轉化的年代，它的成立與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調整和轉變有着直接的關係。正是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化決定了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及其活動的主要方向，而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也反映了戰後一定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化。蘇聯領導人通過共產黨情報局開展的反對南斯拉夫的運動及其對情報局東歐各成員的整肅，對蘇共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對冷戰起源中蘇聯和東歐集團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共產黨情報局的衰落與解散也同蘇聯冷戰政策的調整和轉變息息相關。共產黨情報局在冷戰的起源和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此，從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轉變的角度對共產黨情報局活動的整個歷史過程進行系統的研究，對於了解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及其開展的活動，對於探討冷戰初期蘇聯共產黨同共產黨情報局其他成員的關係以及蘇聯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對於考察二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以及冷戰的起源，乃至冷戰初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等問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二、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狀況

以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為界，學術界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在冷戰年代，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被列為高度機密，在社會主義集團內部研究它的活動是被嚴格限制的。¹ 因此，在這一時期，對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的。西方學者依據有限的檔案材料對共產黨情報局的實質和活動的某些方面進行了一定的分析。但是由於受到檔

1 在蘇南關係惡化時期，南斯拉夫出於政治目的曾披露了一些有關共產黨情報局活動的材料。

案材料的限制，總的來說，這些研究成果都是非常有限的。¹

蘇聯解體以後，關於共產黨情報局活動的一批檔案材料、特別是俄國的檔案材料得到了解密。1994年，在俄國解密檔案材料的基礎上，在米蘭出版了英文版《共產黨情報局：1947、1948、1949三次會議記錄》一書，其中還收錄了一些研究共產黨情報局的論文。² 1998年在莫斯科又出版了該書的俄文修訂版。³ 這些檔案材料的解密和出版把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在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中作出突出貢獻的是俄國學者，他們利用豐富的俄國檔案材料，取得了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包括吉比揚斯基的《40年代蘇聯集團形成時期東歐的國際政治結構問題》、葉戈羅娃的《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與共產黨情報局，1947—1953年》、阿季別科夫的專著《共產黨情報局與戰後的歐洲：1947—1956年》以及他和吉比揚斯基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及其職能等問題發表的文章（吉比揚斯基：《共產黨情報局是怎樣產生的》《共產黨情報局在1947—1948年的行動》；阿季別科夫：《1950年共產黨情報局國際化的償試》《陶里亞蒂為什麼沒有成為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⁴

1 關於冷戰結束前西方學者在共產黨情報局研究領域中的不足詳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 XXVI—XXVII*. 作者認為，在多數情況下，由於沒有必要的檔案材料，西方作者們沒有弄清共產黨情報局成立過程中許多重要的幕後活動，沒有弄清它的內部結構和實際運行機制，以及它在莫斯科和情報局成員各黨領導人各種具體的政治計劃中的實際地位。由於沒有必要的檔案材料，或因回憶錄作者遺忘或杜撰，或因某些研究者猜測，或因南斯拉夫官方宣傳說法所產生的有關共產黨情報局的一些神話，都對學者們對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造成了困難。

2 Proscacci G.,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1947/1948/1949*, Milan: Feltrinelli, 1994.

3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4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 1995;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1947-1953",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1947-1956 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4;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 4;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 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1-2;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пытка 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 гг.*, По новы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4-5;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4.

這一時期，英美等西方學者也依據他們所能掌握的有限的歷史資料，對戰後初期作為蘇聯對外政策工具的共產黨情報局的實質進行了比較恰如其分的分析，並深入到了一些具體的研究領域，比如，關於馬歇爾計劃對蘇聯領導人決定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影響；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對意大利共產黨活動的影響；關於戰後初期蘇共與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關係及其對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影響等等。¹ 而法國外交部解密的檔案——關於法國諜報人員於1948年2月從共產黨情報局駐瑞士的兩名代表那裏得到的情報，對於人們認識共產黨情報局在建立初期為法共和意共規定的任務提供了重要依據。²

主要是受檔案材料的限制，中國學者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成果不多，從檔案入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沈志華教授的文章《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³ 雖然已經解密的中國檔案顯示，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蘇共領導人和中共領導人在他們舉行的會談中曾多次提到過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但到目前為止，關於這一問題尚未出現專門的研究成果。

總之，冷戰結束以後，經過各國學者、特別是俄國學者的努力，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具體來說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
- 1 這些研究成果為：Biagio, Anna Di,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Silvio Pons, 「A challenge Let Drop: Soviet Foreign Policy, the Cominform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1947-1948」,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Dimitrov, Vesselin,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19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 2 這份檔案於1996年在俄國的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雜誌上發表，見 *Ельмеевой Э.С. Принцип Н.С. Коминформ: взгляд из Парижа, Январь 1948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1.*
 - 3 其他中國學者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論著大都是從中共黨史角度進行的研究，沒有運用或很少使用已經解密的檔案材料。其主要的研究成果還有：孫言《中國共產黨與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關係初探》（《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1期）、高敬增《試論九國共產黨情報局的功過和經驗教訓》（《哲學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孫耀文《論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世界歷史》，1997年第3期）。

（一）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

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原因學者們之間的分歧不大，只是強調的重點各不相同。一般來說，大多說學者都認為，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是「莫斯科想找到一種工具，以便對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法共、意共這樣大而有影響力的西歐共產黨施加影響和監督」。¹ 蘇聯共產黨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主導作用。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對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起到了促進作用。俄國學者阿季別科夫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是如何準備的》這篇文章中，通過對戰後初期蘇聯領導人關於建立新國際的設想，以及對蘇共領導人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前為會議所作的準備工作進行的分析，揭示了正是蘇共領導人組織和發起了這次會議。比亞卓在《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過程》以及《馬歇爾計劃與 1947 年 6—9 月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這兩篇文章中認為，當時蘇聯和它勢力範圍內各國共產黨的關係出現了一些麻煩，這促使蘇聯領導人儘快建立一個協調中心，以便對東歐國家的對外政策實施強有力的監督。圍繞馬歇爾計劃的爭論大大加速了這一進程。作者認為，在準備共產黨情報會議的初期，莫斯科就已經下定決心，要使這些國家儘快建立起蘇聯模式。蘇聯讓法共和意共加入情報局的主要目的是使其作為反面教材使東歐國家吸取教訓。作者也認為，參加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對蘇聯代表在會上提出的意見所持的態度是不同的，並且他們與蘇聯代表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沈志華教授在其發表的《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一文中強調的則是法共、意共被逐出聯合政府以及一些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馬歇爾計劃問題上表現出的獨立傾向，使莫斯科感到有對歐洲各國共產黨的活動失控的危險，這種擔心促使蘇聯領導人最終下定決心建立起共產黨情報局，以便對歐洲國家的共產黨進行約束。此外，作者還認為，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標誌着蘇聯冷戰政策的形成。

1 *Гибницкий Л.Я.*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ко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 XXXII.

雖然在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問題上，學者們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是，對其中的一些問題仍然沒有予以充分的研究，比如，在醞釀和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過程中，關於將要建立的這一國際組織的任務，蘇聯領導人的考慮在不斷發生變化，但是，為這一機構創辦一份報刊的想法始終都沒有改變。聯繫到這一時期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和對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缺乏充分的經驗和馬列主義知識」，「偏離正確的政治路線」的狀況的擔心，蘇聯領導人主張創辦一份報刊，提出思想政治上的任務也不是偶然的。

（二）關於情報局機關報編輯部的組建、蘇南衝突和共產黨情報局第二、第三次會議

俄國學者吉比揚斯基在關於這些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為：《從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到第二次會議》《共產黨情報局在 1947—1948 年的行動》《產黨情報局活動的頂點：組織機構的建立和第三次會議》。此外，意大利學者西爾維奧·龐斯的文章《共產黨情報局的黃昏》也對蘇南衝突進行了研究。吉比揚斯基的上述研究成果揭示了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編輯部的建立過程及其作用，揭示了設立在貝爾格萊德的情報局大本營的工作、祕書處會議和常設機關的日常工作、情報局印刷機構的設立和報紙的出版工作等。作者認為，蘇聯方面為情報局機關刊物的出版祕密地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事實上蘇聯代表在情報局的各項工作中都起着主導作用。這些研究成果也進一步說明，正如共產國際一樣，共產黨情報局仍然是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

在蘇南衝突問題上，吉比揚斯基認為，在蘇南衝突前，儘管蘇聯對南斯拉夫有一些消極的看法，雙方的關係一直都是比較友好的，蘇南衝突的爆發是由於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問題和巴爾幹聯邦問題上提出的要求違背了蘇聯領導人盡力維護的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人民民主國家」的等級制度模式，因而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不滿，南斯拉夫領導人在這些問題上採取的不妥協的立場促使蘇聯領導人最終決定利用共產黨情報局來向南斯拉夫施加壓力，因而便召開了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共產黨情報局的其他成員為了加強

自己的地位，支持蘇聯對南斯拉夫的譴責，支持蘇聯關於南斯拉夫的其他各項提議。作者認為，通過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蘇聯領導人一方面加強了向南斯拉夫領導人施加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加強了對共產黨情報局其他成員的控制。南斯拉夫拒絕公開承認錯誤的立場，使各種調解活動失去了可能，最終導致了南斯拉夫被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作者認為蘇南衝突的起因和實質在於：南斯拉夫謀求在東歐確立起某種領導作用，企圖以領導的姿態對待其他的一些共產黨。這種意圖違背了蘇聯領導人堅持的只能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等級制度模式。西爾維奧·龐斯認為，蘇聯領導人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目的是同在東歐確立起嚴格的政治和社會模式聯繫在一起的，1948年春天和夏天，蘇聯集團建立的速度明顯加快了，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之後，蘇聯領導人在建立情報局問題上所追求的目的已經達到。

吉比揚斯基的研究成果還揭示了蘇聯領導人為參加情報局第三次會議所作的準備工作以及蘇聯方面關於召開這次會議的意圖。作者認為蘇聯領導人召開情報局第三次會議的目的沒有越出情報局第二次會議決議所劃定的範圍。

（三）1950—1951年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

阿季別科夫的文章《1950年共產黨情報局國際化的嘗試》《共產黨情報局結局的開始》和《莫洛托夫與1950—1951年改組共產國際的嘗試》對蘇聯領導人在1950—1951年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進行了研究。阿季別科夫認為，1950年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建議最初是斯大林提出來的，通過對莫洛托夫和蘇聯對外政策委員會關於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構想進行的研究，作者指出，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主要目的在於設立情報局總書記一職，並為此要求召開情報局第四次會議。作者認為，陶里亞蒂拒絕出任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的職務，直接導致了共產黨情報局第四次會議的流產和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嘗試的失敗。阿季別科夫的上述研究成果揭示了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的整個過程，但缺乏從蘇聯對外政策轉變的角度對蘇聯領導人進行這一嘗試和最終放棄這一嘗試的原因進行深入的分析。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

俄國學者阿季別科夫的專著《共產黨情報局與戰後歐洲》是俄國首部依據原始檔案文獻而寫的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問題的專著，它從多個角度揭示了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會議、祕書處會議、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的編輯工作、技術祕書處工作、「自由南斯拉夫」和「自由希臘」無線電台工作，蘇共中央在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以及重大決議的準備、採納過程中的作用等等，從整體上論述了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發展和衰落。阿季別科夫《通往祕密的漫長道路：共產黨情報局歷史》這篇文章對學術界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概述，介紹了有關共產黨情報局文獻史料的出版情況，指出了以往學術界在關於共產黨情報局這一領域研究中的不足，並辨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誤區和錯誤觀點。葉戈羅娃的《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與共產黨情報局，1947—1953年》一文使人們對蘇聯領導人通過共產黨情報局所要追求的戰略目標有了初步的認識。龐斯的《失敗的挑戰：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共產黨情報局和意大利共產黨：1947—1948年》研究了共產黨情報局在意大利共產黨活動中的作用；瓦西里·季米特洛夫《革命爆發了：斯大林、保加利亞共產黨和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研究了戰後初期蘇共和保加利亞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對保加利亞共產黨的影響。

總之，冷戰結束之後，學者們在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關共產黨情報局的一些問題仍然沒有被予以充分的研究，特別是有關共產黨情報局後期的活動情況、關於共產黨情報局被解散的過程和原因等問題。

三、文獻資料的收集

目前，有關共產黨情報局的俄國檔案的解密已經比較充分，新的檔案材料的出現為進一步研究本論題提供了可能性。其中筆者在哈佛大學圖書館收集的關於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俄國縮微膠捲檔案中有關共產黨情報局活動

的新檔案，以及俄國近年來出版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等檔案文獻為進一步研究本論題提供了堅實的材料基礎。

四、本書的主要創新

本書主要創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新的研究視角。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蘇聯對外政策轉變的角度、蘇聯與東歐國家關係的角度以及國際共運的角度對共產黨情報局活動的整個歷史過程進行研究，通過這種研究來揭示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過程，並對冷戰起源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

（二）提出一些新的問題並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比如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在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中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關於 20 世紀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蘇共和中共領導人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嘗試；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等。

（三）利用了新的檔案材料。除了國際學者廣泛應用的一些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檔案材料之外，本文還利用了一些新的檔案材料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比如，利用俄國最新解密的蘇聯國家安全機關的檔案材料對蘇聯領導人解散共產國際的原因進行了研究，利用最近解密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檔案材料對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過程進行了研究。

五、本書的主要章節結構

本書在緒言部分提出了選題的意義，並對國內外學術界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研究狀況進行了概述。

第一章：共產國際的解散與蘇聯戰後大國合作戰略的確立。以開展世界革命為目的的共產國際一方面在其活動的實踐過程中逐步成了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的工具，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它又是蘇聯領導人實施其對外政策目標的障礙，特別是在國際條件發生變化，蘇聯需要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關

係的時候，這種障礙就越來越突出。1942 — 1943 年，隨着盟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取得的初步勝利，美英對蘇聯在戰後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擔憂增加了：戰後的世界是共產主義的世界還是資本主義的世界？由於這種擔憂，蘇聯與美英的關係陷入了危機。為了取得對德戰爭的最後勝利和最大限度地維護蘇聯在戰後的利益，蘇聯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後都必須與美英進行合作。而此時的美英領導人也顯示了與蘇聯進行合作、解決戰後問題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1943 年 5 月初，在收到羅斯福總統關於美蘇首腦舉行會晤的信件之後，斯大林馬上就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以此向美英作出一種友好的姿態，為隨後舉行的首腦會晤創造條件。共產國際的解散標誌着蘇聯開始走上與美英合作，解決戰後世界安排問題的道路。蘇聯領導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構想的核心是維護蘇聯的安全，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們確立了戰後與西方大國保持合作的戰略。與這一戰略構想相適應，蘇聯領導人要求那些在本國佔據一定地位的國家的共產黨，其中包括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戰後都實行聯合政府政策。

第二章：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與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戰後，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首要挑戰是蘇聯與西方大國在東歐問題、德國問題、希臘和土耳其等問題上矛盾的發展。其次，東歐一些國家以及法國和意大利的國內政治鬥爭的加劇使蘇聯為這些國家共產黨確立的聯合政府政策越來越受到挑戰。再次，在聯合政府政策受到挑戰的同時，各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也在進一步的發展。最後，受西方國家發起的強大的宣傳攻勢的影響，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重大挑戰也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不安。為了應對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種種挑戰，蘇聯領導人的對外政策不斷向對抗的方向發展，並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情報局，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加快了這一進程。1947 年 9 月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以及兩大陣營理論的提出，標誌着蘇聯開始放棄聯合政府政策，大國合作的戰略基礎被動搖了。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形奠定了基礎，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以及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

第三章：蘇南衝突與蘇聯在共產黨情報局內部的整肅。共產黨情報局的

建立是蘇聯在其推行的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挑戰的情況下作出的一種反應，標誌着蘇聯對外政策開始向冷戰對抗的方向轉變，但在這一政策轉變過程中，蘇聯領導人仍然是非常謹慎的，即使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他們仍然希望與西方國家的合作能夠持續下去，更不願採取激進的措施去挑釁西方國家，給其推行反蘇政策和加強西方聯盟提供藉口。但是，南斯拉夫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不斷採取的一些具有獨立的民族主義傾向的措施，比如支持希臘革命，派遣一個獨立師到阿爾巴尼亞，以及他們希望建立包括有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希臘在內的巴爾幹聯邦的企圖，都直接違背了蘇聯領導人對西方國家的戰略意圖。在1948年2月蘇南簽署關於在對外政策上協調立場的協議之後，南斯拉夫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仍然堅持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這就進一步刺激了蘇聯領導人，導致了蘇南衝突的爆發。在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不斷發展的同時，東歐其他國家的反蘇傾向和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共產黨情報局其他成員在內外政策上並沒有事先同蘇聯協商，情報局也沒有履行第一次會議所規定的協調職能。在此情況下，蘇聯就開始利用情報局，一方面對南斯拉夫領導人施加壓力，另一方面開始利用南斯拉夫問題在情報局東歐成員中展開整肅，消除那些具有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領導人。這些整肅一方面鞏固了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另一方面對東歐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選擇、對蘇聯與東歐各共產黨的關係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四章：戰後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與共產黨情報局。在蘇聯利用蘇南衝突在情報局內部展開整肅的同時，西方聯盟的步伐不斷加快，特別是1949年1月北約的成立標誌着西方反蘇聯盟的建立。面對安全領域的這一重大挑戰，蘇聯領導人把緩和國際局勢，推遲戰爭，爭取和平的希望寄託在和平運動上，並為此進行了廣泛的反對戰爭的和平宣傳，其主要的目的：一是企圖通過「進一步加強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的力量的聯合」，「以便阻止不斷加劇的戰爭威脅」，贏得和平的國際環境，贏得時間增強蘇聯的力量；二是建立維護和平的統一戰線，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實現蘇聯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在對德政策上，反對西方國家恢復德國和把德國納入西方聯盟體系。

三是爭取國際輿論，對西方國家的對德政策施加壓力。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主要通過世界和平大會等國際左翼組織進行，但共產黨情報局起到組織宣傳和廣泛的動員作用。開展和平運動，同戰爭販子作鬥爭成為 1949 年情報局第三次會議的重點，這次會議還通過決議，規定了情報局各成員在開展和平運動中的具體任務。

第五章：共產黨情報局組織機構的建立與職能的擴大。在共產黨情報局編輯部組建之後，其職能不斷擴大，起到了臨時協調中心的作用。同時，情報局開始關注情報局成員之外其他共產黨的活動，並通過機關報對一些國家共產黨的活動進行批評；情報局機關報的發行範圍在不斷擴大，並且開始成為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理論指導的刊物。共產黨情報局章程的確立和常設秘書處的建立標誌着共產黨情報局活動的機制化，也使情報局的協調職能進一步得到加強，更加有利於蘇聯對情報局其他成員的控制。

第六章：回歸世界革命：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1950 年秋，在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問題上態度謹慎的蘇聯領導人提出了擴大情報局職能的要求，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加強對歐洲、美洲和亞洲各國共產黨的工人運動和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並為此設立秘書處總書記一職。斯大林的這一嘗試可以被看作是對西方聯盟不斷加強的趨勢作出的一種反應。但是，一方面由於在擴大情報局職能問題上遇到了障礙，特別是由於陶里亞蒂拒絕擔任擬議中的情報局秘書處總書記的職務，另一方面是由於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特別是在中國出兵朝鮮之後國際局勢的加劇使戰爭的危險進一步增加，在此情況下，擴大情報局的職能無疑將使國際局勢更加惡化，給蘇聯外交帶來更大的危害。因此，蘇聯領導人最終放棄了擴大情報局職能的嘗試，而其回歸世界革命的想法最終也未能實現。在此之後，他們再也沒有提出關於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建議和設想。

第七章：蘇聯對亞洲國家共產黨政策的變化與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東方情報局問題的提出、醞釀都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的變化。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前後，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就提了出來，儘管中共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都對建立東方國家共產黨的聯合持支持態度，但蘇聯的

態度則是謹慎的。隨着國際條件的變化以及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領導人開始考慮關於組建東方情報局的問題，其主要原因同蘇聯領導人在 1950—1951 年擴大情報局的職能的主要目的一樣，都是為了推行「間接戰略」的需要，具體到亞洲來說就是要使美國等西方國家陷入殖民地國家的事務，加深他們之間的矛盾，在避免美蘇直接對抗的同時減緩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並應對美國在亞洲建立反蘇聯盟的挑戰。但由於蘇聯領導人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謹慎，不願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承擔責任，在希望中共承擔起這一責任的同時始終存在對「東方鐵托」的擔憂，由於亞洲國家共產黨面臨的困難狀況以及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道路認識的轉變等原因，蘇聯領導人最終放棄了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

第八章：共產黨情報局的衰落與機關報的出版。在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之後，蘇聯領導人逐漸對這一機構失去了興趣。在此之後，共產黨情報局的機構活動實際上開始陷於衰落。祕書處辦公室更多地扮演的只是各國共產黨之間「郵政總局」的角色。在共產黨情報局陷於衰落的同時，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仍然在定期出版，配合蘇聯外交政策上的任務展開積極的宣傳工作。這些宣傳工作主要表現在：第一、就結束朝鮮戰爭、簽署停戰協定進行廣泛的宣傳；第二、宣傳蘇聯的和平政策；第三、為反對西方國家擴大聯盟體系進行廣泛的宣傳；第四、宣傳蘇聯提出的關於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倡議；第五、對國際和平運動進行廣泛的宣傳。斯大林去世後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的出版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的新變化。

第九章：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隨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化，改革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逐漸被提上了蘇聯領導人的議事日程。在南斯拉夫領導人對共產黨情報局持消極看法、國際上出現要求解散共產黨情報局的輿論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仍然希望保留和改革這一組織，但最終提出了解散共產黨情報局、代之以建立四個區域性的共產黨聯合組織的設想。蘇聯領導人在實現這一設想的過程中遭受了重重困難。最終，1957、1960 和 1969 年共產黨代表大會成了蘇聯與其他國家共產黨之間進行聯繫和接觸的新形式。

本書在結語部分從國際共運的角度、蘇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關係的角度以及蘇聯對外政策轉變的角度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進行了評價。

目錄

叢書總序 / 沈志華	i
緒言	iv
第一章	001
共產國際的解散 與蘇聯戰後大國合作戰略的確立	
第二章	044
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 與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	
第三章	099
蘇南衝突與蘇聯在 共產黨情報局內部的整肅	
第四章	142
戰後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 與共產黨情報局	
第五章	190
共產黨情報局組織機構的 建立與職能的擴大	

第六章	215
回歸世界革命： 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	
第七章	234
蘇聯對亞洲國家共產黨政策的變化 與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	
第八章	268
共產黨情報局的衰落 與機關報的出版	
第九章	290
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	
結語	324
對共產黨情報局的評價	
附錄	331
主要外國人名翻譯	
參考文獻	338

第一章 共產國際的解散與蘇聯戰後 大國合作戰略的確立

根據馬克思的構想，為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全世界無產者需要聯合起來，建立某種國際聯合組織進行鬥爭，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建立了第一國際。十月革命以來，為了擺脫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外部困境，列寧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同十月革命勝利成果的鞏固結合起來，企圖通過開展世界革命來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並以此來減緩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壓力，為此他創建了共產國際。也就是說，共產國際的成立是與蘇維埃政權當時面臨的外交任務聯繫在一起的。雖然不能否認列寧和他的同事們在建立共產國際問題上的革命動機是純粹的，但是，在共產國際活動的實踐中，目標還是逐漸脫離了現實，以世界革命為己任的共產國際還是日益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¹

然而，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的共產國際為什麼在 1943 年 5 月突然解散？蘇聯領導人採取的這一舉措與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又有什麼關係呢？

一、共產國際與蘇聯的對外政策

以開展世界革命為目標的共產國際在其活動的實踐過程中逐步成為

¹ 從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國革命勝利到 1922 年 12 月 30 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建立的這段時間稱為蘇俄，為敘述方便，本文所稱的蘇聯有時也包括這一時期的蘇俄。

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同時，在一定條件下它又成為蘇聯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障礙。

（一）共產國際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

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正如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所寫道的：「共產主義革命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它將在所有文明國家同時發生……它是世界性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¹ 根據這種構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先後成立了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來開展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抓住時代的特點，不僅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世界革命的學說，在關於建立無產階級國際組織方面提出了更為激進的思想，而且他還根據這種思想，在1919年3月創立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成立之後，馬上就把開展世界革命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共產國際一大認為，世界形勢變得越來越有利於革命，因此共產國際應作為世界革命的大本營來行動。不僅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而且列寧當時都認為，只要成千上萬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導致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蘇維埃政權。² 隨着紅軍在國內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在蘇維埃領導中產生了通過共產國際向其他國家輸出俄國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主張。³

但是，以開展世界革命為目標的共產國際在其活動的實踐過程中逐漸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看法，革命的無產階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頁。

2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37, с.514, 轉引自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5, с.44.*

3 詳見：*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44.*

級的國際組織就其本質來說，不可能從屬於任何一國的民族利益。共產國際就是本着這個精神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共產國際具有超國家的性質。¹ 蘇維埃政權被認為是完全從屬於世界革命鬥爭的利益與需要的力量，是共產國際的一個單位，而不是凌駕於其上的力量，比如，蘇俄紅軍最初曾宣誓效忠於共產國際。² 儘管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具有真誠的國際主義思想，但共產國際的活動從一開始就從屬於蘇聯領導人，而且日益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這不僅是因為共產國際是在俄國共產黨和列寧的積極參與下建立起來的，而且還是由於它自建立伊始，就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同蘇俄、同蘇聯共產黨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在物質上依賴蘇聯。儘管共產國際的章程規定，蘇共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實際上它在共產國際中佔據了特殊的最具影響的地位，對共產國際的各方面的活動產生着決定性的影響。共產國際在決定重要問題的時候，在許多因素的影響下，蘇共的意見最具影響。³

到斯大林時代，共產國際對蘇聯對外政策的從屬性在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共產國際已成為斯大林推行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而且斯大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還給這種從屬性提供了理論基礎。世界革命不僅僅被作為一個單純的目標，而且也成為用來建立一個強大的蘇聯的根據。一個強大的蘇聯就意味着世界革命的發動機仍在轉動。正如斯大林在 1924 年所宣稱的：「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是全世界革命運動

1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339頁。

2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杭州大學出版社，1982年，第120頁。

3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с.5. 1925年，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更名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1952年10月，正式更名為蘇聯共產黨。為敘述方便，本書在一般情況下都使用「蘇共」一詞。*

的根據地、堡壘和保護者。」¹一年以後，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再次重申，蘇維埃制度的穩定不斷積累着使無產階級專政鞏固、世界各國革命運動高漲和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²一旦一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被規定為世界革命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戰線，一旦保衛這一目標免受外來威脅成了共產國際的首要任務，共產國際的活動就自然理應由直接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人來掌握了。³總之，斯大林提出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要求其他各國共產黨把蘇聯的安全看成是世界革命的頭等大事，要求他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貫徹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服從蘇聯對外政策的利益。

在共產國際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之後，它便被蘇聯領導人積極地利用起來為蘇聯的對外政策服務，共產主義運動便被迫屈從於蘇聯領導人的決定，加入共產國際的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不得不主要根據蘇聯的政策來決定他們的戰略和戰術。如果莫斯科把中國的國民黨看作是蘇聯可信賴的同盟者，那麼共產黨人就必須與國民黨妥協。如果德國社會民主黨對拉巴洛條約的精神不滿，那麼德國共產黨人就必須集中火力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如果拉戈·卡列羅對蘇聯的勸告「三心兩意」，那麼，西班牙共產黨人就必須擺脫掉他，轉而支持曾經較好地領會蘇聯外交政策需要的涅格林。如果維護 1939—1941 年與希特勒德國簽訂的條約要求一切國家的共產黨人不再把法西斯主義看作他們最主要的敵人，那麼共產黨人必須毫不猶豫地收回以前「對法西斯主義的公正的譴責」。如果共產國際成了斯大林與羅斯福、丘吉爾達成諒解的障礙物，那麼全世界共產黨人必須為共產國際的解散而歡呼，把它作為理想的和唯一的解決

1 斯大林：《關於波蘭共產黨》（1924 年 7 月 3 日），《斯大林全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231 頁。

2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總結》（1925 年 5 月 9 日），《斯大林全集》第 7 卷，第 84 頁。

3 賈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 319 頁。

問題的方式。¹

蘇聯領導人之所以能夠利用共產國際為自己的對外政策服務，並使各國共產黨的活動屈從於自己的對外政策，一方面是因為在世界革命者的心目中，它是第一個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政權，達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頂峰，並且在工業化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這同舊的沙皇制度比較起來是真正的解放，因而它對世界無產階級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由於共產國際內部日益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體制更加有利於蘇共對共產國際其他成員的控制。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認為的革命政黨在國際和國內應該是怎樣的一個黨的觀念完全相反，共產國際日益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在黨的工作和黨的統一方面，引進了官僚主義的觀念——不僅在政治上和組織上，而且在理論上都如此，這就使共產國際日益成為全世界革命者「唯一的世界黨」，其執行委員會，即常設的領導機構，被賦予特別的權力，它的指示對各國支部來說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可以開除某一成員或撤換一國支部的領導人，甚至在違反大部分成員意志的情況下予以撤換，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上只是擁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授予他們的那部分權力。這樣，共產國際就自上而下建立起了鐵的紀律和最嚴格的集中制。²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就沒有再被召開過，共產國際內部權力的集中化進一步加強。雖然蘇共中央政治局不再直接參與共產國際的政治決策，而是由共產國際主席團和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對決議的作出全權負責，但事實上，共產國際主要的決議草案都要提交給蘇共中央政治局，都要經過蘇共中央政治局或斯大林的同意，沒有他們的同意，哪怕是口頭上的同意，共產國際領導人就不能採

1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77頁。

2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306、124、111頁。

取任何一項重大的措施。¹ 蘇聯領導人對共產國際的控制比以前更強了。

（二）共產國際與蘇聯對外政策的矛盾

共產國際的建立是與世界革命的開展結合在一起的。早在二月革命後不久，列寧就指出，俄國行將到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只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階段。² 十月革命前夕，列寧認為，德、法、意和英國的革命形勢正是世界革命大轉折的標誌，是全世界革命的前夜，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革命形勢已經成熟，俄國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環。1918年1月，列寧還樂觀地估計說：「現在，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時每刻地成熟起來。俄國人開始了，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將去完成，社會主義定將勝利。」列寧當時認為，在一個國家內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³ 因此，共產國際建立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促進世界革命的開展。

但是，事實證明，蘇俄領導人這種關於世界革命前景的看法是過於樂觀了。1917年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革命、芬蘭工人的革命、匈牙利的蘇維埃共和國、巴伐利亞和斯洛伐克的蘇維埃共和國、保加利亞的工人起義，意大利的革命都只是曇花一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很快又陷入了低潮。在此之後，列寧逐漸轉變了對世界革命形勢的認識，並開始改變共產國際激進的戰略路線。1920年末，列寧指出，在世界範圍內兩大力量的鬥爭中，任何一方都不會很快取得勝利。1921年春，發生在德國中部地區的「三月鬥爭」失敗後，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大部分領導人得出結論，

1 *Ленинские Г.М.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1919-1943г., с.15.*

2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80頁。

3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7頁；第442-443頁。

認為形勢不允許蘇俄和共產國際推行進攻性的革命戰略。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列寧對「左傾主義」的立場及其「進攻性理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提出下一步的任務是：爭取工人階級和勞動者的大多數站在共產黨一邊，同「左傾冒險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在和蔡特金進行的談話中，列寧聲稱：「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經低落，第二次浪潮還沒有到來，如果我們對此抱有幻想，將是危險的。」¹ 在列寧的最後幾部著作中，他試圖對世界革命激進的路線進行修正：資產階級的地位已經得到了鞏固，這就需要考慮推遲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革命進程的發展變得複雜起來，在新的條件下，國際工人運動在最近的時期內應該集中力量進行防禦鬥爭，建立起統一戰線。²

從進攻性的世界革命戰略上退卻也是蘇俄領導人實現當時所面臨的國內發展任務的客觀需要。當時蘇俄正在向新經濟政策轉變，需要建立國內和平，需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相互承認的基礎之上建立和平關係和在互惠的基礎之上發展經濟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列寧通過對社會主義力量和資本主義力量的對比進行分析，提出了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構想。對列寧和俄國共產黨來說，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在世界舞台上共處時期的不可避免性，是屬克思主義的無可爭辯的、為歷史經驗檢驗過的理論結論。蘇維埃國家的對內政策，尤其是它的對外政策，就是建立在這些結論之上的。³

但是，和平共處理論的提出使俄國共產黨和列寧立即遇上進退兩難

1 Ленин В.И.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44, с.266, с.26;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И.Ленине, т.5, М., 1969, с.26, 轉引自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47.

2 參見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47.

3 安·安·葛羅米柯主編：《和平共處——蘇聯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三聯書店，1965年，第14頁。

的處境，保衛俄國的民族利益與世界革命的方針既相互聯繫又相牴觸。¹ 這一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初期蘇聯與德國的關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德國在共產國際的總戰略和蘇聯外交政策中佔據十分特殊的地位。在納粹分子在德國上台之前，共產國際一直把德國視為帝國主義體系中爆發下一場革命的突破口，對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德國也是蘇聯與之保持着真正的「最惠國待遇」的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對外貿易一半是同德國進行的。德國的工業和德國的技術人員對於蘇聯的工業化乃至軍備生產都至關重要。與德國的關係是蘇聯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對外政策的中心內容。1921 年簽訂的拉巴洛條約奠定了蘇德實用主義聯盟的基礎。蘇聯通過這一條約從德國得到了國內現代化所需要的技術。在隨後兩國簽訂的祕密議定書中，又規定了德國國防軍同紅軍進行合作的內容。1926 年簽訂的蘇德友好條約和中立條約使兩國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曾經被蘇俄寄予革命希望的德國成了它的主要貿易夥伴。但是蘇俄的一些領導人並沒有放棄在德國開展世界革命的想法，儘管兩國簽訂了拉巴洛條約，蘇俄仍然試圖支持 1923 年德國的共產主義政變。而在這一試圖失敗後蘇俄仍然與德國維持着實用主義的關係，從德國獲得了一些技術和軍事援助。² 於是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不知不覺地面臨着難以協調的兩大任務：一方面，作為世界革命戰略上的首要任務，他們必須組織一場反對德國的革命；而另一方面，作為蘇維埃共和國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他們必須保護自己與德國的聯盟。這兩項任務，每一項都十分重要，這就需要蘇聯領導人對德共實行密切的監督。³

1 Чубарьян А.О.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дискуссии//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Восток-Россия-Запа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с.757.

2 參見：Kennedy-Pipe, *Stalin's Cold War: Soviet Strategies in Europe, 1943-1956*,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

3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 140-141 頁。

列寧提出的和平共處理論，顯示出了共同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方針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因而遭到了來自共產國際內部左翼分子的懷疑和抵制，引起了共產國際內部的摩擦。他們甚至指責蘇聯領導人忘記了世界革命的目標，並企圖同資本主義強國相勾結。列寧對世界革命概念的修正始終都沒有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比如，在 1923 年秋，當一些國家的革命形勢高漲起來的時候，俄共和共產國際的一些領導人認為，這種革命形勢應該被利用起來，於是在 11 月下旬，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高會議上，他們不顧台爾曼等人的反對，祕密地通過了武裝起義的決定。重病中的列寧無法關注這一問題。會後，蘇俄領導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向德國派去了一些軍事情報人員，並提供了一些武器。然而他們的願望落空了。只有在漢堡舉行了起義，在經過 60 小時的艱苦奮戰之後，最後失敗了。¹

自 1924 年起，在美國的帶動下，資本主義世界開始趨向繁榮，革命的風暴已成為過去，蘇聯顯得更為孤立，這就客觀上要求蘇聯領導人集中精力醫治戰爭創傷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資本主義的穩固性迫使蘇共和共產國際在回答蘇聯改革的命運以及延緩世界革命等問題上更加具體地確定自己的國際戰略方針。這時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組成了反對派聯盟。他們認為，若無西方取得勝利的工人階級的支持，要取得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反對派認為應致力於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實施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同時加快蘇聯內部的工業發展速度。²

斯大林上台之後，他雖然沒有拋棄世界革命的目標，但更多地把加強蘇聯自身的力量和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在國際力量對比不利於世界無產階級的情況下，斯大林認為，俄國不再需要等待外國的革命：國內革

1 參見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48.*

2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49-50.*

命的鞏固將使俄國能夠援助國外的革命。因而，他要求首先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¹ 因此，贏得鞏固和發展的時間，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避免戰爭就成了形勢的客觀要求。但是，作為世界革命象徵的共產國際成為蘇聯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障礙。

十月革命以來，意識形態因素一直是影響蘇聯與西方國家關係的重要因素。在共產國際推行的世界革命戰略失敗之後，雖然列寧提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戰略，蘇聯領導人也在改善同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仍然沒能取得重大的進展。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意識形態上的。正如蓋迪斯所指出的，不加掩飾的顛覆資本主義國家的企圖使得蘇聯的外交官很難展開工作。² 而共產國際則是其中最大的障礙。一些主張與蘇聯發展關係的西方政治家也在全力促使蘇聯領導人放棄在國外鼓動革命的行為，放棄共產國際。對此，蘇聯領導人也有着清醒的認識。1927年年終，在蘇共15大報告中，布哈林模仿張伯倫的如下談話：「我們一點也不反對同你們做生意，可是請你們把共產國際收起來行嗎？」³ 出於對共產國際的警惕，共產國際自成立之日起，就處在西方國家的嚴密監視之下。二戰期間，蘇聯紅軍曾繳獲了大量的關於法國反偵查機構在1920—1942年期間對共產國際及其所屬機構的活動進行密切監督的材料。⁴

由於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的國際形勢，共產國際成了法西斯國家建立聯盟的藉口，並使蘇聯與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公開宣

1 Kennedy-Pipe, Caroline, *Stalin's Cold War: Soviet Strategies in Europe, 1943-1956*, p.14.

2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7, p.8.

3 布哈林在蘇共十五大上的報告：《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的任務》，轉引自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321頁。

4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81, л.28-34.

稱反對共產主義。蘇聯同德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尤其令蘇聯領導人不安的是，德意日打着反對社會主義的旗號，組成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並且他們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努力得到了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縱容。蘇聯面臨十月革命以來最為險惡的國際環境。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決定在外交戰略上作出重大調整：改善同美國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應對法西斯帶來的威脅。1933年11月16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和羅斯福互換照會，蘇美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之後，蘇聯與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西班牙、比利時、盧森堡等國也建立來了外交關係。蘇聯還改變過去對凡爾賽體系的敵視態度，加入了國際聯盟。

無論是消除法西斯國家攻擊蘇聯的藉口，還是改善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共產國際都成了障礙。因此，在1935年共產國際的解散就已經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前夕，在共產國際的最高權力機關進行的討論中已經指出：「蘇聯作為和平和民主的偉大的保衛者所起的積極的世界作用，將促使共產國際對世界政治的領導成為過時」。¹然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並沒有決定在1935年解散共產國際。雖然還沒有發現相關的檔案材料來解釋蘇聯領導人在關於解散共產國際問題上的真正考慮，²但是，在當時的國際條件下，解散共產國際的條件顯然尚未成熟。共產國際雖然已不再開展世界革命，但是尚未完全失去其利用價值。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世界革命」這一概念不

1 《福斯特選集》，第439頁，轉引自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128頁。

2 克勞丁對其中的原因進行了推測，他認為，蘇聯領導人擔心，許多共產黨員會把共產國際的解散看作是蘇聯徹底拋棄了列寧主義路線。他們還擔心這會引起一場危機使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們創建第四國際的企圖得以實現。他還推測，斯大林在打共產國際牌，企圖利用共產國際對西方國家施加壓力。共產國際雖然已經成為蘇聯外交政策的障礙，但是還尚未失去全部的利用價值。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128-129頁。

是作為一項戰略任務，而只是作為一項意識形態上的方針。這次大會為各國共產黨規定的戰略是：實現廣泛的人民陣線，動員羣眾反對法西斯，建立起人民陣線。斯大林贊同共產國際新的政治方針並參加了會議決議的起草工作。¹

即便是放棄激進的世界革命策略，在意識形態上向西方國家作出讓步，轉而實行較為溫和的人民民主陣線政策，共產國際仍然是蘇聯與英法等國發展關係的障礙。這種障礙在 1936 年爆發的西班牙內戰中表現了出來。在這場衝突中，蘇聯不能推卸與戰鬥的西班牙人民主動團結的責任，否則就有喪失它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心目中的一切威望的危險。從某一方面來講，這一責任與蘇聯在這一時期的反法西斯主義的外交路線是相一致的。可是，從另一方面來講，可以說它同這一路線所採取的戰術形式是矛盾的。因為蘇聯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要鞏固同法國的軍事聯盟，並同英國達成諒解。但是，無論是當時的法國政府，還是英國政府，都不能容忍西班牙取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因此，對蘇聯政府來說，支援西班牙共產黨就意味着與西方大國關係的惡化。看來，能夠使援助西班牙共產黨與蘇聯的外交目標相一致的唯一辦法，就是保證西班牙共產黨的革命不要超越法國和英國可以接受的程度。對蘇聯來說，西班牙事件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斯大林之所以幫助西班牙共和國，只是為了使共和國能多存在一段時間，並在反對希特勒的聯盟體系的組織內部達到西方民主國家肯接受的讓步的解決辦法，而不是為了使西班牙共和國獲得勝利。²

儘管共產國際轉變了激進的革命路線，儘管蘇聯在西班牙內戰中態度謹慎，但是英法等國家對蘇聯的擔心仍然沒有消除，並且這種擔心大

1 參見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55.

2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 255 。

於對法西斯國家進行擴張的擔心，因而他們對德意法西斯的擴張實施綏靖政策，企圖推動希特勒進攻蘇聯。並且這種擔憂在美國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比如，蘇芬戰爭爆發之後，33%的美國人認為，斯大林比希特勒引起了歐洲更大的消極反應，因為「共產主義威脅西方文明」。30%的美國人認為，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樣危險；16%的美國人認為，希特勒是引起歐洲動盪的重大策源地，而斯大林只是「模仿了他的方法」。¹ 在西方輿論界看來，共產主義的威脅甚於希特勒的擴張帶來的威脅。這在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蘇聯企圖與西方國家結盟，建立集體安全，應對德國威脅努力的失敗。

在為營造歐洲集體安全而努力的同時，斯大林也不忘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1939年夏天，在同英國和法國進行談判的同時，蘇聯代表也在同德國進行着談判。在與英法進行的談判遭到挫折，並從希特勒那裏得到了蘇聯領導人所需要的東西之後，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是蘇聯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轉變。與這一轉變相適應，斯大林要求共產國際再次改變路線，取消反法西斯和人民陣線的口號，並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爭取和平鬥爭的口號。他下達指示要求共產國際淡化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弱化反法西斯的鬥爭，並且，不允許各國共產黨給希特勒撕毀合同、進攻蘇聯的藉口。² 雖然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但是，斯大林對蘇德戰爭的擔心並沒有消除，他只是要贏得時間，準備戰爭。顯然，共產國際的存在無疑仍然可能成為德國進攻蘇聯的藉口。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也把共產國際再次置於尷尬的境地，正如

1 Levering R., *American opinion and the alliance, 1939-1945*, Chapel Hill, 1976, p. 34,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1941-1945гг, Смоленск: РУСИЧ, 2001, с.136.

2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ВКП (б) и Коминтерн, с.17.

西方與論界所宣稱的，「蘇聯要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曾考慮解散共產國際。1941年4月在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層裏開始出現一些懷疑共產國際的存在是否適宜的言論。1941年4月20日，斯大林在同日本前外相松岡洋右進行談話時表示，共產國際妨礙了各國共產黨的獨立發展以及自己的任務的實現。因此，「共產國際在近期是否繼續獨立存在以及在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國際聯絡和國際工作的新形式問題尖銳地、明確地提出來了。」1941年4月21日，季米特洛夫同愛爾科利和多列士也討論了關於「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之以情報和對各國共產黨提供思想和政治幫助的機構」。1941年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同馬努伊爾斯基討論了關於發表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的決議的根據相關問題。¹但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還沒有就解散共產國際作出最終的決定，蘇德戰爭就爆發了。

二、1942 — 1943 年蘇聯與盟國關係中的危機 與共產國際的解散

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蘇聯與美英等國建立了國際反法西斯聯盟。但隨着反法西斯戰爭的不斷勝利，蘇聯與美英的關繫在1942—1943年上半年發生了危機。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繼續與美英保持合作關係，才能取得對德戰爭的最終勝利，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在戰後維護蘇聯的安全利益。為消除與美英關係中的危機，作為向西方國家作出的一種友好姿態，1943年5月，蘇聯領導人突然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1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馬細諾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35、136、140頁。

（一）1942 — 1943 年蘇聯與盟國關係中的危機

蘇德戰爭爆發之後，美英開始支持蘇聯的對德戰爭，特別是美國把租借援助的範圍擴大到蘇聯，向蘇聯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在蘇德戰爭初期，在蘇聯處於極其困難的戰爭條件下，這些援助起到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在共同的戰爭目標下，1942年初，蘇聯與美英等國建立反法西斯聯盟。但是，聯盟的建立並沒有消除蘇聯與美英關係中的障礙。

在反法西斯聯盟建立之後，意識形態因素仍然是蘇聯與西方國家關係中的重大障礙。十月革命以來，「信奉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說教一直都是西歐的夢魘。」¹ 意識形態因素雖然沒有妨礙西方國家同蘇聯在反法西斯的基礎上聯合起來，但是，在反法西斯聯盟建立之後，美國和英國的政界和輿論界都沒有改變他們的反蘇反共立場。美英只是出於實用主義的目的，才決定聯合蘇聯，才決定向蘇聯提供一些援助。蘇德戰爭爆發以後，丘吉爾在宣稱將「盡一切力量幫助俄國和俄國人民」的同時，仍然宣稱，「在過去 25 年裏，沒有人比我更加始終一致地反對共產主義。凡是我談過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話，我決不收回。」² 美國援助蘇聯的目的也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正如 1947 年美國駐蘇聯大使加里曼在談到美蘇戰時軍事合作的時候所說的，在這一合作中，美國人的目的完全是實用主義的：紅軍可以摧毀希特勒的力量，而美國人就不必自己做這一困難的工作。羅斯福不希望美國軍隊像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樣再次流血。³

蘇德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和英國的社會輿論仍然對斯大林同希特勒達成的協議記憶猶新，許多報紙雜誌、國家領導人和社會領袖的許多言論，都對蘇聯的社會政治制度表示了深刻的厭惡，甚至希望蘇聯和希特

1 The *Torpeka Daily Capital*, June 24, 19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17.

2 丘吉爾對德國侵略蘇聯發表的聲明，1941年6月，轉引自 溫斯頓·丘吉爾：《永不屈服：溫斯頓·丘吉爾一生最佳演講集》，李陽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第259頁。

3 參見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285.

勒德國相互廝殺。蘇德戰爭的爆發再次使蘇德於 1939 年簽署的條約成為美國輿論界關注的焦點。1941 年 6 月 24 日，《堪薩斯報》轉載了美國著名政論家休·約翰遜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指出：「許多觀察家都相信，斯大林的戰略是非常狡猾的，這一戰略的實質是，靜待英國、或許還有美國、日本相互摧毀或相互廝殺、相互削弱。」該文認為，在蘇德條約簽署之後，斯大林「使希特勒有機會奪取波蘭，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俄國人也得到了好處，他們奪去了部分波蘭領土，奪去了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這些小國家。」同時，美國的一些地方媒體又再次提出了關於蘇聯領導人煽動世界革命的問題，並且強調說，這是他們反對向俄國人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最為充分的理由。《堪薩斯報》寫道：「許多高級官員，其中包括深得總統信任的哈利·霍普金斯和埃夫里爾·加里曼，都在暗地裏詛咒蘇聯的體制。」該報認為，對蘇聯體制的肯定看法是應當受到指責的，「雖然德國入侵了蘇聯，但是無論怎樣都不能因此而支持斯大林推行世界革命。」報紙指出，蘇聯反對德國的戰爭，目的不是為了民主和自由，而是為了蘇聯的生存。即使一些報紙認為，美國可以向蘇聯提供其對希特勒作戰所必須的彈藥，但同時也認為，不應該因此得出結論，「必須支持斯大林對其統治體系的看法」，該報強調說，該文所表達的上述看法是「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看法」。¹ 美國輿論界許多代表都相信，美國和蘇聯政治體制的差別是兩國改善關係不可克服的障礙。²

1941 年 10 月 16 日，美國勞工聯合會在西雅圖召開了第 61 次會議，這次大會通過的決議比勞工聯合會領導人的報告具有更強的反對共產主義傾向。決議指出，「斯大林對歐洲國家取得勝利的後果與希特勒對歐洲國家取得勝利的後果一樣嚴重。」決議強調說，共產主義「像過去一樣，對美國的制度仍然是非常危險的」。美國的社會輿論對於同「共產主義俄

1 The Topeka Daily Capital, June 28, 1941; November 2, 19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73.

2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74.

國」結盟的前景的看法非常警覺。休·約翰遜認為，美國共產黨滲透進工人組織，是為了破壞美國的經濟，並為世界革命做準備。¹ 就連實施租借援助法案的美國駐英國代表加里曼也在通過路透社發表的廣播講話中指出：「現在美國絕大多數人都很清楚，幫助俄國人反對納粹的侵略無論如何都不會影響我們對共產主義的態度。」²

影響美國對蘇看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關於教會在蘇聯的地位問題。美國的許多人曾多次就這個問題對蘇聯領導人和斯大林本人提出批評，他們認為，在蘇聯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³ 在美國的一些人士看來，斯大林主義與無神論是結合在一起的。1941年7月1日，一名記者在給羅斯福的信中寫道：「同我們極端厭惡納粹軍事機器相比，我們也極其厭惡斯大林主義。我們應該仇視斯大林主義及其無神論學說。」⁴

極端反蘇主義，極端反斯大林主義參透進了美國資深觀察家的每一句話。……這些看法，在美國非常流行。⁵ 甚至在美國的國家機關和政治機構也是如此。在對蘇聯人民來說最為悲慘的那些歲月裏，美國的保守人士明顯地形成了如下立場：讓德國和蘇聯、希特勒和斯大林儘可能長時間地相互戰鬥、相互廝殺，當德國和蘇聯都筋疲力盡的時候，美國再積極地參與戰爭。美國參議員、後來擔任美國總統的杜魯門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後也宣稱，應該讓俄國人和德國人廝殺儘量長的時間。在德國進攻蘇聯的第二天，堪薩斯州議員凱珀宣稱：

在我看來，同斯大林建立聯盟的危害只是比同希特勒建立聯

1 The *Torpeka Daily Capital*, October 17, 1941; June 26, 19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69, 121.
 2 ГАРФ, Ф, 4459, Оп. 12, Д. 217, л. 65, 66,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53.
 3 參見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246.
 4 F. D. Roosevelt Library, Collection OF 220, Box 3, Russia 1941, R. A. Grant to F. Roosevelt, July 1, 19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19.
 5 參見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21.

盟的危險相對小一些……只要這兩個獨裁者相互廝殺，美國就能夠鞏固自己的國家安全，能夠作好用武力應對各種事件的準備。¹

美國國內的反蘇浪潮，雖然沒有動搖羅斯福向蘇聯提供援助的決心，但不能不對羅斯福政府的對蘇政策施加一定的影響。因此，羅斯福特意通過其密友和處理特別重要問題的私人助理加里·霍普金斯以總統的名義向蘇聯提出了解散共產國際以及與俄羅斯東正教和解的問題。羅斯福在信中表示，為了排除反對派對根據租借法案向盟國提供援助的障礙，以及保障與盟國在戰時的政治合作，這樣做是必須的。²

英國人也存在與美國人上述類似的看法。德國進攻蘇聯形成了新的軍事政治局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領導人開始轉變對蘇聯的態度。丘吉爾在6月22日通過廣播向蘇聯發出的呼籲中以及在7月8日寫給斯大林的信件中都表示，願意盡一切可能幫助蘇聯。但是，這並不意味着6月22日以後情況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意味着英國所有的政治勢力都開始支持蘇聯和斯大林。即使6月22日英國和蘇聯自發地結成了軍事和政治聯盟，這也沒有阻止反蘇主義和反斯大林主義的慣性。戰爭期間，英國的一些政治勢力仍然在強烈地批評蘇聯和斯大林，抱怨斯大林曾同德國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並不願開闢第二戰場，幫助蘇聯。³在莫斯科戰役最緊張的時刻，丘吉爾給英國駐蘇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信件中寫道：「當他們（蘇聯領導人）同立賓特洛夫簽訂條約的時候，他們就已經為自己下了判決書，他們使希特勒有了侵略波蘭、點燃戰火的機會。他們允許法國軍隊遭受失敗，使自己失去了有效的第二戰場。」丘吉爾宣稱，「關於第二戰場，談都不用談。」⁴蘇德戰爭爆發之後，丘吉爾

1 The Topeka Daily Capital, June 23, 19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16-117.

2 帕維爾·蘇多普拉托夫：《情報機關與克里姆林宮》，魏小明等譯，東方出版社，2000年，第255頁。

3 參見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201.

4 *Черчилль У. Указ. соч. Книга 2*, с. 219,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94.

雖然宣稱支持蘇聯，但他真正的政治目的卻是：在蘇聯同德國的戰爭中最大限度地削弱蘇聯，並使西方國家在戰後同蘇聯的交鋒中處於有利的地位。¹

總之，蘇德戰爭爆發之後，美英雖然與蘇聯聯合起來，但是，這種聯合都是在建立在實用主義的基礎上的，在兩國的輿論界和政治界仍然存在強烈的反蘇反共主義。

隨着盟國對德戰爭的勝利，從 1942 年底到 1943 年初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盟國將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關於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開始日益突顯出來，美英對蘇聯的擔憂增加了：二戰後的世界會向什麼方向發展？戰後的歐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歐洲還是社會主義的歐洲？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對立的制度今後能否和平共處？

實際上，早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初，美國政界的一些人士就表現出了對俄國取得戰爭勝利的擔憂，並反對向蘇聯提供援助。比如，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惠勒指出：「俄國的勝利會產生一個共產主義的歐洲」，「美國人是否希望，用我們的金錢來援助蘇聯，或者讓美國士兵同蘇聯一起作戰，而結果則是為了確保共產主義在歐洲和全世界取得勝利？」² 隨着蘇聯在對德戰爭中不斷取得勝利，這種擔憂在不斷增加。正如蘇聯內務部駐外機構在 1943 年 3 月 7 日和 3 月 10 日發往莫斯科的報告所指出的，「現在，國務院領導人毫不懷疑，德國將會失敗。美國人開始擔心，他們擔心蘇聯事實上會成為真正的勝利者，並且，由於這些勝利，一些國家可能會建立起蘇聯體制。他們都對共產主義充滿擔憂，現在他們提出的一個問題是，美國是不是在為將來推廣共產主義提供幫助。因此，國務院一些領導人的反蘇傾向在增長。雖然現在還沒有聽到有關反對蘇聯

1 參見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294.

2 *The Torska Daily Capital*, June 26, 19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121.

的具體計劃，但是，從國務院一些工作人員的談話中可以得出的一個共同的印象是，他們都表現出了反蘇情緒。他們對蘇聯今後在歐洲的作用充滿擔心，他們認為，一旦德國失敗，很有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是，波蘭、巴爾幹、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國將會確立起蘇聯體制。¹

英美對蘇聯的這種擔憂影響了他們的對蘇政策，並使他們與蘇聯的關繫在 1942 — 1943 年出現了危機。

這些危機首先表現在第二戰場問題上。第二戰場的開闢對盟國取得對德戰爭的勝利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1942 年 5 月 29 日，在莫洛托夫對華盛頓進行訪問的時候，經過同羅斯福和其他美國最高軍事領導人進行的談判，蘇美兩國在會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提出，「雙方就在 1942 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這一刻不容緩的任務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² 但在蘇德戰線正在進行着殘酷的戰鬥的 1942 年，盟國遲遲不願開闢第二戰場。

在拖延開闢第二戰場的同時，美國也放緩了對蘇租借物資的供應。蘇聯與美英的租借援助的供應問題上的矛盾開始突出起來。

蘇聯與美英在開闢第二戰場問題和租借物資援助問題上的矛盾反映的是美英對蘇另外的一種戰略意圖：讓蘇聯與德國相互廝殺，儘可能地削弱蘇聯，以便在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上取得優勢的地位。

對於英國拖延開闢第二戰場的戰略意圖，美國學者約翰遜認為：「丘吉爾和英國人企圖越過地中海，在意大利登陸……以便獲取一個基地，為他們戰後在政治上控制歐洲而鬥爭。」英國歷史學家凱芹也指出，「隨着德國軍隊繼續對斯大林格勒展開進攻，英國的社會輿論越來越傾向於認為，盟國將會推遲開闢第二戰場。輿論懷疑，英國是要讓俄國人和德

1 Патрушев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V, к1, Москва: Русь, 2008, с.252; с.260.

2 參見 Борисов А. Ю. СССР и США: Союзники в годы войны, 1941–1945, Москва, 1985, с.97.

國人相互戰鬥，因為英國政府不希望俄國在戰後過於強大。」¹ 1943年4月，來自蘇聯駐外安全機關的情報也進一步證明了美英的這種戰略目的。這些情報表明，由於蘇聯紅軍在軍事上取得的勝利，美英的一些勢力對蘇聯的擔憂增加了，他們企圖使蘇聯和德國相互廝殺，兩敗俱傷，然後再從中得利。1943年4月10日，蘇聯內務部駐外機構發回的情報顯示，英國人要做做的就是「讓德國和蘇聯相互廝殺到精疲力竭」，以便提出條件，迫使他們接受。英國人相信，「在取得勝利的時候，蘇聯將是非常虛弱了，不能再指望進行軍事擴張了。相反，蘇聯將會不得不向英國求助，以便拯救自己的國民，並處理好自己的債務。」²「如果蘇聯準備擴張的話」，英國將準備對蘇作戰。英國對蘇聯提供的有限的幫助，只是為了讓蘇聯能夠把戰爭進行下去。當英國人確信，德國和蘇聯都已經極其虛弱的時候，他們才會開闢第二戰場，結束戰爭。這樣對英國有利。蘇聯安全機關得到的情報還顯示：隨着蘇聯紅軍在軍事上取得一些重大的勝利，羅斯福和丘吉爾開始擔心，在盟國開闢第二戰場之前，俄國人可能會戰勝德國。為此，他們倉促召開了卡薩布蘭卡會議，討論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問題。英美「企望蘇聯和德國相互廝殺，相互削弱」，希望「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保存實力，以便把自己的條件強加給蘇聯」。²

更令斯大林感到警惕的是，來自蘇聯國家安全機構的情報還顯示，1942—1943年上半年，英美代表曾多次嘗試着同希特勒的反對者進行祕密接觸，企圖簽署單獨的和平條約，結束戰爭。

1942—1943年，關於美英代表同希特勒反對派進行接觸的情報源源不斷地通過蘇聯國家安全機關駐外機構發往莫斯科。這些情報顯示，

1 Johnson G., *Eisenhower: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Great General, President and Statesman*, Derby, 1962, p.76; Kitchen M.,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Basingstoke, London, 1986, p.14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207.

2 *Патрушев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V, к1, с.371、117、372.

莫斯科戰役之後，德國就已經開始經受嚴重的困難，開始感到人力和物力的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國內開始出現一些悲觀情緒，一些高級官員，其中包括馮·勃勞希奇——巴巴羅薩計劃的制定者之一和德國前總理馮·帕本都開始認為，德國將不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了，他們企圖尋求途徑，同英美單獨談判，使德國擺脫戰爭。這種認識促使他們希望通過同盟國單獨進行秘密的談判，力求達成妥協。¹ 根據馮·帕本的提議，反對派的代表在1942年同英國在土耳其、瑞典、梵蒂岡進行了單獨的談判，企圖簽署單獨的停戰和約。² 這種試探首先在土耳其進行。1942年5月，在德國的授意下，土耳其試圖作為中間人使英國和法西斯德國簽署單獨和約，並對英國和蘇聯的關係進行挑撥。1942年5月，德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秘密乘坐瑞典民航飛機到了英國進行和平談判，並受馮·帕本的委託提出了和平條件。1942年5月23日，蘇聯內務部駐外機構發回的報告表明：德國企圖同英國開始進行單獨的和平談判。為此，德國工業家奧本海默（獲得了雅利安人權利的猶太人，是戈林的密友）企圖在瑞典展開活動，為英德進行單獨的和平談判創造條件。而英美代表也對德國的希特勒反對派們發出的這些單獨媾和的倡議作出回應。1942年7月，英美一些大銀行把自己的一些代表派到了瑞士，同德國銀行界代表進行了幾次秘密會談，討論了關於戰後向德國提供貸款的問題以及關於歐洲的經濟秩序問題。從1942年9月開始，這些希特勒的反對者們開始夥同一些工業界的代表背着希特勒同英國駐中立國家大使館的一些工作人員進行談判，商討關於同英國和美國締結單獨和約的

1 Патрушева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I, к1, Москва: Русь, 2003, с.534-535.

2 Патрушева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V, к1,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с.XIII.

可能性。¹ 而一些中立國家的代表也在利用「布爾什維主義」的威脅，對英美與蘇聯的關係進行挑撥。1943年初，在同英國代表進行的祕密談判中，土耳其代表企圖說服英國在巴爾幹推行反蘇政策，以便不使「布爾什維主義」蔓延到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而這種挑撥顯然是會產生一定的效果的，1943年2月，莫斯科得到消息說，美國情報局資深情報員杜勒斯在瑞士同親近法西斯德國的一名公爵一起討論了關於組建「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防線」的計劃。²

斯大林無疑會對英美方面同德國代表舉行的這些祕密談判更加警覺。畢竟，戰前英美曾對希特勒德國實行「綏靖」政策，並採取「禍水東引」的戰略，推動德國進攻蘇聯。正如克勞丁所指出的，在反對社會主義、不使歐洲爆發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問題上，美英的意見是一致的。³

英美和德國代表進行的這些祕密和談的嘗試，雖然都沒有獲得什麼結果，也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和談得到了英美最高領導層的指示，但英美的對蘇政策已經在發生一些變化，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英美對開闢第二戰場的拖延和延緩對蘇租借援助物資的供應。顯然，在某種情況下，英美同德國單獨媾和、締結和約的可能性還是不能被完全排除的。而且，一旦他們達成了協議，蘇聯的處境將會更加艱難，甚至不堪設想：根據蘇聯國家安全機關在3月份得到的情報，雖然日本帝國會議已經決定暫時不介入蘇德衝突，但是仍將祕密地加強針對蘇聯的軍事準備，一旦「蘇德戰爭向有利於帝國的方向發展」，日本將會「使用武力解決北方問題」。⁴

1 Патрушев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I, к1, с. 439-440, 446-448, 478; к2, с.40-41.

2 Патрушев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V, к1, предисловие, с.XIII. XIV.

3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19頁。

4 Патрушев Н.П.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 к1, с.594-595.

面對這種情況，除了保持與美英的聯盟關係、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下去之外，蘇聯外交已經別無選擇。否則蘇聯不僅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而且還將再次面臨西方國家在反蘇和反共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的局面。在蘇德戰爭正在進行的情況下，這種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為了保持與美英的聯盟關係，把反法西斯戰爭進行下去，就必須消除英美在意識形態上對蘇聯的擔憂。為此，蘇聯就需要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作出讓步，需要盡力克制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在此情況下，共產國際的解散便提上了議事日程。而且，到了1943年5月，解散共產國際的國際條件也已成熟。

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蘇聯雖然同美英在反對德國法西斯的基礎上聯合了起來，但是，對於斯大林來說，未來世界的局勢仍是不明朗的，戰後與美英是什麼樣的關係尚不得而知，共產國際對於蘇聯來說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它便被積極利用起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竭盡了一切可能去動員共產黨及其擁護者同法西斯國家進行鬥爭。英國、美國、加拿大的共產黨被號召起來採取一切措施努力配合本國的軍事行動，在最短的時間內開闢「第二戰場」，幫助蘇聯。同時，為了蘇聯與盟國關係發展的需要，在國際共運問題上，共產國際採取溫和的立場，建議各國共產黨不要再提出致力於實現民主改革和革命的要求。當一些共產黨把德國反對蘇聯的戰爭視為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戰爭的時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立刻指出，這一立場是錯誤的。¹而到了1943年，隨着蘇聯與英美關係中的危機，处理好與英美兩國的關係已成為斯大林唯一的戰略選擇。而與此同時，鑒於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及其擁有的實力地位，在處理戰後世界安排的一系列問題上，美英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與蘇聯合作、滿足蘇聯利益的意願。

1 РЦХИДНИ, Научно-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бюллетень, Вып., №1, М., 1992, с.14, 轉引自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58.*

1942年5月，在莫洛托夫對英國進行訪問期間，蘇英兩國簽署了同盟條約，其中除了規定有關兩國在戰時進行合作的一些問題之外，還規定兩國要承擔戰後共同行動與合作的義務。1943年5月5日，羅斯福寫信給斯大林，希望與斯大林在夏季舉行會晤，解決戰時問題和關於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¹

（二）共產國際的解散

為了與美英進行合作，最終取得對德戰爭的勝利，就必須消除蘇聯與美英關係中的危機。同時，為了在戰後世界安排的問題上與美英進行合作，取得有利於蘇聯的結果，蘇聯就必須消除美英的疑慮，在這種情況下，解散共產國際也就成了蘇聯的必然選擇。

然而，共產國際的解散過程則是倉促的。解密的檔案材料表明，1943年5月8日深夜，莫洛托夫向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通報了蘇聯領導層（更準確地說，就是斯大林）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意見。²這一點也得到季米特洛夫日記的印證。³而在此之前，共產國際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在5月6日舉行的共產國際書記處第822次會議上根本並有提出關於解散共產國際活動的任何問題。這說明，斯大林在作出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之前，共產國際內部對這一決定是毫不知情的。

是什麼原因促使斯大林在這一時刻突然作出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呢？顯然，羅斯福在5月5日寫給斯大林的信件起了促進作用。在這封信裏，羅斯福提議蘇美兩國首腦在夏季舉行一次會晤。⁴1—2天后

1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1, 1944-1945,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гиздат, 1984, с.315.

2 Лебедева Н., 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4, №5, с.81.

3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43頁。

4 羅斯福給斯大林的信件，1943年5月5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39-340頁。

莫斯科收到了這一信件。¹ 之後，斯大林與莫洛托夫進行了商談，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委託莫洛托夫把這一決定告知了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一切看來，斯大林之所以突然提議解散共產國際，顯然是考慮到，他同羅斯福總統即將舉行的會晤將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晤，在這次會晤中他們不僅要討論戰時的相關問題，而且還將討論關於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這次會晤將關係到蘇聯戰時和戰後目標的實現與否。因此，必須為這次會議的召開掃清一切障礙。為此，斯大林當然明白羅斯福的關切，明白應該怎麼做。畢竟，早在 1941 年 12 月，羅斯福就通過其密友和處理特別重要問題的私人助理加里·霍普金斯，以總統的名義向蘇聯提出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及與俄羅斯東正教和解的問題，羅斯福總統提出這些要求的理由是：為了排除反對派根據租借法案向盟國提供援助的障礙以及保障與盟國的戰時政治合作。為了為即將到來的蘇美兩國高層會晤掃除障礙，並向西方國家作出一種友好的姿態，滿足羅斯福在信件中提出的這些要求是非常必要的。²

因此，在收到羅斯福關於舉行兩國首腦會晤的信件之後，斯大林馬上就作出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而且，必須是在美蘇首腦夏季會晤之前解散。共產國際的解散過程表明了蘇聯領導人是如何迫切地希望儘快解散這一機構的。5 月 8 日深夜，莫洛托夫把蘇聯領導層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告知了季米特洛夫和馬伊努爾斯基；5 月 11 日，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共同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草案，並如期將之呈遞給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當晚，斯大林接見了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在場的還有莫洛托夫），並對其所提交

1 *Левбева Н., Нарц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с.86.*

2 在解散共產國際後不久，斯大林接見了俄羅斯東正教會首領麥特羅波里當·塞捷斯，並且在這次接見之後，蘇聯宣佈了恢復神聖宗教會議的決定。詳見：賈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 10 頁。

的草案表示讚許；5月15日，報紙上刊登了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消息；5月20日，斯大林加快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步伐，在5月20日晨給季米特洛夫打電話，催促儘快將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解散國際的決議登報公佈；6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最後一次會議，宣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和祕書處以及國際監察委員會解散；¹6月10日，《真理報》公佈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1943年6月8日決定的通告。²這樣，從5月8日提出解散共產國際問題到6月8日共產國際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共產國際就被解散了。

在解散共產國際期間，1943年5月28日，斯大林還接受英國路透社駐莫斯科記者的採訪，就解散共產國際的原因進行說明。斯大林在這次談話中指出：一方面，解散共產國際可以揭穿希特勒分子和共產主義的敵人關於「莫斯科企圖干預別國的生活，並使他們布爾什維克化」的謊言和誣蔑；另一方面便於進步力量聯合成統一的民族解放陣營，展開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³這樣，斯大林實際上是向西方宣稱要放棄世界革命，他解散共產國際的舉措實際上也是其為消除英美的擔憂而作出的一種姿態。

這種姿態也得到了美英政治界和輿論界的好評。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重要委員，德州的參議員湯姆·康納利（不久即出任外交委員會主席）讚揚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舉動是轉向西方價值的基礎，「俄國人多年來都在改革其經濟，也趨向放棄共產主義，整個西方世界將樂見其努力臻至高峰。」甚至，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堡壘《幸福》雜誌亦以同樣的口吻對斯大林的這一舉動讚揚有加。⁴

1 Лебедева Н., 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с.81, 86 :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47頁。

2 Правда, 10 июня 1943г.

3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51-252頁。

4 基辛格：《大外交》，顧淑琴等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66-367頁。

就連丘吉爾也對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舉動表示肯定，在他寫給斯大林的信中指出：

西歐各國都擔心共產主義的侵略……，因為我們兩國的社會制度不同，無論他們具有多少優點，任何一國都不願遭受流血的革命。……我們認為，您作出的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是正確的，我們把這看作是蘇聯政府決定不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¹

應該說，斯大林是非常了解局勢的，他對1942—1943年蘇聯與英美之間出現的危機有着清醒的認識，在共產國際的活動在國外引起了一些懷疑，英美的一些社會輿論對共產國際的存在表示不滿的情況下，他作出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西方的擔憂。1944年10月14日，丘吉爾在與斯大林就波蘭問題進行的談話中開誠佈公地對斯大林說，歐洲的小國對於布爾什維克革命怕得要死，這是因為在共產國際解散以前蘇聯政府曾經宣佈要讓歐洲所有國家都改信新教。1919—1920年時，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嚇得發抖。對此，斯大林回答說，現在世界不會再嚇得發抖了。蘇聯無意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丘吉爾回答說，他相信斯大林元帥向他表示的一切。²

在共產國際解散後不久，1943年11月，蘇美英三大國首腦首次在德黑蘭舉行了會晤，蘇聯與盟國之間懸而未決的第二戰場問題得到解決，這就保證了盟國反法西斯戰爭的順利進行。不僅如此，蘇美英首腦會晤的順利舉行，也預示着三大國將在戰後繼續合作，維護世界和平，預示着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將要建立，蘇聯將積極地參加這一進程，最大限度地維護蘇聯的利益，並使這種利益得到西方的承認。因此，可以說，共

1 丘吉爾給斯大林的信，1944年10月11日，這封信件沒有發出。NSA-R9466。

2 斯大林與丘吉爾關於波蘭問題的談話記錄，1944年10月14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第717-720頁。

產國際的解散標誌着蘇聯開始走上在戰後與西方大國進行合作的道路。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來看，共產國際解散的影響是深遠的。長期以來，共產國際按照蘇聯對外政策的需要，給各國共產黨規定了一條清一色的路線，而不是要求他們主動地制定出最符合本國具體特點的方針，結果導致了一些國家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失敗。正如共產國際在解散時所承認的，由一個國際中心領導各國革命運動已被歷史證明破產了，「經驗表明，不能有所有國家的國際領導中心。」¹ 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解除了對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束縛，是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的。二戰期間，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法國、意大利等國的共產黨根據自身的特點，制定了正確的發展路線，共產黨的人數不僅得到極大的增長，而且由於其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本國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力也空前增長。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雖然被解散，但它的部分功能卻實際上被保存了下來，只是集中在蘇聯共產黨的機關——共產黨國外局和國家各機關，其中包括內務部中。而且，在共產國際消亡之後，共產國際的領導方法依然存在。² 蘇聯共產黨仍然通過相關的機構與一些主要國家的共產黨保持聯繫，對這些國家共產黨的活動施加影響，使這些國家共產黨的活動符合蘇聯對外戰略的需要。從而對這些國家共產黨戰後發展道路的選擇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三、蘇聯領導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構想

共產國際的解散標誌着蘇聯領導人已經確立了與美英在戰後進行合

1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 243 頁。

2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第 23 頁。

作的政策。此後，蘇聯領導人加快了解決戰後世界安排問題的步伐，¹ 並就這些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構想，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維護蘇聯在戰後的安全，作好應對下一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是蘇聯領導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構想的核心。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相關理論，資本主義意味着戰爭，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及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斯大林認為，戰後 6—20 年內，復興的德國將會再次復仇，引發戰爭。日本也將在 20 或 30 年內恢復力量。1945 年 4 月，在鐵托率領的南斯拉夫代表團在莫斯科訪問期間，斯大林提出了德國復興及其對和平的危險問題。在反駁在座的一位代表團成員關於德國復興需要 50 多年時間的插話時，斯大林說：「不，他們能復興，而且很快。給他們 12—15 年的時間，他們便能重新站起來。」² 當然，斯大林對德國恢復經濟和軍事實力所需時間的估計是有變化的，1945 年 6 月 23 日在克里姆林宮慶祝波蘭民族統一臨時政府成立的招待會上斯大林說：歷史教導我們，德國人力量的恢復要不了多長時間。6 年就夠了，德國能重新恢復自己的力量並構成新的戰爭威脅。³ 總之，在斯大林看來，那些在科學、技術和經濟方面表現出驚人的能力，曾經征服歐洲，甚至差點擊碎蘇聯的德國人，在長時間裏陷入虛

1 1943 年 9 月到 11 月，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決定建立和約與戰後安排問題委員會、停戰問題委員會和由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邁斯基領導的希特勒德國及其盟國對蘇聯造成損失的賠償委員會，來研究關於停戰問題和關於戰後世界的安排問題。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16 卷，第 672—673 頁。

2 Djilas M., *Wartime*. N.-Y., 1977, p.437-438,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30.

3 Archiwum Akt Nowych (Warszawa). 295 / VII-244. S.40-41,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0-31.

弱和癱瘓是不可想像的。¹ 德國將在 6 到 20 年內重新站起來，重新發動戰爭。斯大林也認為，同德國一樣，日本也將復活，對蘇聯的遠東地區構成挑戰。1945 年 7 月 7 日，斯大林在同到訪的宋子文進行會談時說，日本將在 20 或 30 年內恢復力量。正是出於這種認識，蘇聯領導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構想都是建立在為下一次世界大戰作準備，特別是作好應對德國發動復仇戰爭的準備的基礎上的。因此，蘇聯戰後對外戰略主要目的便在於應對戰爭，維護蘇聯的安全，這一戰略也可以稱之為安全戰略。²

（二）地緣因素在蘇聯戰後的安全戰略中佔據首要的地位。

首先，為了應對來自德國的下一場戰爭，在地緣上位於德國和蘇聯之間的東歐地區在戰後蘇聯的安全戰略中佔據着首要的地位，因為「德國人侵入蘇聯是經過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³ 因而，東歐地區成為蘇聯領導人特別感興趣的地區。早在 1941 年 12 月 16 日，在莫斯科與英國外交大臣安·艾登進行會談時，斯大林就從地緣的角度明確闡述了他對戰後歐洲體制的粗略示意圖：恢復蘇聯在 1941 年 6 月前擁有的邊界線；通過簽訂軍事聯盟和允許蘇聯在其領土上設置軍事基地的途徑，將芬蘭和羅馬尼亞列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削弱並肢解德國；恢復德國侵略受害國以前的邊界線，同時使邊界劃分略有利於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土耳其因保持中立立場獲得賠償。⁴

1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and La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7-48.

2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55-56.

3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斯大林文選（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 464-465 頁。

4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1, с.18.

為了確保東歐地區成為蘇聯安全的屏障，戰後，蘇聯領導人致力於在東歐國家建立起對蘇友好的政府。1946年3月，斯大林強調說，「蘇聯為了保證自己將來的安全，力求在這些國家（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內能有對蘇聯抱着善意態度的政府」，理由是，「德國人所以能夠經過這些國家侵入蘇聯，是因為當時在這些國家存在着敵視蘇聯的政府。」¹另一方面，戰爭後期，蘇聯軍隊已越境進入東歐國家作戰，這就為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實施自己的安全戰略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機會和條件。所以，斯大林對東歐的政策就是要利用蘇軍進入東歐作戰的機會，在這一地區建立起蘇聯的勢力範圍，使之成為蘇聯牢固的安全地帶。

除了致力於在東歐建立安全地帶和對蘇友好的政府之外，蘇聯領導人還致力於在遠東地區建立蘇聯的安全地帶，以應對未來日本的挑戰。1945年7月7日，斯大林在同到訪的中國外長宋子文進行會談時說，「日本將在20或30年內恢復力量。我們和中國關係的全盤計劃都是基於此點。萬一日本恢復力量，現在我們在遠東的準備是不足的。」他憂鬱地注意到蘇聯在遠東需要花40年時間建造港口和鐵路系統。他說：「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同盟，蒙古是這個計劃的一部分。」他告訴來訪的宋子文：「萬一日本恢復力量，我們需要中國的大連和旅順港，需用30年。我們將可從這兩個港口對日本發動攻擊。」²

（三）為了維護蘇聯的安全利益，蘇聯需要與盟國進行合作。

在邁斯基、李維諾夫和葛羅米柯構建蘇聯關於戰後世界安排問題的報告中，他們首先關注的都是蘇聯最基本的安全利益，他們都一致認

1 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斯大林文選（1934—1952）》，第464—465頁。

2 斯大林與宋子文的會談記錄，1945年7月7日，《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3卷，第600—603頁。

為，要保持一個和平、穩定的戰後世界秩序，三大國的合作是唯一有效的基礎，並且都認為這有助於維護蘇聯的利益。其次，他們都堅信，英美也同蘇聯一樣，把德國和日本的再次復活看成是主要的潛在危險，這為蘇聯與美英在戰後的合作提供了基礎。再次，他們認為，美英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矛盾，英國或美國都不可能會在近期對蘇聯構成嚴重的威脅，考慮到「英美矛盾」，他們在戰後聯合起來反對蘇聯是不可能的，這就給蘇聯的策略提供了額外的迴旋餘地。¹ 戰後，蘇聯需要與盟國進行合作的必要性還在於，「如果美蘇之間爆發衝突的話，美國將會給蘇聯帶來巨大的麻煩。譬如，它將採用各種各樣的手段來使德國和日本復活。」²

（四）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是蘇聯與美英合作的障礙。

在構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構想的時候，無論是邁斯基、李維諾夫還是葛羅米柯，他們都認為，蘇聯和英美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仍將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是蘇聯與美英合作的障礙。為了與美英合作，共同對抗德國，必須「有意識地把社會主義前途和發展問題放在第二位。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遇到了困難，它應該被推遲到一個合適的時段」。邁斯基承認，「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導致蘇聯與兩個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是對抗」，「現在需要注意，提前進行革命會危害和平、打破平靜，因為這會引起同西方緊張關係的升級。」³

蘇聯領導人雖然希望與英美在戰後進行合作，為此解散了共產國際，消除了蘇聯與英美關係中的一個重大障礙，並且，在蘇德戰爭爆發

1 參見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507-508, 537.

2 AVPRF, f.06, op.6, papka14, de.145, p.27, 39, 轉引自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31.

3 邁斯基給莫洛托夫的關於《未來和平最佳的基本原則》的報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第699-713頁。

之後，蘇聯領導人還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與英國締結了劃分歐洲勢力範圍的協議，這些都為戰後蘇聯與美英的繼續合作奠定了基礎。但是，對於「大同盟」能否持續下去，對於戰後蘇聯與西方盟國能否繼續合作，蘇聯領導人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比如，蘇聯副外長羅索夫斯基曾經證實說，即使在戰爭結束之後，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激烈的對抗也是不可避免的，蘇聯外交的主要目的應該是防止英美建立反對蘇聯的西方聯盟。¹ 在公開的談話和外交談判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示，他們是非常希望戰後的聯盟能夠繼續下去和同西方大國進行合作的。但是也有一些跡象顯示，他們也支持羅索夫斯基的擔心：戰後蘇聯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將更有可能走向衝突。作為務實的政治家，斯大林是不相信蘇聯與西方大國之間能夠長久地和平相處的。1945年1月，斯大林在與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進行的會談中已經預見到同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他說：

在把資本家分化為兩個派別——法西斯和民主派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暴露出來。我們之所以同民主派結成同盟，是因為民主派反對希特勒的獨裁統治。這種殘暴的統治會把工人階級推向極端，以至於推翻資本主義。目前，我們同其中一派結盟來反對另一派。將來，我們就會反對剩下的另一派。²

斯大林也講了他對正在進行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本質和特點的看法：「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能夠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³ 但是，為了實現蘇

1 參見 Роберте Дж. Сферы влияния и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39-1945 гг.: идеология, расчет и импровиз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5, с.86.

2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гг.,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3, с.16-29.

3 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9頁。

聯的安全戰略，為了與盟國尋求某種形式的合作，得到至少是幾十年的和平，壯大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同時，避免一個反蘇集團的出現，同西方盟國進行合作，建立和維持一個有利於蘇聯的戰後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莫洛托夫後來回憶所說，保持這種同盟關係對蘇聯是有利的。¹

四、聯合政府政策：蘇聯對戰後各國共產黨的要求

在解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諸多問題中，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一個突出矛盾就是：戰後各國共產黨在本國的地位問題。

儘管斯大林在 1943 年 6 月解散了共產國際，但是，在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特別是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臘這四個國家的共產黨已經掌握了強大的武裝力量，並且，在戰後，這些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發展使得在這些國家顯然有可能出現革命的結果。無論在法國，還是在意大利，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如此強大的真正能夠對資產階級構成挑戰的羣眾運動。工人羣眾、知識分子以及社會的其他階層發起廣泛的示威運動，要求建立新國家，要求新的階級來進行統治。² 而且，戰後蘇聯威望的提高和蘇聯紅軍在一些歐洲國家的存在為蘇聯實施「世界革命」的戰略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機會和條件。這種狀況都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擔憂：戰後的歐洲是否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歐洲？二戰後期，不僅關於這方面的情報通過國家安全機關被源源不斷地被傳送到莫斯科，而且西方大國的領導人也在同斯大林進行的會談中也

1 丘耶夫：《莫洛托夫訪談錄——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 年，第 77 頁。

2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 120、122 頁。

表現出了這種擔憂。1944年10月9日，丘吉爾在同斯大林舉行的會談中直接表示，希望蘇聯政府能夠抑制意大利共產黨的活動，不使意大利共產主義者攪亂意大利，不在那裏建立武裝政權。¹

二戰期間，歐洲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在力量對比不利於世界無產階級的情況下，維護蘇聯的安全利益仍然是最為重要的，社會主義革命仍然是個遠景目標。在這種情況下，與盟國維持合作，哪怕是形式上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按照蘇聯領導人的看法，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戰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內，都還不是公開實現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理想的時候。也就是說，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尚未到來，為了在戰後保持與盟國的合作，就必須「有意識地把社會主義前途和發展問題放在第二位」。²

因此，斯大林公開承諾，不開展世界革命，以消除西方國家對蘇聯的疑慮。比如，1944年8月，在他同波蘭流亡政府總理米克拉伊契克舉行會談期間，當米克拉伊契克問道，戰後，蘇聯是否打算使德國實行共產主義的時候，斯大林回答說，「德國完全不適合搞共產主義。」³ 斯大林還向丘吉爾保證，他沒有在歐洲國家移植共產主義的打算。1944年10月9日，在同丘吉爾進行的談話中，對於丘吉爾提出的希望蘇聯政府能夠抑制意大利共產黨的活動的要求，斯大林一方面表示「很難對意大利的共產主義者施加影響」，不能「命令意大利共產主義者不做什麼和做什麼」，顯示蘇聯沒有通過共產黨來干涉別國的企圖，另一方面卻表示願意

1 Стрижов Ю.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 2003, №2, с.51-52.

2 АВПРФ, ф.07, оп.9, п.61, д.68, л.1-41, 轉引自 Валюхитина Т.В. Сталин и сме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Кремля в конце 40-х годов: от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с.11.

3 Секрет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Рузвельта и Черчилля. М., 1995, с. 631, 轉引自 Иванов Р. Сталин и союзники, с.396-397.

對陶里亞蒂施加影響，使其「不去冒險」。¹ 1944年10月14日，斯大林再次向丘吉爾表示，「現在世界不會再（被世界革命）嚇得發抖了。蘇聯無意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丘吉爾可以通過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例子相信這一點。」²

斯大林不僅向西方國家作出這樣的保證，而且在實踐上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消除西方盟國的疑慮，在此方面，他實際上是根據「人民陣線」的思想來解決戰後相關國家共產黨的地位問題。³ 根據這一思想，斯大林主張在這些國家實行「聯合政府」政策，也就是說，主張相關國家的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合作，共同掌握國家政權，並盡力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避免衝突。⁴

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通過與國外共產黨的聯繫渠道，蘇聯共產黨仍然能夠對國外的共產黨施加影響和控制，這就使得蘇聯領導人提出的聯合政府政策的實施有了保障。這樣，從斯大林同西方盟國開始談判時起，除了幾個當時已經開始反對莫斯科的領導的黨之外，各國共產黨的全部政策就是由斯大林這一政策的宗旨決定的。根據這一宗旨，各國共產黨就必須預先放棄把反法西斯戰爭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何嘗試，而這種做法本身就決定了各國黨共產黨的政策不是鼓勵而是阻撓這種可能性的出現。⁵

與聯合政府政策相適應，斯大林明確指示法共和意共要採取防守的而不是進攻的政策。也就是說，要求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

1 *Стрижов Ю.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 2003, №2, с.51-52.

2 斯大林與丘吉爾關於波蘭問題的談話記錄，1944年10月14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第717-720頁。

3 「人民陣線」思想早在1937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就提了出來，根據蘇聯外交的需要，在不同的時期它具有不同的目標。

4 「聯合政府」政策這一概念最早見於沈志華教授的《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一文（《俄羅斯研究》2007年，第5-6期）。

5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323頁。

放棄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選擇。為此，斯大林曾經私下勸告法、意兩國的共產黨領導人，不要在戰後立即試圖奪取政權。¹ 1944年3月3日夜到4日，在同意大利共產黨人領袖陶里亞蒂舉行會談時，斯大林向意大利共產黨提出建議：（1）不要求國王立即退位；（2）共產黨人可以進入巴多利奧政府；（3）主要致力於在反德鬥爭中建立和鞏固統一。² 斯大林首先強調的是：不加快民主改革進程以及向「新民主主義的」過渡，而是要廣泛團結各種政治力量，以便完成反納粹德國的鬥爭，阻礙英國在意大利和地中海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根據斯大林給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的指示精神，季米特洛夫委託陶里亞蒂向法共領導人馬蒂和居約口頭轉達一些指令。這些指令既沒談到組織武裝起義奪取政權，也沒談到成立共產主義的「反抗政府」。1944年11月在與法共領導人多列士進行的談話中，斯大林要求法共不要保留武裝力量，要求法共把「武裝隊伍改為另一種政治組織，而武器應該藏起來」。斯大林告誡多列士，「共產黨人竭力保留警察，這是行不通的。已經成立了政府，而且這個政府又得到了英國、蘇聯、美國和其他強國的承認，共產黨人卻繼續按慣例行動。同時，形勢已經不同，是一種新的形勢，它把機會給了戴高樂。局勢變了，就應該轉變政策。共產黨人已不再有能力打擊政府的首腦了。它應該積蓄力量尋找同盟者。」斯大林要求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參加資產階級領導的政府，一方面是保持與美英關係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斯大林還有另外的戰略目的：不使意大利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矛盾，使法國儘可能快地成為英國和美國在歐洲大陸勢力的平衡力量，成為蘇聯潛在的同盟者，在抗衡英國方面為法蘇之

1 托馬斯·沃爾夫：《蘇聯霸權與歐洲 1945-1970》，冷向洋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頁。

2 РЦХИДНИ, ф.495, оп.74, д.259, л.8, 轉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9-21.

間的特殊關係奠定基礎。¹ 從中可以看出，斯大林並不排除利用帝國主義陣營國家之間的矛盾來調整大國關係的可能性。多列士和陶里亞蒂無條件地接受了斯大林的路線，因為這些路線與這些領導人的政治觀點在人們陣線時期就已經開始的向新改良主義的轉變恰好一致，而兩黨的領導集團就是由一批持有這種觀點的人組成的。因此，在法國和意大利，在那些「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軍比反動力量組織得好、而且與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及其政治代理人相比，顯然佔優勢」的地方，千方百計地避免了革命的爆發。²

對於東歐各國，蘇聯的目的則在於建立起對蘇聯友好的政府。這一路線在戰爭年代蘇聯的對外政策中是確定的和一貫的路線。在蘇聯的影響下，東歐各國共產黨雖然在國家政權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斯大林卻要求這些國家實行介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人民民主制」這一模式，而不是要求把蘇維埃模式作為其最好的政府形式。³ 只要能夠保證與蘇聯友好，他甚至不反對這些國家同西方大國發展關係。1944—1945年斯大林不止一次強調，東歐政治家不僅需要同蘇聯、而且必須同西方國家有友好關係。例如，在1944年8月9日在莫斯科同米科瓦伊奇克進行的會談中，當波蘭領導人提出「波蘭和蘇聯之間將建立信任和友誼」的聲明時，斯大林強調指出：「波蘭還應同英國、法國和美國建立聯盟。」1945年6月，斯大林對前來莫斯科訪問的波蘭代表團再次表述了上述思想，「波蘭將是強大的國家。對於這樣一個波蘭來說，僅同一個國家結盟是不夠的。它應同幾個大國有聯盟關係。波蘭需要同西方國家，同英國、法國有聯盟關係，需要同美國有友好關係……波蘭需要締結新

1 АПРФ, ф.45, оп.1, д.390, л.85-93//Источники, 1995, №4, с.152-158, 轉引自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9-23.

2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21、132頁。

3 阿·托因比、維·托因比合編：《國際事務概覽（1939—1946）：歐洲的重組》，勞景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527-532頁。

的聯盟。」¹

1945年3月，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在研究捷克共產黨提出的科希策政府綱領草案時也貫徹了類似的路線。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第四歐洲處處長佐林在看過這份綱領草案後指出，綱領的第四部分在對待蘇聯和斯拉夫民族統一的態度問題上「失去了靈感」，並建議對這份綱領作如下修改：「在保留捷克斯洛伐克以蘇聯和以加強斯拉夫各民族團結為趨向的條件下，強調捷克斯洛伐克還要加強同英國、美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的友好關係。」²

為了實行聯合政府政策，二戰後期和戰後初期，斯大林多次鼓勵東歐國家共產黨領導人走人民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1945年2月，斯大林告訴保加利亞人，「你們已經建立起愛國陣線政府，這是一件好事。它應該得到加強，可能的話還要擴大一些。不要拒絕任何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能夠利用的人。」此前他曾提到，「當我們認為建立蘇維埃政權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時，這也許是錯誤的。也許其他的方式——成立民主共和國或者在一定情況下建立立憲君主政體也能實現社會主義。」³ 1946年5月，在同波蘭領導人進行的談話中，蘇聯領導人把在東歐地區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權看作是史無前例的新型的民主。對於這種民主，斯大林認為：「它在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體制的條件下就接近了社會主義」，斯大林告誡波蘭領導人，「你們需要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對新體制不滿意的人數將會不斷減少，而你們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1., М., 1999, с.87.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1, 1944-1948,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7, с.17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35-36.

3 TsPA, f.1, op.9, a.e.12, l.1-12; TsPA, f.146, op.2, a.e.15, l.18, 轉引自 Dimitrov, Vesselin,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272-289.

不需要留血的鬥爭就能接近社會主義。」¹ 同樣，根據聯合政府政策，在戰後的最初幾年斯大林還要求匈牙利政權也堅信這一戰略路線；要求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承認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並且反對他們激進的內外政策；要求希臘共產黨同意共和法共一樣，放棄武裝力量。1946年7月在與哥特瓦爾德的談話中，斯大林以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波蘭為例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條件可能會打開通向社會主義的另一條道路，沒有蘇聯體制和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指出，「我們的道路是簡捷、快速的，但有很多流血和犧牲，如果你們可以繞過這些，那就請繞過吧！」1946年8月，在接受《每日先驅報》的採訪中，斯大林再次回到了這個話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認為自己的道路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但是這時斯大林嚴格限制了兩種過渡方式：「俄羅斯的」和「英國的」，「俄羅斯的道路更短些，但更艱辛，並伴有流血」，英國的（議會的）道路具有和平性質，但斯大林強調說，「這是個更加漫長的過程。」²

當然，東歐地區是蘇聯的勢力範圍，與西歐各國不同的是，莫斯科要利用自己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保證東歐各國共產黨在聯合政府中擁有最低限度的代表，掌握國家政權。在此方面蘇聯的任務是，使東歐共產黨迅速轉變為羣眾性的政治力量，使其在羣眾中得到20—50%選民的支持。當然，蘇聯的勢力範圍政策也遠不是統一的，相對於一些國家而言（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不得不對一些國家施加更加嚴厲的控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波蘭）。³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1, М., 1997, с.457-458.

2 Stasrf ustrednf archiv, Archiv UV KSC. F.Ot. Sv. 2, Aj. 13, L. 104; Daily Herald. 19zt6, 22. VIII.p.2,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талинской модел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Боларии (1944-1948гг.) //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с.147.

3 參見 Роберте Дж. Сферы влияния и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1939-1945 гг.: идеология, расчет и импровизация//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90.

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既涉及到歐洲各國共產黨，也涉及到亞洲各國共產黨。除了要求歐洲各國共產黨走聯合政府的道路之外，蘇共還要求中共在戰後也走聯合政府的道路，以維護雅爾塔體制，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利益。

總之，二戰後期和戰後初期，斯大林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始終是偏向於在戰爭結束之後保持與西方國家的合作關係。隨着蘇聯軍隊對東歐國家的解放，雖然莫斯科預先採取了在這些國家建立有利於共產黨力量的政權，確保這些國家對蘇聯的態度是友好的，但是，蘇聯領導人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急於使這些國家「蘇維埃化」的想法。比如說，1945年在保加利亞和匈牙利舉行的選舉是在蘇聯軍隊駐留在那裏的情況下進行的，然而，選舉的結果是共產黨的反對派取得了勝利。¹ 解密的檔案表明，對於一些國家共產黨的地位問題，蘇聯領導人感興趣的是建立民族力量的聯盟，首先是在那些共產黨力量和影響有限的國家如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芬蘭建立這種聯盟。為建立這種聯盟，蘇聯領導人對共產黨人中的左派激進主義進行了尖銳的批評。²

當然，並非所有國家的共產黨都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實行聯合政府政策。由於共產國際的解散而正式得到認可的各國共產黨的「民族化」，逐漸具有某些動搖斯大林體系鐵板一塊的特點。當時，所有的黨（其中多數是忠誠的，也有少數是存心玩弄手腕的）都繼續認為自己是受莫斯科領導的。它們並不懷疑蘇共的領導作用和斯大林的一貫英明正確，但是由於事態的驅使，由於各國情勢千差萬別，它們也不得不按本身的利

1 參見 Корниенко Г.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с.19.

2 參見 Мурашко Г.Л.,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с.79.

益行事，採取更多的主動。¹ 戰後，這種獨立自主的傾向在歐洲各國的共產黨中都普遍存在，並且對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對蘇聯在東歐的存在和影響構成了挑戰，促使斯大林建立國際性的聯合組織，加強對這些國家共產黨的控制。

1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7-8頁。

第二章 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與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

共產國際的解散標誌着蘇聯開始走上與美英進行合作的道路。通過與盟國進行協商建立起來的雅爾塔體制滿足了蘇聯領導人追尋的一些重要利益，為了維護這些既得利益，蘇聯更加需要維持與西方盟國的合作關係。但是，隨着戰後國際局勢的發展，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着越來越大的挑戰。

在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的情況下，蘇聯的對外政策不斷向對抗的方向轉變。加強對東歐國家共產黨的控制，遏制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增強蘇聯在東歐的影響力，創辦一份共同的雜誌和建立歐洲國家共產黨聯合組織的問題逐漸提上了蘇聯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中，馬歇爾計劃的挑戰促使蘇聯領導人加快了這一進程，最終在 1947 年 9 月聯合東歐各國共產黨和法國、意大利共產黨成立了具有協調職能的共產黨情報局。

一、戰後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

共產國際解散之後，蘇聯加緊實施其關於戰後安排的構想，通過 1943 — 1945 年與盟國的協商，雅爾塔體制逐步確立起來，這一體制的確立使得蘇聯最為重要的地緣利益，特別是在東歐和遠東的主要利益都得到了保障。因此，雖然蘇聯與西方盟國之間在關於戰後安排問題上存

在一些分歧，但是，對於蘇聯領導人來說，與西方盟國保持合作，哪怕是形式上的合作，維護蘇聯的既得利益仍然是最佳選擇。因此，斯大林在同外國人士進行的談話和接受的訪問中仍不斷聲稱蘇聯尋求繼續和擴大與美國的合作，強調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妨礙蘇聯與西方國家建立長期友好的合作關係，兩種制度能夠「友好競賽」。¹ 為了維持大國間的合作，斯大林要求在共產黨力量佔據一定地位的國家的共產黨實行聯合政府政策，要求東歐國家共產黨放棄激進的社會變革模式，選擇人民民主道路。在 1946 年夏秋之際，蘇聯領導人和斯大林本人都繼續把人民民主模式看作是長期的和當時還沒有完全體現其潛在優勢的模式。² 斯大林在同外國政治領袖進行的談話中和在答記者問中，不止一次強調社會主義和平過渡即「民族道路」的某些本質特徵。³ 出於國際政治的考慮和對這些國家各派政治力量現實對比的認識，蘇聯領導人制止了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人改變同自由黨人、社會黨人和農民黨聯盟的方針和按蘇聯模式建立壟斷政權的試圖。蘇聯監察委員會駐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代表都努力制止左傾激進主義。因為這些政策不符合蘇聯領導人讓那些被劃入蘇聯勢力範圍的國家的共產黨通過和平的漸進的議會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想法。⁴

1 關於斯大林類似的談話，見 1946 年 9 月 17 日在答《星期日時報》駐莫斯科記者亞歷山大·韋爾特先生的講話（《斯大林文選》，第 476-478 頁）；1946 年 12 月 21 日斯大林與埃利奧特·羅斯福的談話（《斯大林文選》，第 484-487 頁）；1947 年 4 月 9 日斯大林在接見史塔生時的談話（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翁著：《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徐先麟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 年，第 37 頁）。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талин и сме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Кремля в конце 40-х годов// Гайдук И.В.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4-15.

3 詳見 1946 年 7 月斯大林與哥特瓦爾德的談話記錄·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90.

4 АВПРФ, ф.0125, оп.34, папка11, д.130, л.38; ф.074, оп.34, папка10, д.115, л.13-14.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89.

儘管維持與盟國的合作仍然是戰後蘇聯外交的最佳選擇，蘇聯領導人也希望維持與西方國家的合作關係，並為此在一系列問題上、特別是在對待其他國家共產黨的問題上採取謹慎的政策。但是，戰後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還是不斷地受到挑戰，這些挑戰是多方面的，具體表現在：蘇聯與美英在歐洲和近東一些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蘇聯的聯合政府政策受到的挑戰，東歐國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以及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受到的挑戰等。

（一）蘇聯與英美在歐洲和近東一些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

儘管斯大林希望維持與西方盟國的合作，但是，戰後國際關係發展的一個趨勢是，蘇聯與西方盟國的矛盾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在東歐問題、德國問題和近東問題上的矛盾。

在蘇聯戰後的安全戰略中，在蘇聯的西部邊界建立戰略緩衝區佔據首要的地位。並且，蘇聯的這一戰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雅爾塔體系的保障。儘管蘇聯與西方大國之間達成的協議使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芬蘭以及德國和奧地利的一部分被納入了蘇聯的勢力範圍。但是，西方國家承認蘇聯在這些地區的利益，並不意味着他們同意蘇聯壟斷這些地區的事務和在這些地區建立蘇聯的社會制度，也不意味着西方不對這些國家的內部事務施加影響。¹ 西方國家把保障自己在東歐地區的利益同維護既存的社會制度和把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政治家推上社會生活的中心為目的，而蘇聯領導人則要使那些與蘇聯的思想體系相近的新的政治家掌握政權。在聯合政府政策問題上，莫斯科的最低綱領是要使東歐國家的左

1 1941年8月13日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的《大西洋憲章》明確提出，他們尊重所有民族選擇他們願意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權利。

派力量和共產黨勢力以及具有重大影響的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力量進入戰後的聯合政府，而其最高綱領則是要使東歐的左派力量壟斷政治權力和建立與蘇聯相似的社會制度。¹ 因而，在東歐國家聯合政府的組成問題上，蘇聯與西方國家存在重大的分歧。

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大國的猜疑。早在二戰期間，在預言戰後歐洲的形勢時，西方的一些官員就指出，蘇聯不僅要確立起對鄰國的控制，而且，甚至要把它們作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納入蘇聯。到1944年初，很明顯，東歐將是蘇聯的影響範圍，問題只是這種影響的形式和程度。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不能允許這一地區公開實行蘇聯模式，並被作為牢固的蘇聯集團的一部分。雖然斯大林作出了讓步，主張在東歐國家實行聯合政府政策，但是，仍然不能就這些國家政府的組成問題與西方國家達成協議。特別是在波蘭問題上，美國人認為，斯大林違背了戰後在波蘭進行自由選舉的諾言。然而，斯大林的這種承諾是不甚明確的。1943年，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會晤的時候，羅斯福提出了波蘭問題，但是他主要是出於194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考慮，斯大林對羅斯福的籲請並不是很在意。1945年2月簽訂的雅爾塔協定也沒有就波蘭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斯大林極力按自己的需要來解釋其含義，當蘇聯紅軍把德軍從波蘭趕走之後，蘇聯便在華沙建立了共產黨政府。美國人感覺自己受到了欺騙，但是斯大林認為美國人會接受現實，因為是蘇聯軍隊解放了波蘭。² 關於在東歐國家成立民主政府，特別是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這些國家採取什麼樣的選舉方式問題上蘇聯和西方國家存在着爭議，並分別支持這些國家相互對立的黨派，進行鬥爭。

1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69-70.

2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衝突：理論與歷史》，張小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6頁。

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是與西方國家在德國問題上的分歧。德國問題在戰後蘇聯的安全戰略中佔據中心位置。戰後初期，在這個問題上，美蘇頗有合作趨勢，美國支持蘇聯在第一次外長會議上提出的建立全德中央政府和對魯爾區實行四國共管的建議，在法國全力反對的情況下，美國甚至積極主張組建美、英、蘇三國佔領區的管理機構。蘇聯由於未能實現其建立全德統一管理機構的計劃，便率先在蘇佔區開始實行非軍事化、非納粹化的民主改革，並為此策劃了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為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運動。此舉引起西方盟國的疑慮，美國遂建議把自己與英國的佔領區合併為雙佔區，以實現德國經濟統一的目標。¹ 解決德國問題對於西方國家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德國的工業及其資源，尤其是煤炭資源，曾是戰前歐洲經濟增長的動力。如果在德國一直保留着不同的佔領區，而沒有統一的經濟政策，其他西歐國家的經濟只能是停滯不前。從現實情況來看，除戰後第一年有些增長外，西歐的經濟復甦在 1947 年開始急劇滑坡。只有把美國不斷增加的經濟援助以及德國的資源與歐洲的經濟結合起來才能避免歐洲經濟的崩潰。對於蘇聯來說，無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解決德國問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經濟上，蘇聯想從德國得到 200 億美元的賠償用於自己國家的經濟重建。在政治上，蘇聯關心的是消除德國復活的可能性。為達到這一目標，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強調廢除德國的軍備，建立一個能保證德國共產黨擁有重要地位的政治體制。但是，無論是在經濟問題上還是在政治問題上，蘇聯與西方國家都存在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在 1947 年 3—4 月召開的莫斯科外長會議上突出了起來。蘇聯向德國提出的賠款要求遭到了西方國家的拒絕。賠款問題得不到解決，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在德國政治體制問題上就更加不願妥協，不願同意西方國家

1 參見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1 卷·第 21 頁。

提出的在所有佔領區實行臨時性的統一經濟政策的建議。¹

1946 年底到 1947 年上半年，蘇聯與英美關係中另一個突出的矛盾表現在希臘和土耳其問題上。鑒於重要的地緣政治地位，希臘和土耳其都在蘇聯的安全戰略中佔據着重要的地位。根據二戰期間斯大林與丘吉爾簽達成的百分比協定，希臘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1944 年 5 月蘇英達成協議，為報答英國對蘇聯在羅馬尼亞政策的認可，作為交換，莫斯科決定不插手希臘事務。而且，應英國方面的要求，蘇聯領導人還派代表到希臘解放區，勸說民族解放陣線參加流亡在開羅的帕潘德里歐政府。9 月初，民族解放政治委員會自行宣佈解散，交出了在解放區已經掌握的政權。1946 年 3 月，希臘內戰再次爆發。希臘共產黨的鬥爭獲得了巴爾幹地區一些力量的支持，包括希臘的鄰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支持。但莫斯科對希臘革命的態度則是複雜的。一方面，莫斯科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希臘革命的支持，對希臘共產黨提出的給予技術和物資援助的要求的看法是相當正面的。另一方面，出於與美英保持合作關係的需要，莫斯科對希臘革命的態度是非常謹慎的。在這種情況下，莫斯科實際上選擇了通過希臘最強大的鄰國——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來干預希臘問題的策略。²

戰後，土耳其在蘇聯的地緣戰略中也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土耳其被蘇聯、巴爾幹、阿拉伯和中東國家夾在中間，它在帝國主義爭霸的國際鬥爭中佔有重要位置，也是進攻蘇聯的重要的橋頭堡」。但是戰後的土耳其卻被蘇聯領導人看作是個很危險的、不友好的鄰國。³ 因此，蘇聯

1 Parrish, Scott 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CWHP Working Paper*, №9, 1994.3, p.6-7.

2 Artiom A. Uluni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Greek Question', 1946-1953: Problems and Appraisals",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144-160.

3 蘇共中央情報局情報局關於土耳其民主局勢的報告，1946 年 4 月 15 日，轉引自 Ulunian, Artiom A., 「Soviet Cold War Perceptions of Turkey and Greece, 1945-1958」, *Cold War History*, Vol.3, No.2, p.38-40.

領導人就更加堅持按照自己的意願，在黑海海峽的通航制度問題上與土耳其達成協議。

蘇聯對希臘和土耳其的政策引起了美國的警惕。在美國領導人看來，如果美國不採取措施，希臘和土耳其將成為「蘇聯的傀儡」，留下民主失敗的例子，這將導致整個近東和還不在蘇聯控制下的西歐大部分地區抵制蘇聯壓力的廣泛失敗。¹ 1947年2月5日，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向華盛頓告急，通知美國國務院，英國將終止對希臘的所有經濟援助，並強調說，美國確定對希臘進行援助的具體方案刻不容緩。² 在這種情況下，3月12日，杜魯門總統在國會宣佈了他的「學說」，提出了杜魯門主義，公然要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

隨着蘇美矛盾的發展，美國對蘇聯的態度在迅速惡化。1947年2月，蘇聯駐紐約總領事館向莫斯科報告說：「與去年11月和12月相比較，1947年1月和2月美國對我們的態度急劇惡化了。共和黨人範登堡、塔夫脫、杜勒斯以及巴魯克等人在報刊和電台發表的言論使形勢更加惡化了。」³ 1947年2月10日在美國參議院進行的討論中，艾奇遜實際上同意了「俄國的對外政策是侵略性的和擴張主義的政策」這一說法。蘇聯外交部對這一說法迅速地作出了反應，並且把這個看作是導致兩國關係複雜化的一個問題，在向美國發出的照會中指出，艾奇遜的上述言論是不可容許的。莫洛托夫把艾奇遜的講話描述成「是一次粗暴地詆毀和敵視蘇聯的講話」。但美國國務院在答覆照會中卻指出，艾奇遜的上述

1 FRUS, 1947, Vol V, p.47.

2 參見 Gorlizki, Yoram, and Oleg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5.

3 蘇聯駐紐約總領事洛馬金關於美國對蘇聯的態度和在美國的俄國僑民問題給蘇聯副外交部長維辛斯基的信，1947年2月28日，*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4, с.373-375

言論「屬於對對外政策問題的有分寸的意見」，「不是詆毀和誹謗」。¹

儘管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一系列的挑戰，但是，應該說，直到在 1947 年中，斯大林一直在外交上作出努力，來防止歐洲的分裂，維持盟國之間的合作。蘇聯領導人對杜魯門主義的反應是非常克制的。² 在 1947 年 4 月 15 日與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進行的談話中，當馬歇爾告訴斯大林，他對外長會議上蘇聯與英美之間誤解和分歧的狀況深感不安時，斯大林則極力安慰和鼓勵馬歇爾提起精神，讓他不要過於悲觀地看待問題。他認為，蘇美雙方在「初次交鋒」和「互試鋒芒」之後，「妥協還是有可能的。」1947 年 4 月 9 日，斯大林在接見美國共和黨領導人哈羅德·史塔生時仍然認為蘇美在所有重要問題上都可以達成妥協，必須有耐心，不能悲觀。³ 對於英美報紙上出現的關於修改 1942 年英蘇條約的輿論，真理報在 4 月 22 日發表的社論中特別指出，蘇聯過去從未有過也不會有任何反對英美親善或英法親善的事情，蘇聯除積極主張加強英蘇合作之外，還積極主張加強英美、英法合作。當然，這種合作必須不是反蘇的。⁴

（二）聯合政府政策在歐洲面臨的挑戰

在蘇聯與西方國家在歐洲問題上矛盾激化的同時，蘇聯的聯合政府政策在歐洲也面臨了挑戰。

1 АВПРФ, ф.0129, оп.31, папка 192, д.12, л.3-5; АВПРФ, фонд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олотова, оп.9, папка 68, д.1049, л.1-6, 轉引自 Пихоя Р.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0, с.25.

2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Москва: ИРИ РАН, 2005, с.118.

3 斯大林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關於蘇美關係以及德國問題的會談記錄·1947 年 4 月 15 日·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39 :《斯大林文選》·第 491-494 頁。

4 Правда, 19 апреля 1947г.

戰後初期，與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相適應，在東歐各國的社會生活舞台上活躍着各種社會力量，它們代表着早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形成的一系列政黨：各資產階級保守黨，自由民主黨，農民黨，社會民主黨。在人類歷史上，共產黨也第一次佔據了這些國家政治風雲的中心位置。¹ 但是，戰後初期，一些東歐國家的政治現實是：共產黨的力量是弱小的。比如，在波蘭的聯合政府中佔壓倒多數的是各種反蘇的政治勢力，只有極少數團體把共產黨作為自己的政治夥伴。² 匈牙利共產黨的力量也是弱小的，到 1945 年 2 月蘇聯紅軍解放匈牙利時也僅僅發展到 30000 人。在這種情況下，1945 年 11 月匈牙利國民議會選舉的結果是，小農黨得票 57.03%，社會民主黨得票 17.41%，而共產黨得票不足 17%。³

聯合政府政策是以蘇聯與西方國家的合作為前提的，但是，隨着蘇聯與美英矛盾激化，並且在東歐地區展開激烈爭奪的情況下，這一地區的國內政治鬥爭更加尖銳。為了爭奪政權，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一些資產階級政黨向共產黨發動了攻勢。在波蘭，隨着波蘭社會黨和波蘭工人黨之間相互關係惡化，波蘭社會黨領導人走上了一條同波蘭工人黨決裂的道路。「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極力將波蘭工人黨擠到次要地位上去，並將其孤立起來，建立以波蘭社會黨為首的、使波蘭的國內外政策屈從於英美要求的新的聯盟。」在羅馬尼亞，農民黨、自由黨和社會黨人在英國的支持下，企圖分裂民族民主陣線，然後迫使羅共領導人格羅查下台。在保加利亞，代表祖國陣線的四個黨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競爭：每個黨都在搶職位，到處安插自己的人，都想從政治上限制其他力量，為自

1 參見 Волоку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05.

2 參見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0.

3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6 卷·第 1-2 頁。

已壟斷權力創造條件，一場爭奪影響力和權力的鬥爭正在進行。¹ 在這場鬥爭中，保加利亞共產黨雖然口頭上支持愛國陣線，但是，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抑制自己對權力的追求和在全國開展革命的決心，因而對反對派展開了進攻。同時，保加利亞工人黨也盡其所能讓蘇聯領導人相信他們是不可能與反對派妥協的。儘管斯大林對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勸說，但是，保加利亞共產黨人仍然沒有接受反對派存在的合法性。² 在匈牙利，反動勢力是有力量的，追求修正主義的勢力是很強大的。除了共產黨人，所有的人都在扮演反對派的角色。³

東歐國家各黨派為爭奪權力的政治鬥爭在不斷加劇，事實證明，在這場鬥爭中，共產黨無法同資產階級政黨進行真正的聯合。在資產階級黨派的進攻下，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面臨統治危機，甚至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不得不依靠偽造的選舉保持執政地位。⁴ 為了應對資產階級黨派的進攻，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或者直接違背斯大林關於建立聯合政府政策的指示，為壟斷政權向反對派開展積極的進攻（如保加利亞共產黨和南斯拉夫共產黨），或者由於在與反對派進行鬥爭的過程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並且擔心西方和本國社會輿論指責他們執行允許侵犯國家主權的政策而出現向反動派妥協的趨向（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
- 1 參見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3卷·第152頁；第19卷·第537、537頁；第24卷·第8-13頁。
 - 2 Dimitrov, Vesselin,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283.
 - 3 莫洛托夫與拉科西關於匈牙利政治形勢的談話記錄（摘錄），1947年4月29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第94頁。
 - 4 共產黨偽造選舉結果的情況至少發生在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從解密的檔案來看，1946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選舉結果不是偽造的。但是，捷共領導人對待作為組織國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工具的選舉態度還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哥特瓦爾德在1946年4月直截了當地表示，「工人階級、我們的黨和勞動人民手中掌握著足夠的手段、工具和方法來糾正這種機械式的投票……以便獲得對工人政黨的有利的結果」。(ЦХСД. ф.17. оп.128. папка901. л.33). 就連一些共產黨領導人自己也承認選舉是偽造的。詳見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94.

羅馬尼亞）。¹ 在這種情況下，東歐國家共產黨的政策開始向兩個趨向發展：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政策開始向激進的方向發展，開始逐步背棄蘇聯領導人所確立的聯合政府政策，排斥資產階級政黨參加本國的政權；而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本國政治發展中開始出現與資產階級加強聯合、甚至向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趨向。這兩種政策趨向都標誌着東歐國家共產黨獨立傾向和民族主義傾向的發展，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甚至開始宣佈走本國的民族主義道路，對蘇聯對這些國家的控制造成了挑戰。

聯合政府政策在東歐各國遭到挑戰的同時，在西歐的法國和意大利也遭到了失敗。在 1945 年和 1946 年進行的大選中，儘管法國共產黨都成了議會中的第一大黨，但是仍然不斷遭到資產階級政黨的排斥。1947 年 1 月，在組成的以社會黨的拉馬迪埃為總理的政府中，多列士只擔任了屬於榮譽性質的副總統。1947 年 5 月，法共在拉馬迪埃政府要求議會舉行內閣信任投票時投了不信任票，按照資產階級憲法規定，議會中的第一大黨投不信任票時，現政府必須辭職，重新組織政府。但拉馬迪埃政府不僅不辭職，反而在 7 月公佈了一項法令：解除產黨人所擔任的部長的職務，理由是他們破壞了政府團結一致的原則。此後不久，意大利共產黨也被逐出了政府。1947 年 1 月，意大利總理加斯貝利在對美國進行的非正式訪問中，了解到美國對意大利尋求經濟援助的要求反應冷淡，主要原因是擔心共產黨在意大利政府中發揮作用。5 月 1 日，美國新任國務卿馬歇爾更直接暗示加斯貝利，只有將極左翼從他的政府中趕出去，才有可能談到美國的援助問題。美國駐意大使鄧思也表示了同樣的意見。於是，5 月 13 日加斯貝利以政府內出現眾多意見分歧為由提出辭

1 而戰後的地區各國社會在這方面都十分敏感。當時，無論是莫斯科，還是地區國家共產黨領導人中，都明白這一點。詳見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605-606.*

職。當 5 月 31 日組成新政府時，共產黨和社會黨都已經被排除在外。¹

二戰後期，斯大林要求法共和意共放棄武裝鬥爭的道路，參加資產階級領導的聯合政府，其目的方面是為了維護與西方大國的合作關係，另一方面是企圖利用這些國家的左翼力量，對本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施加影響，同時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防止他們建立針對蘇聯的聯盟。但是，法共和意共相繼被逐出聯合政府的事實表明，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在西歐也遭到了失敗。這使蘇聯領導人大為震驚。這一方面是由於蘇聯領導人對法共和意共採取的這樣的行動事先毫無所知。在日丹諾夫於 1947 年 6 月 2 日以蘇共中央的名義寫給多列士的信裏毫無掩蓋地流露了克里姆林宮的不滿：法國共產黨在政府危機時沒事先同蘇共協商自己的策略，結果導致被驅逐出政府。莫洛托夫將該信的副本於 6 月 6 日寄給了蘇聯駐美國的大使，7 月 7 日又寄給了蘇聯駐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大使，並請求他們將信的內容轉告給所在國家共產黨領導人。² 蘇聯領導人採取這一措施，顯然是希望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能夠吸取法共和意共的教訓，在採取一些重大的行動的時候，事先同蘇共協商。另一方面，隨着對這些事件了解的加深，蘇聯領導人開始認為，法共被逐出聯合政府是由於法國社會黨各部長向右翼政黨自動投降，是由於美國壟斷家對法國內政——而且不僅是法國一國的內政粗暴干涉的結果。「撤換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放棄獨立政策，然後我們就給你金元」，這便是這些壟斷家們要求的主要要求。³ 也就是說，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的實質是由於美國施加的壓力。在美國以財政援助為條件，對法國施加壓力的這樣一個關頭，在所有民主力

1 關於法共和意共被逐出聯合政府的詳細過程，見沈志華：《斯大林的「聯合政府」政策及其結局》，《俄羅斯研究》2007 年第 6 期。

2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л.89, л.6-13, 轉引自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 23.

3 Правда, 20 мая 1947г.

量正需要團結的時候，社會黨卻走上了分裂與分化民主力量的道路。社會黨的右翼首領們不顧冒着加劇本黨黨內鬥爭與更加削弱他們在工人階級中的地位的危險，決意要阻撓和共產黨的合作。¹

聯合政府政策遭受的諸多挑戰表明，這一政策已經不能適應各國共產黨進行鬥爭的需要了。而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在突破這一政策框架的同時，表現出了脫離蘇聯控制的種種民族主義傾向。這就要求蘇聯領導人改變這種政策，並對各國共產黨進行思想上的引導。因此，蘇斯洛夫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兩大陣營理論。

（三）東歐國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

在聯合政府政策遭受失敗的同時，東歐各國都表現出了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並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擔心。

波蘭 戰後波蘭國內政治社會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反蘇情緒強烈。1944年7月，在蘇聯的支持下成立的波蘭新政府——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只得到了波蘭國內少數人的承認。而大部分波蘭人則追隨不被蘇聯承認的流亡政府，支持與之有聯繫的波蘭地下軍事政治組織。他們認為波蘭共產黨人是外來力量，不願讓其參加政府，擔心蘇聯的政治軍事存在會損害波蘭的主權。²「反動派散佈挑撥性的流言蜚語，似乎蘇聯侵害了波蘭的獨立，或者說在波蘭根本就沒有獨立。」³ 在與反對派勢力進行鬥爭的過程中，波蘭工人黨領導人意識到自己的地位是脆弱性，因此，為了消除社會輿論中出現的關於波蘭依附於蘇聯的論調，他們採取

1 Правда, 30 мая 1947г.

2 ЦХСД, ф.495, оп.74, папка441, л.89-92,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82-83.*

3 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就波蘭社會黨與波蘭工人黨在全民公決後相互間關係惡化的報告，1946年10月12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9卷，第553頁。

了一些民族主義措施。比如，1945—1947年間，從波蘭軍隊中大批復員蘇聯軍官。1947年，從波蘭國家安全部召回了蘇聯國家安全部的軍官。¹ 為了避免被指責為「蘇聯的走狗」，波蘭工人黨領導人看起來對各種反蘇言論無能為力。波蘭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高度關注，關於這些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報告不斷地被發往莫斯科。蘇聯方面認為，波蘭國內的反蘇反共宣傳，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波蘭政府、民主黨派放鬆了羣眾宣傳工作，並且幾乎完全停止在人民中宣傳蘇聯以及蘇軍在把波蘭從法西斯德國手中解放出來、在鞏固波蘭的經濟及政治基礎中的作用和意義。因此蘇聯領導人對波蘭領導人感到了不滿。²

捷克斯洛伐克 戰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發展迅速，在1946年5月的議會選舉中，共產黨獲得37.94%的選票和38%的席位，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大黨，³ 為了得到民族陣線中其他政黨的支持，捷共領導人哥特瓦爾德致力於走不同於蘇聯的發展道路。在1945至1947年，哥特瓦爾德多次強調說，蘇聯的道路不適合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9月25日，在舉行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哥特瓦爾德明確提出了關於「捷克斯洛伐克通往社會主義的特色道路」的觀點。⁴ 這種言論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警惕。而且，捷共領導人關於加強同美國關係的某種暗示，尤其是1946年11月4日簽署的捷美加強和擴大雙邊貿易的聲明更加深了蘇聯領導人的擔憂。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領導人指開始指責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

1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606.

2 1947年6月30日日丹諾夫同芬蘭共產黨庫西年等人在莫斯科的談話時，直接表達了對哥穆爾卡捍衛波蘭民族主義道路思想的不滿。РГАСПИ, ф.77, оп.3, д.174, л.3, 轉引自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Сталин и сме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Кремля в конце 40-х годов//*Гайдук И.В.*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7.

3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3卷·第261頁。

4 *Марфина В.В.* Чехия и Словакия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нига.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5, с. 52-53.

過於追求同民族陣線的夥伴的妥協。¹ 在 1947 年 2 月的時候，在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裏，已經準備好了對「貝奈斯公式」和哥特瓦爾德的立場展開批評的工作報告，其中特別對哥特瓦爾德提出的「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特有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的觀點」進行了批評。² 1947 年 6 月，蘇共中央得到了大量的對捷克斯洛伐克領導的政治實踐進行批評的情報。其中指出了黨際鬥爭的尖銳和「受盎格魯—撒克遜」支持的反動分子活動的猖獗，指責捷共在美國影響增長的情況下，「揭露反動派及其國外盟友的宣傳很不得力。共產黨對敵對宣傳的危害和反動派大規模行動的危害有時估計不足」，「共產黨領導人把主要活動集中到奪取議會多數上，同時沒有採取堅決措施來粉碎反動派在國家機關、軍隊、農村和中產階級中的最重要的障地。黨還沒有表現出她是一個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黨。」報告指出「斯洛伐克共產黨在大選後形勢不穩定，在組織上軟弱，中央領導人缺乏充分的經驗和馬列主義知識。」³ 因此，捷共領導人的問題不僅僅是傾向於走民族主義道路的問題，而且還表現為組織軟弱和「缺乏充分的經驗和馬列主義知識」。

羅馬尼亞 戰後，羅馬尼亞聯合政府內的政治鬥爭也異常激烈。受這一鬥爭的影響，在同反對派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不僅羅共領導人格羅查的立場明顯發生了某些動搖，而且喬治烏·德治的「不健康情緒是如此之重，以致如果不採取相應措施，這種情緒將可能會轉變成為嚴重的政治錯誤」。喬治烏·德治和毛雷爾認為，由於戰爭的後果，蘇聯不僅無力完全滿足羅馬尼亞在經濟方面的需求，而且甚至連它對羅馬尼亞已承擔

1 ЦХСД, ф.0138, оп.27а, папка1, д.138 а, л.18; оп.27, папка4, д.135, л.1. 4, 9,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86-87.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1, с.573-579.*

3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83, л.219-220, 轉引自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с.139-140.*

的義務（原料和工業品）也將難以履行。因此，他們致力於尋求和發展同英、美兩國的關係。隨着羅馬尼亞同英、美兩國經濟關係的日益鞏固和加強，喬治烏·德治開始疏遠蘇聯駐羅馬尼亞的代表，很少與他們會面，而對某些蘇聯代表則乾脆不予理睬。羅共領導人的這種獨立傾向引起了蘇聯方面的警惕。蘇聯駐羅馬尼亞代表蘇薩伊科夫認為，羅共領導人在不惜任何代價去爭取在英、美兩國的幫助下從困境中擺脫出來，他們的這種盲目追求會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失去方向，在對待英、美兩國的態度方面喪失警惕性。「喬治烏·德治甚至向中央委員們證明說，『連斯大林同志都贊成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合作』，試圖以此說明自己在對待英、美兩國方面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而英國和美國也明白喬治烏·德治的處境和整個羅馬尼亞的經濟狀況，並作出了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的許諾，給喬治烏·德治造成一種在英美的幫助下將能夠擺脫困境的幻覺。」最後，報告認為，以上諸多事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信號，「因為當前存在着一方面是喬治烏·德治在一定程度上偏離正確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是尚處於起步階段的、向英美兩國傾斜的危險趨向，這種情況要求毫不遲疑地採取根本性的措施。」¹

保加利亞 戰後，保加利亞的社會政治制度相對較快地適應了蘇維埃制度，同時保留着某些形式主義的外部特點。在蘇聯在東歐的附屬國中，保加利亞變成了蘇聯一個最可靠的附屬國。但是，保加利亞國內的政治形勢也相當複雜，一場爭奪影響力和權力的鬥爭正在進行。在這場鬥爭中，保加利亞共產黨雖然口頭上支持愛國陣線，但是，他們既不能，也不願抑制自己對權力的追求和在全國開展革命的決心，因而對反對派展開了進攻。儘管斯大林對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勸說，但

1 蘇薩伊科夫關於羅黨內矛盾給蘇斯洛夫的報告，1947年6月10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2卷，第582-589頁。

是，共產黨人也永遠不會接受反對派存在的合法性。¹ 1946年9月2日，斯大林與季米特洛夫的會談時談到了關於在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問題。斯大林提出了一個方針：共產黨和其他的「勞動人民的政黨」應該聯合成一個所謂的勞動政黨。在共產黨佔優勢的條件下，聯合政黨應該成為在實質上是共產主義的，而在外表上不顯得是這樣的和獲得更加廣泛的羣眾基礎的，尤其是在農民之中獲得廣泛基礎的政黨。儘管斯大林指出，這僅是「非常方便的面具」，但正如他所強調的那樣，無論是從國內政治角度，還是從國際局勢方面來說，這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後，直接提出最高綱領的時刻就會到來。² 但是，斯大林無力控制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活動。

匈牙利 戰後，匈牙利也存在強烈的反蘇主義，正如拉科西在同蘇聯領導人的談話中所指出的，匈牙利人對俄國人的傳統恐懼尚未根除。³ 很多匈牙利人對俄共的宗派主義、激進主義傳統，反法西斯性質及其對民主聯合陣線的潛在威脅心懷疑慮，他們認為，匈牙利共產黨隨後可能會壟斷政權和限制民主。⁴ 在聯合政府內，匈牙利的資產階級政黨與共產黨為爭奪權力展開激烈的鬥爭。1947年初，這種鬥爭更加激烈。在這場鬥爭中，反對派公開奉行親美反蘇政策。他們批評蘇聯只是從匈牙利索取戰爭賠款而不給匈牙利任何東西，可是美國卻是匈牙利的恩人。只要在匈牙利結束共產主義專制，美國將向匈牙利提供3億美元的貸款。反對派還與美英勢力加強了聯繫。社會民主黨與英國工黨的聯繫加強了，

1 Dimitrov, Vesselin,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283.

2 Димитров Г. Ук. Соч., с.533-535, 轉引自 Гибнаний 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 6, с.156-157.

3 莫洛托夫與拉科西關於匈牙利政治形勢的談話記錄（摘錄），1947年4月29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第109頁。

4 *Стычкин А.С. Стал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Венгрия*// Гибнаний Л.Я. (Отв.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с.159.

而右翼的社會民主黨人則與美國人有聯繫。因此，反動勢力在匈牙利是有力量的，「追求修正主義的勢力在匈牙利也還是很強大的。」但是，面對這種狀況，匈牙利共產黨的政策則是無力的。正如蘇聯大使館在 1946 年的年度報告中所指出的，「共產黨醉心於空洞的宣傳，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在一些州，共產黨人做事過於絕對而無靈活性，忽略同其他黨派的合作，從而把自己置於孤立的境地。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把廣大居民和各階層爭取到自己一邊，因此，他們也就不能指望在選舉中贏得大量的選票。」更加令蘇聯領導人擔憂的是：匈牙利共產黨有一種撇開蘇聯的總政策去解決匈牙利問題的明顯的獨立傾向，並且時而表現出對蘇聯政策的不理解。¹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內部情況與東歐其他共產黨內的情況有原則性的區別。與東歐其他國家不同，在南斯拉夫不僅沒有廣泛的反蘇情緒，而且還以確立蘇聯模式為榜樣。南斯拉夫與東歐其他國家另一個原則上重要的區別是，以鐵托為首的少數領導人越來越掌握了絕對的權力，但是，他們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也更為顯著。1944 年 10 月 29 日，鐵托在給斯大林的信中專門指出了蘇聯紅軍在南斯拉夫所犯的一系列違法案件，要求蘇聯方面採取措施，消除違法行為。這封信引起了斯大林的強烈不滿，並指責南斯拉夫方面將個別紅軍軍官和士兵的一些行為和錯誤普遍化，侮辱紅軍。² 另外，在一系列外交事務上，南斯拉夫指責莫斯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走與西方妥協的道路。為了實現自己在的里亞斯特問題上的要求，在 1945—1947 年，南斯拉夫一直在指責蘇聯人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全力相助。³ 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的態度也日益引

1 斯維里多夫關於匈牙利政治形勢向科羅特克維奇的口頭彙報，1947 年 4 月初；蘇聯駐匈使館 1946 年度政治總結報告，1947 年 4 月 16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6 卷，第 94、105 頁。

2 德迪耶爾：《鐵托傳》，三聯書店 1977 年，第 61 頁。

3 參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1, с.164-165.*

起蘇聯領導人的不滿。從戰時起，南斯拉夫就確立了在阿爾巴尼亞的特殊地位。為了把南斯拉夫納入蘇聯外交的軌道，斯大林表示尊重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的地位，蘇聯將通過南斯拉夫幫助阿爾巴尼亞。¹ 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實際上對南斯拉夫的這種地位是不滿的，在他看來，「阿爾巴尼亞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並號召阿爾巴尼亞人「在發展自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時應該表現出獨立自主的精神」。² 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建立聯邦的企圖也有違蘇聯的對外戰略，在斯大林看來，南阿聯邦的建立必然會引起英美的注意，使巴爾幹的局勢複雜化，因此他「建議」推遲「討論阿爾巴尼亞加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³ 但南斯拉夫方面一直沒有放棄控制阿爾巴尼亞的努力，仍然在努力「使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服從於南斯拉夫的利益，使阿爾巴尼亞成為它的原料附屬國和第七個共和國。」⁴ 此外，南斯拉夫對希臘革命的態度也引起斯大林的警惕。斯大林則恪守1944年10月同丘吉爾達成的百分比協議（根據這一協議，希臘屬於英國的勢力範圍），因而對希臘革命運動及其領導人都持冰冷的態度，他稱希臘左派起義為「愚蠢的行為」：美英絕不會容忍一個紅色的希臘威脅他們與中東之間的生命交通線，並建議希臘共產黨要特別利用合法手段，把「羣眾性的政治鬥爭」作為鬥爭的優先方面。⁵ 與此同時，蘇聯領導人多次拒絕希共領導人提出的援助請求。而鐵托則把英國在希臘的存在視為對自己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因此，南斯拉夫要求對希臘革命提供援助，要求對希臘共產黨提供支持。

1 丘瓦欣與霍查關於阿政府代表團訪南結果的談話記錄，1946年7月3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第161頁。

2 Чубахин Д.С. 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ей в Албании, 1946-1952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1, с.122.

3 АВПРФ, ф.0144, оп.30, п.118, д.10, л.3,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05.

4 Чубахин Д.С. 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ей в Албан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25.

5 參見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57.

戰後初期，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特別是一些東歐國家出現的反蘇反共情緒，與蘇聯要求在這些國家建立對蘇友好政府的戰略意圖明顯相悖，對蘇聯戰後的安全戰略構成了重大挑戰。

（四）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挑戰

戰後，不僅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和反蘇反共傾向的發展對蘇聯的安全戰略構成了挑戰，而且，隨着蘇聯與西方國家矛盾的發展，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向蘇聯發動了旨在削弱蘇聯影響力的強烈的攻勢，對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及其安全戰略的實施造成了重大挑戰。

隨着蘇聯與英美在東歐問題和德國問題上的矛盾的發展，雙方在地緣政治上的爭奪已經展開，並且都在醞釀對外政策的轉變，但是，到1947年上半年，大國合作戰略還沒有被最終放棄。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把注意力轉入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企圖以此來削弱對手的影響力，在政治問題上取得有利於自己的結果。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轉入到了意識形態戰線，以此來掩飾自己在地緣政治上的利益。¹ 蘇聯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逐步加劇。

由於蘇聯紅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突出貢獻，戰後，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空前增長，蘇聯紅軍在軍事上取得的一系列勝利，也成了蘇聯對外宣傳的資本。為降低蘇聯的威望，破壞蘇聯的影響力，「英美，尤其是美國人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一場規模宏大、不斷針對蘇聯的活動」，「由美國和英國的一系列部門組織」的關於「破壞紅軍」的運動「籠罩了世界所有的報刊」，「紅軍戰士在佔領國家的每件有違紀律的事情都被鼓吹和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不懷好意地被加以評論。」² 二戰後期至1946年早

1 參見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135.

2 RGASPI, f.17, op. 128, d. 870, l.1, 轉引自 Лельчук В.С., Пивовар Е.И. Менталите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6, с.65.

期，蘇聯駐外情報機構從國外發回的所有報告的主題幾乎都是「英美宣傳的挑釁行為」。並且，隨着美英與蘇聯矛盾的加劇，美英發動的這場宣傳運動不僅針對紅軍，而且還針對蘇聯的外交政策（首當其衝的是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政策）和內政。這些反蘇宣傳不僅局限在西方國家，而且還開始向蘇聯的勢力範圍，包括向中歐和東歐國家滲透。¹

1944—1947年，東歐各國的政治發展以各政黨爭奪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方向和確立對外政策方向——以蘇聯為方向還是以西方國家為方向的激烈鬥爭為特點。² 為了保留對東歐各國居民的影響，在東歐國家成立有利於西方的民主政府，特別是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這些國家進行的自由選舉中取得勝利，同時遏制共產主義的進一步擴張和蘇聯國際威望和影響力的增長，在這場鬥爭中，西方國家依靠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共產黨為首的聯合政權和民主陣線內外的反對派，利用大眾傳媒和西方國家傳統的影響渠道（各種西方通訊出版物，同東歐國家合作的協會，駐東歐國家的外國記者，政治精英同英美使館的聯繫等），把它們作為奪取政權、爭取羣眾支持的最重要的鬥爭武器，在東歐國家發動了一場新聞戰。³ 在索非亞，美、英、法大使館都開辦有閱覽室，意大利和奧地利都設立了一些書店。保加利亞報刊管理處也正式允許出售英、美、法的報紙和雜誌。1947年從蘇聯駐羅馬尼亞大使館經常收到關於英國人和美國人在居民中加緊活動的報告。其中一份報告稱：美國公使館同資產階級上層分子和著名的知識分子代表保持着特別的聯繫；「美國之友」這一組織在資產階級圈子裏有很大的影響；「美國青年朋友協會」特別關注學生和手工業青年……；「紅十字會」等社會保障組織對整個勞動

1 參見 Pechatnov, V., "Exercise in Frustratio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5-1947", *Cold War History*, Jan. 2001, Vol. 1, Issue 2, p.3.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05.

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18.

階層產生了影響。在布加勒斯特和羅馬尼亞其他每座大城市都有兩所美國圖書館；……美國影片租賃處使首都和其他地區近 140—160 家電影院處在它的影響之下。¹

戰後，東歐雖然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但是，西方國家在東歐地區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特別是美國可以依靠它在戰爭期間急劇發展的經濟和科技潛力，向東歐國家提供實際的經濟援助，從而對東歐國家的社會思潮產生影響。接受美國的貸款，在東歐國家戰後的政治綱領中成為廣泛的共識，並得到普遍的支持。不同派別的政治家，從自由民主黨到社會黨和共產黨，都把自己的活動綱領同獲得美援相聯繫。² 美國積極利用自己在東歐的影響力展開宣傳活動，並且得到當地部分知識分子和由反對黨控制的媒體的支持。比如，根據蘇聯駐華沙大使館秘書佩烏金的通報，1945 年夏天，美英在波蘭進行的宣傳活動得到了相當一部分波蘭知識分子的支持，其中包括大學教授和大學生，教師，藝術領域的工作人員。在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共產黨反對黨的大眾傳媒也在積極地表現自己。反對黨報紙——波蘭的《人民報》，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新聞報》和《自由言論報》，保加利亞的《農民旗幟報》，羅馬尼亞國家農民黨機關報《正義報》出版份額都很大，擁有能夠積極地支持自己政策的廣大讀者。³

除了在東歐國家，美英在德國也加強了反蘇宣傳。根據蘇駐德軍政府情報局發回的報告，「英美在德國的宣傳機構已達到了極其巨大的規模」，「倫敦和華盛頓無線電通訊社專門進行反蘇攻擊。……英國宣傳機

1 РГАСПИ, ф.575, оп.1, д.93, л.139-140; АВПРФ, ф.0125, оп.35, п.136, д.9, л.12, 轉引自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18-319.

2 參見 *Мурашко Г.Л.,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71-72.

3 參見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18-314.

構把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對立起來，挑撥社會民主黨人，推動他們與共產黨決裂，號召他們投靠西方，並應允支持他們。……很明顯，美國佔領當局企圖依靠社會民主黨人與資產階級黨派的聯盟，來反對左翼民主運動。」¹「英美和一部分法國宣傳機關在蘇佔區進行反宣傳的積極性大大增長。西方盟國政府的一些機關採取了一些措施，不僅不允許民主思想和蘇聯的影響滲透到西部各佔領區去，而且還要削弱蘇聯在柏林的影響，甚至企圖對蘇聯佔領區的德國居民也施加政治影響。」¹

來自蘇聯駐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奧地利、保加利亞以及德國駐外機構的報告顯示，英美在這些國家加強了宣傳，其影響力有不斷增長的趨勢。² 無論是按其規模、專業和資金撥款，戰後西方國家的宣傳努力都超過了蘇聯。³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 1948 年。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 年翻譯的 718 部著作中，209 部是英國作品，111 部是美國作品，而蘇聯作品僅佔 135 部。而在這一時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影片租賃中，蘇聯影片所佔的比重只有美國影片的 23%。⁴

對於美英在東歐國家發動的強大的宣傳攻勢，東歐各國共產黨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應對措施。正如檔案文件所表明的，在 1944—1948 年，儘管東歐許多國家共產黨的地位都加強了，軍事政治檢查及其強力部門都轉入了共產黨的手中，但畢竟暫時還未形成對新聞的壟斷。反蘇宣傳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沒有受到各國政府的限制，直到 1947—1948 年，在許多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在一定階段內羅馬尼亞）反對

1 別斯帕洛夫關於改進蘇聯對德國居民無線電廣播的措施給莫洛托夫的報告，1946 年 4 月 6 日；蘇駐德軍政府情報局《關於德國的政治狀況》的綜述（摘錄），1945 年 11 月 3 日；希金關於檢查蘇駐德軍政府宣傳處工作給亞歷山德羅夫的報告，1946 年 3 月 30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1 卷，第 376、396、401 頁。

2 Pechatnov, Vladimir O., "Exercise in Frustratio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5-1947", *Cold War History*, p.3.

3 Печати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 Совет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47)//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74;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20.

4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276, л.4, 轉引自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19.

黨報刊都沒有遭受嚴格的系統的書報檢查。直到 1948 年 2 月，掌握在捷克斯洛伐克非共產黨手中的報刊，在每日印刷的份額中還佔據 52% 的多數。在羅馬尼亞，直到 1947 年 6 月還在出版私人報紙以及社會民主黨的出版物，出版反對共產黨及其組織的刊物，儘管共產黨的報刊越來越佔據主導地位。在波蘭，1947 年出版的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報紙有 735 種，其中包括反對派的報紙。¹ 在這些反對派報刊的影響下，一些東歐國家特別是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反蘇情緒在增長，特別是在波蘭和匈牙利，反蘇情緒是公開化的。

在一些東歐國家存在的反蘇情緒有着歷史的原因，雖然由於蘇軍解放了東歐國家，戰爭結束後人們的自發熱情使反蘇情緒有所減弱，但是戰後的一些現實問題，比如邊界問題，賠償問題，拆卸工業企業問題，蘇聯清點戰利品小組的工作，蘇軍司令部的鎮壓行動（首先是在佔領區內，蘇軍與當地居民的衝突）都產生了反蘇情緒的土壤。戰後初期，蘇聯紅軍政治部第七分局給蘇共中央的材料、東歐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同蘇共中央領導人的通信以及蘇聯外交機構發給莫斯科的報告都證明了這一點。²

對於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發起的挑戰和東歐國家反蘇情緒的增長，蘇聯領導人迅速作出了回應。考慮到東歐各共產黨的思想政治任務，蘇共中央 1945 年 9 月 29 日通過了「關於改善蘇聯境外宣傳的決議」，責成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的蘇聯各組織（蘇聯情報局、對外文化協會、外國書籍出版社、國際圖書出版署、蘇聯電影出口公司等等）提高蘇聯對外宣傳的「進攻性和戰鬥性。」³ 與此同時，莫斯科嚴密地注視西

1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276, л.8,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19-320.

2 詳見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72.

3 參見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15-316.

方國家的文化中心、圖書館和書店在東歐各國的活動。¹ 針對「敵人破壞紅軍聲譽的行動」，1945年10月，蘇聯情報局在向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提交的專門報告中，建議採取緊急的對策，首先是收集能夠「敗壞」盟國軍隊行為的材料，以便「以材料和事實武裝我們在全世界的眾多朋友，開展反宣傳活動」。蘇聯情報局的這一建議得到了上級的支持。²

蘇聯雖然採取了一些措施，加強意識形態工作，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的這場激烈的鬥爭中，蘇聯明顯感到自己是防禦的一方，處於不利的地位。從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奧地利、保加利亞和德國，都傳回了關於英美宣傳活動極其活躍及其影響力急劇增強的報告，以及關於在這些國家裏蘇聯與其西方競爭者之間在宣傳資源方面差距越來越大的報告。³ 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戰爭的結束使蘇聯失去了一張宣傳的王牌，即紅軍在擊潰龐大的納粹軍隊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⁴ 隨着戰爭的結束，紅軍從蘇聯宣傳活動的重要「資產」迅速地變成了它的「債務」，蘇聯紅軍在佔領區的行為都會為敵意的宣傳活動提供豐富的素材。「關於紅軍在佔領國家裏的『殘暴行為』，尤其是『強姦行為』的誹謗性通報，如潮水般涌來。」⁵ 另一方面是由於蘇聯對外宣稱自身的種種缺點。第一，蘇聯針對東歐國家的文化宣傳活動，沒有充分考慮各個國家的特殊性，具有大而化之、鬍子眉毛一把抓的特點。第二，蘇聯整個對外宣傳工作的協調性很差。宣傳工作缺乏針對性，絕大部分宣傳作品專

1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т.2, с.164-167.

2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5, д.136, л.82, 轉引自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72.

3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54, л.1-10, 35-38, 45-51, 轉引自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73.

4 Pechatnov, Vladimir O., "Exercise in Frustratio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in the Early Cold War, 1945-1947", *Cold War History*, p.7.

5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006, л.195, 轉引自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 совет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47//*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72.

業水平較低，整個對外宣傳機器效率低、靈敏度差、缺乏協調性，總是按照老的作法工作。第三，蘇聯情報局的宣傳工作極其薄弱，其效果極差。「它與美國和英國的宣傳工作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美國和英國擁有龐大的機關、資金和佔優勢的技術設備。」第四，蘇聯對外宣傳活動粗淺和空想化、形式化、笨拙和公式化。¹

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增強蘇聯在東歐的影響力是蘇聯在這一地區建立安全緩衝區的重要手段。正如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寫道，「斯大林用意識形態來組織東歐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來建立他的安全緩衝區。」² 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對蘇聯安全戰略的實施造成了嚴重的威脅。斯大林對蘇聯的宣傳工作日益感到不滿。1945 年底，他強烈叱責莫洛托夫和塔斯社的主編們把中央權力下放到各海外辦事處，訓斥他們將「克里姆林宮的權力鬥爭」從莫斯科泄露出去。他還批評《真理報》「在國內外缺乏訓練有素的辦事人員」。為了克服這些不足，蘇聯設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研究蘇聯的對外宣傳，並給上層出謀劃策。³ 在「對蘇聯情報局的工作，以及對蘇聯在境外的情報和宣傳活動情況進行了解之後，委員會認為，蘇聯「在境外的宣傳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必須極大地加強這項工作」，蘇聯對外宣傳組織（蘇聯情報局、塔斯社、無線電廣播委員會、國際圖書出版署、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等等）的工作「缺乏針對性和協調性」，委員會建議中央和外交部加強對它們工作的協調，並為其指明方向。⁴ 1945 年秋，蘇共中央意識形態部門已經積極地恢復

1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 совет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47//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84-189

2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131.

3 1945 年 9—12 月斯大林同莫洛托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員關於對外政策問題的來往信函。Печатнов В. Союзники нажимают на тебя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сломить у тебя волю// Источник, 1999, №2, с.70-85.

4 РЦХИДНИ, ф.1, оп.128, д.870, л.123, 138-139, 轉引自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 совет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47//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85.

了他們的活動。檔案中包含了大量有關意識形態措施的備忘錄和預備文件，大部分都顯示了「擰緊螺絲釘」的趨勢。¹

針對蘇聯對外宣傳工作令人不能滿意的狀況，蘇聯領導人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1946年4月18日，蘇共中央召開宣傳工作會議，針對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嚴重缺陷和不足，委託日丹諾夫對蘇聯的宣傳機構進行改組。² 8月，蘇共中央連續通過了三項決議。第一個決議說，「中央委員會認為，目前黨和蘇維埃領導幹部的訓練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第二個決議說，「中央委員會指出，列寧格勒出版的兩份文藝雜誌《星》和《列格勒》辦得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第三個決議說，「中央委員會……認為劇院的劇目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自這三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決議起，蘇聯開始了戰後大規模思想鬥爭運動，持續五、六年之久，遍及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乃至自然科學各界，影響深遠。³ 同時，這三個決議的作出也使整個對外宣傳工作更加嚴格化，成為「思想鬥爭」升級的一個新的強大的推動力，使這個鬥爭明顯地開始超越「和平共處」的框架。⁴ 1946年10月9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蘇聯情報局工作」的決議進一步指出，系統地揭露美國、英國及其他反動帝國主義集團旨在進行帝國主義擴張和煽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是蘇聯情報局工作應立即集中進行的一個重要方面。⁵

-
- 1 Chubariyan, Alexander O. "Ideology and Realpolitik: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p.3-4.
 - 2 РГАСПИ, ф.17, оп.125, д.377, с.1, 轉引自 Глотова О.А. Учитывая наличие крупных недостатков в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ВКП (б) о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партии, 1946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3, №5, с.3.
 - 3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52年（第七分冊）》，第245頁。
 - 4 Печати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 совет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47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191.
 - 5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關於蘇聯情報局的工作」的決議，1946年10月9日，РГАСПИ, ф.13, оп.3, д.1062, 134-37, 轉引自 Nadzhafov, Dzhahangir G.,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Aggravation of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Cold War History*, Jan. 2004, Vol. 4 Issue 2, p.166-172.

二、蘇聯意識形態對抗方針的加強與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醞釀

為了應對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蘇聯的對外政策也在逐漸向對抗的方向轉變。儘管在斯大林戰後對外政策問題上是意識形態動機還是地緣戰略動機佔主導地位，學者們的認識不一，但現在多數研究者都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不能不對蘇聯領導者們的感知及其對外部世界的評價、對他們對西方國家行動的解釋打上烙印。¹ 根據馬列主義學說，斯大林始終不相信蘇聯與西方大國的合作能夠長久持續下去。早在1945年的秋天，斯大林就警告自己的戰友：與西方的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戰後「緩和」是沒有任何可能性的。²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選民大會上的演講表明，斯大林對資本主義本質的看法仍然沒有發生變化。他關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看法無疑是極其明確地把現代資本主義與戰爭劃上了等號。這一演說顯示了意識形態因素對蘇聯外交政策的影響。

隨着意識形態因素對蘇聯對外政策影響的增長，蘇聯的報刊重又開始強調西方集團的威脅，強調帝國主義伴隨着戰爭。1946年6月，蘇共中央雜誌上就已展開關於西方資本主義集團是蘇聯安全的主要威脅的討論。這一討論的出發點是，為了「英美」團結，同時追求擴張主義和反蘇目的，英國準備充當美國的「附屬國」和小夥伴。1946年6月《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瓦爾加院士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對國際形勢的這種

1 參見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2.

2 Pechatnov, Vladimir O., "‘The Allies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 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 September 1945- December 1946", *CWHP Working Paper*, №26, 1999.

解釋仍佔主導地位。¹

1946年11月，在莫斯科慶祝偉大十月革命28周年大會上，莫洛托夫發表講話，除談到大國緊密合作經受考驗之外（鑒於倫敦外長會議受挫），他還提到了西方試圖再次建立反蘇集團的問題。因此，他號召蘇聯人民和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的人民提高警惕。² 為了防止戰爭，防止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起來建立針對蘇聯的聯盟，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是個很好的戰略選擇。日丹諾夫認為，蘇聯在英美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英美之間的矛盾即將顯現。美國的社會衝突在蔓延。英國的工黨多次向英國工人承諾實行社會主義，現在他們很難後退。不久，他們不僅會和本國的資產階級，而且會和美帝國主義者發生衝突。³ 1946年6月《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瓦爾加院士的文章的使命便是強調西方國家之間存在的矛盾，這些矛盾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引起的。從這些矛盾的觀點出發，「殖民地問題」成了實現西方集團計劃的主要目標，同時英國在未來競爭中的立場還是不明確的。所出現的國際形勢還是不固定的，有建立暫時還不清楚的某種聯盟的傾向。⁴ 換言之，瓦爾加通過分析得出的存在「英美矛盾」的結論，深刻地揭示了進一步分析蘇聯對外政策時的關鍵問題：現實形勢決定了蘇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採取利用現有的矛盾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外交手段。⁵

總之，從1946年後半期開始，蘇聯的對外政策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宣傳必須同西方國家保持友好關係，意識形態不同的兩大體系存在「和平競爭」的可能，另一方面開始強調在國際關係的發展中存在兩種相互

1 參見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4.

2 РЦХИДНИ, ф.82, 轉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6.

3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с.535.

4 Ra'anani G.D., *International Policy Formation in the USSR: Factional Debates during the Zhdanovschchina*, Hamden, 1983, p.62.

5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4.

對抗的趨勢，世界政治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和進步方向，另一個是以美國和英國為首的反蘇的帝國主義政策。¹ 兩大陣營對抗的思想開始出現在蘇聯領導人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中。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的這種轉變預示着他們開始對戰後初期構建的大國合作戰略進行某種調整，來應對這一戰略在各方面面臨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領導人開始考慮關於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

檔案材料表明，至少從 1946 年起，建立一個新的共產黨聯合組織的話題，就開始出現在斯大林同東歐某些共產黨領袖的座談中。² 1946 年 6 月初，斯大林在同來訪的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和保加利亞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等人會談時，明確向他們提出了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想法。在 6 月 8 日與鐵托舉行的會談中，斯大林詢問鐵托是否有建立一個具有互換情報性質的新國際的必要。鐵托表示願意。當晚，斯大林在別墅裏宴請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時候再次談到了關於建立情報局的問題。但是，顯然是為了消除他們的擔心，斯大林首先對共產國際進行了批評，說它用命令束縛了共產黨的手腳。在強調完全沒有必要去復活任何形式的第三國際的同時，斯大林提出了建立一個情報機構的想法，「以便經常開會，交流一般的經驗和作出各種決定。」並且，斯大林強調說，這個機構作出的

1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110.

2 根據德地耶爾在《鐵托傳》裏所依據的南斯拉夫官方的說法，1945 年 4 月，鐵托在訪問莫斯科時，向斯大林談到了如下想法：由於沒有共產國際，必須成立一個國際共產黨機關以交換經驗，為此應辦一份國際共產主義報紙。斯大林「雙手贊成」，但這一說法還沒有得到相關檔案材料的證實；斯大林與東歐共產黨領導人就共產黨情報局問題進行的最早的一次會談可能是與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拉科西在 1946 年 4 月 1 日進行的會談。拉科西在這次會談結束返回匈牙利之後，馬上就談到了關於建立共產黨的國際情報機關的前景問題。在 4 月 20 日召開的匈牙利共產黨布達佩斯黨組織書記代表會議上以及在 1946 年 5 月 17 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拉科西都談論了成立新的共產黨國際聯合組織的必要性，並強調指出，這個新的機關應該有別于以前的共產國際，同時還明確它的主要職能是：相互交換信息和互相交流經驗。很有可能的是，拉科西是在莫斯科與斯大林就這個問題舉行會談之後才談論這一問題的。詳見：*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 XXXV-XXXVI.

決議不能束縛任何對決議持有異議的政黨。¹ 在由蘇聯返回南斯拉夫後，鐵托在他的記事手稿中寫下了有關將要建立的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的一些問題。其中在各黨關係方面記載了：相互提供情報，交流經驗，「工作中的一般協調」，「消除個別黨之間的各種分歧。」情報局的政治目標有，「廣泛宣傳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支持世界進步的民主運動」和「反對反動派和法西斯殘餘的鬥爭」。手稿特別指出了「與社會改良主義者作鬥爭」和與「建立新的社會黨國際的企圖」進行鬥爭的「必要性」。關於情報局「不能做的事情」，手稿寫道：第一，情報局「不能對某些黨發佈命令，如果該黨不同意的話」，不能對它採取「懲罰性的措施」；第二，情報局「應該嚴格考慮個別國家的特殊性」。² 儘管從鐵托的記事手稿中無法判斷鐵托所記載的關於情報局的職能問題是鐵托自己的意見還是斯大林的意見，但是，應該說，這一手稿中所提出的情報局的一些職能都反映了蘇聯領導人的需要。東歐各黨在內外政策上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使得他們需要向蘇聯提供情報，個別黨在馬列主義思想認識上的不足使他們需要接受蘇聯的思想指導，與蘇聯「交流經驗」，而個別黨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表現出來的獨立傾向使他們需要事先同蘇聯協調立場，消除與蘇聯之間的分歧。面對西方向蘇聯發起的宣傳攻勢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反蘇宣傳，更需要創辦報刊，「廣泛宣傳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增強蘇聯的影響力。在斯大林看來，「報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報刊是黨「最銳利最有力的武器」。³

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問題的提出，還反映了國外某些共產黨人尋求解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前景問題的願望，因為這些問題使他們感

1 德迪耶爾：《鐵托傳》，三聯書店，1977年，第88-89頁。

2 Arhiv Josipa Tita(貝爾格萊德)，Fond Kabinet Marsala Jugoslavije, I-3-c/11, 1.1-2,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35.

3 斯大林著，李清芳編：《斯大林論報刊》，新華出版社，1985年，第195、285頁。

到焦慮和不安。另一方面，國外共產黨人提出這一問題，也同當時在各式各樣的政黨（首先是資產階級政黨）之間以及在它們的報刊上展開的關於革命、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陳舊過時」等等的爭論有一定聯繫，並部分地是由這些爭論而引起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色權利報》1946年1月25日發表旨在反對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專題文章，也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關注。因為「當前有一些政黨着重宣稱馬克思—列寧關於國家、關於民主、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已經過時和已為實踐所否定，並認為通過暴力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總的來說已被排除」。¹ 這些問題的出現越來越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共產國際聯合組織，對各國共產黨的進行思想上的指導。

在法共和意共被逐出政府，聯合政府政策遭受失敗之後，蘇聯領導人加快了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步伐。1947年6月4日，斯大林在同哥穆爾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談中，第一次向波蘭領導人陳述了召開會議、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想法，並建議哥穆爾卡以波蘭工人黨中央的名義發起倡議召開會議，會議的目的只是交流情報和組建共產黨國際出版機構。² 1947年7月16日，根據斯大林的建議，哥穆爾卡給擬定參加會議的各黨，即聯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發出了邀請信。邀請信裏談到，必須「討論歐洲各兄弟黨所面臨的問題」，所以要召開「有某些共產黨參加的地區性的情報會議」，「交換關於某些國家形勢的情報，交換看法。」邀請信還特別指出：「不追求建立某種國際工人運動機關，不想創辦闡明某些國家工

1 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關於賴赫里來信的結論性意見給蘇斯洛夫的報告，1947年2月7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第263-271頁。

2 參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пеще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ХХIX-XL.*

人運動的問題的雜誌。」¹

但當哥穆爾卡發出這份邀請信，當這次會議的準備工作已經被納入實際日程的時候，日丹諾夫在給斯大林的關於蘇聯方面組織這次會議的具體行動的報告中，確定了莫斯科完全另外的目的：在會議參加者按照波蘭工人黨中央邀請信裏提出的要求，聽取和討論關於每個黨的情況的報告時，蘇共代表團在會議上直接建議把邀請信中完全沒有提到的兩個問題——關於國際形勢問題和協調各國共產黨行動的問題列入會議的日程，而且蘇聯代表團將根據第二個問題在會議上「提出成立情報局形式的與會各黨協調中心的想法」。至於斯大林和哥穆爾卡在會談時和後來哥穆爾卡邀請信中所說的成立出版機構的問題，在日丹諾夫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成了莫斯科主要意圖——組建情報局的一個陪襯。²

有的學者提出，為了取得波蘭領導人的同意，斯大林在6月4日同哥穆爾卡會談的時候欺騙了哥穆爾卡，隱瞞了成立共產黨情報局的主要意圖。³事實上，斯大林不是有意隱瞞，如果一開始蘇聯領導人就抱有建立協調中心的話，即使波蘭領導人不同意，斯大林完全可以事先做工作，正如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時候對哥穆爾卡施加的壓力一樣，迫使他同意蘇聯的要求，何況邀請信還是由波蘭工人黨發出的，其中指明的召開會議的目的也是根據波蘭工人黨的理解提出來的，如果有意欺騙的話，斯大林不僅在波蘭，而且在情報局其他成員中將失去威望。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是，斯大林當時確實沒有馬上就建立協調中心的打算，

-
- 1 АЖВТ-КМЖ 1-3-b/507, 1.1,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14-115.
 - 2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0, л.11,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96.
 - 3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96.

正如早先在同鐵托和拉科西舉行的會談之後表述的一樣，他最初只是認為，有必要使這一國際性的共產黨組織具有互通情報的性質，為其辦一個機關報。

從共產黨情報局的籌備和召開過程來看，蘇聯領導人並沒有完整的、關於召開情報局的周密計劃。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當在建立協調中心的問題上出現爭論的時候，蘇聯代表團從莫洛托夫那裏得到的指示是：進行努力，一定要使會議通過成立情報局的決議，哪怕是沒有協調職能。但從另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後來給蘇共代表團又發了另外的指示：賦予情報局以協調的職能。¹ 而且，從斯大林要賦予情報局協調職能的決心來看，他是有信心讓反對者屈服的。如果這樣的話，在會前他更沒有必要隱瞞這一意圖了。

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蘇聯領導人改變初衷，要使擬議建立的共產黨情報局一定要具有協調中心的職能呢？從斯大林在建立情報局問題上的立場不斷變化的過程來看，對這種立場變化作出較為合乎邏輯的解釋是：斯大林最終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計劃受到了馬歇爾計劃的影響。只是在認識到馬歇爾計劃的實質和挑戰之後，他才進一步堅定了建立協調中心的想法。

三、馬歇爾計劃的挑戰與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

在認識到馬歇爾計劃的挑戰之後，蘇聯領導人改變了原來在建立情報局問題上的一些構想。

¹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3, л.50,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21.

（一）蘇聯領導人對馬歇爾計劃的認識

1947年6月5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了援助歐洲的復興計劃，即「馬歇爾計劃」。在馬歇爾計劃宣佈前夕，儘管蘇美關係不斷惡化，¹ 蘇聯仍然公開主張奉行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緩和緊張狀態及加強合作的政策。1947年4月15日，斯大林仍然向來訪的馬歇爾表示了對蘇美關係的樂觀看法。²

馬歇爾計劃提出之後，蘇聯領導人高度重視，並且特別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對馬歇爾計劃對蘇聯安全可能產生的危險以及所帶來的好處進行評估，評估的結果是，蘇聯應該參加巴黎會議，商討馬歇爾計劃。6月21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對英法提出的三國外長舉行會晤商討馬歇爾計劃的建議給予肯定的答覆。³

儘管蘇聯領導人作出了參加商討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的決定，但是他們的態度仍然是謹慎的，根據經濟學家瓦爾加給外交部提出的意見，美國正瀕臨深刻經濟危機的邊緣，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處理掉其過剩物資。馬歇爾計劃對於美國是迫於形勢不得已而為之的事，蘇聯可以從中獲得利益。同時瓦爾加也指出，馬歇爾計劃的結果會導致在資產階級

1 1947年以來，蘇美關係中又發生了一些導致兩國關係緊張的事件。1947年3月1日，美英在德國的共同佔領區正式成立；波蘭1月19日舉行選舉之前，西方國家和蘇聯互致外交用會，攻擊對方在選舉中的舉動，並互相指責違反雅爾塔和被茨坦協議。2月10日，艾奇遜先生對參院的一個委員會說，蘇聯的政策是「侵略的和擴張主義的」，這引起了蘇聯的抗議；2月26日，在匈牙利的蘇聯人逮捕了匈牙利小農黨書記科沃奇先生，這引起了美英兩國對蘇聯的抗議和持續數星期之久的相互粗暴攻擊；接著在3月12日，杜魯門主義出籠，引起了蘇聯的強烈反應。《真理報》和《新時代》都予以強烈的批評。4月24日莫斯科會議以失敗告終。詳見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第41頁。

2 斯大林同美國國務卿馬歇爾關於蘇美關係以及德國問題的會談記錄，1947年4月15日，*Свободная ГИ.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с.39.*

3 蘇共中央政治局決議，1947年6月21日，APRF, fund 3, inventory 63, case 270, list 12, 轉引自Narinsky, Mikhail 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WIHP Working Paper, №9, 1994.3, p.42.*

的基礎之上統一德國；可能導致建立歐洲資產階級國家的反蘇統一戰線。¹ 及於對馬歇爾計劃的這種認識，蘇聯參加巴黎會議的目的便是：盡力從美國獲取經濟援助，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阻止美國聯合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反蘇統一戰線。當然，為達到這一目的，蘇聯領導人也不排斥東歐國家參加巴黎會議。因此，6月22日，蘇聯通過駐華沙、布拉格以及貝爾格萊德大使轉告這些國家的領導人：

「鑒於一些歐洲國家（如荷蘭、比利時）已經提出了要求，（蘇聯的）友好盟國從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有必要在準備參與制定這樣一個經濟計劃方面表現出主動，並宣佈他們願意參加會談。²

但是，當巴黎會議臨近時，蘇聯對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的目的的懷疑加強了。諾維科夫大使在6月24日發給莫斯科的電報中明確表示了這種擔心。諾維科夫認為，馬歇爾的演講和計劃，只不過是制定了一個比較微妙的、在政治上可接受的策略，企圖拉攏西方國家來支持美國的反蘇政策，阻止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其目的在於使歐洲國家在經濟、政治上依附於美國的資本並建立一個反蘇陣營，設想一個更廣泛的行動綱領以便更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因此，諾維科夫認為，這個計劃並沒有考慮讓蘇聯參與，他還引用了馬歇爾演講中的話作為上述判斷的根據：「任何為了謀取政治或其他方面好處而試圖使人類長期陷於災難的政府、政黨或團體都將遭到美國的反對。」諾維科夫認為這段話「明顯是針對蘇聯的」。³ 諾維科夫分析的結果是，實際上蘇聯在可接受的條件下加入這

1 АВПРФ, фонд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олотова, оп.9, инд.213, папка 18, д.191, л.4-18, 轉引自 Пихоя Р.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0, с.26.

2 莫洛托夫給蘇聯駐華沙、布拉格、貝爾格萊德大使的信件，1947年6月22日，f.6, op.9, p.18, l.19, 轉引自 Narinsky, Mikhail 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WHP Working Paper*, №9, 1994.3, p.42.

3 АВПРФ, f.059, op.18, p.39, d.250, ll.314-320, 轉引自 Parrish, Scott 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CWHP Working Paper*, p.20.

個計劃是根本不可能的。此外，諾維科夫還指出，蘇聯參加馬歇爾援助計劃將為自己提供一個使美國的援助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機會，同時還可以防止利用美國援助作為建立西歐反蘇聯盟的工具。諾維科夫還注意到一個與此有關的問題，他指出因為德國資源在任何歐洲復興計劃都起着巨大作用，所以對美國計劃的討論，可以被當作是一次重提德國賠償問題的良機。這個建議表明，蘇聯通過參加制定相應計劃，不僅可以獲得美國的援助，而且還能從德國獲取賠償。因此，在諾維科夫懷疑馬歇爾援助計劃是企圖建立西歐反蘇集團的同時，他並不排斥蘇聯參加這一計劃，因為這能在政治、經濟上帶來某些利益。蘇聯的參加甚至可以防止西歐集團的形成。¹

然而，在6月26日的議會上，莫洛托夫發現，法國和英國提出的經濟援助方案與蘇聯的設想背道而馳：英法希望建立一個多國委員會來審查歐洲各國的援助申請，然後在他們之間進行協調，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這筆援助。但是，蘇聯只想總地統計一下各國的要求，然後把它提交給華盛頓。蘇聯不能接受建立一個多國委員會的建議，認為這會侵犯各個國家的「主權」。最關鍵的問題是，當巴黎會議進行到一半的時候，莫洛托夫收到了莫斯科發來的祕密情報：英法已經允諾把德國作為將來歐洲復興計劃的中心，而且他們反對把德國的產品用來償還對蘇聯的賠款。²這一情報在會議上得到了證實：當莫洛托夫提出，希望英法能夠保證，無論德國如何加入援助計劃也不能損害支付合理的賠償或者導致德國工業實力增長的時候，英法拒絕同意這些條件。³

-
- 1 Parrish, Scott 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CWIHP Working Paper*, p.19-22.
 - 2 Roberts, Geoffrey, "Moscow and the Marshall Plan: Politics, Ideology and the Onset of the Cold War, 1947", *Europe-Asia Studies*, 1994, Vol.46, №8, p.1376.
 - 3 Parrish, Scott 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CWIHP Working Paper*, p.24-25.

6月29日和30日，蘇聯情報人員把他們從倫敦獲悉的情報向莫洛托夫進行了彙報：美國副國務卿威廉·克萊頓與英國官員正在就如何將德國的西方佔領區納入馬歇爾計劃之內，而將蘇聯排除在外這一問題進行磋商。在巴黎，莫洛托夫還收到莫斯科發來的電報，稱美英將德國視為「復興歐洲大陸計劃的基礎」。雖然英國外相厄內斯特·貝文和他的法國同行喬治·比道爾特均向莫洛托夫否認這一點，莫洛托夫仍將此視為是「美英幕後的陰謀」。後來，莫洛托夫還收到了另一份來自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報告。該報告稱，美國計劃建立「針對蘇聯的聯盟和戰略包圍圈，在西方穿過西德與西歐各國；在北方以在大西洋、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北部島嶼的各軍事基地為依託；東方繞過日本和中國；而在南方，則包括中東各國和地中海。」¹

看來，在德國問題上，英法已經與美國走在了一起，已經與美國建立了反蘇統一戰線。因此莫洛托夫警告說：馬歇爾計劃會破壞國家主權，使德國死灰復燃，讓美國控制歐洲，尤其不祥的是，「使歐洲分裂成兩個集團，……在各國關係中製造新的困難。」²這時，蘇聯領導人最終意識到了美國提出馬歇爾計劃背後的長遠設想：復興德國的軍事工業潛力並對之進行引導，使之像1930年代那樣來反對蘇聯。正如斯大林在1947年7月告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前西方盟友現在力圖重建被英國佔領的魯爾，把它轉變為西方陣營的工業基地。³

馬歇爾計劃不僅是對蘇聯對德政策的挑戰，而且也對蘇聯在東歐的利益構成了挑戰。這是由於東歐國家在經濟上是脆弱的，在很大程度上

1 APRF, f.3, op. 63, d.270, l.54, 59-60, 轉引自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105.

2 《紐約時報》，1947年7月3日，第3版，轉引自拉弗貝：《美蘇冷戰史話（1945—1975）》，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7頁。

3 Известия, 9 января 1992г., 轉引自 Narinsky, Mikhail 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WIHP Working Paper*, p.18.

依賴於同西方國家進行的貿易。¹ 美國的援助當然對這些國家具有特別的吸引力，特別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對馬歇爾計劃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戰後，保加利亞也面臨經濟困境，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巨大政治和經濟壓力，甚至是季米特洛夫也對能否頂住這種壓力錶示懷疑。² 如果美國以經濟援助為手段成功地突破這些東歐國家，歐洲的戰略態勢就會向不利於蘇聯的方面發生急劇的改變。

在認識到馬歇爾計劃的諸多挑戰之後，斯大林明白，蘇聯和東歐國家參加會議不僅將會毫無結果，而且還會對東歐國家產生負面的影響。因此，他不僅責令蘇聯代表團馬上退出了會議，並且還要求東歐國家的代表團也不參加會議。畢竟，美國的經濟援助對某些東歐國家政府太具誘惑力了。如果考慮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政府的聯合性質，而共產黨沒有完全控制這些國家的外交機構，那麼，一旦在巴黎會議上遇到具體問題，莫斯科將很難強迫他們的代表服從蘇聯單方面提出的條件。1947年7月7日至8日深夜，莫斯科命令蘇聯駐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芬蘭的大使，立即向貝魯特、哥特瓦爾德、喬治烏·德治、季米特洛夫、拉科西、鐵托和庫西年轉交蘇聯方面的電報。根據這份電報，他們的國家和政府必須拒絕參加7月12日在巴黎召開的主要討論與馬歇爾計劃問題有關的全歐經濟會議。所有國家都順從地執行了莫斯科的指示，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則遇到了麻煩。問題在於，捷克斯洛伐克在前幾天（7月4日）已經宣佈將參加會議，報紙上也已公佈了這一消息。當蘇聯駐捷克斯洛伐克臨時代辦博德羅夫於7月8日拜見哥特瓦爾德，並將電報交給他時，哥特瓦爾德說，現在已經不可能改變參加巴黎會議的決定了，因為「政府不會

1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63頁。

2 季米特洛夫關於蘇聯援助保加利亞致斯大林的感謝信，1947年5月31日，沈志華、李丹慧整理：《蘇聯歷史：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8卷，華東師範大學冷戰研究中心收藏。

支持我們（共產黨）」。¹雖然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最終接受了蘇聯的要求，但是，斯大林明白了東歐國家對獲得美國援助的渴求，因此，為了安撫這些盟國，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控制，在1947年7—8月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內，蘇聯先後和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進行了談判，簽署了貿易協定即「莫洛托夫計劃」。此外，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在馬歇爾援助計劃問題上的立場也說明聯合政府政策帶來的困難，促使蘇聯領導人改變這種政策。

通過對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態度的轉變進行分析，可以使人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斯大林把蘇聯的勢力範圍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重要的遺產，建立和鞏固對東歐國家的控制是戰後蘇聯安全戰略的首要問題，從帝國利益、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考慮，對這一地區進行控制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在這一地區，斯大林不會對西方做任何讓步。另一方面，戰後，蘇聯領導人把美國看成是國際舞台上的主要對手，所以竭盡全力地阻止建立由美國領導的西方集團的任何企圖。馬歇爾計劃的提出意味着歐洲的分裂和西方反蘇集團的建立，直接挑戰了斯大林實行大國合作戰略的初衷。之後，蘇聯領導人改變這一戰略也就是必然的了。馬歇爾計劃的實施以及蘇聯對這一計劃的消極反應成為歐洲分裂道路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²正如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所說，「對斯大林而言，馬歇爾計劃是一個分水嶺。」³為了應對馬歇爾計劃，蘇聯需要改變戰後初期確立的聯合政府政策，確保對東歐國家的控制，同時，利用西歐共產黨的影響力阻止西歐聯盟的建立。與這一戰略轉變相適應，蘇聯需要東歐各國和法國、意大利共產黨也改變政策，而首先需要的是對這些共產

1 Narinsky, Mikhail 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WIHP Working Paper*, p.49-50.

2 Narinsky, Mikhail 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rshall Plan", *CWIHP Working Paper*, c.19.

3 Leffler Melvyn P., "Inside Enemy Archives: The Cold War Reopened", *Foreign Affairs*, Vol. 75, №4 (July-August 1996), p.133.

黨的政策向這方面轉變進行思想上的動員。創辦一份雜誌和建立具有協調職能的情報局越來越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

（二）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協調中心職能的確立

馬歇爾計劃之後，蘇聯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計劃在加緊進行。根據與斯大林事先進行的協商，7月15日，哥穆爾卡寫信給蘇聯及東歐相關各國共產黨領導人，通知在波蘭舉行會議。與此同時，蘇聯對外政策部受到委託開始制定「有關會議日程所有問題的詳細材料」。在準備這份材料的過程中，對外政策部接到的指示是：制定關於某些國家共產黨情況的報告，詳細分析「議會形式的鬥爭和非議會形式的鬥爭的結合」，各共產黨對其他加入聯合政府的各黨左派的態度，揭露「民族共產主義和民族狹益性的表現」，最後，必須準備關於各共產黨對待馬歇爾計劃，對待「德國問題和德國未來國家制度」的態度的備要報告。¹ 由此可見，蘇共召開情報局會議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揭露各黨的「民族狹隘性」，批判馬歇爾計劃，協調各黨對德國的政策。

根據蘇共中央的指示，對外政策部於1947年8月底完成的報告，充滿了對各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缺點和錯誤的批評意見。其中批判貝爾格萊德堅持自己的特殊目的、違反蘇聯的對外政策利益的錯誤意圖。但具體在報告中只是指出不允許南斯拉夫報刊嚴厲批評意大利共產黨和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本人在的里亞斯特問題上的立場；批評南斯拉夫對外政策——力圖把南共「擺在巴爾幹特殊的領導黨的地位」，關於這一點，報告中指出了兩個問題。其一是1946年底保加利亞公佈憲法草案時，南共領導人嚴厲責備索非亞在馬其頓問題上的不正確立場。南斯拉夫責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3, л.12, 轉引自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29-30.*

備保加利亞在憲法草案中沒有提到保加利亞的少數民族問題，其中包括馬其頓人。保加利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提出抗議，反對南斯拉夫人的言論，但後者依舊堅持自己的觀點。報告還責備南斯拉夫拖延 1946 年 7 月 9 日簽定的南阿友好互助條約中規定的應該給予阿爾巴尼亞的經濟援助，及其阻撓蘇聯與阿爾巴尼亞發展關係。除了上述這些指責外，報告還對南共的一些內部制度提出批評。報告對波蘭工人黨領導人和哥穆爾卡本人的指責是，試圖「忽視蘇聯經驗」，貶低蘇聯在解放波蘭和建立「人民民主制度」過程中的作用和給予的幫助。聯繫到上述批評，有關波蘭情況的報告中具體批評的是哥穆爾卡發表的關於在波蘭的條件下不能接受蘇聯固有的「無產階級專政」和農村集體化道路的公開聲明。報告指責波蘭工人黨出版機構「總是談馬克思主義」，「閉口不談列寧和斯大林」。指責波蘭政府為在波蘭傳播蘇聯出版物和影片設置障礙，忽視和排擠特定時期派到波蘭軍隊中的蘇聯軍官。而且開始時報告中沒有出現這些責難之詞，它們出現在較晚的時候，這意味着得到了上級下達的相應指令。在關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報告中，對共產黨領導人的批評是，他們熱衷於議會活動和與「參加民族陣線的一些反對黨派搞和平合作」，並以此來代替動員羣眾。報告對捷共作出的結論是：他們錯過了更大規模地實行國有化和在政府機構中、軍隊中和社會組織中獲得更多席位的機會。特別指出捷共在宣傳蘇聯取得的成就和推廣蘇聯經驗方面做得不夠。與波蘭的情況相似，報告中提到了不同於蘇聯道路的、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所產生的影響。捷共代表最初在政府中所作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審議馬歇爾計劃的會議的發言，被稱作是「最大的政治錯誤和惡意看待蘇聯的表現」。對匈牙利共產黨的批評是，「個別共產黨領導人」反對波茨坦會議關於把那些曾在匈牙利積極活動的反動分子移交給蘇聯的決定，反對支付戰爭賠款和償還蘇聯的食品貸款。報告中對此的評價是，不僅在對待蘇聯的態度上表現出類似的依賴思想，而且

也滑落到「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¹ 對外政策部撰寫的這些報告表明，蘇共擬定的關於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一個重要日程便是要通過對這些國家共產黨民族狹隘性和獨立傾向的批評，加強對這些國家共產黨的控制和領導。但是，在提出建立協調中心的建議之後，蘇聯領導人改變了最初擬定的會議議程。

關於建立協調中心的問題，巴拉諾夫在 8 月 15 日給日丹諾夫的報告中就以隱晦的形式提了出來。8 月 27 日，代表蘇共出席會議的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在報告中進一步明確了關於建立協調中心這個問題：由波蘭領導人報告這一問題。至於協調中心本身，在出席會議的各黨代表「自願同意」的條件下，計劃以「總部設在華沙的情報局」的形式建立。在協調各黨活動的問題上，蘇聯代表團應提出以下建議：「在涉及這些黨的利益的問題上，各黨之間必須協商」；而且，這裏最主要的是指，「在涉及蘇共利益的所有問題上，有關各黨必須同蘇共協商，同樣，在涉及其他黨利益的所有問題上，蘇共也必須同這些黨協商。」² 實際上，由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莫斯科責成參加情報局的其他共產黨在涉及蘇聯安全範圍裏的所有問題上必須同蘇共協商。這就明確表明了蘇聯領導人在建立新的國際機構問題上的主要目的：重建共產國際時存在的歐洲各國共產黨的利益必須絕對服從蘇共利益的那種隸屬關係。但這次重點只是對蘇聯的安全戰略起着至關重要作用的蘇聯勢力範圍內的各國共產黨。

在蘇共代表明確提出建立協調中心的建議之後，對外政策部工作人員在 9 月 2 日之前準備出了長達 8 頁的分析材料——《關於蘇共的國際聯繫》。總的來看，這份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說服參加會議的各黨相信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41, л.22-23; д.32, л.26-28; л.5-30; д.376, л.1-18; д.39, л.3-30; л.21-29; д.14, л.42,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68.

2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0, л.13, 轉引自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27-28.

建立協調中心的必要性。材料指出，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各共產黨之間現有的聯繫是不充分的，¹ 因為它不是正規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關係是困難的，原因是「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心來交換情報和協調國際工人運動與共產主義運動」，「沒有這一統一的中心，還妨礙了各民主組織行動的協調，妨礙了他們在同反動派和新的世界大戰的戰爭販子的鬥爭中制定統一的策略。」在對「越來越明顯地為資本主義制度招魂和主張恢復社會黨國際的社會民主黨——這一帝國主義在工人階級內部的代理人」進行了譴責之後，這份材料號召解決「完全現實的任務——建立國際協調中心，或至少建立情報出版機構；這一機構在爭取和平和發展民主的鬥爭中，在制定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組織共同路線和策略方面，將扮演積極角色。」² 這份材料說明，蘇聯領導人希望在9月波蘭各共產黨會議上成立協調中心，在這一計劃遇挫的情況下，至少要同意建立國際共產主義出版機構。

顯然，蘇聯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在建立協調中心問題上可能會遇到阻力。為了減輕這種阻力，蘇共中央在會議的日程問題上不能不有所考

-
- 1 共產國際解散以後，蘇共為了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保持聯繫，在蘇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之下成立了第99號研究所、第100號研究所和第205號研究所。建立第99號研究所主要是為了開展戰俘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第99號研究所喪失了大部分功能。最終在1946年解散；而第100號研究所是從共產國際特別聯絡部組建來的，其主要任務是同國外共產黨進行特別的工作聯繫，為「非法分子」製造假證件并把他們派往國外，為國外共產黨中央輸送「特殊物資」（武器、彈藥、無線電器材等），保障通過無線電對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實施領導。第205號科學研究所是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媒體部的基礎上組建的。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看來，這一研究所的活動效率是非常低的。1946年9月，該委員會認為，這一研究所在履行其所賦予的工作方面，做得很差。它所發佈的大部分材料都是過時的，或者是重複塔斯社的報道。1946年10月，蘇共中央書記處賦予第205號科學研究所的職責是「把科研工作同高質量的業務信息結合起來」，之後，科研所的主要任務就是「深入地研究國外共產主義運動、工人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中的問題，並就這些問題及時向蘇共中央提供情報」。該研究所應該根據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批准的計劃開展工作。接近1947年初，第205號科學研究所有如下部門開展工作：出版部；美國部；拉美地區部；西南歐地區部；斯拉夫國家和巴爾幹國家部；中歐國家部；英帝國國家部；中東和近東國家部；太平洋國家部；斯基的納維亞國家部等。詳見：*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0-14.*
 -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3, л.24,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 перв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12.*

慮，因而，對外政策部所準備的材料和報告草案中原有的主題思想——對東歐各國共產黨進行的批評到日丹諾夫在會議上最終發言時已所剩無幾也不是偶然的了。在會議上，蘇聯代表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了法共和意共，而對其他共產黨所犯的種種錯誤則隻字未提，莫斯科顯然是想通過對法共和意共的批評來使其他共產黨吸取教訓，避免對所有各黨都提出批評造成會議的緊張氣氛，給建立協調中心的努力帶來障礙。同時，對應邀與會的西歐兩黨的批評其實也暗含着對東歐各黨的批評。這種批評方式為蘇聯共產黨今後對其他各黨的內政進行干涉開了先例，使蘇共可以對那些「犯有錯誤」和「背離正確路線」的政黨進行裁決，促使他們從所犯的錯誤中汲取教訓。

會議上，蘇聯代表在提出建立協調中心的意見的時候也是謹慎的。在會議的第一天，馬林科夫在報告蘇共中央活動的時候就聲明說，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建立各黨之間的「經常聯繫」，他認為這種聯繫的目的之一就是「協調行動」。¹但就怎樣協調行動一點具體的意見他也沒提。蘇聯代表顯然認為，會下個別試探每一個黨的態度比在會上直接提出建立協調中心的建議要好。在日丹諾夫、馬林科夫每日就會議進程相關問題給斯大林的密碼電報中，報告了同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國和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就成立情報局問題進行座談的情況。正如密碼電報中所說的，上述四個代表團都同意成立具有協調職能的情報局。²不過在與哥穆爾卡協商時卻出現了麻煩。在會議上，波蘭方面就成立協調中心問題提出了「懷疑和反駁意見」。從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給斯大林的一份密電中可以看出，哥穆爾反對建立協調中心，不願把波蘭作為共產黨情報局常駐機構的所在地，他不願拿波蘭的利益冒險，因為「在華沙建立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 л.54-55,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155-156.

2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2, л.52; д.96, л.1-3, 轉引自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43.

情報局將被看成是共產國際的復活」。按照波蘭人的意見，這首先會使波蘭同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複雜化，並且可能會使波蘭工人黨和波蘭社會黨合併成統一的黨遭受困難。但是，哥穆爾卡最終還是妥協了。9月27日，哥穆爾卡在會上做了簡短報告，以個人名義建議成立情報局，而且其職能不僅是交換經驗，同時「在必要的時候」，「按照自願的原則」，協調各共產黨的活動。¹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以及賦予該組織協調的職能標誌着蘇聯對東歐國家政策的轉變：從施加政治軍事影響和控制轉為雙方的等級從屬關係，使這些國家直接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當蘇聯領導人放棄聯合政府政策並把西方聯盟的建立視為蘇聯安全的主要威脅的時候，就開始加強由莫斯科領導的統一的蘇聯集團了。1947年，蘇共制定的政策構想的基礎就是統一的地區集團。這一構想取代了反法西斯人民民主的概念，摧毀了這些國家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的發展趨勢，取而代之的是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國家，也就是說，社會政治對抗應該是今後社會發展的另外一種趨勢。²

四、兩大陣營理論的提出與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

戰後初期，隨着蘇聯和美英矛盾的發展以及意識形態鬥爭的加劇，蘇聯的對外政策逐漸開始向對抗的方向發展。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以前，一個分裂的世界的假設就早已牢牢扎根於蘇聯領導人的頭腦中了。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 л.276-279, 轉引自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пеще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44.*

2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145-146.*

在內部工作層面上，對抗的徵兆已經是非常明顯了。在給斯大林的報告和給出席 1946 年巴黎外長會議的外交部代表們的報告中，莫洛托夫就不斷地提及「我們的敵人」——「英美集團」遭到蘇聯代表團的「抵制」。¹

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日丹諾夫在大會上作了關於國際局勢的報告，其中提出了兩大陣營的理論，把國際關係解釋成為兩極前景——這就不可避免地放棄了莫斯科曾提倡的東歐各黨的人民陣線政策。這一理論的提出也意味着聯合政府中共產黨所追求的既接近西方、又接近蘇聯的政策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是要求情報局其他成員放棄聯合政府政策，要求東歐各黨把最後一部分反對派清除出國家政權。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日丹諾夫的演講不僅是針對馬歇爾計劃的，而且也向東歐資產階級民主及資本主義殘餘發出了進攻的信號。同樣，日丹諾夫有關國際局勢與國內局勢的不可分割地相聯繫的理論，也使法國或意大利共產黨想返回參加政府的希望徹底破滅。會上，日丹諾夫對法共和意共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批評，批評兩黨領導人「沒有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揭露杜魯門—馬歇爾計劃——一項美國奴役歐洲，尤其是奴役法國的計劃」，要求兩黨必須與他們過去的聯合政府政策決裂，直接投入到防止馬歇爾計劃得逞的行動中來。²

日丹諾夫兩大陣營理論的提出標誌着蘇聯開始放棄斯大林自二戰後期以來所一直堅持的聯合政府政策。但從根本上說，斯大林的這一對外戰略的轉變仍然是防禦性的，其主要目的是應對蘇聯在東歐地區面臨的挑戰，確保東歐各國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並使東歐各國領導人對蘇奉行友好的政策，打消這些國家的獨立傾向，把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納

1 Pechatnov, Vladimir O., "'The Allies Pressing on you to Break Your Will...': Foreign Polic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lin and Molotov and Other Politburo Members", *CWIHP Working Paper*, №26, 1999, p.20.

2 ЦХСД, ф.77, оп.3, л.94, л.40-42, 轉引自 Parrish, Scott 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CWIHP Working Paper*, p.35-38.

入蘇聯的戰略軌道，加強蘇聯在東歐、中歐已經取得的陣地。同時，利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主要是法共和意共），使其發揮支持反帝陣營「基地」的作用，用日丹諾夫報告中的話來說，使他們承擔起「領導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擴張計劃進行抵抗的運動」的作用，使美國無法實現其把包括西德在內的所有西歐國家結成一個由華盛頓領導的統一集團的計劃。但這種運動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因此，在日丹諾夫的報告中，對當時正在進行的中國和希臘革命隻字不提。因為，蘇聯領導人首先關心的是為本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最為有利的條件，而條件之一就是國際的和平環境。在日丹諾夫報告的前幾天，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大會上說，蘇聯政府認為，「在現在的局勢下，任何戰爭都勢必發展成為世界大戰。」另一方面，那些正在進行革命鬥爭的共產黨都沒有受邀參加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大會，包括中國和希臘的共產黨。這就說明，斯大林的目的並不是發動世界範圍的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他的戰略目標依然如故，只不過戰術已有所改變。無論是日丹諾夫的報告，還是九國共產黨在會議最後發表的宣言都沒有涉及為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問題，甚至沒有聯繫眼前的目標，把這個問題作為一項遠景目標提出來。很明顯，斯大林仍然沒有放棄他掌權以來的戰略基石。他為國際共運制定的政治路線仍然偏重於利用帝國主義之間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¹ 因此，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是為蘇聯的對外政策服務的，是對蘇聯的對外政策在歐洲受到的諸多挑戰作出的反應，而不是新階段革命樂觀主義的表現。這一點從情報局在成立後給法共和意共領導人的任務中可以明顯看出。這些任務是：動搖這些國家的穩定，猛烈衝擊其「心臟地區」，在法國，要盡量幫助戴高樂重掌政權，「為開展一切民主性質的行動儘可能創造完備的有利條件。」這一進

1 西班牙共產黨刊物《工人世界》，1946年9月25日，轉引自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卷，第165-172頁；第184-186頁。

攻戰略還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要「破壞美國向歐洲的滲透」，不讓美國捲入歐洲。¹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過程也表明，蘇聯的對外政策本質上仍然是防禦性的。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是倉促召開的，雖然早在馬歇爾計劃之前，為應對在歐洲面臨的諸多挑戰，蘇聯就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情報局。但是，當時並沒有考慮建立協調中心，只是在認識到馬歇爾計劃的挑戰之後，8月中旬，蘇聯領導人才提出了建立協調中心的要求。即便如此，蘇聯領導人在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仍然是非常謹慎的。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前夕，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對出席會議的蘇共代表下達指示，其中提出了會議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反對馬歇爾計劃；關於德國的國家制度和經濟制度；關於各國共產黨對蘇聯和蘇共的態度；關於共產黨行動的協調和相互提供情報的形式。蘇共中央認為，這些問題是當代國際形勢中最重要、最決定性的問題，應該成為會議的中心問題。此外，對外政策部還反對季米特洛夫提出的關於成立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危險而鬥爭的國際委員會的建議，認為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國際形勢複雜化，並且會對現有的國際民主組織（工會、青年、婦女聯合會）的作用產生懷疑，因為它們的使命就是為和平、民主而鬥爭。² 從對外政策部的這一指示中可以看出，國際共運問題不是會議的重點，並且，在蘇聯領導人看來，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不應使國際局勢複雜化，不應該削弱國際民主組織在為和平、民主鬥爭中的作用。

會議上，日丹諾夫在闡述關於國際問題的看法時，他的分析和結論的重點就是「兩大陣營」理論，但是，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準備過程中，在為會議準備的頭幾份報告草案列根本沒提及這一命題。隨着日丹

1 *Ельмеевой З. С.* Коминформ: взгляд из Парижа, Январь 1948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1, с.141.

2 巴拉諾夫關於華沙會議議事日程和蘇聯代表團與會問題給日丹諾夫的報告，1947年8月15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第273頁。

諾夫後來對他所作的報告的修改，報告的第二部分的標題「蘇聯——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支柱」才被換成了一個更大的能夠反映兩大陣營命題的題目：「戰後新的政治力量分野和以帝國主義和反民主的陣營為一方，以反帝國主義和民主的陣營為另一方的兩個陣營的建立」。出現這種變動，不是由於日丹諾夫思想出現了轉折而自己主動修改的，而是由於克里姆林宮在這方面作出了原則的決定。很可能這一決定來自斯大林，是他在看了準備好的報告之後作出的。¹ 很明顯，甚至到9月初，蘇聯領導人還未制定出一個新綱領來指導各國共產黨應對馬歇爾計劃。只是在後來的演講稿中，「兩大陣營」理論才正式出現。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不能被簡單視為是共產國際的復活。斯大林的主要戰場是在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被局限在歐洲的地理範圍之內。應該說，斯大林在某種程度上吸取了共產國際的教訓，即「經驗表明，不能有包括所有國家的國際領導中心。……也許，應該建立地區聯合組織。」² 並且，在成員的選擇上，斯大林也是非常謹慎的。斯大林強調指出，「出席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應該只是那些在羣眾中有重大影響和在法律範圍裏活動的黨」，³ 那些尚未得到西方國家承認的共產黨顯然不在邀請之列。此外，蘇聯還拒絕了南斯拉夫人提出的關於邀請希臘共產黨的要求，顯然，這是因為，根據戰時與英國達成的協議，希臘不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出於同樣的考慮，對於比利時和芬蘭共產黨，也沒有發出與會的邀請。考慮到南斯拉夫共產黨與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特殊關係，邀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更不用說了。此外，共產國際是一個審議機構，除蘇聯共產黨外，其餘成員都是弱小的或被政府取締的黨。情

1 參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П.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18-119.

2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243頁。

3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 Сталин и Морис Торез,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в Кремле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с.26-30.

報局代表們所屬的黨則是在行使實際權力或在國內都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黨。情報局也不是一個審議機構。事態的發展表明，情報局的任務是充當俄國共產黨強制命令的傳達渠道和執行助手。只要共產黨人尚未掌握政權，他們的聯席會議只能以協商和制訂政策為限，但在一旦取得政權後，就可被莫斯科利用來採取行動了。莫斯科需要有這樣一個組織，藉助它來指揮和協調各成員的行動。¹

五、共產黨情報局建立的影響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根據斯大林的設想，這一新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堅定不移地促進以蘇聯為首的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統一和團結。正是基於這一觀點，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不到一個月，1947年10月14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准了向蘇聯外交部下達關於同東歐國家締結相互援助條約的指示。按照這一指示，外交部應「保障東歐各國之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簽訂相互援助條約，然後在蘇聯和上述國家中尚未同蘇聯簽訂這種條約的國家之間簽訂相互援助條約。」指示中說，將要簽署的這些條約的出發點應是，各國必須「給予相互援助，反對來自任何國家、而不只是來自德國和奉行侵略政策並同德國聯合在一起的國家的侵略」。假若不能在所提建議的基礎上達成協議，那麼，則建議「特別研究關於簽訂相互援助條約反對來自德國或其他直接或以其他某種形式同德國聯合在一起的國家的侵略問題」。² 為貫徹這些指示，從1948年春天開始，建立作為東歐安全體系基礎的條約構

1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第72頁。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1, с.727.

架在加速進行，東歐大多數國家之間相繼簽署了同一模式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條約，在經過相應磋商之後，這些國家同蘇聯也簽署了條約。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產生了影響。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前，根據聯合政府政策，東歐國家存在由其本身歷史所決定的發展趨勢。但是，受蘇聯對外政策轉變的影響，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之後，這種發展趨勢發生了轉變。在大會上，日丹諾夫報告中提出的關於兩大陣營的命題，以及加強民主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對抗的方針受到了包括東歐各共產黨在內的所有與會代表的贊成和支持。即使反對建立協調中心的哥穆爾卡，在大會上也同其他人一樣，在兩個陣營對抗問題上完全支持日丹諾夫。哥穆爾卡在發言中甚至說，「在現在的國際形勢下，越來越多的國際問題制約着整個事態進程，因此應該確定共產黨內部的政策。」¹ 根據這一方針，會後，東歐各國共產黨加快了消滅議會中反對派的進程，把最後一部分反對派清除出了國家政權。在這一過程中，尋求政治解決問題和達成妥協的途徑越來越被採取暴力的手段所取代。在東歐國家，共產黨通常都掌握着強力部門，創建了警察局，並利用這些工具來改變局勢，如偽造選舉結果和組織一系列「揭露陰謀」的活動，通過強力部門對反對派進行迫害，從政治上搞垮其領導人。解密檔案材料也表明，在此方面蘇聯給予了充分的支持。在波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西方國家對偽造的選舉結果的抗議也沒有產生任何積極的效果。如果說，在 1945—1946 年蘇聯使館同所有的政黨都保持着聯繫的話，那麼，到 1947 年上半年特別是在 1948 年隨着共產黨逐漸壟斷政權，蘇聯同非共產黨首先是同反對派的聯繫縮小了，並且退居了次要位置。同時，蘇聯與東歐各國之間的關係事實上納入了蘇共與東歐各國共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 л.217, 258-265, 轉引自 *Гибня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19.*

產黨之間的關係的軌道。¹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以及兩大陣營理論的提出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產生了影響。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前，以共產黨為首的中國民主陣營，進行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和政治鬥爭，但是，這種鬥爭並不具備公開的政治目標——通過暴力手段推翻國民黨制度和把西方勢力驅逐出中國。只是在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才提出了這個目標。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25日召開的會議上，討論了毛澤東關於「目前局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這一報告給黨指定的任務是：「密切結合歐洲九國共產黨會議向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發出的關於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鬥爭的號召，勇敢地、堅定不移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在九國共產黨會議召開之後，中共軍隊加大了對國統區發動軍事進攻的規模，「這些行動變得更加積極，政治目的更加明確了。」在九國共產黨會議召開之前，中國存在着第三勢力，而在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幻想破滅了，「第三勢力」在中國失去了一切根基。情報局會議有助於更加明確地劃分出兩大陣營力量的界限，加強了民主陣營，削弱了反動派的陣營，促進了民主陣營的力量向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陣營發動進攻。²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對蘇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產生了影響。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意味着嚴格統一共產主義運動意識形態基礎的開始，而各國共產黨走不同於蘇聯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被蘇聯領導人看作是降低蘇聯影響的危險的道路。而且，在情報局會議之後，蘇聯共產黨的經驗重新成為各國共產黨實踐中統一的信仰標準。蘇聯模式重新成

1 АВПРФ, ф.138, оп.28а, папка9, д.92, л.29,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с.94, 99, 100.

2 普霍洛夫向巴拉諾夫發送的材料：關於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中國的局勢，1948年1月23日，沈志華、李丹慧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19卷，第40-77頁。

為東歐各國共產黨遵循的社會發展模式。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之後，東歐各國開始了一個長期的階段，即「以民族主義道路轉入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失去吸引力和被拋棄的一個足夠長期的階段」。¹ 東歐國家發展道路的轉變導致了黨內鬥爭的激化，蘇聯利用這種黨內鬥爭，支持忠誠於莫斯科的領導人對那些具有獨立傾向的領導人進行清洗，這既保證了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和控制，同時也確立了蘇共與這些國家共產黨之間的等級模式，對蘇共與這些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成立情報局的決議公佈後，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強烈反響。但總的看來，在西方一些人士的心目中，共產黨情報局主要是蘇聯對馬歇爾計劃作出的反應。在 1947 年 10 月 8 日進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美國副國務卿洛維特在談到共產黨情報局時宣稱：「支持這一綱領的黨和政府清楚地表明，他們的意圖是——如果可能的話——要阻止歐洲經濟復興。」美國駐蘇大使史密斯認為，「以共產黨情報局的形式重建共產國際是克里姆林宮對馬歇爾計劃的回答。」《紐約時報》聲稱：共產黨採取的這個步驟本質上是「明確地宣佈了政治戰」。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新的共產國際機構的成立使美國援助西歐的計劃更為迫切。英國《泰晤士報》也就共產黨情報局的成立發表評論說：「人們可能發現這一新步驟的含義是想有效地抗衡馬歇爾計劃和美國對西歐 16 國的領導，加強不參加該計劃的東歐人民間的團結的感情。」據約瑟夫·科爾貝爾的分析：「1947 年 9 月，共產黨情報局成立，這也可能是斯大林在 7 月份看到俄國的東歐盟國顯然有意參加馬歇爾計劃而邁出的一步。這似乎促使斯大林作出不惜任何代價把這些國家置於他的控制之下的決定。」²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4-1948: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1998, с.38-81.*

2 張月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長編》第四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04-305 頁。

對於西方世界對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評論，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在10月10日發表的社論中作出了回應。《真理報》一方面對西方世界關於「共產國際復活了」的觀點進行駁斥，聲稱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發表的文件表明，這一機構的建立並不是要重新設立一個世界範圍的像共產國際那樣的有集中領導權的機構。另一方面宣稱，共產黨人有權利「抵抗美國奴役歐洲國家的計劃」，並且指出這是共產黨情報局的主要目的。¹ 之後不久，斯大林也就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向西方作出解釋。10月14日，在索契接見英國下院工黨議員時，斯大林把成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看作是各政府合作的一種嘗試，其目的是提高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保衛情報局各成員國的獨立自主。在斯大林看來，情報局的活動和俄國與任何其他國家的關係完全無關，並且他表示，他一如既往地迫切希望改善這些關係。²

1 Правда, 10 октября 1947г.

2 《泰晤士報》，1947年10月24日，轉引自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第66-67頁。

第三章 蘇南衝突與蘇聯在共產黨 情報局內部的整肅

共產黨情報局是在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挑戰、蘇聯領導人為東歐各國共產黨和法國、意大利共產黨確定的聯合政府政策難以為繼的情況下建立的，其重要的目的是加強蘇聯對東歐各共產黨、加強對法共和意共的控制，遏制其獨立傾向的發展，同時利用法共和意共開展廣泛的工人運動，對本國政府施加壓力，反對馬歇爾計劃的實施，「破壞美國向歐洲的滲透」，¹ 防止西方國家建立起反蘇集團。在蘇聯領導人的堅持下，共產黨情報局被賦予了重要的協調職能，其目的是使其他成員在對外政策上同蘇聯協商，以遏制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但是，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情報局其他成員不僅在它們推行的一些政策上沒有同蘇聯協商，而且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其中以南斯拉夫共產黨最為突出。南斯拉夫領導人拒不同蘇聯「協調」政策的立場及其拒不認錯的態度促使了蘇南衝突的爆發。

為了使南斯拉夫屈服，同時為了遏制情報局其他成員獨立傾向的發展，蘇聯領導人利用了共產黨情報局，並在情報局成員內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整肅運動，使這些國家的政權最終都掌握在了那些依附於莫斯科的領導人的手中。

1 *Ельмеевой З.С.* Коминформ: взгляд из Парижа, Январь 1948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с.137.

一、蘇南衝突的起源與實質

蘇南衝突源於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一方面，南斯拉夫人在一些問題上表現了忽視蘇聯經驗的「民族狹隘性」，在巴爾幹問題上的野心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警惕，另一方面，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以後，南斯拉夫領導人在對外政策上不僅沒有同蘇聯協調，採取了一些違背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構想的激進的對外政策。鑒於南斯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和對其他共產黨的影響力，面對蘇南關係中的種種問題，鐵托採取拒不妥協的姿態挑戰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權威，促使蘇聯領導人利用共產黨情報局對南斯拉夫施加壓力，同時在東歐情報局成員內展開整肅，清除「鐵托分子」，消除情報局其他成員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使東歐各黨的政權掌握在那些忠誠於莫斯科的派別的手中，確保這些國家的政府對蘇是友好的。

（一）南斯拉夫領導人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

在 1947 年 9 月情報局會議之前，南斯拉夫對蘇聯離心傾向的發展已經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注意，當時在蘇聯對外政策部門擬定的一些報告中已經開始出現對南斯拉夫的批評，批評「南斯拉夫人過高評價自己武裝鬥爭的經驗和貶低蘇聯的軍事經驗、貶低蘇聯在解放南斯拉夫中的作用」，特別是批評鐵托忽視蘇聯在南斯拉夫的建立過程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批評鐵托對蘇聯在南斯拉夫整個解放鬥爭中的作用隻字未提。¹ 在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發給蘇聯外交部的密電中，鐵托在一些問題上的立場被認為是「民族狹隘性」的一種表現。情報局會議之後，關於南斯拉

1 拉夫連季耶夫關於鐵托在南人民陣線第二次大會上講話向莫斯科的報告（節錄），1947 年 9 月 27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4 卷，第 218 頁。

夫領導人民族主義錯誤的報告仍然被發往莫斯科。1947年9月27日，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拉夫連季耶夫根據鐵托在南斯拉夫人民陣線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對鐵托進行了指責。1948年1月，拉夫連季耶夫和蘇聯駐南武官西多羅維奇就鐵托和南著名軍事活動家在1947年12月底的一系列講話再次向莫斯科發送了對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民族主義錯誤進行批評的報告。¹

南斯拉夫領導人對其他共產黨，以及對蘇聯的批評也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警惕。1947年8月底到9月初，在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為情報局會議的召開準備的材料中指出，南共「某些活動家」有時表現出民族主義的狹隘性，不考慮其他國家和兄弟黨的利益」。這顯然指的是南共領導人對保加利亞領導人在馬其頓問題上的立場進行的批評，以及對陶里亞蒂和意大利共產黨人在的里亞斯特問題上的立場進行的批評。此外，南斯拉夫還對蘇聯進行批評，「批評所謂蘇聯對友好國家的援助不夠，並在援助問題上提出無限制的要求」，批評蘇聯在的里亞斯特問題上「出於對大國政治的考慮，不願意損害與大國的關係，拖延滿足小國家的要求，尤其是南斯拉夫的要求」。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的報告還特別指出，「南共領導人對阿爾巴尼亞想同蘇聯直接進行聯繫非常嫉妒。按照他們的意見，阿爾巴尼亞同蘇聯的聯繫只能通過南斯拉夫政府進行」，貝爾格萊德「企圖把南共置於巴爾幹地區特殊領導黨的地位」。² 種種跡象表明，南斯拉夫領導人謀求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建立一種起領導作用的秩序，並以領導的姿態對待其他一些共產黨和人民民主國家。³ 這種意圖違背了莫

1 參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57.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41, л.22-23,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08; RTsKhIDNI, ф. 77, оп. 3, д. 91, р. 46, 轉引自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134-135.

3 參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67-168.

斯科堅持的只有莫斯科這一個中心的等級制度模式，挑戰了蘇聯在東歐地區的權威。

（二）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後南斯拉夫與蘇聯在對外政策上的矛盾

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蘇聯開始更加明確地實行對抗的對外政策方針，這一方針被日丹諾夫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明確地表述為整個蘇聯集團的總路線。南斯拉夫領導人雖然衷心地贊同蘇聯的這一方針，但他們並沒有像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規定的那樣，在一些重大的對外政策問題上事先同蘇聯協商，而是不斷地採取一些有違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構想的激進的對外政策措施。

首先，南斯拉夫吞併阿爾巴尼亞的企圖及其事先不同蘇聯協商就向阿派遣軍隊的圖謀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擔心。早在二戰期間，南斯拉夫共產黨就同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關係。戰後，南斯拉夫一直試圖吞併阿爾巴尼亞，並反對蘇聯在阿爾巴尼亞影響力的增長。1947年12月初，南斯拉夫方面通過駐莫斯科大使波波維奇向蘇聯領導人提出，希望蘇聯從阿爾巴尼亞召回專家，採取措施加強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的優勢地位。對於南斯拉夫的這一提議，斯大林並沒有拒絕，反而建議南斯拉夫派吉拉斯或其他「負責」的、「最了解阿爾巴尼亞情況的人」來莫斯科商談此事。1948年1月中旬，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在會見吉拉斯時，蘇方表示，他們同意使阿爾巴尼亞的發展完全同南斯拉夫聯繫在一起，直至合併，蘇聯軍事和經濟顧問在阿爾巴尼亞的活動要同南斯拉夫協商。但是，如同1946年5月會見鐵托時一樣，斯大林指出，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形式上的合併決不能匆忙，必需等待時機。¹ 斯大林顯然是擔心西方國家對南斯拉夫吞併阿爾巴尼亞的

1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3, д.99, л.10-11,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58-359.

反應，擔心加劇國際局勢。斯大林的這種擔心馬上就表現了出來。1月19日，在得到吉拉斯發自莫斯科的關於蘇聯立場的報告後，鐵托向霍查建議在阿南部提供一個基地以供南一個師進入。理由是有消息說，存在着希臘在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支持下入侵阿爾巴尼亞的危險。鐵托在提出這一建議時既沒有同莫斯科商量，也沒有向莫斯科通報他給霍查的建議。¹ 儘管貝爾格萊德和地拉那之間交換信件是祕密進行的，1月21日莫斯科還是收到了拉夫連季耶夫通過非正式渠道得到的關於南斯拉夫一個師即將被派往阿爾巴尼亞的情報。蘇聯駐地拉那使團也從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那裏得到了同樣的消息。² 在斯大林看來，鐵托的這一擅自決定是對西方的挑釁。斯大林告訴霍查，「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不需要進駐部隊。實際情況是，如按原計劃進行部署則會引發這一行動原來設法避免的危險——在這一地區擴大敵對行動並可能導致美國的捲入。」斯大林向霍查解釋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向我們過去的盟國挑釁。」³ 鐵托擅自對西方國家進行挑釁的行動強烈地刺激了斯大林。

南斯拉夫對西方國家進行挑釁的行動還表現在關於建立巴爾幹聯盟的問題上。早在1944年，英國就表示了對建立南保聯盟的強烈反對態度，認為這一聯盟威脅到了英國在希臘的利益。⁴ 因此，蘇聯在南保聯盟問題上態度謹慎。但是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不僅沒有在這一問題上事先同蘇聯協調，而且走得更遠。1948年1月18日，在南保條約簽定之後回國途中，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季米特洛夫提出了未來將要建立的東歐

1 參見 Гибя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58-159.

2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472, л.78, 84, 轉引自 Гибя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109.

3 Чувакин Д.С. 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ей в Албан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25.

4 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在1944年12月4日的備忘錄中對莫斯科和索非亞表明，倫敦反對南保之間任何形式的聯盟。見：Nation, R. Craig, 「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48」,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130.

聯盟的輪廓，即一個包括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希臘在內的聯盟。這一採訪錄發表後，立即引起了西方媒體的巨大反應，他們認為此次事件是蘇聯統治歐洲的一種策略。¹ 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在發表的演說中大談共產主義對希臘的威脅，並呼籲西歐團結起來對付東歐的進一步蘇維埃化。他還敦促荷、比、盧三國加入一年前英國同法國簽訂的敦刻爾克條約，從而給他的呼籲帶上軍事色彩，這個條約原是為了對付可能出現的德國的威脅，但在英國外交大臣看來，形勢的發展更需要用它來阻擋蘇聯的威脅。為了加強威懾的力度，倫敦還帶頭勸說美國對保衛歐洲承擔責任。²

南斯拉夫在巴爾幹的這些行為極大地刺激了斯大林。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這些問題上，南斯拉夫並沒有按照共產黨情報局的有關規定向蘇聯進行通報，而且還在於這些挑釁行為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而且南斯拉夫違背斯大林的意圖，在希臘問題上力主援助希臘革命的行為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根據蘇聯間諜（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二等祕書）得到的情報，斯大林得知，華盛頓直接介入希臘事件，其原因就是南斯拉夫的野心。在得到這份報告止之後，斯大林對鐵托的政策更加警惕了。³ 鐵托對西方國家的一再挑釁無疑加劇了國際局勢，給了西方加強集團建設的藉口，直接違背了蘇聯領導人的戰略構想。自馬歇爾計劃以來，蘇聯對西方集團的建立作出了強烈的反應，並成立了共產黨情報局。然而，即使在宣佈世界分裂為兩大陣營以及採取更具對抗性的方針之後，在現實政策中蘇聯領導人對西方國家的政策仍然是非常謹慎的，他們盡力在不必要的情況下惡化局勢，給西方加強聯盟的口實。正因為如此，在共產黨

1 Nation, R. Craig, "A Balkan Union? Southeastern Europe in Soviet Security Policy, 1944-48",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134.

2 參見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37.

3 參見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18.

情報局建立後不久，蘇聯媒體得到的指示是：「對主要國家——美英法採取另一種態度」，「對待他們時不要使其難堪，不要漫罵，不要歇斯底里，要使用比較準確的、深思熟慮的、同時平靜的詞句，對西方大國不要諷刺，文章要用外交辭令的、客氣的語調。」¹ 儘管 1945—1948 年蘇聯和東歐各國之間簽訂了雙邊同盟條約，並鼓勵東歐各國之間相互簽署條約，結果出現了包括集團所有國家的完整的相互交織的條約體系，但莫斯科仍然避免建立集團的多邊結構，其目的在於不給西方指責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結成反西方集團的藉口，不挑釁西方國家。² 正因為如此，1948 年 2 月 4 日，蘇聯外交部決定改變同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雙邊條約中關於侵略者的界定。這一定義由泛泛地提出相互保證防衛以防「任何侵略」改為以防德國的侵略。對防衛侵略的這種界定表明，蘇聯僅僅是回到了戰時所使用過的術語，同時是為了避免西方國家對蘇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³ 1948 年 3 月，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日丹諾夫在因出現「斯拉夫國家」統一問題而引用這一論據時強調指出，確實需要「斯拉夫人」的聯合，即蘇聯和許多東歐國家的聯合，而且這種聯合也在進行中，但不應公開講這個，相反，應把建立集團的貴冠讓給西方。⁴

因此，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問題、南保聯盟問題和希臘問題上的挑釁行為，完全違背了蘇聯領導人對西方國家採取的謹慎的對外政策的戰略目的，這些行為引起斯大林的震怒也就是必然的了。2 月 1 日，蘇聯領導人在就南斯拉夫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隊問題給鐵托的電報中指出，

1 РГАСПИ, ф.629, оп.1, д.97, л.53, 78, 89,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талин и сме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Кремля в конце 40-х годов//*Гайдук И.В.*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9.

2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99.

3 *Лон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82-383.

4 РЦХИДНИ, ф.77, оп.1, д.990, л.6,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99.

作為南斯拉夫盟國的蘇聯，不會對南斯拉夫政府事前未同蘇聯協商，甚至也沒有向蘇聯政府通報而採取的這種行動所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¹ 但是，作為南斯拉夫盟國的蘇聯是不可能不承擔這種責任的。早在 1941 年斯大林就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即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蘇聯將不得不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負責。作為世界共產主義的故鄉，莫斯科面對各種反蘇團體的「挑釁行為」是如此地脆弱，這些團體很容易做到以共產主義旗幟為幌子製造麻煩，從而對蘇聯的國際聲譽造成危害。對於每一次罷工和工會組織的活動，倫敦和華盛頓都懷疑是受到了莫斯科的指使；而莫斯科則將每一次不是在巴基羅夫控制下的罷工看成是英帝國主義企圖往蘇聯身上抹黑的陰謀。² 既然要為南斯拉夫的這些對外政策承擔責任，蘇聯領導人就不得不說服南斯拉夫，使其在對外政策上同蘇聯協調。2 月 2 日，莫洛托夫給鐵托發送了一份緊急電報，請求南斯拉夫政府派兩至三名負責代表前來莫斯科交換意見。同時還邀請保加利亞政府的代表前來，蘇聯領導人希望通過在莫斯科舉行非正式會議交換意見的方法來消除他們在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在 1948 年 2 月 10 日進行的談話中，斯大林直接向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代表表明了問題的實質：南保兩國採取的行動沒有同蘇聯協調，挑釁了西方。會談中，斯大林告誡南斯拉夫代表「不要做任何有利於反動派取得勝利的東西」，在美國大選的情況下要特別小心，「美國的反動派在聽到這樣的聲明後就會說，在東歐不僅正在建立一個集團，而且還有一些國家正在合併成統一的國家。」在談到阿爾巴尼亞問題的時候，斯大林說，「阿的獨立是由三個大國蘇聯、英國和美國通過專門的協定予以保證的。……如果南斯拉

1 蘇聯領導人關於南斯拉夫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隊問題給鐵托的電報，1948 年 2 月 1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4 卷，第 220 頁。

2 巴基羅夫：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中央委員會書記，在戰後初期蘇聯對伊朗的戰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見 Scheid, 「Stalin's reluctant bid for Iranian Azerbaijan, 1941-1946: A View from the Azerbaijan Archives」,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p.5.

夫進入阿爾巴尼亞，英國和美國的反對派就可以利用這件事情，作為阿爾巴尼亞獨立的保護者採取行動。」在會談中，斯大林指責南斯拉夫「在任何問題上」都沒有同蘇聯進行磋商，並特別提出了關於南斯拉夫對希臘游擊隊的援助問題。斯大林認為，希臘的情況不同於中國，希臘的游擊鬥爭根本沒有希望，南斯拉夫支持游擊隊的立場是錯誤的，並應該停止這一支持。¹ 但是，卡德爾則認為希臘游擊隊一定會取得勝利，「只要外國不加大對希臘的干涉，只要希臘游擊戰士不犯嚴重的政治上和戰略上的錯誤。」² 看來，在關於支持希臘游擊隊問題上，斯大林仍然沒有說服南斯拉夫，仍然需要對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進行約束。因此，在蘇方的要求下，南斯拉夫同蘇聯在2月11日簽訂了就國際問題進行協商的議定書。對於斯大林來說，這一協定書不僅僅是要求南斯拉夫在對外政策上同蘇聯進行協商，而且是要在蘇南關係中建立起一種「協商」的制度。正如在2月10日的會談中，在卡德爾談到南斯拉夫沒同蘇聯人進行協商的錯誤時，斯大林說，「這不是一種錯誤，而是一種制度。」斯大林通過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簽署這一協定，不僅僅是要對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施加影響，而且還是要確立起「協商」的制度，遏制其獨立傾向的發展。因為，在蘇聯方面看來，在兩大陣營對抗的條件下，「所有基本的對外政策問題無疑應該出於一個堅定的目的，那就是符合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利益。所以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之間在對外事務方面保持一致的立場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那些重要的政策問題上要有協商和一致的立場」。因為，「有些問題，看上去只是地方上的問題，但它們可能引起嚴重的複雜的國際事端，因而是很重要的問題。其中包括巴爾幹和地

1 科拉羅夫關於蘇、保、南領導人會談的筆記，1948年2月10日；吉拉斯關於蘇、保、南代表會談給南共中央的報告，1948年2月10日，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第223-243頁；另見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446-453頁。

2 德迪耶爾：《鐵托傳》，三聯書店，1977年，第111-119頁。

中海地區的發展局勢，它是與全世界的政治相聯繫的，任何不小心的一步都可能加深事情的複雜化，況且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想使這些地區的局勢複雜化，以此在世界輿論和自己國家的輿論面前，為他們的帝國主義行徑開脫。」¹

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雖然對南斯拉夫的錯誤進行了批評，但是他仍然向鐵托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在阿爾巴尼亞問題上，斯大林實際上同意了南斯拉夫吞併阿爾巴尼亞的要求；對於巴爾幹聯邦問題，斯大林提出的三個聯盟的設想也部分地滿足了鐵托的要求。顯然，為了換取南斯拉夫在對外政策上同蘇聯協調，斯大林仍然在拉攏鐵托，在會談中，斯大林雖然激烈地批評季米特洛夫，但是對鐵托的批評卻要緩和得多。而斯大林也達到了這次會談的目的，2月11日，蘇南簽署了就重要的國際問題相互協商的議定書，建立了南斯拉夫在對外政策上同蘇聯進行磋商的制度。蘇南雙方對會談的結果都是滿意的，因此，2月13日，在同卡德爾再次會談時，莫洛托夫轉達了斯大林對鐵托來訪的積極態度，並且表示將繼續討論對南斯拉夫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問題。² 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矛盾好似得到了解決。

（三）蘇南衝突的爆發

蘇南兩國在2月中旬進行的協商使兩國的矛盾得到了緩和。然而，南斯拉夫政治局3月1日會議的召開使蘇南關係急劇惡化。在這次會議上，南斯拉夫領導人就蘇南關係問題無所顧忌地發表了一些言論。首先，卡德爾對斯大林對南斯拉夫代表的態度進行了批評，「說簡直把我

1 拉夫連季耶夫與貝勃勒關於蘇南關係惡化問題的談話記錄（摘錄），1948年4月21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2卷，第265頁。

2 АПРФ, ф.3, оп.66, д.908, л.149-153,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60.

們當作共青團員。他們明顯地企圖使我們依附於他們。」然後，會議愈來愈向批評斯大林和蘇聯的方向發展，並對南斯拉夫同蘇聯的分歧進行分析。卡德爾進一步認為，南蘇兩國在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存在着分歧，即社會主義的發展是通過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平等合作呢，抑或如俄國人彷彿所想像的那樣，通過繼續擴大蘇聯的辦法。他補充道：「我們對蘇聯的外交政策仍然未改變；但我們有義務密切注視我國的利益。」卡德爾的這一發言實際上指出了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的關係問題，要求在同蘇聯發展關係的時候以自己的民族利益為重，而不再是以蘇聯利益和國際主義為重。會上，鐵托對蘇聯向南斯拉夫施加經濟壓力的作法進行了批評，並且認為，與經濟利益相比，南斯拉夫的獨立更為重要。南斯拉夫「不是棋盤上的卒子」。在會議上，南斯拉夫政治委員們暢所欲言，挖苦保加利亞是蘇聯的特洛伊木馬，他們看不起斯大林的政策，認為它還不夠革命，他們把共產黨情報局說成是實際壓制的工具，他們還發牢騷說莫斯科有意在經濟上掠奪他們的國家。中央委員中除了財政部長斯仁坦·茹約維奇沉默以外，一致對蘇聯的要求採取了堅定的立場。而且鐵托在這次會議上強調說，這場爭論是關於南斯拉夫獨立的問題。¹ 看來，南斯拉夫領導人不僅完全沒有吸取教訓，而且其民族主義獨立傾向又有了新的發展：要求取得與蘇聯平等的地位。這就完全違背了對於莫斯科來說早已習慣了的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關係的規則。

在3月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南共政治局委員們紛紛講出自己的心理話，卻沒意識到他們中間有一隻蘇聯鼯鼠茹約維奇。他通過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拉夫連季耶夫把這次會議的詳細情況傳遞到了莫斯科。²

更令斯大林不能忍受的是，南斯拉夫違反從莫斯科得到的指示，仍

1 德迪耶爾：《鐵托傳》，三聯書店1977年，第122-125頁。

2 多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60.

企圖實現自己合併阿爾巴尼亞的企圖。「斯皮魯案件」之後，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政策的影響增強了，南斯拉夫領導人努力利用這種影響，計劃依照聯邦、邦聯或其他什麼形式實現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統一。¹ 並且，這一方針在 1948 年 2 月末和 1948 年 3 月初召開的阿共中央全會上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隨後，在貝爾格萊德的影響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再次向蘇聯提出了由於希臘威脅而必須向阿派駐南斯拉夫軍隊的問題以及阿爾巴尼亞同南斯拉夫合併的建議。² 南斯拉夫的這種立場是令蘇聯不能容忍的挑釁。因此，斯大林對南斯拉夫採取強硬政策就不難理解了。

3 月 11 日，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拉夫連季耶夫應召從貝爾格萊德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裏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做了彙報。政治局 12 名委員中有 9 名參加了會議，從參加會議的人員上便可看出，克里姆林宮對出現的形勢是何等的重視。從這次會議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暫時決定先不對南斯拉夫領導人採取猛烈的行動，3 月 13 日發給鐵托的電報只是駁斥了南斯拉夫所謂蘇聯駐地拉那外交代表言辭曖昧云云是沒有根據的，表示似乎蘇聯準備着手解決經濟和軍事問題。³ 但是，批評南斯拉夫的準備工作則在加緊進行中。3 月 18 日，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向蘇斯洛夫遞交了根據領導人佈置的任務所準備的「關於南共領導人在內外政策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報告」，指責南斯拉夫領導人在確定實際任務和發展前景時「無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且沒有把它當作

1 斯皮魯：阿爾巴尼亞政治局委員和經貿部長。1947 年 11 月，因抵制南斯拉夫對阿爾巴尼亞的政策而遭到黨內以佐澤為首的親南派的批判，在向莫斯科訴求無果、審查也完全倒向佐澤一邊的情況下，自殺身亡。

2 АЖ-цК СКЛ, IX, 1-1/135, 1-1/163, 1-1/164, 1-1/166, 1-1/169;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472, л.78-79, 84-86; АЖВТ-КМЛ, 1-3-В/35, 1.1. 3,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61.*

3 參見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63.*

行動的指南」；對「世界所有反帝的進步力量的經過考驗的和得到承認的代表」——蘇聯和蘇共採取「不正確的敵視態度」；低估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困難特別是低估富農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對待富農的政策中表現出機會主義」；在南共組織建設中「實際上是執行了取消派的政策」，「把黨融化於人民陣線之中」；「陶醉於在鞏固人民民主國家中和為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前提中所取得的成就…… 過高估計自己的成就，在評估自己的發展遠景和執行對外政策時表現出冒險主義，謀求在巴爾幹和多瑙河沿岸國家中的領導作用。」¹ 在這些指控中，提出了南斯拉夫領導人尤其是在國內政策問題上「反馬克思主義方針」的提法，這是蘇共中央在1947年8月擬定的報告、1947年10月和1948年1月擬定的報告中所有沒有的，這表明蘇聯領導人對南斯拉夫的批評加劇了，同時也表明克里姆林宮決心採取更強烈的措施打破貝爾格萊德的「陰謀」，其中包括用捏造政治思想罪名的方法。²

3月18日，莫斯科打響了反鐵托鬥爭的第一槍。當天，莫洛托夫在給鐵托的電報中，以南斯拉夫拒絕向蘇聯代表提供他們所要求的關於南斯拉夫經濟的信息，蘇聯政府把這看作是「對蘇聯駐南斯拉夫工作人員的不信任行為和對蘇聯不友好的表示」為理由，通知南斯拉夫，蘇聯將立即召回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蘇聯專家、軍事顧問和教官。電報發出之後，克里姆林宮在等待召回蘇聯專家後貝爾格萊德的反應。但是，在3月20日對莫洛托夫進行答覆的電報裏，鐵托沒有任何懺悔的表示，並且拒絕了所謂對蘇聯不友好的指控，以與莫斯科平起平座的姿態，表示贊成消除一切妨礙兩國友好關係的因素。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

1 ЦХСД, ф.17, оп.128, папка 1163, л.9-24,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62.

2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у//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63-364.

蘇共中央的名義把在3月18日報告基礎上寫成的信寄給鐵托和南共中央，信中指控南斯拉夫領導奉行反蘇路線，以左的關於世界革命的詞藻掩蓋反蘇言論，南共犯有機會主義錯誤，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最重要的原理。這封信實際上是向貝爾格萊德宣佈了尖銳的政治思想鬥爭。¹ 但是這封信在送往貝爾格萊德的同時，還被送往共產黨情報局東歐各共產黨領導人。這樣，蘇聯領導人把南斯拉夫問題擴大到共產黨情報局的範圍內進行討論。

二、共產黨情報局與蘇南衝突

（一）蘇南衝突與蘇聯對情報局其他成員政策的轉變

蘇聯領導人把南斯拉夫問題擴大到共產黨情報局的範圍內進行討論不是偶然的。這一方面是由於蘇聯領導人想通過這種方法迫使情報局其他成員在蘇南衝突中追隨莫斯科，對南斯拉夫領導人進一步施加政治壓力；另一方面是由於在南斯拉夫獨立傾向發展的同時，其他一些情報局成員，特別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獨立傾向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情報局第一次會議為情報局確立的協調職能並沒有被其他成員認真踐行。比如，1948年春天，在蘇聯駐波蘭大使館發回莫斯科的報告中說，「波蘭所採取的在波蘭人中間加強和普及波蘇友誼思想的措施，不僅遇到了根深蒂固的傳統的反俄殘餘和反蘇情緒的抵制，而且還碰上了許多波蘭人對美國和西歐國家懷有的深厚的友好感情的抵抗。」² 哥穆爾卡

1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64-365.

2 АВПРФ, ф.0122, оп.30, папка2, д.164, л. 61,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с.72.

的路線，據列別傑夫的肯定，「其貴族精神明顯令人擔憂。」哥穆爾卡周圍的人「沒有放棄反蘇言論和對蘇攻擊」，認為自己不是莫斯科的「間諜」，而是「真正的波蘭人」。「明茨小組，——列別傑夫認為，——和所有類似小組一樣，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反對黨內的波蘭沙文主義，而自己又糾集猶太人集團。……哥穆爾卡的周圍應有一個擺脫了民族主義的團體……應當創造一種氣氛，使這位年輕的活動家受到健康精神的陶冶，而不要接觸有害的民族主義。」1948年3月30日黨的思想家和政論家博列伊沙同使館參讚雅科夫列夫的座談也證明了這一點，座談內容當天就報給了莫洛托夫。博列伊沙向蘇聯外交官通報了波工人黨領導層兩個集團的情況，給兩派領導人下了斷言，哥穆爾卡「同許多波蘭人一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¹

共產黨情報局顯然沒有起到蘇聯領導人所希望的作用，這種狀況的發展不能不引起蘇聯領導人的憂慮。1948年春蘇共對外政策部，在蘇斯洛夫領導下，除了準備對南斯拉夫進行批評的祕密報告之外，還準備了對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進行詳細批評的祕密分析報告，其中心內容是指控它們所犯的民族主義錯誤和對蘇聯作用估計的不足。²

1948年3月24日，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擬定了題為「關於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的民族主義錯誤和匈牙利共產黨報刊上資產階級影響」的報告，報告批評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極力在本國人民面前以民族黨的面目出現，經常脫離正確路線，滑入民族主義的立場。」報告指出，反對派一直都在進行詆毀匈牙利共產黨的宣傳活動，說共產黨就像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不是匈牙利的黨。匈牙利共產黨人面對這種敵對的宣傳，

1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301, л.13,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06-507.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497.

更加強調自己的民族性。在日常工作中，大多數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都害怕被說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排斥蘇聯，儘量閉口不提蘇聯，還時而做出他們與蘇聯毫不相干的姿態。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忽視蘇聯和蘇聯的利益，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在匈牙利不宣傳也沒有興趣宣傳蘇聯和蘇聯文化，但是對於書籍和出版物中大量嚴重歪曲蘇聯現實及反對蘇聯的內容卻採取了容忍的態度。共產黨的刊物完全不宣傳蘇聯，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沒有登載任何有關蘇聯人、蘇維埃生活和蘇共的材料。匈牙利共產黨負責出版工作的領導人極力適應被資產階級培植起來的反常的嗜好，尾隨資產階級的報刊雜誌。資產階級的影響和無原則的思想正是在匈牙利的各個領域氾濫。這份報告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所犯的民族主義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特別是批評匈牙利共產黨採用資產階級辦報刊的方法，在對西方資產階級影響進行鬥爭的問題上的認識嚴重不足。「這表現在共產黨領導人在匈牙利不僅不宣傳也沒有興趣宣傳蘇聯和蘇聯文化，而且容忍許多粗暴歪曲蘇聯現實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蘇內容的書籍和出版物進入匈牙利。」¹

1948年4月5日，對外政策部向蘇斯洛夫提交了「關於波蘭工人黨領導人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針的報告」和「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某些錯誤的報告」，對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進行批評。同對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指責一樣，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也都被指控為民族主義者，具有推行反蘇政策的傾向。其中波蘭領導人受到的指責是，在「波蘭存在着民族主義傾向，它們表現為對蘇聯不友好，特別是對蘇聯在社會主義中的經驗和成就視而不見」，波蘭領導人沒有同波蘭民族主義的各種傾向進行鬥爭，「害怕被指責為使波蘭蘇維埃化」，「在宣傳同蘇聯接近

1 聯共（布）中央關於匈牙利民族主義宣傳的調查報告，1948年3月24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第152-156頁。

方面執行的是可恥的路線」。¹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被指責為「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綱領把自己同資產階級政黨聯繫在一起」，贊同與貝奈斯和所有資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採取共同的立場來解決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國人和匈牙利人的問題。報告還指責捷共領導人使民族政策服從於同資產階級實行民族統一的利益。在指責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民族主義傾向的同時，對外政策部在擬定的報告中還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領導人企圖走本國社會主義道路的觀點進行了強烈的批評。在對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進行批評的報告中，首先指責的不是捷共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政策，而是他們提出的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和平道路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捷共領導人的這種尖銳批評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在捷克斯洛伐克，走民族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已經得到了各種政治力量的廣泛支持，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捷共與捷其他黨派關係的基礎。應該說，捷共領導人的這一思想是同聯合政府政策相適應的，但是，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之後，這一思想則已不再符合蘇聯領導人的需要了。儘管報告沒有否定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性，但卻特別批評了哥特瓦爾德和其他領導人關於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道路的「和平」的特徵的觀點。報告指出：「許多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所犯的嚴重錯誤在於，他們篤信同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實際上滑向了對反動的資產階級一味讓步和妥協的道路。」報告也對波蘭領導人走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道路的觀點進行了批評。重點是批評波蘭共產黨人企圖證明自己道路的特殊性，試圖論證避免象俄國那種流血革命和在波蘭避免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的可能性。哥穆爾卡認為，與蘇聯不同，執行機關和司法機關

1 ЦХСД, ф.17, оп.128, папка1161, л.2-3; РГАСПИ, ф.82, оп.2, д.1301, л.6.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Л.,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03.

的職能應當予以區分，國家政權應當建立在議會民主的基礎上。這種觀點被對外政策部認為是絕對不正確的。「在這些關於波蘭的發展與蘇聯根本不同的論調的基礎上就產生了應能證明波蘭工人黨領導人中的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趨勢的『波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¹顯然，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民族主義道路的思想與波蘭領導人關於走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發展道路的「波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疑都是削弱蘇聯影響的獨立因素，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特別擔心。

對外政策部準備的對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進行批評的報告的基礎是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召開前該部所擬定的關於這些共產黨的報告中所提出的批評。但現在，這些批評，尤其是對波蘭工人黨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批評，如同對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批評一樣，已經嚴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而且故意誇大其辭，並成了評價這些黨的領導人的核心。不僅波蘭領導人，而且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都被指控執行「反馬克思主義方針」，而對波蘭人批評得更厲害——指責他們滑向民族主義的立場。關於匈牙利共產黨的報告寫得不太尖銳，看來對匈牙利共產黨領導只是「訓斥」而已。²

上述文件對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批評表明，蘇共對上述各黨的政策中可能出現的獨立因素感到不安，擔心這些國家共產黨確立起來的政治壟斷不是加強而是削弱莫斯科的影響。³而除了對上述各黨的民族主義傾向感到擔憂之外，一些情報局成員在對外政策上的自行主張也引起蘇聯不安。例如，從拉科西在1948年3月22日致

1 ЦХСД, ф.17, оп.128, папка1082, л.75; ЦХСД, ф.17, оп.128, папка1162, л.45-46; л.61; папка1161, л.3-5,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04.

2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67-368.

3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104.

蘇共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南共還是匈共領導人都支持當時正在意共領導人中間討論的關於在意大利北部發動武裝起義和奪取政權的計劃，如果美國對將於4月份舉行的選舉進行干預的話。共產黨和社會黨聯盟打算在選舉中獲得一半甚至更多的選票。這些計劃是與莫斯科的意願相悖的。在3月23日從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那裏獲悉了這些計劃之後，蘇聯方面告訴陶里亞蒂，蘇聯對武裝奪取政權的計劃持否定態度，並特別警告說，匈共和南共可能會提出的那些建議與蘇共的立場沒有任何共同之處。¹ 完全可以設想，這些行動可能被莫斯科認為是這些共產黨過分獨立的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更加需要對各國共產黨施加直接的壓力，以便在兩大陣營對抗日益加劇的情況下統一各國共產黨的行動，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範圍內在布爾什維主義原則的基礎上確立起嚴格的服從性，清除共產黨領導內那些篤信社會主義民族道路概念的獨立方針的擁護者們。早在1947年末和1948年初，莫斯科就開始打算開展廣泛的政治鎮壓活動，以便把所有權力都集中到那些一切都向蘇聯看齊和準備加速向蘇聯模式過渡的東歐領導人的手裏，以及通過蘇共中央直接操縱來「制服那些過於不自量力」的民族領導人。² 蘇南衝突為蘇聯領導人進行這種政治鎮壓提供了機會。

為了促使南斯拉夫領導人改正其民族主義錯誤，同時遏制東歐各黨獨立傾向的發展，蘇聯在積極利用共產黨情報局對南斯拉夫施加壓力的同時，也在準備對情報局其他成員的獨立傾向和民主主義錯誤進行批評。3月初，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得到指示，緊急準備反對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材料，為召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做好準備。同時，蘇共中央對外政

1 ЦХСД, ф.17, оп. 128, папка1165, л.79; АПРФ, ф.3, оп.3, л.198, л.55-59,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 с.164.*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3.*

策部還受命準備了關於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共產黨的類似材料。這就是對外政策部在4月5日向蘇斯洛夫提供的「關於波蘭工人黨領導人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針的報告」、「關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某些錯誤的報告」和「關於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民族主義錯誤和匈牙利共產黨報刊中的資產階級影響的報告」。1948年5月，對外政策部已經準備好了對情報局每一個黨都進行批評的材料。這些材料對東歐各黨提出的要求是：必須「從南斯拉夫人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建議西歐兩黨注意需要克服的「缺點」，對法共的批評是「過高估計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的危險和她在殖民地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不夠堅定。對意共的批評則是對抱有「議會主義幻想」和「機會主義」錯誤進行的批評。法共和意共還都被批評沒有進行充分的宣傳，對蘇聯進行支持。相對於法共和意共而言，對情報局各東歐成員的批評則完全是另外一種調子和言辭。在對這些黨的批評意見中，使用了狹隘的類比法，經常援引共同的題目，從中可以看出，蘇聯對東歐各國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其主要的目的便是排除走向社會主義有各種道路的可能性。情報局東歐各成員沒有一個逃脫輕視農村階級鬥爭和富農威脅的指責。其中波蘭共產黨人遭到了最嚴厲的斥責，他們被指責沒有把集體化問題提到議事日程，而對匈牙利人的責備幾乎同對南斯拉夫人的責備一樣，對農民採取「沒有區別的態度」。在黨的理想和組織工作方面，保加利亞共產黨和捷克共產黨遭受了最嚴厲的批評，前者被認為是思想工作軟弱，以國家行動取代黨的機關，而後者被認為是由於大規模吸收新黨員而削弱了黨。在蘇斯洛夫3月18日的備忘錄裏，對南斯拉夫人的批評是：以國家取代黨，黨作為領導機關喪失了自主權。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對波蘭工人黨的批評最為強烈，就像她在富農問題上遭受的批評一樣。對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批評的重點放在必須加強同蘇聯的聯繫上。從這些文件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的目的在於：通過譴責南斯拉夫和情報局其他各黨領導人的錯誤，在東歐確

立嚴格的政治和社會模式，建立統一的嚴守紀律的社會主義陣營。這些報告的出現標誌着蘇聯對東歐國家施加的壓力發生了質的飛躍。¹

雖然對外政策部已經準備好了對情報局每一成員都進行批評的文件。但是，除了繼續對南斯拉夫共產黨進行批評之外，對情報局其他成員的這種指控都沒有進行。這一方面是由於在對南斯拉夫的鬥爭中，蘇聯需要得到這些黨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於這些黨在蘇南衝突中很快就轉變了立場，站到了蘇聯一邊，並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自我批評」。

蘇南衝突之初，東歐各共產黨顯然都沒有意識到蘇南衝突的嚴重性。在共產黨情報局東歐 5 個成員中，在收到蘇聯領導人 3 月 27 日給南斯拉夫領導人的信件的複本之後，只有匈牙利共產黨如莫斯科期望的那樣，立即做出了反應。儘管在蘇南衝突之前，匈共領導人特別稱讚南斯拉夫的經驗，並經常到貝爾格萊德取經，就在 3 月 22 日，拉科西還向蘇共中央通報了他的貝爾格萊德之行，當時他還不知道蘇南衝突已經開始。但在接到蘇聯 3 月 27 日信的複本之後，匈共政治局立即來了個 180 度大轉變：4 月 8 日，政治局通過了嚴厲譴責南斯拉夫人的決議，並把該決議寄送給蘇共中央，其中特別指出，蘇聯方面可把匈共的這一決議通告給那些收到蘇聯信件複本的其他共產黨。於是，匈牙利共產黨政治局通過的這份決議，立即被送到貝爾格萊德和情報局其他成員的手中。保加利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儘管在 4 月 6 日通過了支持蘇聯立場的決議，但沒有考慮到必須把它寄送給莫斯科，與此相反，季米特洛夫表示，在一周半之後，在他將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的正式訪問之後的歸國途中，他將在貝爾格萊德作短暫停留並同南斯拉夫領導人進行談判。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一開始也沒考慮需要就蘇聯的來信作出決議。一得到這種提示，他們便模仿起匈牙利人的榜樣。哥特瓦爾

¹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50, лл .15-47;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63, л.22, 轉引自 Поис 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78-379.

德在4月17日收到匈牙利共產黨政治局決議的副本之後，馬上聲明，捷共中央主席團隨後將討論這一問題。4月19日捷共中央主席團召開了會議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4月23日，該決議被寄送莫斯科；同時，季米特洛夫也在4月18日把保共政治局4月6日的決議寄給了蘇共中央；儘管哥穆爾卡在4月初收到蘇聯在3月27日的信件之後，立即表示不同意對南斯拉夫人的指控，認為莫斯科採取的行動太過分，但是，他隨後即轉變了態度，並在4月19日把波蘭工人黨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寄送給了蘇共中央；4月22日，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政治局也按照蘇聯對羅共領導人的要求通過了決議並將其送往莫斯科。上述各黨在寄送莫斯科的這些決議裏，都對南共領導人進行了譴責，並聲明支持蘇聯的立場。¹

情報局各成員不僅對蘇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表示支持，而且還召開會議，通過決議，進行「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表達對蘇聯的支持。² 例如波蘭工人黨承諾，保證提高黨員的思想水平，衷心承認「蘇聯的領導作用」，對破壞同蘇聯「友好關係」的企圖保持高度的警惕。至於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她表示對「蘇聯的領導作用」給予應有的尊重，在掌握國家政權的時候，警惕黨和國家職能合一的危險。保加利亞共產黨可以說是一個例外，因為與其他黨不同，她早給莫斯科寄去了充滿自我批評的信件，並且表示對「普遍的國際緊張形勢」、尤其是对巴爾幹的形勢「深表憂慮」，認為在這一地區，「在這種時刻，所有民主力量必須絕對緊密團結在蘇聯周圍並在其領導下反對可恥的帝國主義

1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62, л.122-123; ЦХСД, ф.575, оп.1, д.62, л.31-32; ЦГАБКП, ф.146, оп.4, д.645, л.37,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68-369.

2 根據意大利學者龐斯的研究成果，情報局各黨通過的這些決議的副本保存在意大利共產黨黨務檔案館裏。這些決議指的是波蘭共產黨的決議（沒有日期）、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決議（1948年4月19日）、匈牙利共產黨的決議（1948年4月8日）、羅馬尼亞共產黨的決議（1948年4月2日）、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決議（1948年4月6日），以及意大利共產黨的決議（1948年5月20日）。參見 *Понс 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 379

反動派。」至於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它們的決議是後來通過的。¹ 但是，早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5 月 4 日給南斯拉夫的信件之前，多列士就向尤金表示了自己對蘇聯的支持態度，尤金在 4 月 27 日的信裏將此事報告給了日丹諾夫。第二天，按照杜克洛後來在會議上發言的說法，法共通過了自己的第一個決議，隨後在 5 月 12 日又通過了第二個決議。5 月 20 日，意大利共產黨書記處也通過決議，雖然該決議缺少某種自我批評精神，但也強調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作用」，表示意大利共產黨支持蘇聯領導人。²

這樣，情報局其他成員都進行了自我批評（南共除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表示承認蘇聯的領導作用。但是，此時南斯拉夫領導人仍然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1948 年 4 月 12 日，在南共中央委員會上，鐵托雖然表示南斯拉夫仍然是蘇聯最為忠實的同盟者，並且期待蘇聯的援助，但是他仍然強調發展兩國關係「必不可少的因素首先是嚴格遵守民族和國家獨立的原則」，仍然認為，「在南斯拉夫的蘇聯人，他們不應干涉這個國家的內部生活。」並且大會決定邀請蘇聯共產黨派遣一個代表團來南斯拉夫，核實他們對南共的「誣告」。³ 在 4 月 13 日南共中央就中央全會的決議發給蘇共中央的通報中，南共雖然承認，在「工作中存在着錯誤和缺點，但並不是那種據此就可以作出蘇共中央來信所述那些結論的錯誤和缺點」。並且認為蘇共的結論是在情報不充足和不正確的基礎上作出的，首先是南斯拉夫「某些反黨不良分子向蘇聯機構提供了虛假的、誹謗性的或帶有偏見的情報這樣一個事實的結果」。⁴

1 參見 *Понс 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79-380.*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52, л.8, 轉引自 *Понс 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80.*

3 德迪耶爾：《鐵托傳》，三聯書店 1977 年，第 132-140 頁。

4 南共中央關於中央全會決定給聯共（布）中央的通報，1948 年 4 月 13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2 卷，第 255 頁。

面對鐵托毫不妥協的立場，斯大林只有繼續對鐵托施加壓力。在得到共產黨情報局東歐成員一起行動的保證後，蘇聯領導人在5月4日致南共中央的信（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簽署）中聲明，建議把「蘇南分歧」拿到「在近期召開的情報局會議上」討論。

（二）蘇南衝突與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

蘇聯建議把蘇南分歧拿到情報局會議上討論的建議遭到了南斯拉夫的拒絕。在5月17日由鐵托和卡德爾簽署的覆信中，南斯拉夫方面通知蘇聯，南斯拉夫拒絕在情報局會議上討論問題，「因為情報局其他成員根據蘇聯的指控，事先就已經採取了反南立場。」但是，蘇聯領導人召開情報局會議的決心已定。5月18日，在蘇斯洛夫寫給鐵托的信件中，蘇共中央再次提出召開情報局會議，討論南共狀況問題，並提出了召開這一會議的確切日期，「在6月上旬，大致在6月8—10日」。同時，莫斯科還把這封信的副本寄送給了共產黨情報局其他黨的領導人。¹

為了促使南斯拉夫參加即將召開的情報局會議，蘇聯領導人對南斯拉夫進一步施加了壓力。在收到南共中央委員會於5月20日作出的不出席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之後，5月2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致南共中央的信中，對南斯拉夫拒不出席情報局會議的理由進行了駁斥。蘇聯方面認為，「情報局有權對南共狀況問題進行討論，認為，在組建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時所有共產黨都是從這樣一個無可爭辯的原則出發的，即任何一個黨都應當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正像任何一個黨都有權批評其他黨一樣。」蘇聯領導人以南共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參與對法共和意共的批評為例，批評南斯拉夫方面轉變態度，要求取消情報局內業已建立

1 鐵托、卡德爾關於處理分歧問題的意見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件，1948年5月17日；蘇斯洛夫關於召開情報局會議致鐵托的信件，1948年5月18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2卷，第296、298頁。

的制度，認為無權批評南共的狀況問題。蘇聯領導人把這看作是「南斯拉夫黨及其領導人應當處於享有特權的地位，情報局的規章制度對該黨不適用，他們有權批評其他黨，而自己則不該受到其他黨的批評」。信件最後警告南共，「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還意味着南共中央已經走上了脫離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道路，並且準備使自己的黨和人民背叛人民民主國家和蘇聯的統一陣線。」¹

儘管南斯拉夫拒不出席會議，1948年6月19—23日，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仍然如期在布加勒斯特舉行。與第一次會議不同的是，這次會議是嚴格按照蘇聯方面預定的方案進行的。會前，在蘇共向情報局各黨發出的建議召開情報局會議的信中明確指出，會議要討論的是關於南共的狀況問題。6月19日，在大會的第一天，日丹諾夫就會議的程序問題再次指出，「會議的任務是解決具有重要意義的南共狀況問題，並作出重要決議。」關於南斯拉夫的狀況問題成為情報局第二次會議日程中的重要問題。從大會的會議記錄來看，與會者都完全無條件支持日丹諾夫的報告，都對南斯拉夫的錯誤進行了批評。在討論中，與會代表的發言都是重複日丹諾夫報告的基本觀點，所有代表都表現出鮮明的反南——準確地說是反鐵托的立場。他們採取這種立場的主要的原因是，南斯拉夫直接抵制蘇聯的指責，尤其是南共代表不參加情報局會議。儘管哥穆爾卡和喬治烏·德治不同意蘇聯對南的指責，但他們都希望南斯拉夫通過與蘇聯調整關係的方法，在陣營和情報局的範圍內解決衝突，而對抗莫斯科的行動和不參加情報局會議的做法被認為是是有利於敵人的，是脫離世界革命運動的行為。² 在對南斯拉夫進行的批評中，與會代表還有一種

1 聯共（布）中央關於駁斥南共答覆致南共中央的信件，1948年5月22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2卷，第322頁。

2 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記錄，1948年6月19-23日，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99-462.

普遍的願望：要南斯拉夫為他們以前在蘇聯集團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優越地位付出代價，為他們曾經是蘇聯第一號盟友（包括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大會時對其他各黨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傲慢態度和對它們的批評）付出代價。與南斯拉夫人在馬其頓問題上發生的爭論對保加利亞代表立場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甚至陶里亞蒂也沒有忘記由於南斯拉夫對的里亞斯特的立場而使他們所經受的困難。¹ 所有這些都促使他們積極支持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指責。

大會最後通過了蘇聯領導人起草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形勢的決議」，決議首先指出，「近來，南共領導人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採取的是不正確的、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實行的是對蘇聯和蘇共不友好的政策。情報局認為，在對內政策方面，南斯拉夫領導人正在背離工人階級的立場，放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並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進行修改。情報局還對南共的領導方法進行了批評，指責「南共領導人在黨內建立的官僚統治」，「南共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指責南共領導人「野心勃勃」、「驕傲自滿和自高自大」，「不誠懇地接受批評，不以布爾什維克式的態度改正他們的錯誤，而是以挑戰和敵意來對抗批評」，拒絕以「正常的夥伴關係為基礎，在情報局會議上討論南共黨內的情況」，企圖「破壞各共產黨之間的平等地位」，企圖在情報局裏享有特權地位。情報局認為，「根據南共的整個態度和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這一事實，南共領導人已將自己置於情報局所屬各個共產黨的對立面，走上了脫離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陣線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工人階級國際團結事業的道路，並採取了民族主義的立場。」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所犯錯誤的基礎，在於從前以偽裝形式存在的民族主義因素，在南共領導中已獲得了統治地

¹ ЦХСД, ф.77, оп.3, папка106, л. 5-6, 13, 15; папка108, л.18, 29, 30-31; ЦХСД, ф.77, оп.3, папка106, л.6,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70.*

位，南共領導已經同南共的國際主義傳統決裂而走上了民族主義道路。」情報局最後指出，如果南共領導人不能改正他們的錯誤，那麼黨內的「健康力量」的任務就是要取代他們，形成黨的國際主義的新領導。¹

從這一決議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企圖通過情報局施加思想政治上的壓力，迫使南斯拉夫領導人放棄民族主義錯誤，也就是促使南斯拉夫領導人屈服。在斯大林看來，只要把鐵托集團孤立開來，即使在南共領導人不屈服的情況下，南共黨內的健康力量很快便會取代鐵托集團。正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祕密報告中所揭露的，斯大林深信，要搞掉鐵托，只需他抬抬小拇指就夠了。斯大林深信，如果號召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蘇聯與南斯拉夫、斯大林與鐵托兩者之間進行抉擇的話，他們是絕不會有片刻猶豫的。²

蘇聯領導人通過情報局對南斯拉夫領導人在思想政治上施加壓力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力圖通過這種方法來對其他共產黨特別是東歐黨施加影響，使他們從南共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因為東歐各黨被認為在思想政治上存在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着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緒，並且是脫離馬列主義的。蘇共對外政策部在籌備會議的過程中，就已經準備了東歐各黨要從南共錯誤中吸取教訓的專門的情報分析報告。這不僅涉及以前批評過的波蘭工人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和匈牙利共產黨，而且還涉及到保加利亞工人黨（共）和羅馬尼亞工人黨。根據材料來看，對波蘭工人黨和哥穆爾卡本人已經準備好了組織結論。為了對南斯拉夫領導人進一步施加壓力，同時促使各黨從南斯拉夫的錯誤吸取教訓，蘇聯領導人還決定公開蘇南衝突。早在會議前夕，蘇共代表日丹諾夫就向斯大林彙報了自己同來到布加勒斯特的各共產黨領導人會談的情

1 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摘錄），1948年6月28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2卷，第302頁。

2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91-192頁。

況，他們都建議在大眾傳媒上公佈蘇南衝突。「毫無例外，——日丹諾夫報告說，——大家對南共都採取了不調和的立場。」「大家都一致認為，——日丹諾夫強調指出，——內部批評不會有理想的結果。不公開和當眾揭露南斯拉夫領導人，南斯拉夫的形勢就不會改變。需要儘快整頓秩序。」¹ 這種秩序顯然不僅僅是對蘇南關係而言的。這樣，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的準備及其會議本身表明，莫斯科成功地組織了不僅對南共領導人而且對東歐其他各國共產黨領導的國際鎮壓。²

在使參加會議的東歐各黨吸取教訓方面，蘇聯領導人達到了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大會上與會代表所有發言的重點都是談論關於從南斯拉夫所犯「錯誤」中吸取教訓。拉科西公開地接受了所有這些對南斯拉夫的批評意見。而貝爾曼把民族主義的影響同「不理解日益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具體形式」，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準備」聯繫起來。斯爾斯基在自己發言的自我批評部分，集中談了黨的社會成分問題。³

儘管如此，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公佈以後，蘇聯領導人仍密切注意着東歐各國的反應。蘇聯外交官和一些特殊部門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發回的情報被送至國內各個部門，這些情報顯示了各國共產黨，各國社會對蘇聯譴責南斯拉夫共產黨所持的態度是懷疑的。⁴ 比如，蘇聯方面得到的情報顯示，1948年7月1日在波蘭工人黨中央全會上與會者指出，對南共的批評不能服人，個別論據不足。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共產黨員和社會民主黨人稱讚「鐵托的勇敢和獨立性」。而且南斯拉夫領導人的行為有時被過分英雄主義化，例如波蘭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с.74.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 351–352.

3 Понс 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пеще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94–395.

4 Tmurashko G. P., “Intraparty Repressions in Eastern Europe: Initiators and Executors, 1949–1953”, 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 p.2.

的一些共產黨員認為，鐵托看透了蘇聯把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化」的意圖，因此反駁了俄國人。「我們的領導害怕俄國，俄國人在我們這裏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部分波蘭工人黨員說。正如蘇聯駐格但斯克領事館 1948 年 7 月 24 日的報告中所說的，相當一部分波蘭居民認為，「如果沒有蘇聯軍隊，波蘭早就做南斯拉夫所做的事了」，因此他們希望斷絕同蘇聯的關係。¹「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不僅居民，就連省委機關領導都甚感突然。」在工人黨積極分子會議上，在發言對決議表示支持的時候竟發出了批評的聲音，對情報局指控的真實性表示懷疑。此外，還報告說：「如果說在波蘭工人黨和社會黨聯合會議上這些黨員們的意見一致，那這並不意味他們同意這一決議」，關於波工人黨和社會黨成員常在親近的同志之間的議論的材料表明，他們「贊成南共領導的政策」。波蘭格但斯克、索波特、什圖姆市的黨的積極分子懷疑對南共指控的公正性，據駐格但斯克的蘇聯總領事館報告，造船廠的工人和職員舉行遊行，對南共舉行支持：「南斯拉夫人做得漂亮！」，「你們要有南斯拉夫人那樣的行動。——造船廠一名職員羅薩克對工人黨黨員們說，——我們也會那樣。」從捷克斯洛伐克傳來的消息說，「對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和廣大居民來說，情報局的決議是很突然的……鐵托在捷克斯洛伐克很有威望……一些捷克斯洛伐克青年懷疑共產黨情報局決議中對南共領導人的指控。」後來，1949 年從布拉格傳來了更為震驚的消息：「許多人暗地裏把鐵托看成值得模仿的英雄。」² 1949 年 5 月，在保加利亞地方政權機關的選舉過程中，基層提出了按照南斯拉夫現有制度的榜樣建設國家的要求。³

東歐各國對蘇南衝突的上述反應說明，南斯拉夫表現出的這種民族

1 АВПРФ, ф.0122, оп.30а, п.247, д.3, л.70-71,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5.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II, с.115.

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00.

主義獨立傾向在東歐國家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為消除這種獨立傾向，需要在東歐地區開展一場廣泛的社會鎮壓運動，為此，蘇聯領導人把目光首先轉向了東歐具有獨立傾向的領導人身上。這種政策傾向在 1948 年 12 月 6 日，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進行談話的時候就已經表現了出來。在這次談話中，斯大林對科斯托夫進行了激烈的批評，批評他拒絕蘇聯駐索菲亞代表直接從相關的機構得到關於保加利亞經濟的信息。斯大林把科斯托夫的這一拒絕看作就像是鐵托事件一樣。「我們同鐵托的衝突就是這樣開始的」，共產黨人之間只應該有友誼和合作，「不應有欺騙和吹噓」，就這個問題斯大林談了很長時間。他非常懷疑科斯托夫是在搞欺騙，在耍花招。¹ 蘇聯領導人的這種政策傾向一經確定，科斯托夫案件以及東歐其他一系列案件的出台也就是必然的了。

（三）拉伊克案件與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

1948 年春天開始爆發的蘇南衝突，實質上是在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中建立由蘇共中央直接操縱的總的計劃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統一東歐各黨的政治方針和把所有的政權都轉交到那些贊成實行蘇聯模式的領導人手中，加強蘇聯對這些國家的控制，應對西方集團的建立給蘇聯帶來的挑戰。但是，斯大林的這一計劃在開始階段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南斯拉夫共產黨不肯服從莫斯科的操縱，並出乎意料地頂住了蘇聯的壓力。

1948 年夏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是對南共的一次強有力的打擊，使南共處於分裂的邊緣。情報局決議公佈之後，有 5.5 萬多名南共黨員（接近 12%）和近 5.2 萬名預備黨員支持共產黨情報局的立場，譴責南共領導拒絕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議。但是，這部分人都被作為

1 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 486 頁。

「共產黨情報局分子」和「第五縱隊」而受到鎮壓。為此，南斯拉夫國家安全機關國家保安處下設了同共產黨情報局支持者作鬥爭的特別處，對被揭露或被懷疑同意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的人進行登記。在人民陣線會議上，每個成員都受命「揭發共產黨情報局奸細」，而且以提職或赦免以前罪行進行鼓勵。黨員必須以書面形式表明自己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態度（部分同意或不同意個別條款）。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決議通過之後，針對情報局分子的鎮壓浪潮席捲全國。¹ 通過這些鎮壓，鐵托頂住了壓力，鞏固了自己的統治。

在南斯拉夫領導人出乎意料地頂住了壓力的情況下，為了實現既定的目標，蘇聯領導人就必須把反對南斯拉夫的思想政治鎮壓運動持續下去，因此，反對不順從的南斯拉夫領導人的鬥爭便成了蘇聯政策的主要優先方面之一。在這場鬥爭中，共產黨情報局仍然起着積極的作用。通過共產黨情報局，莫斯科監督、同時千方百計激勵、組織和協調東歐國家以及西歐兩個最大的共產黨——意共和法共反對南斯拉夫的鬥爭。為此，1948年7月5日情報局祕書處第一次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決議。會議最後通過了蘇共中央的建議，決定情報局各成員黨不出席預定在1948年7月21日召開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而且還通知阿爾巴尼亞、希臘和芬蘭共產黨也不出席這次會議。² 1948年10月16日，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編輯部召集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各黨代表開會，討論各黨執行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問題決議的問題。會議建議各黨代表準備關於積極反南活動措施的備要報告，並提醒情報局成員各黨

1 РГАСПИ, ф.17, оп.137, д.289, л.253; д.290, л.20, 25,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214.*

2 *Гибя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созд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третье совещание//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10. 525-526.*

領導人積極貫徹 1948 年會議上所提出的方針。¹ 除了協調情報局成員反對南斯拉夫之外，1948 年 8 月成立的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特別關注蒐集和分析相關國家共產黨反南活動的情報和情況。這一工作一開始就被確定為情報局機關的一項主要任務。² 在 1949 年 6 月 14—15 日召開的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會議的議事日程上，作為單獨一項議事日程，提出了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積極開展反鐵托集團鬥爭的策略問題。在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會議召開的第一天，即 6 月 14 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的決議，規定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程是「各黨反對鐵托集團的鬥爭的策略問題」。³ 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之後，除蘇聯對外廣播外，還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領土，尤其是同南斯拉夫接壤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土上，用南斯拉夫各族語言對南進行無線電廣播宣傳。為加強這一工作，在情報局機構的管理下還組織了專門的無線電廣播，以南斯拉夫反鐵托僑民的名義通過布加勒斯特專門的無線電中心進行反南宣傳。因此，情報局的另一項特別任務是協調這些反南宣傳。此外，在反對南斯拉夫方面，屬於情報局關注範圍的問題還有：監督和協調在東歐國家成立的南斯拉夫僑民組織的活動以及這些組織報紙的出版（正如蘇共中央政治局在 1949 年 4 月 3 日的決議中規定的）；同南斯拉夫反對派分子建立聯繫，向那裏派遣人員、運送宣傳材料並祕密散發，從那裏獲取所需情報，試圖在南國內組織親蘇運動。⁴ 此外，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也刊發大量關於反鐵托的材料，在開展反南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 РГАСПИ, ф.575, оп.1, д.56, л.76-83,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60.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51, л.69, 轉引自 *Гибя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25-526.

3 АПРФ, ф.3, оп.23, л.50, л.58,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39.

4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3, л.143, 154; д.115, д.116, л.1-19, 87-193; д.117, л.1-45, 轉引自 *Гибя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25-526.

但是，蘇南衝突的擴大以及東歐各國對蘇南衝突的消極反應說明，不僅需要加強反對鐵托的鬥爭，而且需要對東歐共產黨進行全面的清洗。因此，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之後，蘇聯反對南斯拉夫的鬥爭出現了新的變化，這就是：逐步把反對南斯拉夫的鬥爭同在東歐國家消除民族主義傾向的任務結合起來，清除地區共產主義運動鐵托的代理人和特務成為一項中心任務。¹ 這一鬥爭的特點是利用東歐各黨內的鬥爭，把一些領導人首先是贊成民族社會主義道路的支持者看作是鐵托分子和帝國主義的間諜，對其展開刑事訴訟，一方面打擊鐵托，揭露鐵托的罪行，另一方面使東歐各國的政權掌握在莫斯科的支持者的手中，從而消除這些黨的民族主義情緒，加強蘇聯對這些國家的控制。在反鐵托主義、鐵托代理人 and 間諜的名義下，許多重要的政治審判在東歐各國接踵上演。莫斯科抓住機會，適時「調教」當地的共產主義運動並利用一些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在其黨內煽動衝突，然後再出面干涉並作出仲裁。相應地，東歐的一些政治精英們接受並有效地運用了鐵托主義，把其作為問鼎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有效工具。²

這一時期東歐國家的政治審判始於 1948 年 12 月在保加利亞開始的科斯托夫案件，但是，最為突出、最具影響的案件則是對匈牙利原共產黨總書記拉伊克進行的政治審判。³

1948 年 3 月，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小組起草了一份文件「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的民族主義錯誤和布爾茹瓦對該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影響」。該

1 *Крекотень П.* Дело Сла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7, №3, с.5.

2 Tmurashko G. P. and A. F. Noskova, "Intraparty Repressions in Eastern Europe: Initiators and Executors, 1949-1953", *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 p.3.

3 對拉伊克的審判完全是根據捏造的材料進行的。詳見 *Желицки Б.И.*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с.125-138 ; №3, с.166-186. 在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領導人也承認，這一案件是偽造的，見第 9 章相關內容。1956 年，匈牙利為拉伊克進行平反，引發了「匈牙利事件」。

文件明確顯示蘇共中央的批判對象是拉科西。但是，在 1948 年 6 月以後的 3—4 個月裏，拉科西成功地將批判的矛頭轉移到了拉伊克身上，並在這一鬥爭中獲得了莫斯科的支持。¹ 拉科西之所以能夠獲得這種支持，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拉科西把拉伊克同南斯拉夫領導人，首先是「帝國主義代言人」鐵托的國際陰謀聯繫了起來，指控他們在東歐各國進行反革命叛亂。這一指控正合斯大林的意圖，根據霍多什在出版的《偽造的訴訟案件》一書中提供的材料，1948 年 5 月，斯大林就委託貝利亞組織揭露鐵托的罪行，那時就有了一個關於東歐國家的總計劃：南斯拉夫領導人有同西方情報部門相勾結的陰謀，其目的在於使人民民主國家脫離蘇聯。² 拉科西對拉伊克的指控正符合蘇聯領導人的這一計劃，因此，拉伊克案件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正如俄羅斯檔案材料所證實的，蘇聯領導人不僅積極地參與了拉伊克案件，而且實際上在幕後指揮着這一案件的進展。1949 年 6 月底，應匈牙利領導人的要求，蘇聯國家安全部反諜報局的官員，蘇聯中央集團軍別爾金中將率領一個調查團來到了匈牙利，督辦這一案件。³ 當蘇聯有經驗的調查官直接介入此案後，調查工作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並於 1949 年 8 月結束了調查工作。在隨後的一個月裏，布達佩斯和莫斯科就拉伊克案件問題頻繁地交換信息，協調立場。在這一巨大的政治訴訟案接近尾聲的時候，9 月 22 日，也就是在對拉伊克作出判決的前兩天，斯大林通知拉科西關於他對拉伊克案件結果的看法。「拉伊克應被處死，因

1 Tmurashko G. P. and A. F. Noskova, "Intraparty Repressions in Eastern Europe: Initiators and Executors, 1949-1953", *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 p.6.

2 參見 Желіцкі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28.

3 參見 Желіцкі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69.

為任何其他的判決都將不會被人們所理解。」¹正是斯大林的這一通知決定了拉伊克的命運。

共產黨情報局也積極地參與了拉伊克案件。拉科西及其密友不僅直接向蘇聯領導人，而且還通過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向莫斯科彙報拉伊克案件的進展情況。例如，1949年7月11日，法爾卡什作為拉伊克案件的組織者之一，在發往莫斯科的通報中說：

……近幾天拉伊克開始第一次交待一些事實。已經清楚，從1931年起拉伊克就成了霍爾蒂的間諜；後來他為德國人效勞，然後又成為美國的奸細。大部分被揭露的間諜集團的成員都是早先從西班牙和法國集中營裏被招募進來的。戰爭期間他們中的許多人呆在瑞士。雅爾塔會議之後，當得知蘇聯軍隊將首先進入中歐和東南歐之後，在瑞士的美國間諜頭子杜勒斯把自己的間諜網撤向了人民民主國家。以瑟尼為首的匈牙利間諜小組通過南斯拉夫進入了匈牙利。²

1949年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佈了對拉伊克和其他領導人的起訴書，其中指出：「拉伊克執行了鐵托的指示。」因此，在這場政治審判中，主要的被指控者實際上是鐵托。這次審訊者的政治動機是很清楚的。「嚴格來說，這並不是對拉伊克及其同謀者的審訊。受審的是鐵托及其親信……很明顯，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伊克這一幫陰謀分子有罪，在道義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和吉拉斯這個犯罪集團。這次審訊的國際意義就在於此。」費倫克·菲伊託在他著的《人民民主國家史》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審訊拉伊克不過是代

1 АПРФ, ф.3, оп.64, д.505, л.198,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Т. Костова и Л.Райка//Сталинск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31; 另見: Желички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3, с.180-181.

2 РГАСПИ, ф.575, оп.1, д.94, л.149, 轉引自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25.

替了不可能舉行的對貝爾格萊德的審訊。」¹ 正如 1956 年以後已政治移民到蘇聯的拉科西在對赫魯曉夫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斯大林利用拉伊克案件是為了證明自己反對南斯拉夫政策的合法性和正確性。²

為了證明反南斯拉夫政策的合法性和正確性，為了繼續利用拉伊克案件對東歐共產黨領導人進行整肅，斯大林再次利用了共產黨情報局。1949 年 8 月 5 日，鑒於蘇共中央政治局 1949 年 6 月 14 日作出的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的決議，共產黨情報局機關擬定了由巴拉諾夫和尤金簽字的「關於共產黨和工人黨反對鐵托—蘭科維奇集團的鬥爭的備要報告」，這份報告後來成了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問題報告的基礎。作為忠於蘇聯和蘇共的基本標準，報告宣佈：「各共產黨準備絕對地、毫無動搖地和無條件地保衛蘇聯。」這樣，情報局其他各黨領導人對蘇聯領導人作出的決議的任何動搖，以及不同意蘇共中央的行動都將被看成是政治犯罪，是背離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路線，是滑向「以英美帝國主義分子為首的敵人陣營。」³ 在 1948 年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通過南斯拉夫問題的決議之後，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上重提南斯拉夫問題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在 1949 年秋天之前的良苦用心：千方百計發動鬥爭，反對不馴服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膽敢不聽從蘇聯的指揮，在努力加強蘇聯集團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等級關係的克里姆林宮的眼裏，這一先例是異常危險的。反南歇斯底里大發作被用來作為一種預防共產黨領導人和人民民主國家不同意莫斯科意見的手段。這就決定了在 1949 年情報局第三次會議上提出南斯拉夫問題的政治意義。⁴

1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卷，第 234—235 頁。

2 ЦХСД, ф.89, оп.2, едхр.3, л.91, 轉引自 Желички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81.

3 РГАСПИ, ф.575, оп.1, д.76, л.146, 轉引自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65.

4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27.

1949年11月，情報局第三次會議在匈牙利召開。議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間諜和殺人犯手中。」會議之前，在9月完成的拉伊克案件為這次會議批評南斯拉夫提供了法律上的證據。正是依據這一案件，會議作出了「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間諜和殺人犯手中」的決議，該決議指出，「在布達佩斯舉行的對拉伊克—布蘭科夫的審判已經最鮮明地揭露了貝爾格萊德那個受人僱傭的間諜和殺人犯集團」，他們「公開與帝國主義反動派相勾結，並已經在為反動派效勞」。決議指出，鐵托集團「所代表的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意志，而是美、英帝國主義分子的意志」，「它出賣了本國的利益並消滅了南斯拉夫的政治獨立和經濟自主地位」，「目前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已經落入人民公敵的殺人犯和間諜手中，所以它已經無權被稱為共產黨了，它現在不過是執行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吉拉斯集團間諜任務的機關而已」，貝爾格萊德已經「變成了國際間諜活動的中心和反共宣傳的中心」。最後，共產黨情報局號召「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內以及黨外革命分子進行積極的鬥爭，以求把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南斯拉夫獨立的真正革命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復興起來」，使南斯拉夫「回到社會主義陣營中來」。在揭露鐵托集團的同時，會議通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間諜和殺人犯手中」的決議還要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南斯拉夫為借鑒，「全面提高自己隊伍的革命警惕性，揭露和根除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及帝國主義的一切代理人，不管這些人用什麼招牌進行掩飾。」並要求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把這作為「最重要的一項任務」。¹ 這實際上是在要求各國進一步開展揭露鐵托分子的運動，在黨內開展鎮壓活動。

1 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決議的討論記錄，1949年11月19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6卷，第645-647頁。

三、蘇聯對情報局東歐成員的整肅及其影響

早在 1948 年 5 月，蘇聯領導人就有了利用對反南斯拉夫的鬥爭在共產黨情報局內擴展整肅的想法，以便消除那些較具獨立傾向的領導人。在科斯托夫案件之後，在斯大林的許可下，哥穆爾卡被剝奪了波蘭共產黨總書記的職務。他被指控的罪名有：民族主義、抵制農業迅速實行集體化、缺乏警惕、寬容知識分子，而且最嚴重的是，不能理解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作用。1949 年 1 月，哥穆爾卡、斯皮查爾斯基將軍以及其他領導人被清除出黨。¹毫無疑問，哥穆爾卡 1948 年春天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成了以「新的方案」鎮壓波蘭工人黨領導人的動因，這一動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莫斯科的行動。²

蘇聯領導人把反對鐵托的鬥爭同對東歐各國共產黨的整肅結合起來也不是偶然的。在蘇南衝突的同時，根據從各方面得到的情報，東歐國家親南斯拉夫和親西方的情緒進一步增強的同時，反蘇情緒也有了新的發展。1949 年 1 月 7 日，布爾加寧在致斯大林的信中寫道，親南斯拉夫的情緒在保加利亞極大地增強了，特別是在軍隊裏這種情緒非常強烈，並且鐵托集團也通過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幾個人，尤其是通過南斯拉夫的武官菲利波維奇中校及其他一些機構，在保加利亞展開了大規模的行動。³ 1949 年 3 月 21 日，在蘇聯外交部歐洲第四局局長基爾薩諾夫日整理的報告中指出，「無論在捷克斯洛伐克還是在波蘭，在科學、文化和藝術領域，在很大程度上都還保留着所謂『西方文化』的影響」，由此提出了關於加強蘇聯對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東歐國家文化生活的影響的

1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卷，第 239 頁。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05.

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1949-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13.

必要性。¹ 1949年4月21日，蘇聯情報局駐波蘭代表索科洛夫斯基在給波諾馬廖夫的報告中批評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在出版工作中「避而不談蘇聯社會主義農業取得的成就」，「害怕西方資本主義，容忍英美帝國主義者的思想意識進入波蘭文學和出版物」，「害怕波蘭居民中一些階層的民族主義的反蘇偏見，錯誤地擔心有人指責他們，說他們（及其出版物）是蘇聯的代理人，害怕對蘇聯及蘇聯政策的宣傳過了頭。」² 1949年5月，經過在東歐各國的巡視，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³工作人員發現，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沒有積極地制止西方影響的擴散，他們在發往莫斯科的報告中指出，「這些國家共產黨的宣傳處和國際處沒做一些專門的工作來蒐集關於英美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的情報，也沒制定反對他們的措施」，「廣大捷克人對蘇聯的態度明顯冷淡了。在同捷克人的交往中，無論是國家機構還是社會組織的領導幹部，蘇聯人都感到，他們的冷淡甚至敵視態度都在加強。」根據塔斯社記者的情報，由於國內經濟問題不斷增長，捷克人「把所有困難和缺點都歸罪到蘇聯頭上。」⁴ 1949年7月27日，對外政策部從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得到的報告表明，保加利亞共產黨「在揭露科斯托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方面的工作，仍然像從前一樣不能令人滿意」。⁵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I, с.38.

2 索科洛夫斯基關於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出版部工作缺點的報告，1949年4月21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9卷，第665頁。

3 1949年3月12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設立聯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的決議，取代在對外政策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基礎上成立的對外聯絡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1948年12月23日成立），1952年10月27日，對外政策委員會又被改為對外聯絡委員會（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партиями），1953年3月19日被改名為對外聯絡部（Отдел ЦК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партиями），1957年2月2日被改名為國際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партиям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отдел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 рабоч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4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Том. II, с.109-113.

5 РГАСПИ, ф.575, оп.1, д.93, л.132-140,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с.148.

隨着東歐國家共產黨獨立傾向的新發展以及這些國家親西方的和反蘇情緒的增長，蘇聯領導人加快了更換較有獨立傾向的領導人的步伐。而始於 1949 年 6 月的拉伊克案件的國際化則成了對東歐各黨高層領導人進行大規模清洗的導火線。在匈牙利和蘇聯領導人的努力下，拉伊克案件超出了一個國家的範圍。因為在這一案件中，在東歐共產黨領導人中間挖出了拉伊克的「同夥」——「鐵托的代言人」，在對拉伊克的審訊中，從被告人口中獲得的供詞表明，526 名外國共產黨員涉及了這一案件。在拉科西轉交給莫斯科的名單中，這些涉案人員包括 353 名捷克斯洛伐克人，71 名奧地利人，40 名德國人，33 名羅馬尼亞人，以及蘇聯、保加利亞、波蘭、意大利、英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共產黨員。¹

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要求各黨把揭露鐵托分子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在共產黨情報局和蘇聯的這一要求下，東歐各國政府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搜查「鐵托和英美帝國主義間諜」的觀念。² 拉伊克案件的國際化為東歐各國實現情報局的這一要求提供了條件。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之後，東歐各國開展了揭露鐵托的鬥爭，進行了一系列按臆想而捏造的政治訴訟案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斯蘭斯基案件、羅馬尼亞的帕特拉什金案件、阿爾巴尼亞的佐澤案件等等。³

解密的俄國檔案證明，蘇聯與這些案件都有着密切的關係。蘇聯領導人和斯大林通過各種渠道得到了關於這些訴訟案的詳細彙報材料，其中包括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企圖保證自己向蘇聯領導人和蘇聯代表通報情況的優先地位，主動向莫斯科提供的誣陷東歐其他國家共產黨領袖

1 АПРФ, ф.3, оп.64, д.496, л.53-54,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с.171.

2 Tmurashko G. P. and A. F. Noskova, "Intraparty Repressions in Eastern Europe: Initiators and Executors, 1949-1953", *Manuscript 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room*, p.9.

3 Желички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26.

和積極分子的黑材料。這些黑材料都被莫斯科所利用。¹ 此外，莫斯科派往東歐各國安全機構的顧問們還直接參與和組織了這些案件。一系列文件材料，比如，斯大林給哥特瓦爾德的一封信就證明了這一點。正如後來赫魯曉夫回憶的那樣，在哥特瓦爾德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對他施加壓力，直接要求他積極在捷克斯洛伐克黨內尋找敵人，並且要求他為此邀請蘇聯顧問予以幫助。²

解密的檔案材料還表明，蘇聯不僅參與了這些政治鎮壓，而有時還是這些鎮壓的主謀，在此過程中它追求的是自己的戰略利益。利用黨內集團鬥爭和軍隊內部新、老精英互不相容等狀況，莫斯科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任務。³ 通過在東歐各國發動的這些訴訟案件，蘇聯對情報局各成員進行了整肅，不僅消除了鐵托獨立傾向的影響，而且還使這些國家的政權都掌握在那些忠於蘇聯的領導人的手中。這樣，在冷戰條件下，東歐地區交替開展的黨內鎮壓使蘇聯領導人完成了一項重要任務——使各黨的領袖們成為對蘇聯戰略路線絕對服從的執行者。這樣，蘇聯加強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

在蘇聯的參與下，東歐各國進行的這些訴訟案件對蘇聯共產黨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對東歐各國的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通過一系列整肅，那些具有民族主義獨立傾向或者不符合蘇聯領導人意願的東歐各黨領導人都喪失了權力，東歐各國的政權都掌握到了忠於莫斯科的領導人的手中，他們都屈服於蘇聯，這就進一步確立了蘇聯共產黨與東歐各國共產黨的等級從屬關係，造成情報局其他成員在發展道路，思想路線等方面都緊隨蘇共。在斯大林對和平、戰爭與革命，對共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39-341.

2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 6, л.108-109, 轉引自 Крекотель П. Дело Сла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7, №3, с.6.

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489-490.

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作用等問題所持的教條主義觀點的影響下，一些黨堅持僵化的戰略，在領導本國的建設中和領導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不時地犯錯誤，違背了在共產黨之間關係上的馬列主義原則，不能創造性地解決國際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從而使共產黨脫離了工人羣眾，給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造成了危害。¹ 此外，在蘇聯的要求下，東歐各國領導人不僅根據蘇聯的建議，在外交等領域儘量與蘇聯保持一致，而且在國內建設上還將蘇聯模式作為自己國家發展的樣板，盲目機械地照搬蘇聯經驗，確立起了僵化的蘇聯模式，為後來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長期停滯乃至最終的巨變埋下了惡果。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東歐各國也力求最大限度地符合蘇聯的標準，不加區別地對待蘇聯文化，並將之作為樣板大規模引入，這給東歐各國的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從而必然導致東歐社會中反蘇意識的不斷增強。1956年爆發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這種反蘇意識增強的結果。

1949—1953年間蘇聯在東歐國家發動的整肅運動規模巨大，² 對東歐各國的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鎮壓的形式多樣——從黨的最高層被清除出黨和罷免黨政職務到逮捕入獄和進行法庭訴訟。不論這類鎮壓是以何種意識形態掩飾，其結果都是使東歐各國共產黨成為控制本國社會極權制度中心結構的最為重要的力量，同時也使大部分共產黨的面貌及其黨內的生活準則發生了質的變化，黨內的所有異己思想都

1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293頁。

2 清洗的程度本身就非常驚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布拉格政變」時期黨員數為一百三十萬，到1948年年底有二百多萬。1954年只有一百四十萬。波蘭共產黨1948年有一百四十萬黨員，1952年只剩一百一十一萬。羅馬尼亞共產黨從1940年的一百萬減少到1951年的七十萬。匈牙利1948年6月為一百二十萬，1951年2月減少到八十五萬。保加利亞黨1948年12月黨員人數為五十萬，1951年還不到三十萬。據費倫克·菲伊托統計，1948年至1952年間，東歐共產黨內被清洗的總人數大約為二百五十萬，其中大約十二萬五千到二十五萬遭監禁。被處決的人數不得而知。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卷，第244-245頁。

被排除了，留下的只有一言堂，對上級俯首帖耳和惟命是從的殘酷機制被塞進了黨內生活。這樣，各國共產黨便在政治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成了蘇共的翻板。¹ 這場整肅運動也是解決各國共產黨領導內派系矛盾鬥爭的結果，它導致了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或第一書記）的職能大大加強，立法和執法部門的所有關鍵權力都掌握在他們手中。總書記或國家領袖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受制約。在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上，也都毫無例外地接受了蘇聯模式，這種體制的形成和發展道路的選擇是以後蘇東各國發生巨變的重要原因。

同時，蘇南衝突對國際局勢，特別是對東南歐的局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聯通過情報局開展的反對南斯拉夫的運動使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向不可逆轉的方向發展。儘管斯大林對鐵托施加了種種壓力，但是鐵托最終出乎意料地堅持了下來。在蘇南關係惡化的同時，美國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得到了改善。蘇南衝突公開化之後，美國開始向南斯拉夫提供經濟援助，1951年11月14日，兩國政府又簽署了軍事援助協定。這就使得鐵托頂住了蘇聯的軍事壓力和衝破了東方的封鎖。² 同時，美國對東南歐的介入對蘇聯的地緣戰略形成了新的挑戰，這使蘇聯在兩大陣營愈演愈烈的對抗中日益處於不利的地位。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588.

2 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李代軍等譯，新華出版社，1981年，第240頁。

第四章 戰後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 與共產黨情報局

除了反對南斯拉夫之外，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的另一項重要議程就是保衛和平和反對戰爭，與戰爭販子進行鬥爭。並且，這一問題被列入大會的首要議程。會議上，蘇斯洛夫首先重點做了「保衛和平和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報告」，其中指出，兩大敵對陣營之間的鬥爭已經尖銳化，帝國主義陣營的侵略性也日益加強了。「現在，領導帝國主義陣營的美、英統治集團已經在公開進行侵略政策，即準備和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目前，英、美帝國主義聯盟的全部政策都是為了準備新的世界大戰」，戰爭的危險更加嚴重了。但是，日丹諾夫認為，「隨着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日益增長和鞏固」，戰爭是可以防止的。「如果各國人民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警惕起來，積極行動和一致努力，在保衛和平的事業中表現堅定和不屈不撓，那麼戰爭挑撥者就絕對無法實現他們那種燃起血腥的第三次世界戰火的罪惡陰謀。」鑒於和平運動的巨大意義，蘇斯洛夫指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頭等任務，就是要把工人階級最廣泛的階層吸收到和平戰士的隊伍中來，建立工人階級鞏固的統一，堅決反對那些分裂和瓦解工人運動的右翼社會黨人，在為和平與本國民族獨立而奮鬥的共同行動綱領的基礎上，組織無產階級中各種隊伍的聯合行動」，這樣，蘇聯領導人就向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提出了開展和平鬥爭的任務。在與會代表對蘇斯洛夫的報告得進行討論之後，大會最後通過了「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決議，其中指出，在新的戰爭威脅日益加劇的形勢下，「爭取鞏固而持久的和平，爭取組織

與團結和平力量去反對戰爭勢力，這一鬥爭現在應該成為各國共產黨和民主組織的全部活動的中心。」同時，決議還指出了各國共產黨在開展和平運動中的具體任務。¹

和平運動在蘇聯對外政策中起到了什麼作用呢？為什麼蘇聯領導人賦予和平運動如此重要的意義呢？在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中共產黨情報局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一、蘇聯對外戰略中的和平運動

自共產國際推行的世界革命戰略遭受挫折，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的長期共處成為現實之後，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贏得建設和發展的時間便成為蘇聯對外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目標，而在實行這一戰略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日益突出的情況下，和平運動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列寧的和平共處戰略

共產國際成立以後在推行世界革命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使列寧看到了在國際力量對比不利於無產階級的情況下，要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開始改變激進的對外政策，把對外政策的重點放在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建設上。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從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長時期內將在國際舞台上同時存在這一客觀歷史規律出發，提出了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理論。在蘇俄成立後最初的幾個月內，列寧在他所寫的著作中和發表的演說中

¹ 情報局會議關於「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決議」討論記錄，1949年11月18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600頁。

都強調了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世界共處的客觀性，同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一定關係的必要性，以及「適應」於同比蘇維埃共和國更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共處的必要性。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中，在談到蘇俄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以及具體談到蘇俄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對德國帝國主義所做的讓步時，列寧說道：「……這並不是我們的妄想……，而是客觀的必然性」，「我建議這樣做，並不是因為我喜歡這樣做，而是因為沒有別的路可走，因為歷史的安排並不符合我們希望各國革命同時成熟的心願。」¹

1920年6月，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一文中，列寧把社會主義體系同資本主義體系的共處劃分為兩個階段：國內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即「存在於一國之內並且不能決定世界政治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以及國際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即「至少是幾個先進國家內的、對全世界政治能夠起決定性影響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最初年代起，社會主義體系由一個國家代表，而資本主義在所有其他國家內佔統治地位。蘇維埃共和國被看作「帝國主義強盜勢力的波濤洶湧的大海中的一個孤島」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一個孤立的邊沿地區」，並把它的地位估計為「被在軍事方面比我們強大得多的帝國主義國家包圍着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認為，在國內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即資本主義包圍時期，存在於一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決定世界政治，雖然它能對世界政治發生巨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列寧認為，「爭取和平的鬥爭構成了蘇聯政府和蘇聯共產黨全部外交活動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內容。」列寧認為，為此目的向帝國主義者作出巨大的讓步，運用機動靈活的策略，使全部外交活動服從於鞏固和平的任務，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在和平時期，我們會逐月強大幾十倍。」在和平共

¹ 《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89頁。

處時期，列寧說道：「……我們將用一切力量來維護今後的和平，我們要把和平保衛住，即使要作很大的讓步和犧牲也在所不惜。」接着他又說道：「我們既已從事和平建設，我們將不惜用一切力量來把它不斷地進行下去。」¹當然，列寧也多次強調指出，讓步是有限度的。社會主義國家用一切力量和手段捍衛和平共處，但是它不能容忍侵犯自己的獨立和國家主權，不能同意帝國主義者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²這樣，列寧就明確提出了開展和平運動，維護蘇俄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的任務。

此外，列寧還對社會主義體系同資本主義體系在國際舞台上和平共處的可能性，並對決定這種可能性、保障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政策勝利的那些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作了深刻的分析。列寧認為這些因素是：第一，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和性質，它對和平和防止戰爭的願望；第二，社會主義國家不斷增長的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實力；第三，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集團某一部分人士對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政治的、尤其是經濟關係的關心；第四，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使他們難於為了侵略目的聯合起來發動戰爭的種種矛盾；第五，全世界人民對和平政策的支持。列寧認為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矛盾的存在是鞏固和平共處的異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他多次指出蘇維埃外交為了和平必須利用這些矛盾。³1920年12月，在向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俄共（布）黨團會議所作的報告中，列寧談到了蘇維埃共和國是受到帝國主義的新進攻威脅的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實行的利用它們之間的分歧、使它們難於勾結起來反對我們的政策是否正確呢？當然，這種政策是正確的。」⁴

1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128、447、147頁；第二十七卷，第840頁；第三十三卷，第122、124頁。

2 安·安·葛羅米柯主編：《和平共處——蘇聯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第22-23頁；第15-16頁。

3 安·安·葛羅米柯主編：《和平共處——蘇聯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第24、31頁。

4 《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427頁。

但是，在提出和平共處理論的同時，列寧仍然認為，世界帝國主義要消滅社會主義體系的企圖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總結報告中所說的：「蘇維埃共和國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¹ 由此看來，和平共處只是列寧在對國際力量對比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策略：避免戰爭，維護和平的局面，贏得時間不斷增長蘇聯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把世界革命留待力量對比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時候進行。在此過程中，應該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

斯大林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戰略思想，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學說，把世界革命的前途同蘇聯的發展壯大，也就是世界無產階級力量的發展結合起來。與列寧不同的是，斯大林更加善於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從人民陣線政策，到與希特勒結盟，再到蘇德戰爭爆發之後與美英結盟的政策，他都是在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

（二）戰後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 —— 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戰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後果是社會主義力量和無產階級力量的發展壯大。在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中，各國共產黨都有了迅速發展。戰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比如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芬蘭等國共產黨都根據斯大林的要求，參加了聯合政府，在本國國家政權中佔據了重要的地位。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蘇聯的影響下，東歐一些國家走上了人民民主的道路，社會主義越出一國範圍並形成一種新的世界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開創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共處的新時期。由於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突出貢獻，蘇聯的影響力空前提高。但是，戰後蘇聯面臨嚴重的國內重建任務，與資本主

¹ 《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29頁。

義國家美國相比，蘇聯的實力遠遠落後，何況，美國還壟斷着原子彈。總的來說，國際力量對比仍然是不利於社會主義的，兩大體系的共處仍然處於列寧所說的「國內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這種狀況下，蘇聯實施和平共處的前提仍然存在。在對戰後世界形勢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斯大林根據資本主義世界總危機理論強調，形勢發展對社會主義蘇聯和各國革命非常有利，但蘇聯國力尚遠遠落後於資本主義國家，帝國主義對蘇聯發動襲擊或進行武裝干涉隨時可能發生，所以蘇聯必須加緊社會主義革命的步伐，加快經濟建設的速度，特別是重工業的發展，同時儘量推遲戰爭，爭取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和平國際環境。正如他在蘇共十五大上說：

我們不能忘記列寧的話，他說我國的建設事業多半取決於我們是否能推遲我們和資本主義世界間的戰爭，這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把它推遲到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成熟的時候，或是推遲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時候，或是推遲到資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廝殺的時候。¹

也就是說，戰後的蘇聯仍然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加快發展自己。

另一方面，戰爭與和平問題仍然突出。戰後，蘇聯領導人仍然堅持把馬列主義作為對外政策的學說基礎，他們仍然堅信：資本主義意味着戰爭，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只是爆發的時間而已。正是出於對戰爭和平的這種這種認識，蘇聯領導人關於戰後世界安排的構想都是建立在為下一次世界大戰作準備，特別是作好應對德國發動復仇戰爭的準備的基礎之上的。因此，蘇聯戰後對外戰略主要目的便在於應對戰爭，維護蘇聯的安全。而在這一戰略中，在蘇聯領導人看來，蘇聯面對的不僅僅是來自德國的威脅。根據季米特洛夫的記錄，戰後不久，斯大林在一次會

1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46頁。

談中談到了關於未來戰爭的前景：在 15 到 20 年之後，蘇聯將不僅與德國——根據他的預測，那時德國已經復興，而且是與包括目前仍然與蘇聯一起結成反希特勒聯盟的西方國家在內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衝突。¹ 斯大林很清楚，在未來這場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中，作為可靠的盟友，能夠指望的是那些最終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因此，在蘇聯境外，具體地來說是在東歐國家裏推行社會主義，對於斯大林來說是確保蘇聯安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世界力量對比不利於蘇聯的情況下，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仍然是必要的。因此，蘇聯外交的任務就在於：在確保對東歐國家控制的情況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進行合作，哪怕是形式上的合作，應對德日崛起帶來的戰爭威脅，特別是應該防止西方國家與德日在反蘇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戰後，兩大體系之間的力量對比並沒有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變化，戰爭與和平問題仍然突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仍然是必要的，戰後蘇聯仍然需要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因此，蘇聯共產黨（布）在宣告蘇聯戰後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時強調說，必須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和平而有利的國際條件，為保障世界革命的發展和進步以及世界的和平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² 斯大林在同外國記者進行的談話中，多次表示了願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願望。1946 年 9 月 24 日，塔斯社發表了《曼徹斯特衛報》記者向斯大林元帥提出的若干問題以及他所作的答覆。當被問道「是否相信蘇聯和西方民主國家有友好和持久合作的可能性，而不管意識形態有多大分歧；是否相信華萊士先生演說中提到的兩種制度可以進行友好的競賽？」時，斯大林的答覆是「絕對相信」，並且「毫不懷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遠不會減少，甚至還可能增長。在一

1 Дим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София, 1997, с.463-464.

2 История КПСС, Т.5, Кн.2, М., 1980, с.63, 轉引自 Нежинский Л.Н., Чельшев И.А. О 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 1, с.6.

國實行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特別是像蘇聯這樣一個國家。」1946年12月，斯大林元帥接見了埃利奧特·羅斯福先生。對於羅斯福提出的問題：「您是否相信像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家可以與像蘇聯這樣共產主義式的政府並存，任何一方都不設法干涉對方的內政？」斯大林回答說，「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完全在可以實現的範圍之內。」1947年4月9日在與哈羅德·史塔生進行會晤時，在談到蘇聯和美國之間進行經濟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的時候，斯大林指出：對這種合作並不存在什麼障礙，問題只在於雙方是否有此願望。斯大林和其他俄國領導人在隨後的幾個月中曾試圖表明，只要美國的統治集團中具有這種願望，那就會一切順利。1948年5月17日斯大林元帥在致華萊士先生的信中所說的，和平共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為實現「全世界和平所絕對必要的」。¹

儘管蘇聯領導人希望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但是，隨着美蘇矛盾的加劇，隨着蘇聯與美英關係的惡化，蘇聯與西方國家的對抗加劇，蘇聯領導人感到，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國際和平條件越來越受到挑戰，西方國家進行的反蘇宣稱和反蘇攻勢產生了戰爭威脅。1946年3月26日，斯大林在接受美聯社記者提問時指出，西方一些政治集團在宣傳戰爭的威脅，散播分歧和不信任，這是引發現在戰爭威脅的主要因素。並且他認為，「為了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社會各屆與各國政府統治階層必須針對新的戰爭宣傳進行廣泛反宣傳工作，為了保衛和平，任何進行新的戰爭宣傳的言論都會遭到社會各屆與報界的抵制；同時，要揭露戰爭販子，不給他們濫用自由的言詞反對世界和平利益的機會。」² 這樣，斯大林就提出了進行廣泛的反對戰爭的宣傳，保衛和平，制止戰爭的任務。

斯大林把應對戰爭威脅，維護和平的重點首先放在反對戰爭威脅的宣傳工作上來。這是因為，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戰後，社會主義陣營的

1 參見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64—69頁。

2 Правда, 23 марта 1946г.

力量、愛好和平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國際工人階級和所有捍衛和平事業的力量的積極鬥爭等這樣一些因素的作用極大地增長了。這些因素首先使得在當時的條件下制止戰爭成為可能。蘇聯的和平政策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種支持體現在不僅包括社會主義國家，而且也包括大批由於種種原因對發動戰爭不感興趣的非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廣闊的和平區域的形成上，也體現在資本主義體系各國廣大人民羣眾強大的反戰運動上。¹ 在蘇聯領導人看來，對戰爭威脅的宣傳不僅能夠駕馭社會輿論，把國內出現的種種不滿情緒推到帝國主義陰謀上，而且在國際上還可以增強蘇聯的影響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甚至是爭取資產階級民主人士，建立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統一戰線，阻止或延緩戰爭。

為了開展反對戰爭的宣傳工作，蘇共中央通過宣傳部對相關部門下達指示，要求改變一些刊登和宣揚和平的作法，要求它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由於戰爭威脅而提高警惕性」上來。1946年10月9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指示蘇聯情報局立即把注意力集中於「報道蘇聯為和平共處與持久和平而進行的鬥爭，解釋這樣的事實，即這項政策與所有國家的人民大眾的核心利益以及他們對持久和平的渴望相一致；系統地揭露美國、英國及其他反動帝國主義集團旨在進行帝國主義擴張和煽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政策。」² 反對來自德國的戰爭威脅在蘇聯的宣傳戰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1946年12月底，蘇共中央通過了關於蘇駐德軍政府宣傳廳工作的決議，規定了宣傳廳在德國開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向德國居民解釋為了建立持久和平與各國人民的安全，必須將德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非軍事化進行到底；使德國進一步民主化，把它變

1 安·安·葛羅米柯主編：《和平共處——蘇聯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第33頁。

2 蘇共中央政治局關於蘇聯情報局工作的決議，1946年10月9日，轉引自Nadzhafov, Dzhahangir G.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Aggravation of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Cold War History*, Jan. 2004, Vol. 4, Issue 2. Зубкова Е.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и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с.134.

成一個真正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國家；向德國居民系統地解釋蘇聯的對德政策並且堅持不懈地揭露美國和英國旨在對德國進行經濟奴役的反動的帝國主義政策；闡述蘇聯國家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成就和優越性、蘇聯為爭取鞏固的持久和平而進行的鬥爭。¹

斯大林進行廣泛的反對戰爭的和平宣傳，具有明確的對外政策上的目的：一是維護和平的國際環境，贏得時間增強蘇聯的力量；二是建立維護和平的統一戰線，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實現蘇聯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在對德政策上，使德國非軍事化。三、爭取輿論，對西方國家的對德政策施加壓力。同時，這一政策也是與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相適應的，以爭取和平，反對戰爭為口號爭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人士的支持，建立統一戰線，使這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對蘇政策保持在大國合作的軌道上，使其不向反蘇的方向發展。

二、戰後蘇聯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的挑戰與和平運動的展開

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加劇了蘇聯領導人傳統的擔心——歐洲再次出現了建立反蘇聯盟的趨勢。這一聯盟的建立使世界被分裂為兩大對抗的陣營，並出現了新的戰爭的危險，這就危及到了戰後蘇聯的大國合作和戰略——一種新的和平共處戰略的實施。為應對西方聯盟的挑戰，蘇聯領導人的對外政策開始向 1930 年代的人民陣線政策回歸，企圖通過開展和平運動，建立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統一戰線，制止戰爭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領導人開始積極地開展和平運動。

¹ 聯共（布）中央關於蘇駐德軍政府宣傳工作的決議草案，1949 年 12 月 25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1 卷，第 470 頁。

（一）馬歇爾計劃的挑戰與蘇聯和平運動的提出

戰後，不僅西方國家進行的反蘇宣傳和反蘇攻勢帶來了戰爭威脅，而且更令蘇聯領導人擔心的是，英美等西方國家正在逐漸聯合起來，建立反對蘇聯的聯盟，馬歇爾計劃便是建立反蘇的西方集團的徵兆。負責對馬歇爾計劃進行研究的瓦爾加院士認為，馬歇爾計劃的結果之一便是建立歐洲資產階級國家反對蘇聯的統一戰線。¹ 諾維科夫也在他發往莫斯科的報告中指出，「馬歇爾計劃應被看成是旨在建立一個歐洲反蘇聯盟的合作計劃的第一步：通過這種方式，「馬歇爾計劃」替代了以前的無組織行動，目的在於使歐洲國家在經濟、政治上依附於美國資本並建立一個反蘇陣營。² 而莫洛托夫認為：「馬歇爾計劃會破壞國家主權，使德國死灰復燃，讓美國控制歐洲」，「使歐洲分裂為兩個集團」。³ 蘇聯領導人對馬歇爾計劃的這些看法表明，他們已經開始把馬歇爾計劃看作是反蘇的西方集團建立的標誌，而且這一集團還包括德國。這就動搖了斯大林戰後安全戰略的基石，促使蘇聯大國合作戰略發生轉變。為應對馬歇爾計劃和西方建立反蘇集團的挑戰，蘇聯領導人加快了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步伐，以便加強對歐洲各主要共產黨的控制，同時，企圖利用這一機構反對馬歇爾計劃，阻止西歐集團的建立。

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增加了蘇聯領導人的威脅感。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日丹諾夫在「關於國際局勢」的報告中提出了兩大陣營的理論：帝國主義陣營要加強帝國主義，準備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反對社

1 АВПРФ, фонд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олотова, оп.9, инд.213, папка18, д.191, л.4-18, 轉引自 Пихоя Р.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0, с.26.

2 諾維科夫給莫洛托夫的信件，1947年6月24日，АВПРФ, ф059, оп.18, п.39, д.250, л.314-320, 轉引自 Parrish, Scott 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rshall Plan, 1947」, *CWHP Working Paper*, p.19-22.

3 《紐約時報》，1947年7月3日，第3頁。轉引自拉弗貝：《美蘇冷戰史話（1945—1975）》，第67頁。

會主義和民主，而反帝陣營則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擴張和新的戰爭威脅，加強民主，消除法西斯主義的殘餘。¹ 1947年9月，斯大林在紀念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賀詞中指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正在竭力用各種方法挑起新戰爭」，而莫斯科「是爭取各國人民之間的持久和平和友好的鬥爭的倡導者，是反對新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倡導者。」²

馬歇爾計劃的提出不僅增長了戰爭的危險，而且危及到了蘇聯的戰後戰略。在國際力量對比仍然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情況下，必須制止新的世界戰爭，保證兩種制度的和平共處。那麼，究竟哪些力量能夠防止新的世界戰爭、根本制止侵略戰爭的發動並保障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呢？在蘇聯領導人看來，這些力量是：社會主義陣營及其日益增長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國際工人運動，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世界各國人民保衛和平的積極鬥爭，眾多非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亞洲和非洲的新興國家），以及拉丁美洲那些關心維護和平以便實現其民族復興任務的國家。其中，社會主義陣營是防止戰爭和保衛和平的決定性因素。並且，戰後社會主義力量有了明顯的增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們約佔世界領土的17%，人口的9%。到1939至1945年戰爭以後，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和亞洲一系列國家中開始取得勝利，這些國家走上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形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體系，並且佔世界領土的26%，人口的35%以上。社會主義國家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愛好和平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構成了廣大的和平地區，聯合了全人類三分之二的人口，這股力量是維護和平的強大因素，能夠迫使帝國主義侵略者退卻，能夠堵塞他們發動戰爭的道路。歐洲一些實行中

1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66頁。

2 劉同舜、姚椿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53年（第八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25頁。

立政策的和不參加帝國主義列強軍事集團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主張維護和平，因為這些軍事集團對這些國家的存在蘊藏着致命的危險。¹

和平力量的壯大使得阻止西方反蘇集團的建立和延緩戰爭的爆發有了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對外政策開始向 1930 年代的「人民陣線」政策回歸，即把西方國家建立集團政策的努力同戰爭的威脅聯繫起來，並試圖通過開展廣泛的反對戰爭的和平運動，把廣大和平力量聯合起來，建立起維護和平的統一戰線，來阻止西方聯盟的建立和戰爭威脅的出現，延緩世界大戰的爆發，為兩種制度的和平共處創造條件。

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首先是對馬歇爾計劃作出的一種反應。正如蘇斯洛夫所指出的，和平運動最初是作為反對馬歇爾計劃、反對侵略性的西歐聯盟和北大西洋聯盟的羣眾運動出現的。² 這一運動萌發於 1947 年 9 月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召開。早在會議的準備階段，蘇共對外政策部領導人巴拉諾夫就提議，共產黨情報局通過一項特別的議案，向「全世界的民主組織」發出呼籲，號召人們「反對戰爭販子，反對侵犯各民族的經濟獨立和國家主權的企圖」。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蘇斯洛夫在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同時指出，反帝陣營的「基本任務」就是「保證持久的民主和平」，並規定了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在和平運動中的任務，「在保衛和平的運動中，各國共產黨不能把自己僅僅局限於執政黨所允許的外交和國家的手段……我們認為，共產黨能夠加強力量，利用其所擁有的一切資源，拒絕英美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宣傳。」共產黨人中期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大規模的「反對戰爭的鬥爭，大規模的發展運動和平運動。」³

1 安·安·葛羅米柯主編：《和平共處——蘇聯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第 47、52 頁。

2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7 卷，第 456 頁。

3 日丹諾夫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關於國際局勢的報告，1947 年 9 月 25 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7 卷，第 443-473 頁。

(二) 西方聯盟的加強與蘇聯和平運動的展開

在馬歇爾計劃之後，西方國家建立聯盟的趨勢不斷加強。在美國的支持下，1948年3月5日英國開始同法、比、荷、盧等國就組建「西方聯盟」舉行談判，3月17日，上述五國外長在布魯塞爾簽訂了為期50年的《布魯塞爾條約》。在蘇聯領導人看來，布魯塞爾公約「是組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同盟總計劃中的第一個正式的軍事政治同盟條約」，「其目的首先是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西方聯盟」計劃引起了蘇聯的領導人的高度警惕。蘇聯領導人擔心，不僅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加入這一聯盟，而且意大利、西德、美國和西歐其他一些國家也將加入。蘇聯領導人還把西歐聯盟的建立同馬歇爾計劃聯繫起來，認為「無論是美國的經濟援助計劃，還是英國的西方聯盟政治計劃都將會使西歐和東歐相互對立，然後，將導致歐洲的政治分裂」。¹

布魯塞爾條約的簽訂成為斯大林開展政治和思想「和平進攻」運動以回敬「新的戰爭威脅」的里程碑。² 1948年10月，斯大林指出：「各國人民對不久前的戰爭慘禍記憶猶新，擁護和平的社會力量非常強大，所以主張侵略的丘吉爾的徒子徒孫們是不可能戰勝他們，使他們轉到新戰爭方面去的。」³ 蘇聯打算通過和平攻勢來實現其對外政策，特別是對德政策構想，這一點在美國的檔案材料中也得到了證實。1948年6月14日，杜魯門聽取了一次彙報，其中講到據巴黎一個接近共產黨情報局的情報來源稱，共產黨情報局顯然在準備實行一種高度靈活的綏靖方針，

1 АВПРФ, ф.07, оп.21, п.33, д.497, л.1-2, 轉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1-314.*

2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1-314.*

3 劉同舜、姚格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3年（第八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27頁。

以避免共產主義陣線進一步分裂。同一情報來源還認為，莫斯科可能打算發動一次和平攻勢，其做法是接受倫敦就德國問題提出的建議，以便在對魯爾區的管制問題上有發言權和推進德國統一的構想。¹

1949年1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正式成立後，蘇聯方面馬上注意到，在北大西洋公約草案裏沒有反對德國侵略復活的條款，沒有吸收蘇聯及東歐國家為其成員的規定。這不能不被蘇聯領導人看作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具有侵略企圖的證據。1月28日，由蘇聯外交部起草、並經莫洛托夫修改後提交給斯大林的「關於北大西洋公約的聲明」明確指出，蘇聯政府認為西方同盟和正在籌備的北大西洋軍事政治聯盟公約是旨在反對蘇聯的軍事政治聯盟，英美法的政策是違反聯合國憲章的，是對同蘇聯簽訂的關於德國問題的協定和英蘇、法蘇條約的踐踏。在這種條件下，蘇聯政府保留「積極而徹底地同各種戰爭販子做鬥爭的權利」。總之，在蘇聯專家看來，大西洋聯盟是美國鞏固自己對西歐國家控制的重要組織手段，也是利用這一地區準備新的反蘇戰爭最重要的手段。²在蘇聯同西方國家相互關係不斷對抗的氣氛下，簽署北大西洋公約不能被蘇聯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宮看成是「英美統治集團公然徹底同戰後三國——蘇聯、美國和英國合作政策決裂」。³對於斯大林和其他蘇聯領導人來說，北約的成立意味着必須尋找新的途徑來保障歐洲安全。

在保障歐洲安全問題上，德國問題仍然是核心問題。1947年11月25日—12月15日在倫敦召開的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仍然未能就德國問題達成協議。此後，美英法就德國問題召開的倫敦三方會議，

1 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22頁。

2 АВПРФ, ф.0129, оп.336, п.337, д.1, л.196-201, 轉引自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260.

3 АВПРФ, ф.06, оп.11, п.2, л.16, 轉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3.

1948年2月13日蘇聯政府在遞交給美國的聲明中，指責美英法的這一舉動違背了英蘇美法關於對德控制委員會的協議，也違背了關於成立外長委員會的波茨坦協議。會後不久，英國主張西歐聯合加強防務，以對付蘇聯。蘇聯領導人認為，英美合併了他們在德國的佔領區，就是「試圖利用它來組建特別的西歐集團，與歐洲的其他國家相對立，這將導致德國的分裂和歐洲兩大陣營的形成」。¹ 在蘇聯外交部擬定的關於北約成立的文件中，相當大的篇幅都是談論關於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和關於使二戰的侵略者適應北大西洋公約反蘇戰略計劃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蘇聯領導人的心靈深處和蘇聯社會意識中對德國再次進行侵略的可能性存在的現實威脅感。² 然而，蘇聯為了向西方國家施壓而對柏林採取的封鎖行動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戰略目的，反而把蘇聯與西方大國致於直接對抗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的對外政策開始轉向減少對抗，尋求同西方進行對話的途徑，來解決德國問題和歐洲的安全問題，並且開始對和平運動就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希望依靠大規模的反對侵略政策的羣眾運動來牽制西方國家的決策者。從1949年初開始，人們看到蘇聯開始強調戰爭不是不可避免，在對西方關係上表現出了謀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和平解決東西方爭端的跡象。蘇聯領導人調整外交鬥爭的策略，高舉和平旗幟，謀求和平解決東西方爭端，發動了西方稱之為「和平攻勢」的運動。³ 1949年元旦，蘇聯駐美使館發行的《新聞公報》刊登了《真理報》駐聯合國記者的一則報道，在照例向美國人民祝賀新年快樂之後，寫了一段在兩國人民朝着共同目標前進的道路上將不會有任何

1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с.532-537.*

2 АВПРФ, ф.0129, оп.336, п.337, л.1, л.196, 198, 201, 轉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1-314.*

3 劉同舜、姚椿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3年（第八分冊）》，第226-227頁。

障礙的話。¹ 1949年1月27日，蘇聯提出了關於簽署5國和平公約的提案。同一天，斯大林在回答美國《國際新聞社》報紙歐洲分部領導人金斯別利·斯密特的問題時說，蘇聯政府願意與美國政府簽訂和平條約，以便保證任何一方都不準備反對另一方的戰爭。「通過簽訂這樣的和平條約，蘇聯政府就會同美國政府合作，並逐漸裁軍。」² 斯大林表示，如果美國、英國和法國能夠推遲單獨組建西德國家，那麼他願意同杜魯門進行會談甚至願意取消對柏林的封鎖。在這一建議未引起重視後，斯大林將之修補為一項四大國條約並表示，希望同杜魯門進行一次面對面的密談。³ 與此同時，他讓西歐的共產黨煽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和平運動反對籌建中的西方軍事聯盟。⁴ 開展和平運動成為蘇聯領導人應對西方聯盟的首選方案。正如美國偵察機關在1949年的年度總結報告中指出，蘇聯儘管擁有了原子彈，但現在還不打算對西方動武，他將繼續奉行自己的政治鬥爭策略。這一政治鬥爭的首選方案是組織羣眾性的世界和平運動，這一運動是共產黨情報局和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領導下開展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⁵

為了開展和平運動，1949年，蘇聯領導人把外政策的優先方針轉為「為和平而鬥爭」，轉為建立和開展「和平擁護者的運動」。在這一運動中，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等國際左翼組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8月，由波蘭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在布雷斯勞召集的工人保衛和平文化大會是蘇聯組織和平運動的第一步。⁶ 1948年8月在波蘭的

1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52年（第七分冊）》，第258頁。

2 Правда, 31 января 1949г.

3 FRUS, 1949, vol. 5, p.562-563.

4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1947-53",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p.200.

5 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是根據蘇共中央的決定於1949年8月底成立的。

6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1947-53",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199-200.

羅克勞召開了由各國著名知識分子參加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會」，由四十六個國家的代表組成，會址設於巴黎。會後成立了「世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會國際聯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於1949年2月在巴黎開會，並計劃在世界上的許多主要城市召開一系列會議。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簽訂之後不久在巴黎召開的第一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檔案文獻證明，蘇共中央組織了這次會議。1949年1月6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作出了「關於全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會議」的決議，規定在1949年2—3月間召開會議，地點在巴黎或者是日內瓦，而「如果遇到困難」，那麼就在華沙或者是布拉格。在決議中還擬定，何種組織應該成為會議的組織者，並確定了各機關、團體和聯合組織的大致範圍，以及由誰擔任會議的代表更為理想和必要，計劃了參加者的總人數，並規定會議應該通過何種文件和組織決議。蘇共中央政治局為這次會議制定的主要任務是，全力把世界各國的廣大羣眾和民主人士吸引到這一為鞏固和平而鬥爭的運動中。¹ 此外，蘇共中央還下達了指示，為這次大會的召開提供了70000—100000美元的經費，並早在3月8日就組織了世界範圍內的遊行對這次會議進行支持。²

1949年4月20日至25日，第一屆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巴黎召開，7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在蘇聯代表的引導下，這次會議具有強烈的反美論調。最後，大會以六億和平支持者的名義，通過決議譴責戰爭、原子彈、殖民主義、破壞聯合國憲章和重新武裝西德與日本的行為，大會決定成立常設機構「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總部和常設機構設

1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3, л.69, 轉引自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280.

2 RTsKhIDNI, f.17, оп.3, д.1974, л.62,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p.199-200.

在巴黎。¹ 1949—1950年間保衛世界和平理事會在八各國家的中心地點舉行了多次會議，並在1950年底組織了第二次世界大會。在世界和平委員會召開的多次會議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於1950年3月15日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第三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世界和平大會常委會決定發出禁止原子彈的呼籲，並為此徵集簽名。呼籲書的內容為：我們要求無條件禁止作為侵略和大規模屠殺人民工具的原子武器，並要求在履行這一決議方面實行嚴格的國際管制。我們一定要把那個首先使用原子武器來反對任何國家的政府看做戰爭罪犯。我們號召全世界善良人民在這一呼籲書上簽名。這次簽名運動被其發起者稱為是一次「真正的普遍的公民投票」。² 在華沙召開和平主義者第二次會議的時候（1950年9月16—22日），會議宣佈收集到了485 735 000人在斯德哥爾摩呼籲書上的簽名。不管人們對世界和平委員會宣佈的這些數字的看法怎樣，有一點是根清楚的，即堅持不懈、全力以赴地收集簽名這一事實，表明克里姆林宮對這一運動是很重視的。蘇斯洛夫強調要優先開展簽名運動，特別是在美國和英國。必須為這一運動收集上億人的簽名，「否則這一運動將喪失政治意義」。這場運動的目的是在戰爭問題上「加深分裂」，向世界輿論展示，誰擁護和平，誰反對和平，「揭露戰爭販子」。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和平主義者第二次大會上依靠聯合國辦事處提出關於禁止使用原子彈的議案，這項議案已經得到了收集的簽名的支持。³ 蘇聯在聯合國大會（1950年9—12月）提出的議案和在11月召開的和平主義者代表大會的宣言幾乎是一致的。

世界和平委員第二次大會於1950年11月16日在華沙開幕。這次

1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52年（第七分冊）》，第264-265頁。

2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80-81頁。

3 RTsKhIDNI, f.575, op.120, d.1, l.10; RTsKhIDNI, f.17, op.162, d.44, l.37,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1947-53",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 202.

大會通過的決議的要點都是蘇聯政策的主要目標：立即結束朝鮮戰爭，保證所有外國軍隊從朝鮮全部撤離，將朝鮮問題提交安理會，而國民黨中國在安理會的席位必須先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取代；完全禁止原子、細菌和化學戰爭；與統一的、非軍事化的德國簽訂和平條約；召開五大國會議，兩個對立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問題必須先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得到解決。大會還選舉了一個由二百零八名成員組成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世界和平理事會像其前身世界和平委員會一樣，由於規模過於龐大，不便於有效處理工作，因此和平運動的指導工作被置於只有二十餘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手中。這個執行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就是確保會議和大會的成功，在會議上闡明正確的觀點，隨後再把這些觀點傳播到整個世界。這一任務的實現，除了依靠報紙和廣播進行適當的宣傳之外，還要依靠與其他團體取得的聯繫，利用各種機會來影響輿論。這些團體包括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以及其他類似的國際組織；它們都力求把自己的成員擴大到共產黨的範圍之外。由此可見，和平戰士運動的執行委員會在推進俄國外交目標方面，具有與共產黨情報局相平行的地份。在共產黨情報局指導共產黨的同時，和平委員會則指導一些國際聯合會或陣線，它們顯然並非公開承認或全然屬於共產黨，但它們自願或不知不覺地在莫斯科的戰略中起到了一種輔助的作用。¹

「和平戰士」的主要活動是為大量文件徵集簽名。這些文件向輿論界以及政府、議會、聯合國等機構呼籲：禁止核武器，進行全面裁軍，反對北大西洋聯盟和重新武裝德國，以及支持蘇聯在外交工作上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簽名是和平戰士的主要武器。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第二次世界和平大會上成立）發出呼籲，要求為五大國之間簽署和

1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第83-84頁。

平協議而徵集集體簽名，並組織了為支持這一建議所需的徵集簽名的運動。……這次簽名總人數達到了6億。五年間（1948—1952），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和平不能等待，和平只能爭取」的戰鬥口號下，各國與世界和平大會、和平會議，為和平而召開的各種會議和聯歡會，爭取和平的呼籲書、請願書和決議，以及成億的簽名（每次都是這些人），不斷接踵而來，希望通過簽名來贏得和平。¹

除了利用國際左翼組織開展和平運動之外，蘇聯領導人還在本國組建一些開展和平運動的組織，與國際和平運動相配合。為此，根據1949年8月25—27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全蘇和平主義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成立了蘇聯保護和平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責是協調蘇聯和平主義者的行動，發展和鞏固同國外和平戰士的友誼，同國外和平主義組織和社會機構領導人進行合作。蘇聯保護和平委員會的工作由通過在不定期召開的全蘇和平主義者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的主席團領導。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和州以及一些比較大的城市都有地方的保護和平委員會。蘇聯保護和平委員會同世界和平委員會和國外的民主和平組織在工作上保持密切的接觸。為了使蘇聯保護和平委員會的工作更加具有羣眾性、更加多面性和更加具體，該組織在工作上依託如下幾個委員會：1. 裁軍委員會政治和技術部，2. 裁軍的經濟優勢部，3. 裁軍和民族獨立部，4. 裁軍的道德、文化、法律和醫療問題委員會，5. 出版委員會，6. 同國外組織聯絡委員會，7. 旅遊委員會。蘇聯保護和平委員會下設的分支機構有：1. 秘書處；2. 國際部；3. 宣傳和羣眾工作部。² 從蘇聯保護和平委員會的機構設置來看，開展裁軍運動是它的一項主要活動。為了響應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根據蘇聯保衛和平委員會的決定，1950年6月30日，在蘇聯開始了為世界和平擁護者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禁止核武器呼籲書

1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283頁。

2 РГАНИ. ф.р-9539, оп.1, часть1, л.1.

（斯德哥爾摩呼籲書）徵集簽名的活動。截止 1951 年 7 月 5 日，已經有 56807705 人在呼籲書上簽了名。¹

面對西方聯盟建立和不斷加強的趨勢，蘇聯領導人首先採取的並不是直接針鋒相對的對抗措施，而是把重點放在延緩戰爭的和平運動上。這主要同蘇聯領導人如下的一些認識有關。

首先，在以蘇聯為首的陣營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發展，和在以美國為首的陣營中的資本主義的日益衰落，最終將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因此，為了保證這一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防止資本主義列強——就象蘇斯洛夫說的那樣，在其日益虛弱的情況下忽然歇斯底里大發作——向社會主義陣營發動進攻，從而阻止其向共產主義勝利進軍。因此，共產黨的首要目標就是保持穩定和持久的和平，而為達到這一目標，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就必須有穩定和持久的妥協。各國共產黨要團結所有和平的支持者，建立一道反對美國對蘇聯的任何戰爭企圖的防線，並團結所有主張民族獨立的人，以加深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正如斯大林所說，「當前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把廣大羣眾吸引到為保持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鬥爭中來。因此，這一運動不追求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也就是說，蘇聯發起的保衛和平的鬥爭僅局限於民主主義的目標。因此要求不要去宣傳那些不能為資產階級中的愛國階層、民主階層和平人士所接受的國內的社會、政治目標，從而使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不致發生困難。斯大林在向各國共產黨提出他的最後建議時（1952 年 10 月在蘇共 19 大的發言），沒有提到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進行鬥爭的問題，其原因就在於此。他對與會的西歐共產黨領導人說：「如果你們想成為愛國者和你們國家的領導力量，就必須高舉獨立、民族主權

1 Зубкова Е.Ю.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с.634-636.

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與和平的旗幟。」社會主義的旗幟則被小心翼翼地收起來了。¹ 斯大林還對幾乎所有國內重要文件進行修改，在對馬林科夫於 1952 年 7 月 17 日向蘇共十九大所提交的工作報告草稿進行的修改中，他對原稿中的革命性語彙明顯地加以刪改。從這些修改可以清晰地看出，斯大林的着重點在於積極倡導和鼓動「護衛和平的獨立的民主運動」的發展。²

其次，在斯大林看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其內部矛盾實際上比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更為激烈，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究不是從對蘇聯作戰開始，而是從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開始的。當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願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戰爭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現今的和平運動，其目的是喚起人民羣眾去為維護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戰而鬥爭。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它只限於為維護和平而鬥爭的民主目的。……最可能的是，現今的和平運動即維護和平的運動，在獲得勝利的情況下，會使上述這個戰爭得以防止，使它暫時推遲，使當前的和平暫時維持，使好戰政府辭職而代之以別的願意暫時維持和平的政府。」³ 在蘇聯領導人看來，利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運動是能夠達到阻止西方聯盟的建立這一目的的，至少可以對西方國家的政府施加壓力。因此，世界和平理事會柏林會議被安排在三月初蘇聯和西方三國副外長巴黎會議之前召開，自非巧合。蘇聯代表要求把德國問題列為會議議程的

1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 298 頁。

2 RGASPI, f.558, op.11, d.21, l.24-25, 29, 轉引自 Naimark, Norman M., "Cold War Studies and New Archival Materials on Stalin", *The Russian Review*, 61 (January 2002), p.13-14.

3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563-566 頁。

首要問題，以阻止西方國家武裝西德。在柏林會議反對武裝西德、保衛世界和平口號的鼓動下，法德兩國的羣眾運動風起雲湧，紛紛譴責美國武裝西德的行為。而且，當時在巴黎開會的西歐各國代表都很關注自己在普利文計劃中所佔的地立，美英法三國駐德高級專員則在波恩與西德軍方人士為西德在歐洲軍中的份額爭論不休。西方國家圍繞着歐洲軍計劃的激烈爭吵，以及美國為擺脫它在朝鮮半島困境的焦急心情，都使這場反對武裝西德的和平運動演得很有聲色。原先各有打算的英法等國政府，此刻面對聲勢浩大的羣眾運動，更躊躇不前。到 1952 年北約里斯本會議時，雖在美國催促下，會議重申支持建立一支包括西德部隊在內的「歐洲軍」，並正式宣佈西德為北約「保衛」的「領土」，但各國紛紛以「經濟」原因為由表示難以完成里斯本會議預定的擴軍目標。英國政府宣稱，原定三年內完成的軍備計劃，將作「相當長時間的延長」。法國總理富爾更因新稅法得不到公眾支持，無法籌措巨額費，被迫下台。¹

總之，在阻止美國建立反蘇的西方集團這個問題上，斯大林依然實行他當權以來所實行的戰略的基本原則，仍把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矛盾放在首位，而不把利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放在首位。帝國主義列強過去結成統一戰線來反對蘇維埃國家的企圖之所以遭到失敗，其原因之一就是帝國主義的內部矛盾十分尖銳。² 帝國主義陣營內部不可調和的和日益加劇的矛盾是一個客觀因素，這個因素同其他因素一樣，有助於和平共處戰略的實現。這條路線的戰略目標是要與受到美國擴張威脅的那部分資產階級重新建立民族團結，建立一個保衛和平與維護民族獨立的「廣泛的陣線」。用日丹諾夫的話來說，就是團結「一切願意保衛民族尊嚴和獨立的力量」，動員所有「和平的支持者」，來對付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採取這個戰略的用意是要擊退美國的攻勢，使美國領導人清

1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2（第七分冊）》，第 266 頁。

2 安·安·葛羅米柯主編：《和平共處——蘇聯對外政策的列寧主義方針》，第 9 頁。

醒過來，並迫使他們回到雅爾塔的政策上來。¹

因此，面對戰爭的危險，蘇聯領導人對和平運動寄予了更大的希望。1950年5月4日，在同德國共產黨領導人格洛會晤期間，斯大林號召德國共產黨「把重要的任務放在開展廣泛規模的和平運動上，使德國很好地回想起戰爭以及因此所失去的許多東西。斯大林指出：「德國人民不願意有戰爭。如果在德國開展廣泛規模的和平運動，那麼德國人民爭取和平的運動將能阻止美國人挑唆東德和西德相互發生衝突。」在斯大林看來，在當時的情況下德國人有兩條路可選：戰爭或者和平。美國人企圖把德國拖進戰爭，他們把這描繪成是重建一個強大德國的唯一方法。但是走戰爭道路會導致德國的毀滅，而和平以及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合作才是重建一個強大德國的唯一途徑。如果「全體德國民眾都參加到爭取和平的運動中來，那麼這將使得美國把德國拖入戰爭的計劃全部泡湯。」² 從斯大林的這些談話可以看出他對德國的和平運動寄予的深切希望。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在堅持戰爭不可避免的同時，指出和平運動可以暫時推遲戰爭，使好戰的政府辭職而代之以別的願意維持和平的政府。這次會議上，蘇聯政府就對外政策問題提出的四個方面任務的第一項便是反對戰爭，保衛和平。「目前的任務就是更加提高人民羣眾的積極性，加強和平保衛者的組織」，10月14日，即第十九大的最後一天，斯大林在發表的演說中再次號召建立起維護和平的新同盟，「把社會黨領導人打翻在地，直接向廣大黨員羣眾呼籲，在喚起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的基礎上，使這個同盟儘可能向右擴展。為西歐『和平與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口號的戰略目標，在於削弱美國對歐洲大陸的影響，從而削弱西方聯盟的團結和軍事力量」，「這就意味着利用民族主義、和

1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69、170、280頁。
2 ЛП РФ, ф. 45, оп. 1, д. 303, л. 127-128, 轉引自 Volkov, Vladimir K., "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 1947-1952",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平、中立主義、工會以及和中產階級分子進行合作的其他組織形式。」¹ 斯大林嚴厲譴責美、英統治集團「正在策劃新的世界大戰」，聯合國被美國變成「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工具」，同時又強調，「至少在目前，不能夠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國家的侵略勢力「懼怕他們本國的人民，因為他們的人民不要新的戰爭，主張維護和平」。「如果各國人民將維護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並且把這一事業保衛到底，和平就能夠保持和鞏固。如果戰爭挑撥者用謊言迷惑了人民羣眾，欺騙了他們，把他們捲入新的世界大戰，那戰爭就會成為不可避免。」² 因此廣泛的維護和平的運動，作為揭露戰爭挑撥者罪惡陰謀的工具，現在具有頭等的意義。」³ 為了更好地開展這一鬥爭，蘇聯在斯大林 70 壽誕之際設立了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專門向世界範圍內那些在維護和平，反對戰爭的鬥爭中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士給予獎勵。

值得指出的是，斯大林雖然認為，和平運動只限於為維護和平的民主的目的，這一運動具有重大的意義，但他仍然認為，「縱然有保衛和平運動的這一切勝利，但帝國主義仍然存在，因而戰爭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要消除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須消滅帝國主義。」³ 正如列寧一樣，在斯大林看來，帝國主義意味着戰爭。因此，為了維護蘇聯的安全，為了使國際力量對比向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最終需要依靠的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因此，蘇斯洛夫在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第四次會議上指出，「國際力量的對比仍然是有利於帝國主義陣營」，「為了為和平而鬥爭，聯共將繼續致力於加強蘇聯的經濟力量，發展工業、農業和文化——這些是全世界和平的支柱。」⁴

1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2（第七分冊）》，第 287 頁。

2 劉同舜、姚椿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3 年（第八分冊）》，第 227 頁。

3 《斯大林選集》（下卷），第 563-566 頁。

4 РЦИДНИ, ф.575, оп.1, д.73, л.169,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3.

三、共產黨情報局與和平運動

除了國際左翼組織之外，共產黨情報局在蘇聯發起的和平運動中也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正如蘇斯洛夫所指出的，和平運動最初是作為反對馬歇爾計劃、反對侵略性的西歐聯盟和北大西洋聯盟的羣眾運動出現的，它萌發於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召開。早在會議的準備階段，對外政策部領導人巴拉諾夫就提議，共產黨情報局通過一項特別的議案，向「全世界的民主組織」發出呼籲，號召人們「反對戰爭販子，反對侵犯各民族的經濟獨立和國家主權的企圖」。¹ 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蘇斯洛夫在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同時指出，反帝陣營的「基本任務」就是「保證持久的民主和平」，並規定了共產黨情報局在和平運動上的任務，「在保衛和平的運動中，各國共產黨不能把自己僅僅局限於執政黨所允許的外交和國家的手段……我們認為，共產黨能夠加強力量，利用其所擁有的一切資源，拒絕英美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宣傳。」共產黨人中期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大規模的「反對戰爭的鬥爭，大規模的發展運動和和平運動」。²

蘇聯領導人在情報局會議上提出和平運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開展反對建立一個包括復活了德國在內的西方集團的運動，而在這個問題上蘇聯不僅可以得到東歐國家的支持，而且，西歐國家特別是法共和意共也能發揮重要的作用。解密的俄國檔案材料證明，美國建立包括德國在內的反蘇集團的企圖是無法獲得東歐社會輿論的支持的，德國威脅出現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東歐國家社會情緒的變化，特別是在斯

1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66頁。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4, л.136,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 200.

拉夫國家裏。因此，東歐國家把蘇聯的存在看作是抵制德國再次發動侵略的重要因素。波蘭尤其如此。正如波蘭社會黨人斯坦契克所說，「如果由於國際上各種利益的角逐產生了英國想要建立西方集團的形勢，那麼就必須認識到，這是為發動新的戰爭進行的準備。如果建立了這種集團，那麼它將會是有某種目的的。如果它今天不是針對蘇聯的，那麼在一年或五年之後可能就會是。這裏並不是說對蘇聯有特殊的感情，但是，戰爭將使我們喪失獨立，可能還會使我們國家都不存在。」¹捷克斯洛伐克對德國的威脅也持相同的立場。根據蘇聯大使佐林發自布拉格的報告，「在對待德國和德國恢復的態度方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持如下觀點：這一問題對捷克斯洛伐克來說是一個有關生存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民族陣線中各黨的觀點將會繼續保持極大的一致。」²斯拉夫國家的歷史記憶使它們堅決反對西方國家恢復德國的行動。蘇聯利用德國問題反對西方集團的建立，不僅有助於蘇聯對德政策的實現，而且共同的目標還有助於增強蘇聯在東歐國家的影響力，克服這些國家的離心傾向。正如 1950 年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在布拉格舉行的八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民主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外長協商中所看到的，蘇聯領導層確實在利用德國問題來鞏固東方陣營。³

由於法共和意共在國內的影響，在阻止建立西方聯盟的問題上，法共和意共則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給法

1 ЦХСД, ф.17, оп.128, папка768, л.136,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74.

2 АВПРФ, ф.0138, оп.29а, папка2, д.171, л.55, 轉引自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74.

3 參見：Volkov, Vladimir K. 「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 1947-1952」.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1999.

共和意共的特殊任務：「他們必須高舉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旗幟。」假如法共和意共能「起來領導一切願意保衛民族尊嚴和民族獨立事業的力量，那麼奴役歐洲的任何計劃都是不能得逞的」。這樣，蘇聯方面提出了和平、民主和民族獨立這三個不太過激的口號，這顯然是為了避免採取過激的行動進一步加劇西方對「共產主義威脅」的擔心，加劇西方聯盟的建立。根據共產黨情報局確定的戰略路線，會後，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在國內發動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並一直持續到1949年底才結束（之後，顯然衰落下去，但意大利除外，1950—1955年是它的高峰期），在這場運動中，共產黨力圖使勞工鬥爭與「保衛和平與民族獨立運動以及反對馬歇爾計劃和禁止原子彈」的運動結合起來。1947年秋，罷工浪潮席卷法國，參加的人數超過兩百萬。這場罷工運動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於「反對馬歇爾計劃所體現的經濟奴役計劃」和反對法國「有幫兇的新的戰爭挑釁者」的鬥爭。意大利共產黨也根據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確定的路線展開行動，特別是1948年7月謀刺陶里亞蒂的事件立即激起了羣眾的反擊：800萬工人舉行了總罷工，使國家癱瘓了兩天，給人的印象深刻。與法共一樣，意共也是按照共產黨情報局的要求，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爭取和平與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運動上。¹

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蘇斯洛夫在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同時指出，反帝陣營的基本任務就是「保證持久的民主和平」。並規定了共產黨情報局在和平運動上的任務：在保衛和平的運動中，各國共產黨不能把自己僅僅局限於執政黨所允許的外交和國家的手段……我們認為，共產黨能夠加強力量，利用其所擁有的一切資源，拒絕英美和其他帝國主義者的宣傳。共產黨人中期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大規模的「反對戰

¹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167—175頁。

爭的鬥爭，大規模的發展運動和和平運動。」¹ 這樣就提出了開展反對戰爭的和平運動，應對戰爭威脅的任務。

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之後，國際局勢進一步惡化。1947年11月25日—12月15日在倫敦召開的蘇、美、英、法四國外長會議未能就德國問題達成協議。此後，美英法單方面就德國問題在倫敦召開了三方會議。1948年3月5日，英國在美國支持下開始同法、比、荷、盧等國就組建「西方聯盟」舉行談判，3月17日，五國外長在布魯塞爾簽訂為期50年的《布魯塞爾條約》。在蘇聯看來，布魯塞爾條約組織是針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是西方在建立聯盟的道路上又邁出的新的一步。在這種情況下，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在6月14—16日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會議上把各黨代表就進一步發展和平運動需要採取的措施納入了會議的議事日程。這項日程獲得了斯大林的批准。然而，6月14日，政治局決定把這件事推遲到共產黨情報局下一次會議。蘇斯洛夫對這一日程的突然改變作出的解釋是，這些事情是如此的重要，以致需要在共產黨情報局下一次會議而不是在祕書處會議上進行討論。² 這樣，在蘇聯對外政策優先性方面，共產黨情報局就被利用起來，而開展和平運動也被看作自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以來開始的反對鐵托的鬥爭一樣重要。

蘇南衝突的突然爆發影響了共產黨情報局開展的和平運動的進程，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並沒有把和平運動問題列入會議的日程。但是，隨着國際局勢的加劇，西方聯盟的建立加快了進程，1949年1月，北約成立；5月，四大國外長會議以失敗告終，之後，聯邦德國建立。國際局勢的不斷加劇使蘇聯領導人把對外政策的重點放到和平運動上，通過共產

1 日丹諾夫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上關於國際局勢的報告，1947年9月25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第443-473頁。

2 RTsKhIDNI, f.575, op.1, d.80, l.2,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199-200.

黨情報局開展這一運動再次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重視。1949年4月，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請求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向莫斯科提供關於情報局成員對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的會議所做的準備工作。4月15日，巴拉諾夫向對外政策委員會副部長波諾馬廖夫發送了一份68頁的報告，內容是關於各國共產黨為開展和平運動所應做的相應的準備工作。其中強調了建立「為和平而鬥爭的廣泛的戰線」運動的艱巨任務，這一運動要開展的大規模運動包括：遊行、羣眾大會，在共產黨報刊上發佈文章。所有這些工作都同即將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聯繫起來。報告同時指出，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對這次大會的準備工作進行得很晚。在這些國家普遍存在的兩點不足是：大會的準備工作基本是在首都和工業中心進行，而幾乎沒有涉及到農村；對於西歐、美洲和亞洲國家對大會進行準備的過程共產黨報紙報道得很不夠。對法國共產黨的要求是，法國共產黨「事實上不再對會議的召開作準備工作。他們把這一工作委託給了組織委員會中的個別代表」。用這份報告的撰寫者葉菲莫夫的話來說，「法國同志試圖用以下這種方式對這種奇怪的立場進行解釋：這次代表大會不是某個國家的活動，而是國際性的活動。我們和所有與會代表共同參加這次會議，當需要我們提供幫助的時候，我們就提供幫助。」¹

1949年6月14日，在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第一次會議當天，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委託蘇斯洛夫把情報局下一次會議的日程提交祕書處討論，其中提出的首要問題就是保衛和平和同戰爭販子作鬥爭的問題。在這次祕書處會議上，蘇斯洛夫簡短但十分清楚地表達了蘇共關於召開情報局會議和討論列入其日程的那些問題的目的，在談到關於「保衛和平和同戰爭販子作鬥爭」這一問題時，蘇斯洛夫當時強調指出，在會議

¹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62, д.39, л.25,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2.

上討論這個問題，一方面「將大大提高共產黨作為徹底的和平衛士的威信」，即應完成「冷戰條件下」的重要的宣傳職能，另一方面「將提高它們在這一最重要事情上的組織和動員作用」，即這一討論還肩負着激勵各國首先是西方各國共產黨進一步開展羣眾運動「反對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使命。對於完成後一個任務，克里姆林宮賦予它特別的意義。共產黨情報局對各國共產黨在這方面的活動——無論是第一次和平大會期間還是大會過後——都給予了特別的注意。這一路線是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日丹諾夫報告中所含方針的繼續和新的發展。在確定共產主義運動基本而迫切的應投入主要精力的活動的方向時，作為一個最重要的方向，日丹諾夫特別提出了西歐共產黨建立廣泛同盟的任務——這一同盟主要不是以「階級」為基礎，而是在保衛主權和民族獨立、防止「馬歇爾化」和「美國操縱」的口號下，在保衛和平和國際安全、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侵略方針」的口號下建立起來。蘇聯為這一任務確定的戰略方向是：在西方，即在敵人領土上，開展羣眾運動，在形式上是追求愛國主義的和反帝的目的，吸引廣大的居民階層和最廣泛的社會流派和團體，而不僅僅是共產黨。蘇聯領導人顯然是希望通過各共產黨開展的這一運動來削弱西方國家，破壞至少遲滯西方軍事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建立。¹ 在情報局祕書處召開的這次會議上，在討論關於「保衛和平和同戰爭販子作鬥爭」這一日程問題時，與會其他代表表現出了與蘇斯洛夫完全一致的意見。這樣，作為蘇聯對外戰略的新體現，組織「和平擁護者運動」成了共產黨情報局各黨的一項主要任務。

1949年11月，情報局第三次會議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正如情報局祕書處6月會議確定的日程一樣，關於「保衛和平和同戰爭販子作鬥爭」這一問題成了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大會上，蘇斯洛夫在「保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0, л.9;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2, л.19-81, 133-140.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пеще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16-519.

衛和平和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報告中肯定了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對國際局勢的看法，並且指出，「現在由美國和英國的領導者領導的帝國主義陣營實行侵略政策，他們的政策是準備發動新的戰爭」，「北大西洋集團計劃要對東歐民主國家，首先是對蘇聯進行公然的侵略。」按蘇斯洛夫的說法，美國和英國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進行戰爭準備」。與此同時，帝國主義陣營還在思想上加緊進行新的戰爭準備，不斷變換手段來製造社會輿論，用種族思想和敵視人類的思想進行瘋狂的宣傳，以掀起對原子彈和對戰爭的狂熱來麻痹羣眾，極力把一切能夠影響心理的工具，如刊物、書籍、無線電廣播、電影、教堂等都利用了起來。蘇斯洛夫指出，在帝國主義陣營加緊戰爭準備的同時，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也在日益增長和鞏固，在新的戰爭危險日益加緊的情況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擔負着偉大的歷史責任。共產黨和工人黨應該運用一切鬥爭的手段來保證牢固和持久的和平，使自己的全部活動都服從於目前這一中心任務。¹ 在蘇斯洛夫報告之後，法戎、拉科西、貝爾曼等人參與了對這一報告的討論，這些討論表明，情報局各成員都贊成為和平而開展積極的鬥爭，同時反對和平主義。蘇斯洛夫在報告中提出的「和平陣營、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公式得到了其他與會者的支持，這一公式縮小了為和平而鬥爭的「陣線」的基礎。從蘇斯洛夫的發言可以看出，不僅僅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在各國的「直接的幫兇」是和平運動道路上的重大障礙，而且社會民主主義者、天主教大主教、相當部分「沒有覺醒的」農民、敵人在共產黨中的代理也是重大的障礙。²

在對蘇斯洛夫的報告進行討論之後，大會通過了「保衛和平與反

1 蘇斯洛夫在共產黨情報局匈牙利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49年11月16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439-459頁。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2, л.25-26,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3.

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決議，其中具體分析了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基本特點，闡明了國際舞台上存在的兩種根本對立的政治勢力。「帝國主義陣營又積極準備新的世界大戰，實行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擴張，扼殺民主自由，破壞世界和平，消滅社會主義、力圖確立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而社會主義陣營則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略，根除法西斯殘餘，保衛和平、民主和自由，保衛各民族的獨立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決議指出，二戰結束以來，由於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與鞏固、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以及由於各國共產黨領導的和平民主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廣泛發展，歐美澳三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高潮。在帝國主義陣營內部，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襲擊着整個帝國主義世界，加深了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這就不能不促使帝國主義力圖通過戰爭來改變歷史的進程。因此，戰爭的危險是嚴重存在的。這一決議還進一步指出，美帝國主義在大力扶持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企圖使其東山再起，並變英法為自己發動戰爭的幫兇。同時，美國通過社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建立西歐聯盟和北大西洋軍事組織，大搞軍備競賽，瘋狂地進行原子訛詐，歇斯底里地進行戰爭叫囂，因此，決議號召各國人民保持足夠的警惕。情報局決議還揭露了右翼社會黨人的叛賣活動，指出他們為了奪取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利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詞藻，打着在「兩條路線上行動」和「第三種勢力」的口號，進行騙人的「均勢」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宣傳，極力掩蓋帝國主義戰爭政策的本質。法國的勃魯姆、拉馬迪埃，英國的艾德禮、貝文，德國的舒馬赫，奧地利的倫納、塞爾夫，意大利的薩拉金特等都是鑽進工人內部的分裂主義者，他們是第二國際死灰復燃的產物。根據上述情況，情報局號召各國共產黨勇於堅定地舉起民族獨立、民主自由和保衛世界和平的旗幟，努力統一工人階級隊伍，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為粉碎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維護世界和平而鬥爭，為保

衛各國人民的民主、自由、獨立和國家主權而鬥爭。決議特別指出，工人階級隊伍的團結和統一，是保證這一鬥爭獲得勝利的前提條件，是統一戰線的堅強領導核心。必須集中全力做好這一工作。¹

為更好地完成這一工作，在「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決議中，共產黨情報局為各共產黨和工人黨列舉了八項任務：

1、必須更加堅決地在組織上鞏固和擴大和平運動，接連不斷地把一批一批的民眾吸收到這一運動中來，使這一運動變為全民運動。必須特別努力設法把工會、婦女團體、青年團體、合作社組織、體育組織、文化教育組織、宗教組織等等，以及一切主張保衛和平和反對戰爭的學者、作家、新聞記者、文化工作者、國會議員及其他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們吸收到和平運動中來。今天特別重大的任務，就是要在和平與反對業已來到人類面前的新戰爭威脅這一最廣泛的鬥爭綱領上，不分宗教信仰、政治觀念和黨籍而把一切誠心擁護和平的人團結起來。

2. 為了進一步發展和平運動，工人階級要更加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工人階級的團結及其隊伍的統一，則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頭等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把工人階級的最廣大的階層吸收到和平戰士的隊伍中來，建立工人階級的牢固統一，在為和平與本國民族獨立而奮鬥的共同行動綱領基礎上組織無產階級各個隊伍的聯合行動。

3. 只有堅決地反對分裂和破壞工人運動的右翼社會黨人，才能爭得工人階級的統一。右翼社會黨人、執行分裂主義和反人民政策的人，是工人階級統一運動的主要敵人，是戰爭挑撥者的幫兇，是藉助於假社會主義的和世界主義的詞藻來掩蓋其叛徒行為的帝國主義的奴僕。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在不倦地為保衛和平而鬥爭時，應該時時刻刻揭露右翼社會黨領袖這些和平的死敵們所

1 張月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長編》第四卷（1945—1955），第310—311頁。

起的作用。必須盡力發展和鞏固與各國社會黨基層組織及其黨員羣眾在行動上的合作和統一，支持黨員羣眾中一切真正誠實的分
子，向他們說明右翼反動領導人所執行的政策的災難性質。

4.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應該廣泛地宣傳各國人民間的牢固的和持久的和平，不倦地揭露各種侵略聯盟和軍事政治聯盟（首先要揭露西歐聯盟和北大西洋聯盟），來對抗那些力圖把歐亞各國變為流血戰場的侵略者所進行的仇恨人類的宣傳；必須廣泛地解釋說：假如爆發新的戰爭，那就只會使各國人民遭受嚴重的災難和極大的破壞；反對戰爭和保衛和平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事業。必須使美、英帝國主義宣傳戰爭和鼓動各民族之間仇怨的行為遭到每一個國家全體民主輿論的嚴厲譴責。必須使新戰爭宣傳者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真正的和平擁護者的回擊。

5. 廣泛運用各種已經完全證明有效的動員羣眾擁護和平的新方式，例如在城鄉中建立和平委員會，寫請願書和抗議書，舉行民意測驗（這一方式在法國和意大利兩國已經被廣泛地採用過）。同時印行和散佈各種揭發準備戰爭行為的書籍，募集保衛和平的基金，組織大家抵制那些宣傳新戰爭的電影片、報紙、書籍、雜誌、無線電廣播公司、團體。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和工人黨最重要的任務。

6. 資本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職責，就是要把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與爭取和平的鬥爭結合起來，不倦地揭露那些已經變為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走狗的資產階級政府所進行的叛國賣國政策，要在「消滅甘受美國壟斷組織盤剝的可恥政策，轉而實行符合本國民族利益的獨立的對外對內政策」的口號下，把國內一切民主愛國分子統一和團結起來。必須動員各資本主義國家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去捍衛自己的民主權利和自由，不倦地向他們解釋：保衛和平是與保衛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是與保衛他們的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利密切相聯繫的。法國、意大利、英國、西德及其他各國共產黨負有重大的任務，因為美帝國主義者想要

利用這些國家的人民充當其侵略計劃的炮灰。這些共產黨的職責就是要用更大的努力來開展保衛和平與挫敗英、美戰爭挑撥者的罪惡陰謀而進行的鬥爭。

7.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以及蘇聯共產黨的任務，除了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挑撥者及其幫兇而外，同時還要為了保衛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使和平與社會主義陣營更加鞏固。

8. 美、英帝國主義分子把實現自己的侵略計劃，特別是在中歐和東南歐實現侵略計劃的相當重大的任務，交付給那個為帝國主義分子當間諜的鐵托民族主義集團。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任務，要求更進一步地去揭發這個已經投往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死敵的營壘、即投往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營壘中去的匪幫。¹

在情報局會議上，蘇斯洛夫在「保衛和平和同戰爭販子做鬥爭」的報告中發展了兩個主要論點。第一，按照馬列主義理論，戰爭是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矛盾的手段；第二，廣泛的抗議運動可以、也應該成為西方國家擴張道路上的障礙。按照這一思想方針，共產黨情報局開展了廣泛羣眾簽名運動，號召在關於禁止使用原子彈的斯德哥爾摩呼籲書（1950年）和世界和平委員會關於締結五國公約的柏林呼籲書（1951年）上簽名，以及其他及其他類似的活動。在這一過程中還謹慎地使用了製造社會輿論的手段。例如，阿巴庫莫夫向斯大林報告說，國家安全部成功地說服了英國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站到蘇聯方面，在《真理報》上發表關於蘇聯愛好和平的政策和北大西洋同盟侵略性的聲明。² 這份聲明刊登於1949年4月22日，正好是巴黎世界和平大會會議期間。

1 情報局會議關於「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決議的討論記錄，1949年11月18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605-607頁。
2 參見：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1-314.

為了了解情報局各成員對情報局會議通過的「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決議的執行情況，1950年4月20—21日召開了情報局祕書處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蘇斯洛夫宣稱，國際力量的對比仍然是有利於帝國主義陣營，他提醒說，1949年情報局會議提出的「為牢固而持久的和平而鬥爭，把和平力量組織和團結起來反對戰爭力量應該成為當前共產黨和民主組織的中心工作」這一命題具有重大意義。為了為和平而鬥爭，蘇共將繼續致力於加強蘇聯的經濟力量，發展工業、農業和文化——這些是全世界和平的支柱。蘇斯洛夫把「戰後蘇聯國內經濟恢復的基本完成」稱之為「蘇聯經濟發展的主要成果」，而「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中，在對外政策上提出的主要口號是為牢固和持久的和平而鬥爭」，其任務是依靠所有愛好和平的力量，把這些力量統一起來，使戰爭不再可能。蘇斯洛夫認為，在斯德哥爾摩和平呼籲書上收集簽名成了為和平而鬥爭的這個環節的「中心一環」，抓住這一環節，共產黨和民主組織就能夠「真正地擴大和加強和平運動，把數千萬和上億的人吸引其中，把這一運動提升到新的、更高的層次。」開展的在禁止使用原子彈的呼籲書上徵集簽名的運動被蘇斯洛夫稱為「成功的形式」，在他看來，這一運動可以動員各年齡階段的人們，同時「給予帝國主義陣營最大的打擊，揭露他們的侵略計劃，使戰爭販子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遭受孤立。」但是，蘇斯洛夫同時指出，在一些黨，特別是在非情報局黨中，徵集羣眾性的簽名工作還沒有開始，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報刊還沒有刊登斯德哥爾摩呼籲書。蘇斯洛夫稱讚法國共產黨在保護和平運動中的「大躍進」，稱讚和平委員會在實踐中開始進行的收集簽名的工作。他就此指出，在大多數國家，對斯德哥爾摩會議決議的執行都進行得很晚。¹

蘇聯領導人顯然是擔心許多西方國家的共產黨人在和平運動中採取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0, л.5,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3-144.

消極的態度。因此，蘇斯洛夫在發言中就開展和平運動提出了下列任務：在共產黨的下級黨組織組建保護和平委員會；從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各抽調 1—2 名具有國際工作經驗和組織能力強的同志到世界和平委員會工作；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黨面臨的任務是：為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開展和平運動提供幫助，其中可以利用同上述某國的居民的聯繫（美國的斯拉夫人、加拿大的法國人等等），以及國際組織的、工會的、文化的和其他組織的關係。蘇斯洛夫提議加強鬥爭，反對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的關於戰爭不可避免的和對戰爭的危險估計不足的思想。在蘇斯洛夫看來，這兩種思想都是「帝國主義集團及其幫兇煽動起來的」，其目的是「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瓦解我們的黨，使其產生消極情緒，無所作為和放任自流」，以此來使「戰爭販子的任務更加容易得逞」。蘇共代表還建議，「堅決推廣列寧和斯大林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和平共處是可能的這一思想。」共產黨人的宣傳要使勞動人民相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同時，共產黨人要認識到，忽視戰爭的危險會給世界和平擁護者的運動帶來的巨大危害。¹

在這次祕書處會議上，日丹諾夫除了重複他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的一些講話的同時，還說了一些新的東西，比如，他兩次談到了兩大體系間的和平競賽，批評了關於必然會爆發戰爭的言論的「宿命論色彩」，並提請人們注意蘇聯媒體於 1950 年 4 月 22 日發表的報道。在這一天，蘇聯媒體首次發佈了 1920 年的兩份文件，在這兩份文件中列寧談到了關於蘇維埃俄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可能性。²

在蘇斯洛夫發言之後，情報局其他成員分別報告了對情報局上一次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0, л.8-10,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5.

2 RTsKhIDNI, f.375, op.1, d.120, l.13,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 202.

會議關於「保衛和平與反對戰爭挑撥者的鬥爭」的決議的執行程度。匈牙利勞動黨代表格羅指出，匈牙利勞動黨政治局中央定期對和平運動的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在報刊和廣播上對情報局決議進行大規模的宣傳。在城市和農村組織大規模的羣眾集會。把基督教新教教會以及天主教教會的人士都吸引到保護和平的運動中。匈牙利勞動黨努力在世界工聯、國際婦女民主聯合會以及世界青年民主聯合會開展工作。隨着情報局決議的發表，匈牙利共產黨人「在限制敵人在匈牙利進行帝國主義的戰爭宣傳和歪曲宣傳的工作中採取了重大措施」，「把美國及其他類似的反動電影都完全取消了」，「制止了資本主義的報刊和出版物在國內的散播，禁止從國外輸入這些報刊和作品」，「努力增強我們反帝國主義宣傳工作的影響。」¹

在匈牙利共產黨代表格羅發言之後，基什尼奧夫斯基（羅馬尼亞工人黨）、馬祖爾（波蘭統一工人黨）、波普多莫夫（保加利亞共產黨）、施韋爾莫娃（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也分別就本黨對情報局上一次會議決議的執行情況進行了通報。其通報的內容都大致相同：關於各級黨組織都積極參與到保護和平的運動中；關於在黨的直接領導之下以及共產黨員的參與下組建的和平擁護者委員會工作；關於共產黨人在各階層的居民中以及在羣眾性的社會組織中開展相應的解釋工作中起到的作用；關於在黨組織的領導之下，人民民主國家通過選舉組成的和平擁護者委員會把爭取和平的鬥爭同完成具體的經濟計劃等任務結合起來，貫徹了關於「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取得的經濟成就會鞏固世界和平的思想。從東歐各黨代表的發言來看，東歐各國的教會，特別是天主教教會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保護和平的運動的態度是不同的。特別是波蘭代表在情報局祕書處會議上談到了他們較大的不安，表示希望創造「較為有利的條

¹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0, л.11,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5-146.*

件繼續限制教會在羣眾中的影響」。東歐國家共產黨代表在這次祕書處會議上的發言還揭示了他們在組織和平運動中的不足。比如，在羅馬尼亞，一些保護和平的委員會搞亂工會的工作，開展「社會主義競賽」。保加利亞爭取和平的鬥爭具有時緊時鬆的特點，「沒有同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日常工作及其組織的日常活動結合起來」。波蘭共產黨人代表在大會上進行的自我批評表明，他們不能很好地在社會的各級階層中反對戰爭販子通過諸如「美國之音」和「BBC 電台」進行的宣傳。¹

法共和意共代表在這次祕書處會議上的報告則顯示了他們開展的和平運動所具有的另外一種特點。法戎談到了「馬歇爾計劃對法國經濟造成的災難後果」、關於美國把其增長的軍費開支強加給法國、關於「由於實行戰備政策，勞動人民所受剝削的加強」、關於違背民主權利和自由的現象等問題。法戎主要闡述了法共中央 1949 年 12 月全體會議工作，這次會議討論了法共代表在情報局會議上作的報告。他指出，法共中央的主要錯誤在於對戰爭的危險估計不足，同時一些人沒有看到由於和平力量的團結和鬥爭使得預防戰爭成為可能。法共中央重申「法國人民堅決任何時候都不會同蘇聯作戰」。共產黨人把為爭取實現最近的要求同爭取和平和自由的一般鬥爭結合起來，在他們組建的保護和平委員會中積極行動。在法國，反對準備反蘇戰爭的鬥爭同反對在越南進行戰爭的鬥爭結合了起來。同時，法戎還進行自我批評說，在法共內存在的「宗派主義的殘餘」阻礙了法國工人運動的統一。正如法戎一樣，意大利共產黨代表謝佳也主要講述了在情報局 1949 年會議召開後不久馬上就召開的意共中央代表大會工作，闡述了意共怎樣把在國內開展收集「和平責任」的簽名同爭取勞動和自由的鬥爭聯繫在一起。在根據意大利共產黨和平擁護者民族委員會的倡議而組織的數千次會議中選舉了代表，以便向自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л.120, л.18,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6-147.

治市政府委員會和議會遞交內容為「五項和平條款」的請願書。這些會議成了「真正的人民的會議」，「工會、合作社、婦女組織、青年組織、農民組織、老戰士組織以及其他的組織都參與了這些會議。」在此之後，「五項和平條款」被予以討論，並被三千多自治市政府所接受（佔意大利自治市政府的40%）。在一些省，大部分市府顧問都投票接受「和平責任」。用謝佳的話來說，在市府委員會進行的投票以及後來在國民會議進行的投票證明，存在由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天主教徒和共和黨人聯合組成的統一戰線的範圍內開展政治性的和平運動的良好時機。如果說1949年意大利和平擁護者委員會的活動主要限於宣傳和平和收集簽名，那麼，1950年，這一活動的特點是進行規模龐大的羣眾活動、罷工、反對戰爭的示威遊行，其中包括反對意大利政府在1949年12月召開的外長會議上接受戰爭義務而進行的示威遊行。在談到意大利勞動人民為反對美國增加軍備的政策而進行鬥爭的時候，謝佳指出了這一鬥爭面臨的艱難條件，而首先在於大規模的失業。在談到意大利保護和平運動的弱點的時候，謝佳指出，這些弱點是：「對戰爭危險的估計嚴重不足」，「在黨的隊伍中存在宗派主義的殘餘」，「在無業遊民和軍隊中開展的工作存在不足」，為爭取和平進行的宣傳不經常進行、宣傳的內容也不具體。¹

這次會議的最後通過的決議提醒共產黨必須集中精力解決三個主要任務：1. 開展羣眾性的運動，在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呼籲書上收集簽名，該呼籲書呼籲禁止核武器，對禁止原子武器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國際監督，並宣佈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府為罪犯。2. 準備在1950年召開世界和平擁護者第二次代表大會。3. 工人階級和所有的和平擁護者都加強鬥爭，反對戰爭販子從事的同北大西洋條約和其他的侵略計劃有關的計劃。為實現這些任務祕書處例舉的具體措施可以劃分如下：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0, л.50,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 147-148.

在範圍最廣的居民中，特別是在農民中間收集在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呼籲書上簽名；吸引羣眾性的社會組織和一些共產黨參加這一工作；利用簽名運動加強現有的和平擁護者委員會並組建新的和平擁護者委員會；在黨的報刊上和通過無線電廣播加強反戰宣傳；通過生活在美國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烏克蘭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和說法語的加拿大人的關係，在美國和英國開展收集簽名運動。情報局祕書處會議為各成員規定的首要任務是，開展羣眾性的運動，在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呼籲書上收集簽名，協調這場運動便成了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中心。正如檔案材料所顯示的，1950年代，共產黨情報局繼續收集關於共產黨在和平主義者民族運動中的活動的情報和材料，並把它們送往莫斯科。¹

值得指出的是這次祕書處會議沒有按照原先的計劃在6月份召開，而是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在4月份提前召開，這是由於在4月份已經開始了收集簽名的運動。由此可見蘇聯領導人對開展這一運動的重視。

蘇聯領導人賦予在禁止使用原子彈的呼籲書上簽名的和平運動如此重要的意義不是偶然的。在西方聯盟建立的同時，西方國家也在加緊對蘇戰爭的準備，其中包括核戰爭。來自情報部門的消息，使斯大林得知了美國和英國準備進攻蘇聯和對蘇聯城市實施原子攻擊的計劃，特別是根據對外情報部門的情報，1949年底，美國已經基本完成了氫彈的研製。² 雖然蘇聯在1949年8月進行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實驗打破了美國對原子彈的壟斷，但沒能造成東西方較為穩定的核平衡。在斯大林的眼中，美國發現蘇聯進行這樣的試驗，情況確實變得更加危險。1950年1月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0, л.57; л.112,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48-149.

2 *Лебедев С.Н. (гла. ред.)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 В 6 тт. Т.5, 1945-1965 годы*,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3, с.41.

底，杜魯門已經公開決定進行氫彈試驗，蘇聯領導人開始擔心美國的對蘇政策會更具侵略性。1949年11月6日，蘇斯洛夫說，由於蘇聯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了偉大勝利，因此美國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在研製氫彈。他警告說，美國這種好戰行為旨在改變目前正在逐漸有利於蘇聯的實力均勢，它可能導致西方對東歐、共產黨中國和北朝鮮發動進攻。¹而斯大林在原子彈政策上的一個原則就是假設美國會使用原子彈對蘇聯進行恐嚇，迫使蘇聯讓步。²

為了制止西方國家發動核戰爭，1949年11月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指出，和平運動的一項重點是，通過發廣大羣眾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的感情，來削弱西方因壟斷原子武器而在政治上所佔的優勢。蘇聯領導人顯然是希望利用和平運動對西方國家在使用原子彈問題上施加壓力。

四、對和平運動的評價

蘇聯開展和平運動，是基於這樣一種希望：通過向人民灌輸和平思想，利用人民的反戰情緒對西方國家的政府施加壓力，消除戰爭的危險，為蘇聯的經濟建設贏得時間。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西方國家的侵略勢力「懼怕他們本國的人民，因為他們的人民不要新的戰爭，主張維護和平」，「如果各國人民將維護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並且把這一事業進行到底，和平就能夠保持和鞏固。如果戰爭挑撥者用謊言迷惑了人民羣眾，欺騙了他們，把他們捲入新的世界大戰，那戰爭就會成為不可避免」，「因此，廣泛的維護和平的運動，作為揭露戰爭挑撥者罪惡陰謀的

1 拉弗貝：《美蘇冷戰史話（1945—1975）》，第99頁。

2 Holloway, David, *Stalin and the Bomb*, p.272.

工具，現在具有頭等的意義。」¹ 正如 1949 年 4 月 24 日《消息報》上發表的一篇評論中所說的那樣：

蘇聯強調把美國和英國的老百姓同戰爭販子區別開來……這反映了這樣的希望：人民對戰爭的厭惡能促使西方各國政府改變它們的計劃，從而為重新召開高級會議、設法解決世界緊張局勢創造條件。²

應該說，蘇聯的這一戰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比如，1949 年秋，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上就爭取和平鬥爭問題發出的呼籲雖然帶有明顯的政治性質，但主要具有的是宣傳的意義。它們不僅應該嚴格突出新的主要敵人的形象，而且應該使任何國家的居民都能經常感受到新的戰爭威脅。共產黨情報局進行的反西方的宣傳運動取得了一定的勝利，通過對「帝國主義的罪惡」，「西方的生活方式」的揭露，對於歐洲、特別是東歐各國多數居民來說，「資本主義體系的現實罪惡」（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失業）已經是歷歷在目了。一方面通過對美國及其盟友的揭露——揭露它們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挑撥者」，另一方面號召所有進步力量團結起來為保衛和平而鬥爭，反對發動新的戰爭，這種宣傳給地區各國居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³

蘇聯針對西方國家加緊「復活西德軍國主義，建立德國軍隊和吸引西德加入北大西洋集團」而提出的一些建議，其中包括建議召開緊急會議，準備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政府同德國簽訂和平條約的聯合呼籲書；建議在簽訂和平條約之後撤出所有佔領軍；建議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選舉國民議會，建立民主的愛好和平的德國，召開有兩個德國的代表

1 劉同舜、姚梧齡主編：《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3 年（第八分冊）》，第 227 頁。

2 托馬斯·沃爾夫：《蘇聯霸權與歐洲 1945—1970》，第 30 頁。

3 參見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334-336.

參加的會議，禁止德國軍國主義化，不允許它參加任何軍事政治集團等建議對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社會輿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法國駐莫斯科大使蓬塞在向法國外交部提交的報告中指出，蘇聯所採取的阻止西德加入西方國家防禦體系的步驟在德國居民中產生了良好的反響。因此蓬塞認為，蘇聯的這類戰略對西方國家是個威脅。¹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更多地把蘇聯發動的這場和平運動看作是蘇聯向「自由世界」發動的宣傳攻勢，同時認為這一運動會對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等國政府產生一定的政治影響。1952年8月22日制定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35號文件附件的報告中寫道，蘇聯憑着「在世界範圍內精心設置的宣傳機器」，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旗手和值得讚美的、能夠解決眾多社會、經濟問題的先鋒」，「巧妙地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的陣線組織……掀起『和平』運動，鼓吹裁軍和禁止使用摧毀力極大的武器。通過動員這些有廣泛羣眾參與的壓力集團，或打入關鍵性的團體組織和政府部門，他們可以影響官方政策。此種情況目前在法國和意大利尤為嚴重，日本不久亦將如此」，「在衝突爆發時，克里姆林宮也許會擺弄局勢，縱橫捭闔，使人們覺得戰爭似乎是不必要的，戰爭是西方領導人違背本國人民利益製造出來的，以達到損害自由世界精誠團結和戰鬥意志的目的。」²此外，美國政府還把斯大林發動的維護和平的運動看作是企圖迫使西方放棄自身的「防禦」。³

在企圖通過和平運動對西方各國政府施加壓力的同時，蘇聯希望的仍然是緩和國際局勢，使兩大體系和平共處，為蘇聯的建設贏得時間。

1 РЦИДНИ, ф.82, 轉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307-308.*

2 FRUS, 1952-1954, Vol2,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Pt.1, p95, 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 1952年（第七分冊）》，第269頁。

3 Marcou, *Le Kominform*, p.113-119,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204.

蘇聯於 1949 年底 1950 年初還暗示說，它有意通過高級談判來解決分歧。雖然不曾籌備召開首腦會議，但斯大林至少已使西方國家了解，他已準備謀求緩和因冷戰所引起的歐洲緊張局勢。他通過蘇聯報紙發表的官方聲明，進一步表明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態度，這一官方聲明說：蘇聯的政策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長期共存的不可避免性」之上的。¹ 蘇聯領導人轉變這種態度的目的不但在於應對西方聯盟日益建立的趨向，而且也是為了使蘇聯可以更好地應對自己在東歐的處境，儘管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之後蘇聯在加速使東歐各國成為蘇聯衛星國的進程，但要使該地區成為蘇聯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卻證明並不是那麼順利的，斯大林想要贏得一個喘息的時間。此外，蘇聯還需要爭取時間，以便在技術和工業方面作出一番重大的努力，來改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力量對比，使之長期對蘇聯有利。² 鑒於蘇聯並沒有通過和平運動達到阻止西方集團建立的目的，簽名運動收效甚微，戰爭的威脅仍然存在。面對這種情況，蘇聯採取了加快軍事工業綜合體發展的方針，使蘇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另一方面，面對西方聯盟的建立和不斷加強的趨勢，蘇聯通過和平運動的方式，而不是針鋒相對地直接採取加強緊張局勢對抗的方針，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國際局勢，使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得以保持「冷和平」的狀態。

蘇聯發起的「爭取和平運動」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佔據着重要位置，它有着具體的階級目的，是蘇聯建立廣泛的社會政治聯盟這一意圖的組成部分，其目的是從內部給西方聯盟以打擊。蘇聯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一次特別的祕密會議中作出決定，把在西方國家建立親蘇的羣眾組織確定為蘇聯優先考慮的對外政策之一，並不允許質疑開展這一運動的必要性，也不允許質疑這類組織能從內部影響西方國家政治局勢的重要

1 Правда, 28 марта 1950г.

2 托馬斯·沃爾夫：《蘇聯霸權與歐洲 1945—1970》，第 30-31 頁。

性，並得出結論：

目前進一步開展和平運動的真正障礙是：在許多國家，這一運動仍然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和平運動常帶有狹隘的黨派性質，一些共產黨拒絕吸收非共產黨人士與組織參加這一運動，而這些人是可以參加和平運動的。

斯大林在 1952 年 10 月發表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指出，「現代和平運動的目的在於激起人民羣眾捍衛和平的鬥爭，防止新的世界大戰。因此，其目的在於為保衛和平和爭取民主而鬥爭，並不是要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¹ 因此，這一運動仍然首先是為蘇聯的對外政策服務的，而並沒有考慮到所有國家工人運動發展的需要。在共產黨情報局發起的簽名運動收效甚微，和平主義政策的作用又不大的情況下，一些國家的共產黨走向了另一極端，把爭取和平的運動變成了反美運動，甚至在基本的政治條件不具備時進行街頭暴力活動。法共組織的反對美國將軍李奇微訪問巴黎的示威就是一例。示威的結果只是表明，法共是孤立的，工人並不響應這種抽象的反美運動。²

1 《斯大林選集》（下卷），第 565-566 頁。

2 參見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下，第 286 頁。

第五章 共產黨情報局組織機構的建立 與職能的擴大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過程表明，在建立情報局問題上，蘇聯領導人事先並沒有完全成熟的想法，情報局第一次會議雖然規定了情報局要出版一份雜誌，但並沒有就組建編輯部問題作出最終的決定；雖然規定情報局具有協調的職能，但是並沒有就建立起相應的機構作出具體的規定。為完成情報局第一次會議確定的這些任務和職能，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後不久組建了編輯部，並建立起了負責情報局日常工作的秘書處。而且，隨着國際局勢的發展和蘇聯對外政策的需要，情報局的職能在不斷擴大。

一、共產黨情報局編輯部的組建及其職能的擴大

（一）編輯部的組建與蘇聯領導人擴大其職能的嘗試

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並沒有就怎樣組建編輯部和怎樣組織出版報紙等相關問題作出最終的決議，只是通過了哥穆爾卡提出的如下建議：把組建編輯部的事宜委託給「蘇共中央委員會和情報局總部所在國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理」，在 11 月份或最遲不晚於 1947 年 12 月 15 日召開的情報局下一次會議上確定編輯部的成員。¹ 根據這一建議，編輯部應該

1 Procacci G.,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1947/1948/1949*, p.358-360.

由蘇共和南共的領導人負責組建。實際上在這一工作中起主導作用的是蘇聯領導人。1947年10月7日，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貝爾格萊德共產黨情報局出版機構工作人員的決議，規定向應該成立的編輯部派去一批蘇聯代表「擔任領導工作」。尤金被選中擔任這一角色，並被派往貝爾格萊德。與尤金一起被派去的還有宣傳部的格里戈良和舒米洛夫，以及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的斯特魯奇科夫、葉菲莫夫和舍夫利亞金。蘇共中央政治局決議還規定，尤金以及其他被調往貝爾格萊德編輯部的蘇聯代表應同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和對外政策部副部長巴拉諾夫一起在5天的時間內向政治局「提出關於情報局機關報的出版計劃和出版綱領」，以及更為具體的關於出版頭3—4期報紙的意見。之後，根據尤金後來對波蘭工人黨中央國際部部長德魯斯基所講的消息，日丹諾夫和尤金專程來到斯大林那裏停留了5天，討論了關於所要出版的刊物的方針和性質以及關於編輯部幹部的組成等問題。這次會談之後，斯大林對關於組織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的所有基本問題都下達了指示，其中包括出版物應為報紙。斯大林為報紙確定了名稱。根據斯大林的指示，蘇共中央於10月16日通過了關於貝爾格萊德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出版綱領、程序和頭幾期出版計劃的決議。其中規定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為報紙，名稱為《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並且還根據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文件裏所闡明的那些任務確定了該報的基本選題方向，確定了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的規格和印數（俄文版4萬張，法文版和英文版各3.5萬張），還決定了編輯部的結構及其領導人員，除尤金外，還具體談到了副主編的任命，責任祕書和各處室主任的任命。¹

在組建情報局編輯部問題上，南斯拉夫領導人只是努力完成莫斯科

1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66, л.59;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66, л.59; ААН, зєсп.КС PPR, 295/VII-247, к.87, 轉引自 *Гибня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39.

制定的計劃。在蘇聯代表發給蘇共中央的密電中報告說，南斯拉夫人為組建編輯部提供了舒適的樓房，從南共中央報紙《戰鬥報》印刷廠撥出了必要的生產設備。在10月24日以尤金為首的16名蘇聯工作人員小組由莫斯科飛抵貝爾格萊德之後，南共主要領導人就緊密地配合他們的工作。在編輯部幹部任命問題上，南共方面也完全同意蘇方提出的建議，同意蘇共作出的任命尤金為主編的決定。¹

10月底在貝爾格萊德召開的共產黨情報局各黨中央代表會議確定了蘇聯代表在編輯部中的主導地位。正如蘇聯領導人所預計的，尤金正式擔任了報紙主編輯的職務，而他的副職是格里戈良、季赫爾、以及昂熱（負責法文版）和克拉米諾夫（負責英文版）。季赫爾和昂熱的任命符合卡德爾和吉拉斯提出的關於任命南斯拉夫人和法國人為副主編的建議，該建議在蘇共中央政治局10月16日作出的決議裏已事先得到了認可，但該決議規定的副主編不是兩人，而是4人，其中兩人是蘇聯代表。在編輯部其他領導人員中，蘇聯代表也佔絕對的優勢。按照10月16日的決議，莫斯科派來的人佔據了責任秘書職位（舒米洛夫）以及編輯部幾乎所有科室領導職位：公共政治處——尤金，共產黨工作經驗交流處——葉菲莫夫，理論處——斯特魯奇科夫，新聞處——舍夫利亞金。唯一例外是南共代表戈爾希奇被任命為編輯部委員和「民主運動研究」處處長。²

在這次共產黨情報局各黨中央代表會議上還通過了蘇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16日的決議中規定的制度：每一個參加情報局的黨的中央都應該委託該黨一批負責人員經常同編輯部合作，充當編輯部的通訊員和作

1 АЈ-цК СКЈ, IX, 119/V-34, л. 3-7; 12-12об., 轉引自 *Губи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37-338.

2 ААН, зesp.КС PPR, 295/VII -247, к.86-87; АЈ-цК СКЈ, IX, 119/V-34, л.12-12об., 轉引自 *Губи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40.

者，還應該任命一名能夠長期工作的情報員，經常給刊物撰寫關於本國生活和本黨活動的簡要報告，而且該黨還要抽一名領導人專門負責此項工作。在會上，與會者都提出了本黨擔任此項工作的可能人選的名單，而最後的決定還待本黨政治局批准。蘇聯方面提出，在那些經常向編輯部供稿的人員中，通常應有該黨一名到幾名政治局委員，並且指出，在經常向編輯部供稿的蘇方人員中有日丹諾夫、沃茲涅先斯基和其他政治局委員，蘇共也希望其他黨的領導人也能參加辦報工作。由此可見，這次貝爾格萊德會議只是對蘇聯領導人預先決定的重複。但這次會議的意義在於，克里姆林宮動員情報局其他黨的領導人支持編輯部，首先是為報紙提供材料。¹從中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對情報局機關報工作的重視。

貝爾格萊德會議之後組建的情報局機關報臨時編輯部，在完成前三期報紙的出版工作之後，仍然在繼續工作，直到12月15日克里姆林宮作出了關於情報局報紙常設編輯部組織的決議，其中規定「在1月上旬召開九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每黨派兩名代表參加，專門研究情報局報紙常設編輯部的組織問題」。這樣，組建常設編輯部的問題就被提了出來。在蘇共中央12月15日的決議中，尤金和格里戈良被任命為蘇共駐情報局的代表，並且提出了蘇共關於組織常設編輯的具體計劃：各黨共9名代表組成編委會，1名主編，3名副主編，1名編輯部責任秘書。根據蘇共中央的提議，1948年1月18日在貝爾格萊德郊區召開了情報局秘書處會議，結果通過了蘇聯方面所擬定的計劃，尤金再次被任命為主編，批准了3位副主編和編輯部責任秘書的任命，除克拉克米諾夫被免職外，格里戈良、季赫爾、昂熱繼續留任副主編，舒米洛夫留任責任秘書。²

1 SUA, F, 100/24, sv.91, a.j.1087, s.6-7; AAN, zesp.KC PPR, 295/VII-247, k.86-87; ЦДА-ЦІА, ф.1, оп.6, а.е.372, л.1; AAN, zesp.KC PPR, 295/VII-247, k.87,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41.

2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68, л.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52, л.2, 6,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42-343.

情報局機常設編輯部組建之後，它實際上還起到了協調中心的作用。雖然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各黨代表最終都同意了使情報局具有協調中心職能的建議，但是會議並沒有就這一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而且，第一次會議之後，蘇聯方面並沒有打算在近期召開新的會議，建立協調中心，而是繼續集中精力進一步擴大受莫斯科操縱和成為共產黨情報局唯一常設機構的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編輯部的活動，並試圖賦予這一機構協調中心的職能。因此，從情報局編輯部的成立到第二次會議之前，它的作用不僅是重要的思想宣傳的喉舌，而且還是協調和統一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活動的組織工具，同時還起着共產黨情報局實際總部的作用。為了使編輯部完成這一協調職能，需要編輯部同情報局各成員和蘇共中央建立內部的雙邊無線電通信，因此，尤金於1948年1月向蘇斯洛夫提出了在貝爾格萊德建立無線電中心，保證蘇共中央和情報局其他成員進行祕密的雙邊聯繫的建議，並提議在報紙編委會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再以主編的名義把它正式提交給蘇共中央。¹顯然，尤金的這一提議得到了蘇斯洛夫的讚許，因為在3月3日由巴拉諾夫和尤金署名的呈送給日丹諾夫和蘇斯洛夫的報告中，不僅以編輯部的名義，而且以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的名義重複了在貝爾格萊德建立無線電中心，以保障同共產黨情報局各黨通信的建議，但這份報告只涉及到了東歐各黨，而未提及法共和意共。報告還通報說，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都同意與編輯部建立這種通信聯繫，南斯拉夫政府同意在貝爾格萊德建立這一無線電中心。² 蘇南衝突的爆發阻礙了這一計劃的實現。都是，隨着情報局總部和編輯部搬往布加勒斯特，這一計劃被重新提出。1948年11月，蘇聯政府通過了

1 參見 *Адибег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9.

2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36, л.1-4, 轉引自 *Адибег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90.

關於在布加勒斯特以北 38 公里的地方建設「特別設施」的決議，這一特別的設施就是無線電台發射站，該發射站在 1949 年 1 月 15 日投入使用。¹

（二）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成為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雜誌

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之前，在醞釀成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時候，蘇聯領導人和其他一些共產黨代表討論了關於出版雜誌的問題，但是並沒有涉及到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相關問題。1947 年 6 月底，莫洛托夫和吉拉斯討論了關於「必須出版一份有統一編輯部和統一觀點的理論雜誌」的問題，理由是「西歐和東歐各共產黨之間缺少協調」。² 7 月 16 日，經莫斯科讚許（或草擬）而後由哥穆爾卡簽字並發給將要出席情報局會議的 8 個共產黨領導人的邀請信中寫道，會議的目的是，討論歐洲各兄弟黨面臨的問題，交換有關一些國家情況的情報，交換意見。並且，不追求成立某種國際工人運動機構的目的，不含成立闡述某些國家工人運動問題的雜誌。「通過親自接觸和交流經驗，能促使我們各黨思想接近，幫助各黨解決現實的具體的問題。」³ 從這份邀請信的內容來看，會議只是討論兄弟各黨面臨的問題，要解決的也只是一些現實的具體問題，而不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

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前夕，蘇共中央也沒有打算把共產主義運動問題作為這次會議討論的一項主要內容。1947 年 8 月 15 日，在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對出席會議的蘇共代表下達的指示中，提出的會議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是：反對馬歇爾計劃；關於德國的國家制度和經濟制度；關於各國共產黨對蘇聯和蘇共的態度；關於共產黨行動的協調和相互提

1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90.*

2 *Djilas M., Rise and Fall, New York, 1985, pp.126-127, 轉引自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23.*

3 *РЦХИДНИ, МЖ. (原文標注如此),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 перв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4-5.*

供情報的形式。並且可以認為，蘇共代表在關於情報局出版刊物問題上的立場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成立的情報局編輯部也應主要圍繞上述問題展開工作。此外，蘇聯對外政策部還反對季米特洛夫提出的關於成立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危險而鬥爭的國際委員會的建議，認為，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國際形勢複雜化，並且會對現有的國際民主組織（工會、青年、婦女聯合會）的作用產生懷疑，因為它們的使命就是為和平、民主而鬥爭。¹ 從對外政策部對季米特洛夫所提建議的態度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在國際共運問題上的立場是非常謹慎的，他們在盡力避免採取可能引起國際局勢複雜化的措施。在大會的發言中，各國代表也沒有給予國際共運問題以更多的關注。在日丹諾夫關於國際局勢的報告中，迴避各國共產黨正在進行的革命鬥爭（只有兩行談越南的解放戰爭）問題，特別是沒有提到當時正在進行的中國革命，更沒有提到亞洲、非洲、拉美共產黨進行的革命鬥爭。

10月16日，蘇共中央根據斯大林的指示通過了關於貝爾格萊德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的出版綱領、程序和頭幾期出版計劃的決議，其中，根據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文件裏所闡明的那些任務確定了該報的基本選題方向。也就是說，前3—4期報紙並沒有突破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內容，報紙的目標也不是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指導。10月底，在貝爾格萊德會議上，格里戈良提出了一系列擬定發表的關於情報局第一次會議的材料，以及10月16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決議中擬定發表的幾篇文章和幾篇基本上是用於揭露美國的政策和對外宣傳的文章，並要求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為編輯部提供稿件。² 11月中旬，在分發給共產黨情報局各

1 巴拉諾夫關於華沙會議議事日程和蘇聯代表團與會問題給蘇斯洛夫的報告，1947年8月15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4卷，第272頁。

2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28, д.1136, л.19,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339-341.

成員黨中央委員會的文件中，尤金把「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擬定為報紙稿件選題的宗旨，並在計劃草案中提出了六十四個題目，並由這些題目組成了一整套標準的政治思想方針，這些方針主要是對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會議文件中闡述的綱領的進一步發展，同時提出「民主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主要是反對美國在西歐、亞洲和美國本土實行的帝國主義政策。對東歐國家的「人民民主政治」給予特殊關注，包括關注這些國家特有的「理論問題」，應該以「社會主義道路」的觀點看待其作用。¹ 由此可見，在情報局機關報工作初期，它的主要方向是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關注東歐國家的「人民民主政治」，並為其提供理論指導。臨時編輯部建立後，它的任務是出版前三期報紙，刊登日丹諾夫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和各黨代表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會議上關於本黨活動情況的報告。

但是，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情報局機關報的發行範圍和職能都在不斷擴大。

首先，情報局機關報的發行範圍和發行數量在不斷擴大。編輯部組建之初，機關報的發行也是有限的。情報局機關報最初決定發行俄文版、法文版和英文版，其中俄文版 4 萬張，法文版和英文版各 3.5 萬張。1948 年 11 月 7 日，開始發行德語版，發行量為 1 萬 5 千份。到 1949 年 5 月，情報局機關報的發行量就達到 52 萬 9 千份，其中的 80% 發往 57 各國家，20% 發往蘇聯。² 從 1949 年 9 月 15 日起，機關報由雙周刊改為周刊。1949 年 10 月 2 日，開始發行中文版，在北京、天津、瀋陽三地發行，每期銷售 4 萬份至 6 萬份，並且該刊的英文版和俄文版在中國還有 8 千份至 1 萬份的銷售量。從 1952 年起，情報局機關報已經用 19 種語

1 ЦДА-ЦПА, ф.146, оп.4, ае1472, л.1, 轉引自 Гу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156.

2 參見 Адие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88.

言出版，¹ 其中包括俄語、法語、英語、德語、漢語、波蘭語、保加利亞語、捷克語、羅馬尼亞語、意大利語、匈牙利語、阿爾巴尼亞語，瑞典語和西班牙語等，在 57 個國家發行，總發行量達到 93 萬 1700 份，² 在共產黨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情報局機關報的發行則要少得多，英語、德語、法語和西班牙語的個人訂購量大約共計才 3 千份。情報局機關報主編米京認為，機關報在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在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奧地利推廣得太弱了，這是情報局出版工作中的最大不足。³

其次，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關注的問題的範圍也在不斷擴大。常設編輯部組建之後，情報局主要關注的仍然是情報局成員的活動和情報局自身的活動（主要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會議的決議，反對南斯拉夫的文章、東歐各國進行的訴訟案件以及經濟建設方面的內容等），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為了阻止西方聯盟的建立，蘇聯領導人把希望寄託在各地人們的和平運動上來，開始號召這些國家的人民進行和平、民族獨立和自由的鬥爭，為開展這一鬥爭，情報局逐漸開始關注非情報局成員共產黨的活動和問題。1948 年 5 月，情報局機關報發表了西班牙共產黨領袖伊巴露麗的「西班牙人民在繼續戰鬥」一文，開始對西班牙共產黨的活動進行報道；1949 年 2 月 15 日，發表了荷蘭共產黨總書記格羅特的文章「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解放運動」；1949 年 4 月 1 日，發表了西班牙共產黨政治局委員費南德·克勞丁的文章「英勇奮戰的西班牙人民」和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的文章「英國工黨政府 —— 帝國主義的工具」；1949 年 4 月 15

1 Фурсенко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к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с.106-107. 927.

2 參見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 203.

3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0, л.117-119,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97-198.

日，發表了古巴人民社會黨執行委員會委員羅德里高茲的文章「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聯合抗擊美帝侵略」等等。¹ 如果說，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根據的是建立區域性的國際共產主義聯合組織的設想，關注的問題的範圍只限於歐洲各成員黨之間的問題話，那麼，從 1949 年初開始，它關注的問題的範圍已經擴大到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了。

情報局機關報開始關注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不是偶然的，它同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政策轉變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1948 年 3 月 14 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別會議上指出，世界已經分裂成兩個完全對立的陣營，它們之間遲早要發生衝突。尋找兩個陣營和解的辦法已屬枉然。目前敵對而又和平的世界局勢可能仍會維持較長的時間，但是，衝突不可避免的時期將要來臨。為應付各種不測事件，斯大林在提出增強蘇聯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同時，還指出蘇聯應該有力地支持附屬國人民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因為民族解放運動將引起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但是，在斯大林看來，如果沒有共同的革命陣線的指導和團結，發達國家工人階級的勝利和被壓迫人民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是不可能的。這樣的陣線早已存在，雖然對它取得的成果遠不能令人滿意，但應當竭盡全力使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斯大林認為，尤其應當特別重視西班牙和南美國家，「蘇聯最重要的王牌是並將永遠是亞洲。」千百萬受奴役的羣眾在本世紀已覺醒，不管殖民帝國主義玩的是什麼樣的詭計，它們都無法扼殺千百萬羣眾爭取自由和享受獨立生活的願望。所有的殖民帝國主義都已面臨末日，它們徹底崩潰僅僅是一個不遠的將來的問題。² 從斯大林的這一講話可以看出，國際局勢的變化使蘇聯領導人更加堅定

1 《人民日報》，1948 年 5 月 13 日，第 1 版；1949 年 5 月 18 日，第 3 版；1949 年 8 月 9 日，第 3 版；1949 年 8 月 22 日，第 3 版。

2 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別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48 年 3 月 14 日，Ostermann, C.F. et al. (ed.),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 Read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p.429-433.

了關於兩大陣營的衝突不可避免的信念，並企圖利用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希望利用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來加深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同時「毫不拖延地增強」蘇聯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來應對各種「不測事件」。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蘇聯最重要的王牌是亞洲，因此對中國革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密切關注。為了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加深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共產黨情報局也被積極利用起來，對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進行指導，並對一些沒有加入這一組織的共產黨也發表了指示性的講話，或者直接進行干涉。

在蘇聯領導人開始關注中國革命的同時，情報局機關報也開始對中國革命進行大量的宣傳性報道。1948年11月15日，情報局機關報開始發表關於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文章，其後，連續發表了關於中國革命鬥爭的文章。1949年2月1日發表「中國民主的勝利」的文章；5月2日發表了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大勝利」為標題的文章，評論了南京解放的意義；5月15日，發表了以「中國民主力量的勝利」為標題的文章，綜述中國人民解放軍截止解放杭州時取得的輝煌成就；7月1日，刊載了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的講話全文，並在「準備組織中國人民民主共和國的聯合政府」的標題下，綜合報道了新政協籌備會的整個過程；7月15日，登載了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¹

在對中國革命進行宣傳性報道的同時，情報局還呼籲亞洲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也走中國革命的道路。1949年10月7日出版的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以「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國的偉大勝利」為題發表社論，在對中國革命勝利的重大意義作了高度評價之後指出，印度、緬甸、印尼、越南及東方其他國家已經或者成為爭取自由和民族獨立的鬥爭的中心，號召他

1 《人民日報》，1949年2月15日，第1版；1949年5月8日，第1版；1949年6月3日，第1版；1949年7月6日，第1版；1949年7月18日，第1版。

們走中國的革命道路，加緊民族解放鬥爭。接着，情報局機關報在1950年1月27日發表的以「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為題的社論，再次號召殖民地附屬國人民走中國武裝革命的道路。該社論援引世界工聯副主席劉少奇在北京亞澳工會代表會議上演說時分析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條件所說的話：「中國人民……的道路，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所應該走的道路。」共產黨情報局的號召對亞洲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產生了影響。2月2日，印共總書記蘭那地夫對報界發表聲明，擁護共產黨情報局「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為題的社論，認為它對了解印度民族解放鬥爭的問題是一個偉大的貢獻，並且完全接受該社論所作的結論，願以中國革命經驗作為指針。印度共產黨馬上發表這一聲明不是偶然的，1950年1月印共就受到情報局機關報的點名批評，並要求該黨組織人民解放軍，開展中國式的武裝鬥爭。¹在印共宣佈接受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關於「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為題的社論中的觀點之後，4月12日，巴基斯坦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在《巴基斯坦時報》也發表聲明說：

巴基斯坦共產黨中央書記處詳細研究了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在1950年1月27日所發表的題為「殖民地與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巨大進展」的文章。書記處歡迎該文，認為它是對了解巴基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問題的偉大貢獻，並且完全接受該論文所作的結論，這就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團結；加強工人階級與全體農民的聯盟；為立即實行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而鬥爭，團結一切願為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政黨、階級、團體、派別，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以及與帝國主義合作的大資產階級、封建王公與地主的統治；使以共產黨為首的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解放鬥爭發展到像在中國和越南那樣更高的形

1 參見戴超武：《中印邊界衝突與蘇聯的反應和政策》，《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60頁。

式。中央書記處感謝情報局這一輝煌的領導，並宣佈將在上述結論的啟發下改正自己的錯誤。¹

除了對一些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運動發出指示以外，共產黨情報局還對非情報局成員的一些共產黨的政策方針進行批評。1950年1月6日出版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刊登「觀察家」所寫的「關於日本的形勢」的評論文章，對日本共產黨總書記野阪參三的錯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篇評論認為，在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和朝鮮的掠奪的計劃失敗之後，美國國務院和美國軍國主義者就把其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日本，並把日本作為反對蘇聯和反對亞洲各國民主運動的軍事冒險的主要基地。在這種情況下，日共應該認識到：「只有擯棄帝國主義和擯棄帝國主義的聯盟，只有走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道路，只有遵循和平發展和加強各國人民間的和平的路線，日本才能興起並且成為獨立的大國」，否則，「日本將被迫成為世界帝國主義手裏的工具，喪失自由和獨立。」接着，作者開始批評日共「向那些處在日本複雜形勢中的日本勞動人民指引錯誤的方向」，批評野阪於1947年1月在日本共產黨第二次代表會議的報告中提出的觀點：戰後的日本具備着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條件，即使處在佔領制度的條件之下；批評日共把這種政策看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日本國土上的本地化」。作者還批評野阪關於對美國佔領軍的如下認識：佔領軍對於日本共產黨的目的絕無妨害，它便利日本的民主化；甚至在佔領制度的條件之下，日本共產黨仍然能夠領導工人階級取得政權。作者認為野阪提出的「即使國內有美國佔領軍，日本仍然可能和平地直接走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濫調，這種觀點迷誤日本人民並且幫助外國帝國主義者把日本淪為外國帝國主義

1 《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1日，第1版；1950年2月3日，第1版；1950年3月13日，第1版；1950年6月18日，第4版。

的殖民地附庸，變為在東方的新的戰爭中心。這篇評論文章還指責野阪企圖發明一種「新」的理論，即他之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日本條件下的「本地化」。認為這種理論「無非是主張由反動和平發展為民主，由帝國主義和平發展為社會主義的那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在日本的改頭換面而已」。¹

對於共產黨情報局發出的批評，日本共產黨馬上作出了回應，在1月27日出版的《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上發表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八次全體會議關於「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會關於野阪同志錯誤的決定」的全文以及伊藤律關於日本共產黨對野阪態度的聲明。²

這一時期，受到共產黨情報局強烈批評的還有瑞士勞動黨，批評「該黨支持本國的中立政策是喪失階級立場。」³

在對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革命鬥爭進行指導，對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錯誤進行批評的同時，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經常刊登一些理論性的文章，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行指導，以便以正確的思想武裝各國共產黨，「保衛馬克斯列寧主義者理論的純潔性」。情報局機關報逐步成為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指導的刊物。如，1949年4月15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第35期專門刊登了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的理論性文章；1949年6月1日登載了劉少奇著的「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和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書記T·喬節斯哥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礎」；1949年9月發表「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思想工作」的社論和蘇聯科學院委員米京的「共產黨的偉大的思想武器」一文；1950年6月

1 《人民日報》，1950年1月11日，第1版。

2 《人民日報》，1950年2月22日，第1版。

3 不破哲三：《斯大林與大國主義》（日文版）《赤旗報》1982年，轉引自張月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長編第四卷（1945—1955）》，第313頁。

發表「共產黨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而鬥爭」的社論；1950年7月發表「列寧主義與各族人民爭取和平的鬥爭」的社論和和米京所寫的「列寧主義的國際意義」一文。¹等等。

二、共產黨情報局章程的確立和常設祕書處的建立

共產黨情報局建之後，東歐各國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並沒有得到制止。情報局編輯部的建立及其協調職能遠遠不能適應蘇聯領導人的需要。為了進一步加強情報局的協調職能，以及更好地完成這種職能，情報局祕書處第二次會議上通過了情報局章程和蘇斯洛夫提出的關於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常設機構祕書處的建議。

（一）共產黨情報局章程的確立

1948年6月21日，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預備會議上，蘇共代表馬林科夫提出的關於制定共產黨情報局章程的建議得到了與會代表的一致同意，會議決定組成以法共代表杜克羅和蘇共代表蘇斯洛夫為首的委員會，並委託他們在兩個月的期限內擬定共產黨情報局章程。²

根據預備會議的決議，1948年8月出台了兩份情報局章程草案，第一份章程草案是由杜克羅起草的。該草案四分之三的內容實質上都是在重複1947年在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聲明中論述的條款：「組建這一機構

1 《人民日報》，1949年7月11日，第1版；1949年6月3日，第1版；1949年8月7日，第7版；1949年9月7日，第6版；1949年9月12日，第5版；1950年6月14日，第3版；1959年7月2日，第3版；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46, л.102,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2.

的目的，機構的組成，各成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權利，定期召開情報局會議和祕書處會議，最後一項條款，也就是第六項條款杜克羅寫的是：各黨都有義務接受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決議」。第二份章程草案是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準備的草案。在草案的 12 頁文本中序言就佔據了 5 頁，這 5 頁內容的基礎是日丹諾夫在 1947 年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大會上關於國際局勢的報告以及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局勢發生的「深刻變化」。該草案由 6 項條款組成：目的和任務；交流經驗和協調情報局各成員的活動；關於某黨加入情報局的程序；情報局成員的權利與義務；領導機構及其功能；情報局的資金。從這份草案可以看出，蘇聯對外政策部的工作人員在擬定共產黨情報局章程的時候依據的是共產國際的經驗，其中包括使情報局具有等級的組織結構以及使其具有下達指示的權限。關於這一點可以從這一草案的相關條款中舉出一些例子。「共產黨情報局是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聯合組織，其活動的依據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為了社會主義陣線的利益，加入情報局的各黨應該同各種民族分離主義傾向、同各種脫離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傾向作毫不妥協的鬥爭，同敵視蘇聯的各種表現和行為作堅決的鬥爭」；「共產黨情報局以及各成員組織建設的主要領導原則是民主集中原則」；「加入情報局的各黨在解決自己國內問題上是獨立的，但不能與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相抵觸」；「情報局成員應該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學說的純潔進行不懈的鬥爭，捍衛這一學說，使其免遭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敵人的修正，……應該全力在自己的國家內積極利用黨的經驗以及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其他成員進行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建設的經驗，……不斷地向情報局祕書處通報自己近期的活動，……定期（一年不少於一次）報告對共產黨情報局決議的執行，在情報局會議之前報告本黨的活動。」草案指出，作為共產黨情報局最高的機構，情報局會議每年召開的次數應不少於兩次。在情報局會議之間，共產黨情報局的「領導和指示機關」

應該是其執行委員會，該委員會應不少於在三個月內召開一次會議。共產黨情報局的常設機關是祕書處，由 9—11 人組成，在會議上通過選舉產生，任期一年，祕書處召開的會議應不少於一月一次，在祕書處下組織一個工作機關，組成檢查專家小組（以便「把自己的專員和指示送往個別成員」——正如共產國際一樣）來管理工作。從 1948 年 8 月底到 9 月底，蘇聯駐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人員把這兩份草案合二為一，最後制定了四頁紙的簡短文件。其中對蘇聯對外政策部擬定的決議草案進行了一些修改。1949 年 6 月 6 日，在祕書處開始工作的前一周，蘇斯洛夫和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的三名成員——格里戈良、波諾馬廖夫和巴拉諾夫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通報了祕書處會議的日程，其中關於情報局章程寫道，該章程「基本上保留了」委員會主席杜克羅擬定的內容，「但是有一些擴展和補充」。在報告後附上的是杜克羅和情報局工作人員「詳細化」後的章程草案以及關於所有日程問題的提議草案。蘇共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批准了情報局章程草案」。6 月 14 日情報局祕書處開始審議情報局章程草案。杜克羅在這次會議的發言中指出，「戰爭販子在協調自己的行動反對民主力量」，「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應該協調自己的活動。」杜克羅繼續說，蘇聯是民主力量的領袖，因此，情報局章程首先必須談到蘇聯，談到列寧斯大林建立的黨。如果說草案的第三項談論的是，情報局成員認為，在自己全部的活動中都有責任和義務遵循馬列主義學說這一正確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不斷為工人階級的事業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那麼這就意味着，「對蘇聯的態度是各黨政策正確性的試金石。經驗證明，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在摧毀法西斯的過程中、在民主力量的鞏固中決定性作用評價的不足，是違背國際工人運動的利益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僅僅在於同全世界勞動者的團結，而首先其主要的形式是對蘇聯的熱愛和忠誠，忠誠於蘇聯共產黨和斯大林同志。」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這種解釋是在 1930 年代的共

產主義運動中產生的，並被作為一項重要原則深入貫徹到共產國際的活動中，對國際工人運動的發展造成了嚴重後果。在討論中其他 7 個共產黨的代表也作了發言，對情報局章程草案表示支持，並且都完全贊同杜克羅在報告中提出的觀點，其中的一些人還談論了他們的一些想法，並進行了一些補充。¹

1949 年 6 月 14—17 日召開的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會議上通過的共產黨情報局章程規定：1. 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有權：(1) 參加情報局大會，在平等原則的基礎上，在情報局祕書處和機關刊物編輯部有自己的代表；(2) 有權相互獲得有關各國共產黨狀況的情報。2. 參加情報局的每一個共產黨，承認其他共產黨有權對其活動提出批評，並將實現自我批評以利於自己隊伍思想水平的提高和組織的鞏固看作是自己的義務。3. 參加情報局的共產黨，認為自己的義務和責任如下：(1) 在自己的一切活動中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忠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堅持不懈地為工人階級的事業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2) 遵守情報局的章程，貫徹執行一致通過的情報局決議；(3) 定期向情報局通報自己黨的日常工作情況；(4) 積極參加和協助傳播和推廣情報局的機關刊物；(5) 按規定的數額交納會費。4. 情報局由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組成，每個共產黨派出兩名代表參加。共產黨代表的指派和替換由相應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5. 情報局大會每年至少要召開一次。參加情報局的每一個共產黨，可以建議召開情報局非常會議，並可提議大會的日程安排。6. 由情報局大會批准情報局機關刊物的主編和編輯部的組成人員，並批准情報局的財政預算。7. 情報局的常設工作機構是祕書處，由參加情報局的全體共產黨代表組成，每個黨的中央委員會派出一名代表參加祕書處。8. 情報局祕書處應保證：(1)

¹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51, л.87-101; д.80, л.2-6,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2-186.

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定期聯繫；（2）採取必要的措施，在通過情報局決議和各黨之間協商問題時，協調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行動；（3）對機關刊物編輯部的工作以及情報局的一切出版活動實行監督；（4）準備關於情報局會議的日程問題的材料。9. 根據需要召開情報局祕書處會議，但至少每3—4個月要召開一次會議。10. 情報局的資金由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交納的會費以及出版活動的收益組成。¹

共產黨情報局章程明確規定，各成員有權相互獲得有關各國共產黨狀況的情報，參加情報局的每一個共產黨，要定期向情報局通報自己黨的日常工作情況，承認其他共產黨有權對其活動提出批評，要貫徹執行一致通過的情報局決議。由於蘇共在共產黨情報局中處於主導地位，事實上這些規定就是要求其他共產黨向蘇共通報自己的活動，接受蘇共的批評，執行蘇共的決議。共產黨情報局章程還要求各成員在自己的一切活動中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忠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蘇共無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闡釋者，要求遵循這一學說就是要求他們在理論上遵循蘇共的領導，要求各成員忠誠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意味着要求各成員放棄民族主義利益，任何主張民族主義的嘗試都會被視為修正主義而遭受指責。

（二）情報局祕書處的建立與活動

情報局祕書處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情報局章程規定，祕書處作為情報局活動的常設機構，由各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並確定了祕書處的任務和職責。祕書處的建立標誌着共產黨情報局開始作為一個擁有自己組織機構的常設機關發揮作用，也標誌着一種新的協調的機制的建立。但實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0, л.81-82.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7-188. 另見：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7卷，第658-659頁。

際上，早在情報局秘書處第二次會議之前，1948年7月，蘇斯洛夫和馬林科夫就開始討論關於組織秘書處常設機構的問題。8月6日，蘇斯洛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關於組織情報局秘書處常設機構的計劃，其中指出了情報局機構編制規模，蘇共中央對此費用承擔的數量，蘇聯代表擔任領導職務的任命。8月7日蘇共中央書記處對這一計劃表示了贊同，並於8月26日通過決議，規定由蘇斯洛夫把上述情報局組織機構提案提交情報局秘書處例行會議討論。¹ 也就是說，在情報局秘書處建立之前，蘇聯方面就已經開始執行自己擬定的關於情報局秘書處的工作計劃。

共產黨情報局常設機構秘書處的工作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秘書處會議。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之後，為了落實會議的決議，1948年7月5日，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召開第一次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情報局各成員黨的代表，唯獨意共除外：她的代表遲到了，沒有按時趕到布加勒斯特。會議開始前，蘇斯洛夫預先就把相應的關於會議日程的方案由布加勒斯特報告給了莫斯科，並得到蘇聯領導人就即將召開的秘書處會議下達的有關指示。在這次會議上，蘇斯洛夫提出的關於會議日程的建議被一致通過。會議還通過蘇斯洛夫的提議，決定各黨不派出代表團參加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² 情報局秘書處第二次會議於1949年6月14日召開，這次會議主要通過了情報局章程草案，決定將草案提交給將召開的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批准。蘇斯洛夫按照蘇共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所提出的擬在1949年10—12月期間召開情報局第三次會議的建議以及關於這次會議的議事日程，都得到了與會代表的完全贊同。此外，這次會議還討論了情報局機關報的工作，並且作出了關

1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3, д.1071, л.29; д.1072, л.28, 轉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172-173; с.512.*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49, л.2-5, 轉引自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10.*

於改變情報局各黨承擔情報局費用比例的決定。¹

祕書處會議同情報局大會的區別在於，在這些會上討論的不是共同的政治思想問題，而是實際的組織問題。從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保存的這些會議的記錄看，在這兩次會上起主導作用的是蘇共中央駐情報局祕書處的代表蘇斯洛夫，實際上他在指導這個機構的工作，貫徹蘇聯領導人的方針。同情報局會議的準備工作一樣，情報局祕書處會議的日程方案及其決議草案都是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爾後是 1949 年 3 月取代它的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擬定的。蘇聯領導人在討論了所擬定好的草案之後——通常是由斯大林親自審閱——確定蘇斯洛夫在情報局祕書處會議上所要採取的立場。²

1950 年 4 月 7 日，根據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4 月 20—22 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了情報局祕書處例行的祕書處第三次會議，此時，協調和平運動已經成為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中心。在這次祕書處會議上，日丹諾夫在重複他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的同時，還說了一些新的東西。他兩次談到了兩大體系間的和平競賽，並批評了關於必然會爆發戰爭的言談的「宿命論色彩」。他使人們注意蘇聯媒體於 1950 年 4 月 22 日發表的報道，蘇聯媒體首次發佈了 1920 年的兩份文件，在這兩份文件中列寧談到了關於蘇維埃俄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可能性。³

情報局祕書處第二個層面的工作是它常設機構的日常工作。在 1948 年 7 月 5 日祕書處會議上討論了關於成立常設機構的問題：在祕書處下設「一個不大的辦事機構——由辦公室主任領導的辦公室」。辦公室下設 4 個業務部門：通信科，「負責同情報局各成員黨進行技術通信和聯絡員通

1 РЦХИДН И. ф.575, оп.1, л.80, л.2-27,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т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16-517.*

2 РЦХИДНИ, ф. 575, оп.1, д.49, л.1-28; д.80, л.1-28; д.84, л.128; ф.17, оп.3, д. 1076, л.9, 50, 轉引自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т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09.*

3 RTsKhIDNI, f.375, op.1, d.120, l.13,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 202.

信，保障各黨互通情報」；秘書科，「保障接收、登記和分發通訊，進行記錄和保存記錄等」；翻譯科和總務科。這一提案在1949年6月15日作為情報局秘書處決議被一致通過。¹但是，這些部門在1948年8月實際上已經開始運作。辦公室及其下屬科室工作人員主要都是蘇聯人。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諾夫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他身兼兩職，既擔任情報局機關的職務，又擔任蘇共中央機關的職務（1949年成立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以後，他繼續留任該委員會領導職務）。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通信科由普赫洛夫負責，而辦公室秘書科由安季波夫負責，他們同時還在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工作。辦公室總務科主任由蘇聯代表巴什科夫擔任，他同時還兼管《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的出版。蘇聯方面不僅給情報局機構派去了領導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顧問），還派去了技術人員：無線電技術人員、譯電員、翻譯、速記員、打字員和秘書。情報局秘書處從事的工作主要是蒐集和分析有關各國共產黨主要是有關情報局各成員各種情況和活動的情報，以及有關東歐各國共產黨內外政策的情報。從檔案材料可以看出，情報的蒐集，整理和分析是按照專門制定的方案進行的。情報局秘書處機關從各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上報的通報和報告中獲得大量的材料。從1948年秋季開始，這些材料開始由布加勒斯特向情報局各黨索要。其中最重要材料是關於情報局其他成員對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問題的決議的執行情況的報告，關於各成員的活動和內外政策從中吸取了哪些教訓（法共和意共除外），以及他們實際採取了哪些措施和制定了哪些計劃。在情報局第二次和第三次會議期間，情報局各黨都就這個問題呈送過報告和參考材料，同時還呈送關於該黨在其他方面的活動和關於本國其他一些情況的材料。1949年12月31日，情報局秘書處通過了秘書處辦公室準備的文件「關於情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л.80, л.26-27, 轉引自 Гибн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11.

報局成員各黨之間情報互換的程序」。其中指出，情報局成員各黨中央每月不少於四次向情報局秘書處發送自己的機關報和雜誌，發送 3 份信息公報。至於各黨代表大會、中央全體會議材料以及黨的其他領導機構的決議，各黨中央應該根據決議的性質酌情送往情報局秘書處。此外，黨中央不應每月少於一次向情報局總部發送關於推廣情報局機關報的信息材料，關於黨的出版活動的材料，關於黨校工作和黨的幹部培養工作的材料，關於國內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以及其他民主組織的活動的材料，以及情報局秘書處有興趣的關於其他兄弟黨狀況的情報。秘書處委託辦公室每月寫出關於情報局各黨機關報的概覽，供情報局秘書處了解情況。任何情報材料都要送一份給蘇共中央。¹ 這種規定實際上就是要求情報局其他成員定期向蘇共中央通報本黨的活動，實際上加強了蘇聯共產黨對情報局其他成員的監督和控制。

情報局各成員把什麼樣的材料送往布加勒斯特了呢？一般來說，東歐各黨通報的材料內容是：確認自己國家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推行蘇聯模式的成功，揭露黨內的各種傾向和英美間諜。法共和意共發送的通報是關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反對美國的鬥爭，關於反西方的和平運動等等。比如，從解密的俄國檔案可以得知，法共駐共產黨情報局代表喬治·科尼奧準備的報告有「法國對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決議的反響」（1948年9月23日），「對於對美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的訴訟而採取的行動」（1948年10月28日），「法國共產黨為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鬥爭」（1949年7月30日），「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無線電台的組織」（1950年3月2日），向情報局機關提供的通報有：關於法國共產黨中央1950年5月11日政治局會議對在斯德哥爾摩呼籲書上收集簽名問題的討論（1950年6月15日）等。通過喬治·科尼奧從巴黎向共產黨情報局秘書

¹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51, л.68; д.49, л.38,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78.

處辦公室發送的由法共中央準備的材料有：杜克羅就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關於情報局就南斯拉夫的決議的執行情況寫給情報局的信件（1948年10月25日），法共聯邦委員會通過決議支持情報局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立場的材料（1948年10月28日），關於南斯拉夫在法國的移民的報告（1948年10月28日），關於「法國反對鐵托集團的鬥爭」的通報材料（1949年10月17日），關於法國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降低和失業狀況的材料（1949年10月17日），法國工人階級為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為民主而鬥爭（1949年10月27日），反動派反對共產黨的運動及其向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發動的進攻（1949年10月27日），為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鬥爭以及帝國主義加深工人階級分裂的詭計，美帝國主義分裂國際工人運動的活動（1949年11月3日），關於法共的工會工作（1949年11月3日），法共對民主社會黨的戰略（1949年11月10日），關於法共基層黨組織的黨內工作狀況（1953年3月6日），關於法共基層黨組織領導工作的一些不足（1954年5月21日）。從法共從巴黎發給共產黨情報局的材料為例可以明顯看出，其中的許多材料都是應共產黨情報局的請求發送的，並且都同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有關或者是為了為即將召開的情報局會議做準備。大部分材料都由於其祕密性都由共產黨情報局的專員送往布加勒斯特，當然同時還送往蘇共中央。由蘇聯代表——既有蘇聯在情報局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也有蘇聯駐編輯部的工作人員起草的、從共產黨情報局總部發往蘇共中央的材料對莫斯科來說比較重要。這些材料的主要來源是：報紙上發表的文章，電報局的報道，各共產黨送來的材料，情報局工作人員在東歐國家出差期間收集的材料及其同共產黨領導人的會談記錄。¹

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進行公文處理工作，他們收發各國

1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258, л.12, 24-25,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 178-180.

的通報，保證同各共產黨的特別聯繫，並準備一些材料。比如，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在 1953 年 3 月 1 日的典型計劃是準備如下材料：關於斯洛伐克工業化的報告；關於羅馬尼亞工人黨基層黨組織工作的報告；關於希臘在羅馬尼亞政治移民的報告；關於英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狀況及其方針的通報；關於在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的南斯拉夫愛國移民的活動狀況的報告；1952 年 11—12 月以及 1953 年 1—2 月「自由南斯拉夫電台」編輯部的獨特材料概述；在建立統一戰線的鬥爭中，美國進步力量反對反動派的活動的通報。除了個別情況，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準備的材料都會被寫上「祕密」和「絕密」的字樣通過特別的郵寄發送出去。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根據「進行登記、執行和保守祕密和絕密文件的指示」進行工作。辦公室也成為獨特的情報局成員各黨和非情報局成員各黨交換情報的中心。根據解密的檔案來看，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相互通信和發送的電報經常會利用這種祕密的通信形式，通過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轉交。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充當了各黨之間「郵政總局」和「電報局」的角色。¹ 同時，共產黨情報局也開始通過這種方式履行對各國共產黨及其政策實行控制和監督的職責。這些職能對東歐各國共產黨尤其加強了。擔任情報局祕書處領導和顧問的蘇聯工作人員定期到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出差，了解那裏的情況和各黨的各種活動。他們根據個人印象、出差期間的會談、以及各黨呈送的材料和情報撰寫了大量的分析報告和情報，並呈交給了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的領導，當然，同時還送往蘇共中央。²

1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1.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87, л.1-19, 32-48, 55-61; д.94, л.60-70, 89-96, 103-124; д.95, л.160-183.
轉引自 *Гу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 *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12-513.

第六章 回歸世界革命：蘇聯領導人 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

斯大林在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是謹慎的，在情報局建立之後，他對情報局成員的擴大也持反對的態度，拒絕了一些國家的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建議，比如，在 1948 年 12 月 18 日同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進行的會談中，斯大林拒絕了德國統一社會黨領導人皮克提出的關於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要求。斯大和莫洛托夫都認為「德國統一社會黨加入共產黨情報局還為時尚早」，「共產黨情報局自身需要時間得以鞏固」。「目前許多其他國家的黨作出要加入情報局的聲明，但暫且都難以滿足」。並且，斯大林指出，「統一社會黨最好強調突出他們相對於莫斯科的獨立性」，「必須不給敵人新的藉口」。¹ 此外，斯大林還禁止情報局作為第三方去仲裁那些不與蘇聯接壤國家的共產黨組織之間所發生的紛爭。如，1949 年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中的共產黨組織中的紛爭。²

但是，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蘇聯領導人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重又產生了世界革命的想法。因此，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得到不斷得到加強。並且到了 1950 年秋，斯大林提出了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和設立情報局總書記職務的問題。

1 АП РФ, ф. 45, оп. 1, д. 303, л. 77, 轉引自 Volkov, Vladimir K., "German Question as Stalin Saw It, 1947-1952",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2 參見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228.

一、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問題的提出及其原因

1950年9月20日，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主席格里戈良將一份書面報告呈報給斯大林，建議於10月10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例行會議，並提出了會議的日程：「各國共產黨代表，對於所開展的禁止核武器運動將進行工作總結，並為籌備召開第二屆全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擬定措施」；討論關於共產黨報刊的狀況及其任務的問題，並聽取各共產黨代表的通報；就將於1950年11月底12月初召開共產黨情報局例行大會事宜交換意見，這次大會將要討論的問題是：關於為爭取和平、反對新戰爭販子而鬥爭的長遠任務，關於與反動派反共產主義運動的恐怖活動而鬥爭的措施。¹但是，斯大林否決了格里戈良所建議的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例會的日程安排，並決定在這次例會上討論和研究關於擴大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問題。根據斯大林的意見，格里戈良於10月6日擬定了一份要提交給斯大林的報告，其中提出了關於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問題，包括設立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總書記。這份報告的後面附有蘇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共產黨情報局例會的決議草案和「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關於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職能的問題的建議」的草案。幾乎所有的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制定的致斯大林的關於外交事務的文件，都要通過莫洛托夫的秘書處進行預先的檢查。²自然，像格里戈良提交給斯大林的這類如此重要的報告是不可能不經過莫洛托夫同意的。斯大林對格里戈良9月20日所提建議的否決說明，對於擴大情報

1 РЦХ 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9, л.10-11,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350-351.

2 Адибеков Г.М.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350-351.

局的職能和設立情報局秘書處總書記職務問題，莫洛托夫和對外政策委員會領導人事先都不知情。

阿季別科夫通過對斯大林在這一時期的對外活動進行研究後指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問題是斯大林本人提出來的。¹ 那麼，在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問題上態度謹慎的斯大林，為什麼突然產生了必須「加強」、「擴大」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以及對其進行「改組」的想法？

這主要與當時國際局勢的發展與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有關。柏林危機以來，西方國家利用加劇的國際局勢，不斷加快西方聯盟建立的步伐，並最終於 1949 年 1 月建立了北約組織。在美國聯合歐洲國家組建西歐聯盟的同時，亞洲也出現了聯盟的趨勢。隨着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出於反蘇和反對共產主義的考慮，美國逐步改變了限制和削弱日本的政策。自 1947 年 10 月到 1948 年 2 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凱南兩次就美國的遠東戰略問題提出報告，其中把日本放到了主要的亞洲潛在盟國的地位。1948 年 1 月 6 日，美國陸軍部長羅亞爾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說，標誌着美國對日政策從多方限制、削弱、打擊改為積極幫助、扶植和支持日本。² 與這種政策轉變相適應，美國對日賠償政策也在由嚴厲到緩和繼而轉向對日援助的方向發展。此後，美國加大了復活日本軍事實力的政策，1950 年 7 月 8 日，根據麥克阿瑟的命令，日本政府成立了人數為 7.5 萬的國家警備隊，並且把海上警備隊的人數從 1 萬擴大到 1.8 萬。³ 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警惕。在西方聯盟建立的同時，西方國家也在加緊對蘇戰爭的準備，其中包括核戰爭。來自情報部門的消息使斯大林得知了美國和英國準備進攻蘇聯和對蘇聯城市實施原子攻擊的計劃，特別是根據對外情報部門的情報，1949 年底，美國

1 詳見 *Адибеков Попытка 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51-66.*

2 劉金質：《戰後國際關係史》（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38-39 頁。

3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308-309.*

已經基本完成了氫彈的研製。¹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對戰爭的擔憂增加了，因此，需要應對西方世界強加於蘇聯的戰爭。

為了應對西方強加於蘇聯的戰爭，斯大林從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看到了機會，並再次產生了開展世界革命的想法。

隨著中國革命的不斷勝利，蘇聯領導人開始對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寄予越來越大的希望。這種希望在 1949 年 6 月劉少奇訪蘇期間表現了出來。在同劉少奇進行的談話中，斯大林極力勸說中共承擔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並提出了建立遠東情報局的構想。這說明，蘇聯領導人已經開始醞釀對亞洲國家共產黨政策的變化，² 而且這種變化是與蘇聯在歐洲面臨的日益嚴峻的挑戰結合在一起的。正如蓋迪斯所認為的，斯大林在歐洲遭到抵制後，又在亞洲看到了革命的無限希望，例如中國和印度支那，因此，他允許金日成發動對南朝鮮的戰爭。³ 斯大林對殖民地革命的希望並不是要他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是希望通過這些革命來牽制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力量，以此減緩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斯大林的這一戰略目的在他 1950 年 8 月 27 日給哥特瓦爾德的信件中充分表現了出來。對於在討論朝鮮問題的時候，蘇聯代表退出聯合國安理會，致使安理會通過了關於譴責朝鮮為「侵略」的決議，哥特瓦爾德表示了解，在對這一問題進行的解釋中，斯大林指出，這是為了「讓美國放開手腳，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再做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政府的真實面目」。在蘇聯代表退出安理會後，「美國陷入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和道義上的威望。」當然，斯大林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敗壞美國的「威望」，而是為了讓美國做「蠢事」，陷入朝

1 *Лебедев С.И. (гла. ред.)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 В 6 тт. Т.5, с.41.*

2 關於蘇聯領導人對亞洲國家共產黨政策的變化，詳見下一章。

3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66-67.

鮮戰爭，把「美利堅合眾國的注意力從歐洲引向遠東」。斯大林認為，美國被牽制在遠東之後，「美國會在這場鬥爭中無力自拔」，「不能在短時間內着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被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建設爭取了時間。更不要說美國和中國的鬥爭會在亞洲和整個遠東地區引發革命了」。¹當然，蘇聯領導人關注的不僅僅是讓美國陷於朝鮮，如果所有的西方殖民大國都被陷入歐洲、美洲和亞洲的革命運動和工人運動中，那麼，這將是制止他們對蘇發動戰爭的最有效的途徑。為實現這一目的，需要加強情報局的職能，「幫助那些向共產黨情報局請求給予忠告和建議的非共產黨情報局成員的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需要設立情報局總書記一職，「在急需的情況下——對相應的黨作出必要的決議和下达指示。」²

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的時候，蘇聯領導人並沒有對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給予應有的重視，而擴大情報局職能問題的提出則表明了他們對殖民地革命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其根本的目的是，在戰爭的危險日益臨近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希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陷入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中，減緩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延緩西方國家的對蘇戰爭，贏得較長的喘息時機來恢復和發展蘇聯經濟，鞏固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使兩大陣營的力量對比向有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蘇聯領導人改變的只是戰術，而最終的戰略目的仍然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為了應對美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的危險，蘇聯領導人也開始鼓勵法國和意大利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做好武裝鬥爭的準備。1951年7月27日，斯大林在與法國共產黨中央政

1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62, л.71-72, 轉引自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ун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96-97.*

2 РЦХИДНИ, ф.82, оп.2, д.233, л.125-131, 137, 139,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 с.150.*

政治局委員雅克·杜克洛進行的會談中明確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企圖確立起自己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並威脅要在歐洲發動戰爭」。因此，斯大林認為，法國共產黨應該有自己大量的解放軍，這些軍隊同蘇軍一起可以解決歐洲的一切問題。並建議法國共產黨人向俄國派出 100—150 名優秀的青年組成一個營，後來可以組成一個團。這些人可以被派往蘇聯的大後方學習軍事知識，並在學習後返回法國，到法國各地並組建各個法國解放武裝的中心。在美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的情況下，法共不應寄希望於蘇聯軍隊到法國予以幫助，而應當自己準備鬥爭。在這次談話中，斯大林還對法共總書記多列士和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對建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消極態度進行了批評。¹

總之，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蘇聯領導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開始向世界革命回歸，並為此進行了加強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

二、蘇聯領導人加強情報局祕書處職能的嘗試

在格里戈良 1950 年 10 月 6 日準備的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的第一頁上，標有「絕密」字樣，並有莫洛托夫用鉛筆寫的批示：「將進行修改」。報告文本和政治局的決議草案沒有被改動，而情報局祕書處的建議草案則由莫洛托夫的助手波利亞科夫做了重大的改動。在決議部分的第一條裏，即談到關於「繼續團結工人階級和人民羣眾的一切力量以打擊不斷增長的戰爭威脅」的必要性（對於這一必要性波利亞科夫作的補充是：「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進攻，捍衛勞動人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提出了關於「建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的更加密切合作」的任務。接下來

¹ 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92, Л.122-126

格里戈良和波利亞科夫的意見出現了分歧。格里戈良認為這一任務是「加強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而波利亞科夫則認為這一任務是「對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進行改組比較適宜，這指的是擴大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並設立以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為代表的各國共產黨的常設國際機構」；波利亞科夫將對外政策委員會準備的決議部分的第二點內容全部刪去了，這部分內容是，各國共產黨在很多問題上「感受到了對各自的行動進行相互磋商和達成一致意見的需要，現在，這樣的問題的領域擴大了。」接着——列舉了這些問題：意識形態工作、宣傳工作、黨的組織建設工作、共產黨的報刊工作。二人在決議部分的第三點也出現了分歧：對外政策委員會的方案是——「為了保證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所有活動的正常領導，認為根據共產黨情報局各成員相互協商的一致意見，設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總書記的職位是必要的。」而波利亞科夫的修改則是：「共產黨情報局會議認為有必要把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設為常設機構並設立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一職。」¹

1950年10月，對外政策委員會和莫洛托夫的秘書處都在就明確確定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新的職能問題進行着緊張的工作。格里戈良以波利亞科夫修訂過的「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關於加強職能問題的建議」的草案為基礎，於10月12日又給斯大林準備了一份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建議在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研究、然後在即將舉行的會議上討論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改組」問題。報告後面所附的政治局「關於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例會和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決議草案以及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提交的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決議草案都準確地重複了波利亞科夫的表達。10月14日波利亞科夫在莫洛托夫的委託下對這份報告又作了修改，這次修改作了如下一些變動，並且都被列入了政治局新的決議草案裏：

1 РЦХИДНИ, ф.82, оп.2, д.233, л.116,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 с.149.*

不僅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會議，而且召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的問題都被提出，並要求予以討論和研究；擬議的會議議程中關於第一個問題的表達方式被改變了——用「關於改組問題」替代了「關於加強職能問題」。莫洛托夫在看了波利亞科夫的修改以及政治局決議草案之後，在打上波紋線的「關於改組問題」這幾個詞上面寫了「擴大職能」。他在「擴大職能」和「會議決議草案」這些詞的下面劃上了一道波紋線（大概是表示疑慮或者不願接受），同時在「擴大職能」這個詞的下面又劃了一道直線。¹ 莫洛托夫的意見是決定性的。10月25日格里戈良又準備了3份文件：給斯大林的報告、政治局決議草案以及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決議草案。同一天，波利亞科夫向莫洛托夫發送了一份關於政治局決議新草案的修改稿，其中解釋了新草案中取代「共產黨情報局改組」指的是「擴大職能」，同時把擬定的祕書處會議從10月下旬移到了11月下旬。10月26日，格里戈良根據莫洛托夫提出的修改意見再一次對上述3份文件進行了修改。其中，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決議草案的兩份論題又被作了重大的校訂。其中的第一個論題是論證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和加強各國共產黨更加緊密合作的必要性，莫洛托夫作了下列補充：「還有一個幫助向共產黨情報局請求給予忠告和建議的非共產黨情報局成員的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任務。」莫洛托夫的第二點修改，與第一點修改一樣，在報告的最後講的是共產黨情報局所作出的建議和決定的性質：「在急需的情況下——對相應的黨作出必要的決議和下達指示。」² 聯繫到此時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也開始對非情報局成員的政策提供指導，開始廣泛地報道關於亞非拉更大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情況的實

1 РЦХИДНИ, ф.82, оп.2, д.233, л.117-122, 124,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150.

2 РЦХИДНИ, ф.82, оп.2, д.233, л.117-122, 124-131, 137, 139,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150.

施，可以看出，這項政策絕不是莫洛托夫臨時提出來的，而是反映出了蘇聯領導人主張加強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主要目的。

格里戈良在 10 月 26 日的報告中提出了關於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問題，同時在報告中還提出了「關於在參加情報局的各國共產黨相互協商的基礎上確定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職務，以便確保對情報局日常工作的領導」的問題。接着，格里戈良建議在 1950 年 12 月上旬召開共產黨情報局例行大會，在會上將議論關於「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問題，批准設立總書記一職，「研究關於情報局機關的機構問題，也就是在組織上鞏固和加強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在此之前，擬定於 10 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會議。在這份書面報告後附有蘇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例行會議和「情報局祕書處就加強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職能問題所提建議」的決議草案。

10 月 26 日格里戈良在向斯大林提交報告的同時，還準備了政治局決議草案以及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決議草案。這些文件都是根據莫洛托夫的修改意見修改過的。在 10 月 28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政治局批准了由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官員起草的「情報局祕書處關於擴大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職能的建議」。草案的第 2 和第 3 項內容如下：

2. 遵循已得到充分證明的各黨相互磋商和自願協調行動的原則，情報局祕書處將履行下述任務：(1) 把與國際形勢有關的為了反對戰爭威脅、捍衛勞動人民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要求各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以及他們的先進的共產主義先鋒隊共同努力和一致行動的問題提交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討論；(2) 本着交流經驗和改善其工作的目的聽取一些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報告，然後各黨就這些報告提出意見；(3) 根據一些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請求，就它們的政治路線和實踐活動向它們提出建議以供情報局會議進行討論，而在刻不容緩的情況下，將接受有關各黨必須執行的決議和指示；(4) 促進共產黨和工人黨在黨的組織建設、馬列主義

理論宣傳、改善黨的整個意識形態工作和加強同反動的意識形態鬥爭方面的工作；（5）檢查情報局會議決議的執行情況，提出問題供情報局會議進行討論；（6）對《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刊物實施領導；

3. 情報局會議認為必須創建情報局秘書處作為其常設機構並且設立情報局總書記職務。¹

這樣就規定了情報局秘書處的新職能，並確定了設立秘書處總書記的決定。

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第四次會議於 1950 年 11 月 22 — 24 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這次會議的重點是討論關於加強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問題。會上，蘇斯洛夫向各位代表發出號召：在「不斷增長的被壓迫人民強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高漲」中，「也應該考慮到那些尚未加入情報局的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共產黨，應當對那些向情報局尋求建議的共產黨提供幫助。」並指出了要幫助的共產黨是印度、印尼、伊朗、挪威、比利時、荷蘭、古巴共產黨。² 會上，所有代表都一致同意，國際局勢的發展要求擴展該組織的功能，一個改組的共產黨情報局將能夠在和平運動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運動中起到更好的領導作用。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多諾弗里奧指出，決不能因為不能對那些還不是共產黨情報局成員的共產黨提供建議和幫助，而使和平運動萎縮。意共代表雖然認為，需要擴大情報局的職能，對那些沒有加入情報局的共產黨提供幫助，但加強情報局職能的目的是為了開展和平運動。然而，蘇斯洛夫在強調給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提供援助是「我們的國際義務」的

1 ЦХСД, ф.17, оп.162, д.44, л.213-214,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4, с.156.*

2 РЦХИДНИ, ф.575, оп.1, д.123, л.76,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216-217.*

同時，還要求規定情報局可以通過各成員必須執行的決議和命令性指示。¹ 這一點引起了其他成員的消極反應。而且，對於蘇共提出的設立情報局總書記一職的建議，除了蘇斯洛夫和昌科夫的講話中談到了之外，其他代表的態度也都是消極的。無論是在法戎的報告中，還是在喬治烏·德治、多諾弗里奧、霍爾瓦特、巴列什和貝爾曼的發言中，都沒有提到關於設立情報局總書記職務這一問題。相反，多諾弗里奧強調的則是擬議擴大和加強職能的共產黨情報局要不同於舊的共產國際。² 會上，雖然各國代表都一致認為，需要加強情報局的職能，但是在這一問題上，蘇聯代表的立場與其他共產黨代表的立場存在明顯的分歧。

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原本確定於 1950 年 12 月 23 日召開共產黨情報局第四次會議，討論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問題並且選舉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但是，這次會議的召開卻遇到了障礙：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拒絕擔任改組後的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一職。陶里亞蒂糟糕的健康狀況以及斯大林希望他同意關於加強共產黨情報局職能這一重要問題的願望使蘇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把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推遲召開。

12 月 8 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關於陶里亞蒂同志來蘇聯治療」的決議，決定：「採納對外政策委員會的建議，派巴庫列夫教授（克里姆林宮醫療衛生局）和舍夫利亞金同志（對外政策委員會）前往維也納迎接陶里亞蒂同志，並陪同其前往莫斯科。」12 月 20 日抵達莫斯科之後，根據蘇共中央的計劃，陶里亞蒂被安排住進了醫院。聖誕節前夕，斯大林給陶里亞蒂打了電話，第一次建議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擔任情報

1 АПРФ, ф.45, оп.1, д.293, л.96-98,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с.581.

2 RTsKhIDNI, f.575, op.1, d.122, 1.43, 轉引自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p.203.

局總書記一職。¹

1951年1月4日，陶里亞蒂致函斯大林，拒絕擔任情報局總書記，並在信中闡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在陶里亞蒂看來，意大利共產黨「正面臨着最困難的時期，正是在這一緊要關頭，意大利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無論如何不能沒有陶里亞蒂同志和他的領導。換句話來說，這意味着極大地削弱我們的陣線」；其次，陶里亞蒂認為，由於1951年3月份即意大利將開始市政選舉運動，「如果在選舉之前，陶里亞蒂同志接任國外的的工作，不在國內的話，那麼我們的敵人將會圍繞這個事實，全面開展自己的宣傳活動和挑撥性攻擊」；第三，意大利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將要在1951年3月開幕，而這次會議應該由陶里亞蒂主持。最後，在給斯大林的信件中，陶里亞蒂以並不十分讚揚的口氣對共產黨情報局本身進行了評價：

談到情報局及其祕書處的組成，我並不了解那裏的工作進行得如何，因此，也無法發表準確的意見。作為情報局祕書處成員直今仍在布加勒斯特工作的意大利同志給我的印象是：他們那裏的實際工作很少。從另一方面我還發現，最近一段時間（大約6—8個月期間），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在開展自己的工作時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幫助，但是，他們得到的這種幫助來自於全世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祕書處的，要比來自於情報局的多。準確地說，情報局確定總的政治路線，而和平擁護者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祕書處在發展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善於給予具體的，十分有效的指示。例如，在英國和美國的，這一領域裏就出現了重大的轉折。在這種經驗基礎上，我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在目前的條件下，通過鞏固和發展如和平擁護者這樣的運動，來改善我們

1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62, д.45, л.71,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ч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359-360.*

在國際範圍內的工作情況，要比通過半合法組織的行動更容易一些，我們的共產黨情報局正是這種半合法的組織。¹

在陶里亞蒂看來，全世界爭取和平戰士的廣泛運動要比共產主義運動好一些。對此斯大林極其關注。²

在遭到陶里亞蒂的拒絕後，蘇聯領導人仍不放棄，並在1月13日、1月19日和2月12日同陶里亞蒂又舉行了三次會談，關於這三次會談的記錄，目前還無法得知，但可以得知這些會談的內容都集中在斯大林的建議——陶里亞蒂成為共產黨情報局的首腦上。³為了說服陶里亞蒂擔任情報局總書記，蘇聯領導人甚至打算推遲召開擬議中的情報局第四次會議。1月18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致情報局各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文本：

鑒於目前在提出情報局總書記候選人這一問題上遇到了嚴重的困難，解決這個問題與擴大情報局的職能有關，而擴大情報局的職能又是即將召開的本次情報局會議的主要內容，因此，蘇共中央和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議，把擬定於1月25日召開的情報局會議推遲2—3個月後召開。關於情報局例行會議召開的日期，秘書處在與各國共產黨協商之後，將另行提出建議。⁴

但蘇聯領導人說服陶里亞蒂當然情報局總書記的願望最終沒能實現。1月19日，陶里亞蒂在與蘇共領導人舉行了會談之後，又同前來莫

1 陶里亞蒂關於拒絕情報局總書記致斯大林的信，1951年1月4日，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6卷，第357頁。

2 在頁邊空白處，斯大林在「通過鞏固和發展這種運動」一句話下面劃了線。參見 *Адибеков Г.М.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360-362.*

3 Pons, Silvio, "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p.16.

4 *Источник, 1995, №3, с.138*,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360.*

斯科的意共其他領導人隆哥和謝佳舉行了小型會議，商討蘇聯方面提出的意見。2月12日，由陶里亞蒂、謝佳和科隆比署名的會議情況報告被遞交給了格里戈良，後者當天就把它轉交給斯大林。這份報告指出，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一致表示，蘇聯同志關於陶里亞蒂現在不能居住在意大利的建議是合適的建議，應當被接受。同時，黨的領導同志認為，不應把領導國際組織的責任加諸到陶里亞蒂同志身上。」¹至此，陶里亞蒂與意共其他領導人就拒絕讓陶里亞蒂擔任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的建議達成了一致意見。情報局解散之後，1956年6月24日，陶里亞蒂在意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講話中，對他同斯大林關於擴大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問題的討論進行過論述。陶里亞蒂認為，當情報局成立的時候，他就感覺到這個行動同共產國際解散時所採取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路線在本質上是相反的，因而有所懷疑。但是，他認為，在當時的國際局勢下，在「有人對共產主義的力量、對社會主義、對民主、對和平發動了巨大的冷戰攻勢」的情況下，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個地區之間需要恢復接觸。陶里亞蒂認為，他同蘇聯領導人在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發生的最嚴重的分歧，是1951年1月拒絕斯大林擔任共產黨情報局總書記職務，陶里亞蒂認為，設立情報局總書記這一行動「在輿論看來不能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共產國際組織，這只能在局勢已經極端嚴重的當時對國際局勢發展產生嚴重和消極的影響」；其次，「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來說，採取這樣的方針是不正確的。」最後，陶里亞蒂提出個人方面的許多表示反對的理由。陶里亞蒂的這種態度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但是問題終於獲得了很好的解決」，「斯大林同志收回了他的建議。」²在此之後，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再也沒有向蘇共領導人提出過關於擴大共產黨

1 ЛПРФ, ф.45, оп.1, д.319, л.33, 346,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4, с.161.

2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第115頁。

情報局職能和設立總書記職務的問題。¹ 共產黨情報局第四次會議也始終沒有召開。

有學者認為，陶里亞蒂拒絕擔任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總書記的職務，直接導致了斯大林擴大情報局職能的努力歸於失敗。認為陶里亞蒂對情報局前景的消極看法，對斯大林重新審議擴大情報局職能的規劃起了重要的影響。斯大林從陶里亞蒂對情報局作用的分析中和在追求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看到了情報局各黨對重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厭倦和抵制。學者並舉出了一些例子：在 1950 年 11 月召開的討論擴大情報局職能問題的秘書處會議上，除了蘇共代表和保共代表積極倡議設立共產黨總書記職務外，其他各黨代表在發言中對此一字未提。在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問題上，當蘇斯洛夫提出「在不容遲延的情況下，將給情報局內的有關各黨下達必須執行的指示」時，與會代表中只有匈牙利代表支持他的觀點。這表明，各黨都不希望蘇共假借總書記之手進一步操縱和控制各黨。後來，陶里亞蒂在給斯大林的信中對情報局工作進行的批評性分析，實際上是反映和代表了大多數黨的普遍看法。斯大林正是在明白了情報局內的人心向背後，才失去對情報局前途的信心，並最後放棄了擴大情報局職能的試圖的。²

不可否認，陶里亞蒂拒絕擔任情報局總書記一職，以及情報局其他成員對擴大情報局職能的消極態度，是導致蘇聯領導人擴大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的重要原因。但是，這絕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為重要的原因還是國際局勢的發展和蘇聯外交政策的轉變。

-
- 1 1951 年 4 月 11 日格里戈良在提交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提出了在 7 月份召開共產黨情報局例會的建議，其中提出了會議需要討論的 3 個問題：(1) 關於各國共產黨在爭取工人階級的聯合和切身利益的鬥爭中的任務問題。(2) 關於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加強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問題。(3) 目前的任務是：關於報紙編輯部的工作問題以及關於共產黨情報局雜誌的出版問題。而沒有再提出關於加強情報局的職能和設立情報局總書記職務的問題。見：Адибеков Г.М. 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с.151-152.
- 2 張盛發：《50 年代初斯大林重建國際共運中心的努力及失敗》，《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8 年第 3 期，第 28 頁。

三、蘇聯領導人擴大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的原因

蘇聯領導人提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問題是為了實行其「間接戰略」的需要：加強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控制，特別是希望通過對歐洲、美洲和亞洲的共產黨提供幫助，來加強國際工人運動和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使西方國家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以此減緩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在避免與美國直接對抗的情況下延緩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蘇聯的經濟建設贏得時間。

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國的參戰使美國陷入了朝鮮戰爭而不能自拔，牽制了美國的力量，無論是在太平洋上還是在美國國內，都給華盛頓當局帶來了損失。從這方面來說，斯大林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朝鮮戰爭對於社會主義陣營是有利的，也正因為如此，斯大林不願意進行談判，結束朝鮮戰爭，而是鼓勵中國把這場戰爭持續下去。1951年6月5日，斯大林貌似贊成了毛澤東的立場，而實質上卻是將自己對問題的見解強加給了中國領導人：「我贊同您的主張，即不應當急於結束朝鮮戰爭，因為進一步的軍事行動一方面可以使中國軍隊學會現代戰爭藝術，另一方面也可以削弱杜魯門主義在美國的影響，打擊英美軍隊的氣焰。」¹

然而，朝鮮戰爭的持續使原本緊張的國際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使蘇聯領導人對戰爭的擔憂增加了。在北朝鮮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的情況下，戰爭拖得越長斯大林就越擔心美國在歐洲發動進攻以彌補它在亞洲的敗退。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在朝鮮戰爭進入僵持狀態之後，「美國飛機沒

¹ АПРФ, ф.45, оп.1, л.339, л.17-18, 轉引自 *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с.238-239.

有一天不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領空」。¹ 莫斯科對於美國可能派兵打進捷克斯洛伐克保持高度警戒。²

1951年1月9—12日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最高領導人和國防部長祕密召開的會議也證明了蘇聯領導人對朝鮮戰爭之後國際局勢的擔憂。東歐各國最高領導人及國防部長都被邀請到了莫斯科參加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談到了朝鮮戰爭的經驗。按照他的看法，戰爭顯示出軍事力量的軟弱，軍事力量的優勢不是在美國方面，而是恰恰相反，在社會主義軍隊方面。雖然美國廣泛使用了現代軍事技術，但是他們並沒有取得勝利。這對歐洲和社會主義陣營都具有重要意義。後者在歐洲佔有軍事優勢，美國及其盟國在歐洲的優勢不可能在短期內打破。斯大林提供了準確的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力量資料，並指出了形勢的複雜性，美國會進一步加速向歐洲調兵遣將。從斯大林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社會主義陣營的軍事優勢只是暫時性的，最多只能維持4—5年時間。在這期間，西歐國家的軍事力量還會增強，美國軍隊可能會廣泛地使用原子武器。³ 斯大林的這種擔憂表明，美國雖然陷入了朝鮮戰爭之中，但蘇聯在歐洲的壓力並沒有減輕，反而面臨着更加危險的局面。

對國際局勢的這種看法和對戰爭危險的擔憂促使了蘇聯領導人對外戰略的轉變。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的理念已經開始回歸到1920年代中期形成的那種觀念上。當時，對斯大林來說，「在敵對的資本主義勢力包圍的條件下，對外政策優先是關鍵因素。所有其他一切事情都應服從於以最快速度提高軍事工業實力這一偉大任務」。⁴ 為了完成這一任務，蘇聯

1 Khrushchev Remembe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 362, 轉引自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118.

2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100.

3 Каплан К. Возвышение и падение Алексея Чепичк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10, с. 85-86. 又見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463-464.

4 Валокитина Т.В.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613.

領導人開始加強國內的軍事建設。最突出的就是建設了一條北極圈內的通往楚科奇的鐵路，在楚科奇、勘察加、北冰洋沿海一帶建立了軍事設備供應基地。在楚科奇佈置了第 14 登陸集團軍，該集團軍由奧列涅夫將軍率領，其任務是在一旦與美國爆發戰爭的情況下不僅在阿拉斯加實施登陸戰役，而且在美國西部沿海一帶實施登陸戰役。朝鮮戰爭之後，軍人對蘇聯政治生活的影響增加了。以前失寵的朱可夫元帥和庫茲涅佐夫將軍等人又積極活動起來就證明了這一點。蘇軍人數和軍費開支都急劇增長，軍事工業綜合體也有了很大的發展。¹ 在 1951—1952 年期間，蘇聯的軍事開支在加速增長。對戰爭和海軍部門以及生產、研發武器和軍事技術的部門的資金投入，在 1951 年增長了 60%。在軍事領域，最優先的發展領域放在了原子武器項目上。除了開展原子彈實驗外，相當數量的資源被投入到了火箭技術、噴氣式航空技術和圍繞莫斯科的防空系統中。² 在整個 1951 年和 1952 年期間，蘇聯軍隊增加了將近一倍，達 490 萬人，防務開支增加了 50%。³

為了完成國內建設的任務，做好應對戰爭的準備，維護和平的任務就更加迫切了。但加強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與維護和平的任務顯然是矛盾的。正如陶里亞蒂 1 月 4 日在給斯大林的信件中所說的，設立情報局總書記這一行動，「在輿論看來不能不意味着重新回到共產國際組織，這只能對當時已經極端緊張的國際局勢的發展產生嚴重和消極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已顯得沒有必要，而且，設立共產黨情報局祕書處總書記的職務，這就難免會使共產黨情報局共產國際化。這是蘇聯領導人不能不加以考慮的。畢竟共產國際曾經是蘇聯與西

1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с.314.

2 Gorlizki, Yoram, and Oleg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99-100.

3 拉弗貝：《美蘇冷戰史話（1945—1975）》，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0 年，第 153 頁。

方國家關係中的重要障礙。特別是在當時的國際條件下，美國國內盛行麥卡錫主義，反共反蘇思想蔓延的情況下，加強共產黨情報局的職能，將會導致美國對蘇聯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斯大林放棄了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嘗試，而是把阻止戰爭的希望越來越寄託在和平運動上。1951年2月16日，斯大林在對《真理報》記者發表的談話中，在談到當前國際形勢時，斯大林說，至少在目前，不能認為新的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各國人民將維護和平的事業擔當起來，並且進行到底，和平就能夠保持和得到鞏固。因此，廣泛的維護和平的運動，現在具有重大的意義。¹

也就是說，新的國際局勢的出現使加強情報局職能已經沒有必要，反而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危害。因此，在擴大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之後，斯大林及蘇聯其他領導人就放棄了世界革命的想法，之後再也沒有提出關於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建議和設想，而是仍然把情報局的工作主要放在和平運動方面，直到情報局解散。

1 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編委會：《戰後世界歷史長編（1950—1951）》第六分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09頁。

第七章 蘇聯對亞洲國家共產黨政策的變化與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

為了應對西方聯盟不斷加強的趨勢，使美國等西方國家陷入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中，減緩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同時，為了應對蘇聯在亞洲面臨的挑戰，蘇聯領導人改變了對亞洲國家共產黨的政策，提出了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¹ 然而，斯大林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立場是矛盾的：一方面希望建立這一機構，另一方面不願為建立這一機構承擔責任；一方面把建立這一機構的任務委託給了中共領導人，另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存在對「東方鐵托的擔心」。隨着朝鮮戰爭之後國際局勢的加劇以及斯大林對於在亞洲推廣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發生轉變，蘇聯領導人最終放棄了建立東方情報局的設想。

一、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的提出

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引起了中國輿論的廣泛關注。國民黨報刊和國民黨的官方機關發動了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宣傳，把情報局會議的召開和成立情報局描繪成「共產國際的復興」，甚至是「共產國際從地下走了出來」，並且出現了「關於成立了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的宣傳，而歐洲

1 在俄國和中國的相關檔案中，關於亞洲地區的共產黨聯合組織曾出現過遠東情報局、亞洲情報局、東南亞情報局和東方國家情報局等不同的提法，本文把這些說提法統稱為東方情報局。

和美國的一些通訊社也立即效法起了這種宣傳，一時間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宣傳甚囂塵上。1947年11月18日到20日，法新社、路透社、中國和印度尼西亞的一些報紙援引香港廣播電台的報道進行報道說：「根據可靠的消息來源」，「遠東地區的共產黨人打算近期在哈爾濱開會，以便建立自己的共產黨情報局。中國、蒙古、朝鮮、印尼、印度、馬來亞和越南的共產黨將參加這次會議」，根據11月19日香港廣播電台的另一個「可靠的」的消息：「正如來自香港的報道，11月20日，滿洲、蒙古、朝鮮、印尼、馬來亞和印度支那的共產黨將在哈爾濱召開代表大會，會上將會建立東南亞和遠東情報局，共產國際在貝爾格萊德恢復行動的事實非常明顯地證明，蘇聯政府進行偽裝的時期一去不復返了。」11月20日，上海《東南日報》就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進行了更為詳細的報道：「今天，在哈爾濱召開了遠東共產黨代表大會，以便討論關於建立遠東情報局問題，中國、朝鮮、蒙古和暹羅將參加會議。毛澤東已經派遣了非常著名的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參加會議，並擔任會議的主席，李立三現在正在滿洲。」報紙補充說，建立「遠東」情報局被看作是在貝爾格萊德建立「歐洲」情報局之後合乎邏輯的一步。儘管11月22日，中共中央駐香港的代表喬木（胡喬木的筆名）作為廣東報刊的代表聲明說，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報道「純屬虛構」，而國民黨的報紙仍然繼續發表關於「東方七國共產黨會議的詳細情況」。例如：11月29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南京政府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報道說：「遠東情報局會議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1. 在遠東地區成立共產黨情報局；2. 遠東地區各國在其爭取自治的鬥爭中相互合作；3. 不斷地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而12月19日，國民黨警察的報紙《獵豹》（在上海發行）在對「關於成立了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細節進行報道時，也「胡言亂語地說了一些反蘇維埃的謠言」。中國輿論界出現的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報道還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在亞洲地區擁有利益的英國和法國領導層對於在亞洲建立情報

局的消息真的都感到非常驚恐。這一消息瞬間就傳遍了巴黎和倫敦的報紙。」¹

那麼，在貝爾格萊德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時候，是否存在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這一問題呢？俄國學者阿季別科夫曾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結果是，並沒有發現任何與蘇聯領導人建立亞洲情報局或遠東情報局計劃相關的俄國檔案材料。作者根據斯大林領導層否決了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拉克西提出的關於於 1947 年 9 月底在布達佩斯召開多納河流域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建議，根據蘇聯領導人對丹麥和挪威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召開北歐國家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想法所持的懷疑態度，以及根據 1948 年 4 月蘇共中央拒絕了巴勒斯坦共產黨總書記米古尼斯、民族解放聯盟（巴勒斯坦共產黨組織）總書記艾米里·哈比比、土耳其和伊拉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召開阿拉伯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的建議等事例得出了自己的結論。作者認為，莫斯科贊成建立亞洲情報局或者哪怕是贊成這一地區的國家共產黨召開一般的會議的想法都是值得懷疑的。²

阿季別科夫舉出的上述論據說明：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初，蘇聯領導人對情報局之外的歐洲國家共產黨和中東國家共產黨的政策是謹慎的，對這一地區共產黨的國際聯合持否定態度。那麼，蘇聯對遠東和東南亞地區共產黨的政策是怎樣的呢？最近解密的俄國檔案同樣證明，這一時期蘇聯對這些地區共產黨的政策也是極為謹慎的，對這一地區共產黨的國際聯合也同樣持否定的態度。

首先，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時，應該說，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仍然是極為謹慎的，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蘇聯領導人在毛澤東訪蘇問題上的立場。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及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雖然早在 1947 年 6 月，斯大林就同意了毛澤東提出的訪蘇要求，但實際上非常

1 《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 19 卷，第 40-77 頁。

2 *Адиб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80-81.*

擔心和毛澤東的密祕會見被美國和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所知，使他們認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從而造成的不良的國際影響。¹ 因此，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儘管隨着中國革命的日益勝利，斯大林在逐步改變對中國革命的看法，正如他在 1948 年 2 月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領導人在莫斯科的談話中所談到的對中國革命的樂觀看法一樣，但斯大林仍然一再拖延毛澤東對蘇聯的訪問，² 並且蘇聯政府一直與國民黨政權保持着正常的外交關係，直到新中國成立。

其次，戰後初期，斯大林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政策顯得更加謹慎。長期以來，一些學者根據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後蘇聯發起的激進的對外宣傳論調認為，蘇聯在 1948 年 2 月的加爾各答會議上對東南亞共產黨施加了影響，強調來自「莫斯科的命令」促進了 1948 年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緬甸等國共產黨革命的爆發。³ 但是，最近解密的檔案材料證明，1948 年這些國家革命的爆發並不是「來自莫斯科的命令」，而是在這些國家在其當時的國內條件下，各國共產黨自身發動的革命行動。解密的馬來亞政治部的檔案表明，馬來亞共產黨發動的起義是由於本國的國內因素，而不是由於接到來自蘇聯的「指示」而爆發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作出武裝抵抗的決定是由於他們以「開放式」推翻政府的活動的努力失敗了，

1 Zubok, Vladislav M., "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January 1996, Hong Kong).

2 關於斯大林拖延毛澤東訪蘇要求，詳見：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1: 1946-1948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 с.333；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年，第 547 頁；列多夫斯基：《米高揚與毛澤東的祕密談判》上，《黨的文獻》1995 年第 6 期，第 82 頁；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修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年，1995 年，第 366-367 頁。

3 Tanigawa Yoshihiko, "The Cominform and Southeast Asia", Yonosuke Nagai and Akira Irye e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72-374; 又見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55.

因此，他們認為實現自己目標的唯一道路就是通過訴諸武裝起義。¹ 而緬甸共產黨發動的革命鬥爭是當時緬甸國內政治鬥爭加劇的結果。這次革命的起因是緬甸資產階級政府發動的「三二八事變」。² 至於印尼共產黨，它當時同蘇共實際上是沒有聯繫的，³ 也不可能根據莫斯科的命令行事。

解密的俄國檔案表明，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前後，蘇聯領導人對東南亞共產黨的政策是極為謹慎的，他們不僅不願與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建立直接的聯繫，而且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建立這些國家共產黨的國際聯合也是不可想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於與西方大國合作的需要，東南亞共產黨的活動在戰後蘇聯的對外政策中出於邊緣地位。儘管東南亞共產黨面臨良好的革命的條件，並且希望得到蘇共的支持和援助，然而，斯大林一直拒絕同該地區的共產黨發生直接的聯繫。戰後初期蘇聯對東南亞共產黨的謹慎政策突出地表現在對越南共產黨的政策上，對於越共領導人胡志明在 1945 年 9 月 22 日請求斯大林給予可能的幫助的電報，莫斯科一直都持冷漠的態度。⁴ 蘇共只是通過對世界民主

1 Leon Comber,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Communist of Malaya (1948-1960)", *ISEAS Working Paper: Politics & Security Series*, No. 1(2009).

2 緬甸獨立以後，德欽奴 (Takun Hy) 政府奉行的向英國政府妥協的政策引起了國內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緬甸國內的群眾運動高漲起來。緬甸共產黨、全緬職工聯合會、緬甸民主青年和全緬農民協會和其他的進步團體，揭發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人的出賣罪行，組織數千群眾參加共產黨的群眾大會，聽取共產黨人對德欽奴政府的譴責。在這種情況下，德欽奴政府通過了嚴格的法令。為解散人民的武裝，其中有一個法令規定：凡非法持有武器者將被處以死刑；還有一個法令授權警察對任何人未經審判而加以無限期的扣留。1948 年 3 月 28 日，德欽奴政府向緬甸共產黨等進步團體發動了全國性的進攻，搜查了許多機關、沒收許多財產，逮捕許多人，用軍隊驅散仰光工人罷工，把一百多個罷工工人關入牢獄，逮捕 11 個全緬職工聯合會的共產黨員以及很接近共產黨的同情者。在此情況下，共產黨在農村的支部和農民協會馬上拿起武器，開始進行武裝抵抗。3 月 29 日，共產黨地下政治局和中央發出指令，要求開展全國性的武裝鬥爭。ПГАИИ, ф.5, он.28, л.91, л.224-226.

3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New Russian evidence on the Calcutta Youth Conference of February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ctober, 2009, p.461.

4 Bradley, Mark, "Constructing an Indigenous Regional Polit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Vietnam and Diplomacy of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1946-1949",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January 1996, Hong Kong).

青年聯合會（成立於 1945 年 11 月）、國際大學生聯盟（成立於 1946 年 8 月）、以及蘇共共青團中央下屬的蘇聯青年反法西斯委員會對東南亞各國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領導人和組織加以控制。¹

蘇聯不僅拒絕直接發展同東南亞共產黨的關係，而且對這一地區共產黨之間的聯合持反對態度。1947 年 9 月，也就是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前夕，蘇共駐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的代表奧爾加·切喬特金娜向共青團中央和蘇共對外事務部提交了一份關於她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訪問的祕密報告。² 在這份報告中，切喬特金娜闡述了她個人對所訪的東南亞國家的局勢的看法，並特別談到了印度、印尼和東南亞其他國家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談論了這些國家共產黨對反對帝國主義起義的準備，以及他們對開始反殖民主義革命的準備。她強調了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對於從歐洲和美洲的革命力量、特別是從蘇聯獲得援助，進行本國民族獨立鬥爭的希望。「正如在其他的國家一樣，印尼共產黨總書記阿里明同志請我把他們的每天都急需的幫助通知蘇共中央，他們也急需同其他共產黨建立聯繫。他坦白承認，如果不能和莫斯科建立聯繫，得不到來自莫斯科的建議，就很難解決問題。他請求我把這一點轉告蘇共中央。」在報告的結論部分，切喬特金娜提請蘇共中央領導人注意一些需要解決的「重

1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451-452.

2 奧爾加·切喬特金娜的正式身份是蘇聯青年駐世界青年民主聯合會《世界青年》雜誌社的代表。一般來講，像她這樣的職位都是由蘇共領導人從黨的最能幹、最忠誠的成員中挑選出來擔任的。切喬特金娜被蘇共中央指派到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擔任這一職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她非常精通蘇共的政策，擅長從共產黨的角度對國際關係和東南亞國家的國內狀況進行評估。1946 年，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接受了全印大學生聯合會提出的關於派遣一個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委員會到印度訪問的邀請。該委員會還計劃對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訪問，以便調查殖民地國家的狀況，並同該地區的青年組織建立聯繫。1947 年 2 月，由幾位代表組成的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委員會到達了印度，其中包括切喬特金娜。她這次對東南亞國家進行訪問的主要目的不僅僅是為世界民主青年聯合會收集一些信息以便發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為蘇聯領導人特別是為蘇共中央收集信息。這就是為什麼她的分析對於瞭解蘇聯的地區政策如此重要的原因。詳見：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455.

大而迫切的問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關於她到訪的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的問題，「各國共產黨，特別是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毫無疑問都需要經常得到一些重大的幫助和引導。各黨之間需要建立聯繫，沒有這種聯繫他們將會陷於被孤立的危險，面臨最嚴重的國際和國內問題，他們將不可能迅速接受正確的方針」，「完全需要建立一個局把各國的黨都聯繫起來。這樣的局或許是地區性的，但是各局之間要相互聯繫，或者是一個國際性的局。」¹ 這樣，切喬特金娜就明確提出了關於蘇聯對東南亞共產黨提供幫助及建立包括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在內的聯合組織的問題。

但是，對於切喬特金娜的這份報告，特別是對於她提出的關於建立東南亞共產黨聯合組織的問題，首先遭到了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東南亞部門領導人普利舍夫斯基的反對。在10月22日普利舍夫斯基的附信中，切喬特金娜的建議，特別是那些關於亞洲共產黨的建議被認為性質一般，沒有實踐意義而遭到尖銳的批評。「比如，關於東南亞共產黨需要幫助的結論以及他們感覺到相互之間需要更加緊密的聯繫的結論確實是正確的。但是，目前，向蘇共領導人建議建立這些國家共產黨的任何地區聯合組織都幾乎不是適宜的，要考慮到這些國家的政治地位，考慮到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現在扮演的角色。而且，我相信，我們可以談論將來對這些國家的共產黨提供幫助，向他們提供建議，依靠已經在貝爾格萊德建立的情報局，通過情報局發佈的材料以及通過其他的手段向他們提供幫助。」1947年12月10日，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副部長莫舍托夫向蘇斯洛夫祕書處發送了一份報告，其中對切喬特金娜的報告進行了更加尖銳的批評。報告指出，切喬特金娜的報告主要具有通報信息的性質，並且聲稱由於這些通報，切喬特金娜已經被解除了蘇聯駐世界民主青年聯盟雜誌《世界青年》記者的職務，報告強調，切喬特金娜提出的大部

1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460.

分建議都沒有被深思熟慮。而且，報告重述普利舍夫斯基在附信中的話：

委員會的結論說，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需要幫助，並且感覺到相互進一步密切聯繫的必要性，這些結論確實是正確的。但是，目前，向蘇共領導人建議建立這些國家共產黨的任何地區聯合組織都幾乎不是適宜的，要考慮到大部分東方國家的政治地位，考慮到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現在扮演的角色。¹

因此，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如果說在蘇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的宣傳材料中所體現出來的鬥爭性在增長，那麼在蘇共中央對外事務部的一些祕密報告中則看不到這類鬥爭性。這些祕密報告既沒有增加鬥爭性，也沒有強調進行武裝鬥爭。從中也不能發現蘇聯領導人號召亞洲共產黨人起來反對本國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暗示。在1948年春季之前，蘇聯共產黨都同東南亞的共產黨主義活動保持一定的距離，並且盡力不捲入這些國家的國內發展進程。儘管東南亞共產黨特別希望得到蘇聯的援助，包括諸如輸送軍火的軍事援助，蘇聯都沒有這樣做，甚至沒有同東南亞共產黨保持正常的關係。² 蘇聯領導人甚至不確信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能夠取得勝利。

鑒於蘇聯領導人對建立東南亞共產黨聯合組織的這種消極態度，當時蘇聯領導人不可能支持建立任何類似於情報局的東方情報局組織。而且蘇聯領導人的這種態度還得到了另一些俄國檔案材料的證明。1948年1月23日，蘇共駐中共代表普赫洛夫在發給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副主任巴拉諾夫的報告「九國共產黨會議之後中國的局勢」中，對中國國民黨報刊和政府關於遠東情報局的宣傳活動給予了駁斥，他認為「國民黨政

1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462-463.

2 Larisa Efimova, "Did the Soviet Union instruct Southeast Asian communists to revolt?"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451-468.

府之所以需要這種「關於成立了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的愚蠢謠言，是為了使中國的旨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派的人民運動，顯得是由「莫斯科提出來的」運動，並使「自己的美國主子」確信：「在給國民黨提供軍事和財政援助方面自己是最慷慨的。」在報告中，普赫洛夫還批評中共「沒有給國民黨關於成立了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的虛假宣傳予以應有的打擊」。¹

儘管在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初，蘇聯領導人沒有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構想。但是，中共領導人卻是支持這種想法的。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對中共的革命鬥爭產生了影響，在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路線，首次公開提出了通過暴力手段推翻國民黨制度和把帝國主義分子驅逐出中國的政治目標。結果，人民解放軍於1947年7月開始的軍事進攻行動的規模擴大了。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為中國革命的開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而得到了中共領導人的擁護。為了表示與共產黨情報局的路線一致，中共領導人明確表示，希望亞洲國家的共產黨也能夠聯合起來。正如毛澤東於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的：「東方各國的一切反帝力量應該聯合起來，以便在自己的國家裏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的鬥爭，並以解放數以萬計的東方各國被壓迫的人民為自己的鬥爭目標。」²

儘管中共同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都對建立地區性的共產黨聯合組織持支持的態度，但由於蘇聯的消極態度，這一問題一直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直到1948年7月。

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最終被提了出來。1948年7月底，毛澤東向蘇聯方面提出了他打算在莫斯科訪問期間要討論的一些問題，其中提到了關於討論東方革命力量的聯合與東方的共

1 《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19卷，第40-45頁。

2 《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19卷，第51頁。

產黨（及其他黨派）之間的關係問題。在與蘇聯聯絡員進行的會談中，毛澤東着重強調，這些問題「必須談妥，以便我們的政策方針要與蘇聯完全一致」。¹ 儘管毛澤東對東方革命力量的聯合持贊成態度，但毛澤東提出在訪蘇聯期間同蘇聯領導人商談這一問題，究竟是毛澤東自己主動提出這一問題，還是中蘇之間就這個問題已經交換過意見，而只是中共要進一步了解蘇聯的立場，以便與蘇聯的立場保持完全的一致呢？目前還沒有發現相關的檔案材料能夠直接對這個問題作出答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此之後，蘇共領導人對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態度卻發生了變化。1949年2月3日，蘇共派往中共的代表米高揚在西柏坡同毛澤東進行的會談中，談論了關於亞洲國家共產黨之間聯合行動的問題，並明確提出了蘇共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態度。按照蘇共的看法，中共「不應參加共產黨情報局，而應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東方國家情報局，首先由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組成，以後逐步吸收其他共產黨參加。」²

在建立亞洲國家共產黨聯合組織問題上態度謹慎的斯大林，為什麼改變態度，同意建立東方情報局呢？這主要是因為建立亞洲國家共產黨的聯合組織符合當時蘇聯對外政策的需要。

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其主要任務在於反對馬歇爾計劃，阻止西方集團的建立，解決蘇聯面臨的安全問題。但是，西方國家建立聯盟的步伐仍然在不斷加快。1948年3月5日，英國開始同法、比、荷、盧等國就組建「西方聯盟」舉行談判，3月17日，五國外長在布魯塞爾簽訂了為期50年的《布魯塞爾條約》。在蘇聯看來，布魯塞爾條約組織是針

1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1, с.451-452.

2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62-66.

對蘇聯的軍事同盟。3月23日，在呈遞給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的外交部業務分析材料裏強調指出，布魯塞爾條約「是組建美國領導下的西方同盟總計劃中的第一個正式的軍事政治同盟條約」。專家們還指出，該「條約是軍事同盟條約，其目的首先是反對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論據有兩點：第一，與戰爭期間和戰後簽訂的所有其他歐洲條約不同，布魯塞爾條約序言只簡要地提到了德國侵略威脅，而在基本的軍事條款裏只籠統地提到「歐洲武裝侵略」；第二，該條約參加國英國和法國同蘇聯簽有條約，但兩國事先既沒有通知自己的盟友，也沒有發表關於新同盟不威脅蘇聯安全的聲明。¹「西方聯盟」的計劃引起了蘇聯的領導人的高度警惕。正如蘇聯方面所認為的，組建的這一軍事同盟「不僅僅用來針對德國，而且同樣可以對付那些曾經是二戰同盟國的國家。美國、英國及法國的所有媒體都公開表示，這一同盟是旨在針對蘇聯的……很明顯，五國簽署的軍事條約無論如何也不能被視為是自衛條約。」蘇聯還把西歐聯盟的建立同馬歇爾計劃聯繫起來，認為，「無論是美國的經濟援助計劃，還是英國的西方聯盟政治計劃都將會使西歐和東歐對立，然後，將導致歐洲的政治分裂。」英美佔領區的建立導致了德國的分裂，使德國的西部擺脫四大國的聯合控制，「試圖利用它來組建特別的西歐集團，與歐洲的其他國家相對立，這將導致德國的分裂和歐洲兩大陣營的形成。」²總之，在蘇聯領導人看來，美英兩國領袖們當前的政策，就是侵略的政策，發動新戰爭的政策。³

在美國聯合歐洲國家組建西歐聯盟的同時，亞洲也出現了聯盟的趨勢。隨着美國在中國的失敗，出於反蘇和反對共產主義的考慮，美國

1 АВІПРФ, ф.07, оп.21, п.33, д.497, л.1-2, 轉引自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291-314.

2 *С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с.562-569. 537.

3 斯大林答真理報記者問，《人民日報》，1948年11月2日，第1版。

逐步改變了限制和削弱日本的政策。自 1947 年 10 月到 1948 年 2 月，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凱南兩次就美國的遠東戰略問題提出報告，其中把日本放到了主要的亞洲潛在盟國的地位。1948 年 1 月 6 日，美國陸軍部長羅亞爾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說，標誌着美國對日政策從多方限制、削弱、打擊改為積極幫助、扶植和支持日本。¹ 與這種政策轉變相適應，美國對日賠償政策也在由嚴厲到緩和繼而轉向對日援助的方向發展。在蘇聯看來，美國扶植日本的重要目的在於為其在亞洲組建軍事聯盟服務的。1949 年初，《真理報》發表了馬里寧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揭露美國扶植日本，組建太平洋集團的圖謀。文章指出，早在 1949 年 1 月，在美國的推動下，若干亞洲及中東國家代表在德里舉行會議，為美英組織太平洋集團的計劃鋪平道路。不久，這些國家又在德里召開會議，「貫穿這次會議的乃是由英美統治集團與若干亞洲國家中反人民的反動分子組成政治聯盟的基本主張，這個政治聯盟的目的是為了共同鎮壓日益增長着的人民民主運動。目前，美英兩國要使這一反動的政治聯盟發展成為侵略集團。最近，關於簽訂「太平洋區域公約」的談判正在進行中。「顯而易見，作為北大西洋公約補充物的太平洋集團，將完全為美國統治集團所支配。在華爾街的太平洋區侵略計劃中，日本已被指定要起特別的作用。日本外長已向英國、美國和若干太平洋區以及遠東國家政府提出建議：要它們仿照北大西洋公約與日本訂立太平洋公約。」馬里寧文章的結語稱，正在籌組中的太平洋集團的謀劃是昭然若揭的，這就是英美帝國主義陣營正在向爭取穩固而民主的和平力量發動戰爭。² 在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和朝鮮的掠奪計劃失敗之後，美國國務院和美國軍國主義者就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日本，作為反對蘇聯和反對亞洲各國民主運動的軍事冒險的主要基地，「在日本的美國當局實行着恢復日本帝

1 劉金質：《戰後國際關係史》（上），第 38-39 頁。

2 Правда, 4 апреля 1949г.

國主義以及使日本軍事化的政策」，「美國新計劃的主要目標在於把日本變成軍事工業的反蘇堡壘。」¹

為了彌補在歐洲的劣勢和應對在亞洲面臨的挑戰，同時避免同美國的直接對抗，斯大林開始實行「間接戰略」，並且，他從中國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實行這一戰略的機會。隨着中國革命的勝利，斯大林開始改變對亞洲殖民地革命的態度，希望通過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來牽制帝國主義的力量，並削弱帝國主義，使其不能在歐洲發動的攻勢，並把殖民地人民吸引到「和平力量」一邊，削弱帝國主義陣營。為了實施這一戰略，蘇聯領導人開始改變戰後對各國共產黨活動的謹慎態度，開始重視亞洲各國的革命，尤其是重視中國的革命。在斯大林看來，「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這些國家都沿着同一條道路前進，那麼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有了最終保證」。² 畢竟，蘇聯領導人的政治邏輯仍是實用的，是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來分析國際發展趨向的，其主要特徵是懷疑周圍的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堅信「和美英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³ 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殖民地革命的開展還可以加速美國與英美的矛盾，削弱帝國主義陣營。早在 1945 年 9 月，邁斯基在提交給莫洛托夫的報告中就指出了這種衝突，邁斯基認為：在革命形勢出現的情況下，爭奪中東和亞洲的市場和資源將轉移美英兩方的注意力，並且邁斯基預計戰後美國擴張政策會促使美國反對歐洲的「大殖民帝國」。⁴ 為了充分利用亞洲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力量，加劇美英矛盾，削弱帝國主義陣營，建立東方情報局，組織亞洲各國人民開展革命鬥爭則無疑是符

1 Правда, 4 января 1949г.

2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77.

3 Zubok, Vladislav M., "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January 1996, Hong Kong), p.8-9.

4 AVPRF, ф.06, оп.7, п.18, д.184, п.65-67, 轉引自 Zubok, Vladislav M., "Stalin's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January 1996, Hong Kong), p.8-9.

合蘇聯外交的需要的，而且，亞洲國家共產黨也希望建立起這種聯合組織。

二、蘇共和中共領導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

隨着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的提出，這一問題逐漸出現在蘇共和中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會談和協商的日程之中。1948年7月底，在毛澤東向蘇聯領導人提出商談關於東方革命力量的聯合問題的建議之後，由於毛澤東的訪蘇計劃被推遲，中蘇兩黨領導人沒能就這一問題舉行會談，直到1949年1月底蘇共派出的代表米高揚到西柏坡同中共領導人舉行會談。在2月3日舉行的會談中，毛澤東同米高揚談論了關於亞洲國家共產黨之間聯合行動的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共「支持與印度支那、暹羅、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緬甸、印度、馬來西亞和朝鮮共產黨的聯繫」，中共與印度支那和朝鮮共產黨的聯繫緊密些，但是，「和其他共產黨的聯繫較少，與日本共產黨基本上沒有關係」，「與各共產黨的聯絡工作是通過在香港的專職人員進行的」，但是這項工作做得較差。因此，毛澤東說，「在這樣的條件下不應過早成立像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那樣的亞洲國家共產黨情報局。」這次會談中，毛澤東並沒有否認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必要性，只是認為，建立的時機還不成熟，要等中共軍隊佔領了中國南方地區，局勢得到鞏固以後再討論這一問題。然後，毛澤東進一步談論了他對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的看法。毛澤東指出，暹羅和印度支那共產黨曾表示贊成成立東方情報局，應該「先由幾個亞洲國家，不是所有國家的共產黨，例如中國共產黨、朝鮮共產黨和菲律賓共產黨的代表建立亞洲國家局比較合適」。至於日本共產黨，毛澤東認為，它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望還不高，而且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沒有聯繫。會談中，米高揚也明確提出了蘇共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態度。按照蘇共的看法，中共「不

應參加共產黨情報局，而應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東方國家情報局，首先由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和朝鮮共產黨組成，以後逐步吸收其他共產黨參加。¹ 蘇聯領導人對中共、日共和朝鮮共產黨的重視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三個國家都瀕臨蘇聯，在蘇聯的戰略安全中佔據着重要的位置，而且，此時美國扶植日本，在遠東建立太平洋集團的努力對蘇聯在遠東的安全造成了威脅。

蘇聯領導人雖然希望建立由中共、日共、朝鮮共產黨以及亞洲其他國家共產黨組成東方情報局，但是，他們顯然只是在同中共領導人協商這一問題。從 1948 年年中到 1951 年 1 月，斯大林在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信件或與中共領導人舉行的會談中有幾次談到了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但是，在他這一時期同包括朝鮮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領導人舉行的會談中，還沒有發現有關談論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的內容。² 1949 年 2 月米高揚對中國進行訪問的時候提出了關於首先建立由中共、朝鮮共產黨和日共建立的東方情報局問題。3 月初，斯大林在莫斯科同金日成舉行了兩次會談，其中在 3 月 5 日的會談中沒有提到這一問題，³ 另一次會談的檔案還沒有解密，但很有可能的是，也沒有討論這一問題，至少這一問題沒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視。因為這次會談後中共沒有收到關於朝鮮共產黨在建立由中共、日共和朝鮮共產黨組成的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態度的情報，而不得不就這一事宜直接向朝鮮方面詢問。1949 年 4 月底，受金日成的委託，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對中國進行祕密訪問，並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了關於把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族師轉屬

1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62-66.*

2 這些會談包括：1949 年 3 月 5 日和 3 月 15 日同朝鮮共產黨領導人舉行的會談；1950 年 1 月同越共領導人武元甲舉行的會談，1950 年 1 月 14 日同印度共產黨代表拉達克里希南和達亞爾舉行的會談；1950 年 4 月 10 日同北朝鮮共產黨領導人金日成舉行的會談。

3 斯大林與金日成在 1949 年 3 月 5 日的會談參見：*Christian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 Reader*, Yale University, 1999, p.434-439.

朝鮮政府相關問題、關於朝鮮的局勢問題以及關於成立東方情報局等問題。關於這次會談，俄國檔案中有兩份文件，一份是什特科夫向維辛斯基轉達的金日成的通報，一份是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轉達的毛澤東的通報，在關於成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這兩份文件的內容是基本一致的。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指出，中共中央收到了四個共產黨的來信，其中包括緬甸、馬來亞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來信，他們建議建立東方國家情報局。毛澤東想知道，在朝鮮政府代表團對莫斯科訪問期間是否談過這個問題，朝鮮政府對這個問題持什麼意見。金一回答說，他對這個問題一無所知，但是他將把這一問題報告給金日成。隨後，毛澤東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現在建立東方情報局或許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國的革命戰爭正在進行，印度支那和朝鮮的局勢也很緊張，建立東方情報局會被看作是建立軍事聯盟。但是，毛澤東說，應該好好考慮這個問題，並希望中共中央和朝鮮勞動黨中央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¹

在徵詢朝鮮方面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意見沒有取得結果之後，1949年5月18日，毛澤東通過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闡述了他對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的看法。毛澤東認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時機還不成熟。在東方的12個國家中，中共只與5個國家的共產黨有聯繫。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暹羅（泰國）、印度支那、菲律賓和朝鮮共產黨。與其他黨，甚至與日本和印度共產黨都沒有經常的聯繫，而他們對這些國家的局勢也了解甚少。在毛澤東看來，較好的做法是先建立聯繫，對局勢進行研究，只有在此之後才應着手建立東方情報局。目前需要做的應僅限於建立相互的通訊聯繫，以便在出現一些具體問題的時候相互交換看法。²

1 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的電報，1949年5月15日；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的電報，1949年5月18日。沈志華收集和整理：《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第2卷，第238頁，第240-241頁。

2 科瓦廖夫關於毛澤東通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致斯大林電，1949年5月18日，沈志華收集和整理：《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第2卷，第238頁。

毛澤東關於不宜過早建立東方情報局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斯大林的贊同。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在通過科瓦廖夫轉達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表示，同意毛澤東關於目前不宜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意見。¹

雖然斯大林也認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時機尚不成熟，但他並沒有放棄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想法。1949年7月，在與劉少奇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進行的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向中共方面提出了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當中共方面提出關於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這個問題的時候，² 斯大林雖然表示中共可以加入，但同時指出，這是很不適當的。斯大林提出的理由是，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與中國的情況根本不同，因而也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斯大林再次提出了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構想，他認為，東亞各國有許多情形和中國是相同的，可以組織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他認為這要比中國共產黨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更為適當些。斯大林顯然還沒有忘記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組建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為時尚早的見解，因此，他指出，組織東亞共產黨聯盟的時機還略為早了一些。但是，他無疑還是希望建立這一組織的。在蘇聯與東亞共產黨聯盟的關係問題上，斯大林表示，蘇聯因為是歐洲國家，同時又是亞洲國家，蘇聯將加入東亞共產黨聯盟。³ 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承擔東亞共產黨聯盟的責任是需要中共來承擔的，而蘇共只是要「加入」這一組織。因此，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給予了中國革命高度的評價，強調中國革命經驗具有的特殊的有益價值，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革命運動中擔負着極其重要的使命，特別是亞洲國家的人民，都在「滿懷

1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шн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36-138.*

2 科瓦廖夫回憶錄說是劉少奇提出，中國方面的檔案則顯示是高崗提出了這個問題。見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80*；劉少奇與斯大林的談話記錄，1949年7月11日和27日，中共中央檔案館（這份檔案的複印件在華東師範大學冷戰研究中心有保存，但沒有具體的館藏號）。

3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80-81*

希望地注視着」中國共產黨，中共「應該成為這些國家人民的老師」。「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歐洲轉移到東亞，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亞洲履行其革命義務」，中共「正承擔着具有空前意義的歷史任務」。¹

儘管蘇共和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時機尚不成熟，但中共與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先建立聯繫」的工作卻是在進行中，而且在建立聯繫工作的過程中，中共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對亞洲革命承擔責任的要求，從1949年7月開始便着手建立「培訓班」，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幹部。² 由於蘇聯領導人對東南亞革命的消極態度，隨着中國革命的勝利，東南亞地區各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把爭取國際支持，進行革命的希望逐漸寄託在中共身上。因此，1949年初，緬甸、馬來亞和印度支等國共產黨給中共寫信，希望建立東方情報局，希望取得中共對其革命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為這些共產黨培訓革命幹部的培訓班在1949年7月底迅速組建了起來。馬來亞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阿成（陳瑞）、泰國共產黨總書記王斌、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黃文歡、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吳英明都參加了「第一學習組」的學習，隨後緬甸共產黨中央委員丁文和菲律賓共產黨幹部林青山等人也參加了學習班的學習。學習班組長連貫，支部書記許立，副書記李啟新。授課的都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課程內容主要是講授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羣眾運動等理論，以及中共的經驗。學習組按國家分為7個小組，越南組6人，泰共組10人，菲共組6人，印尼共組2人，印共組1人，緬共組2人，馬共組2人。學習內容分四個單元：1. 關於黨的建設問題；2. 關於武裝鬥爭問題；3. 關於統一戰線問題；4. 關於羣眾運動問題。學習資料以《毛澤東選集》為主。授課老師有：總參作戰部長李濤、第三野戰軍司令

1 Ковалев И. В.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 миссией в Китае // Дуэль, 1996, №21, 22; 1997, №3. 7, 轉引自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с.25.

2 阿成（單汝洪）：《我肩負的使命》，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7年，第11-14頁。

毛澤東關於不宜過早建立東方情報局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斯大林的贊同。1949年5月26日，斯大林在通過科瓦廖夫轉達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表示，同意毛澤東關於目前不宜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意見。¹

雖然斯大林也認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時機尚不成熟，但他並沒有放棄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想法。1949年7月，在與劉少奇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進行的會談中，斯大林再次向中共方面提出了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當中共方面提出關於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這個問題的時候，² 斯大林雖然表示中共可以加入，但同時指出，這是很不適當的。斯大林提出的理由是，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與中國的情況根本不同，因而也要採取不同的政策。斯大林再次提出了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構想，他認為，東亞各國有許多情形和中國是相同的，可以組織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他認為這要比中國共產黨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更為適當些。斯大林顯然還沒有忘記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組建東方共產黨情報局為時尚早的見解，因此，他指出，組織東亞共產黨聯盟的時機還略為早了一些。但是，他無疑還是希望建立這一組織的。在蘇聯與東亞共產黨聯盟的關係問題上，斯大林表示，蘇聯因為是歐洲國家，同時又是亞洲國家，蘇聯將加入東亞共產黨聯盟。³ 在蘇聯領導人看來，承擔東亞共產黨聯盟的責任是需要中共來承擔的，而蘇共只是要「加入」這一組織。因此，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給予了中國革命高度的評價，強調中國革命經驗具有的特殊的有益價值，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世界革命運動中擔負着極其重要的使命，特別是亞洲國家的人民，都在「滿懷

1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36-138.*

2 科瓦廖夫回憶錄說是劉少奇提出，中國方面的檔案則顯示是高崗提出了這個問題。見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80*；劉少奇與斯大林的談話記錄，1949年7月11日和27日，中共中央檔案館（這份檔案的複印件在華東師範大學冷戰研究中心有保存，但沒有具體的館藏號）。

3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80-81*

希望地注視着」中國共產黨，中共「應該成為這些國家人民的老師」。「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歐洲轉移到東亞，中國共產黨必須在亞洲履行其革命義務」，中共「正承擔着具有空前意義的歷史任務」。¹

儘管蘇共和中共領導人都認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時機尚不成熟，但中共與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先建立聯繫」的工作卻是在進行中，而且在建立聯繫工作的過程中，中共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對亞洲革命承擔責任的要求，從1949年7月開始便着手建立「培訓班」，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幹部。² 由於蘇聯領導人對東南亞革命的消極態度，隨着中國革命的勝利，東南亞地區各國共產黨領導人都把爭取國際支持，進行革命的希望逐漸寄託在中共身上。因此，1949年初，緬甸、馬來亞和印度支等國共產黨給中共寫信，希望建立東方情報局，希望取得中共對其革命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為這些共產黨培訓革命幹部的培訓班在1949年7月底迅速組建了起來。馬來亞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阿成（陳瑞）、泰國共產黨總書記王斌、越南勞動黨政治局委員黃文歡、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委員吳英明都參加了「第一學習組」的學習，隨後緬甸共產黨中央委員丁文和菲律賓共產黨幹部林青山等人也參加了學習班的學習。學習班組長連貫，支部書記許立，副書記李啟新。授課的都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課程內容主要是講授武裝鬥爭、統一戰線、黨的建設、羣眾運動等理論，以及中共的經驗。學習組按國家分為7個小組，越南組6人，泰共組10人，菲共組6人，印尼共組2人，印共組1人，緬共組2人，馬共組2人。學習內容分四個單元：1. 關於黨的建設問題；2. 關於武裝鬥爭問題；3. 關於統一戰線問題；4. 關於羣眾運動問題。學習資料以《毛澤東選集》為主。授課老師有：總參作戰部長李濤、第三野戰軍司令

1 Ковалев И. В.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С миссией в Китае//Дуэль, 1996, №21, 22; 1997, №3, 7, 轉引自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с.25.

2 阿成（單汝洪）：《我肩負的使命》，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7年，第11-14頁。

員兼政委陳毅、第二野戰軍政委鄧小平、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晉察冀軍區副政委羅瑞卿、統戰部長李維漢、統戰部副部長廖承志、統戰部副部長邢西萍（徐冰）、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中宣部副部長陳伯達、組織部長安子文、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廖魯言等人。「第一學習組」的學員於1950年7月底結業。為了為亞洲共產黨培養理論幹部，195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設立馬列學院第一分院，把亞洲各國共產黨的學員分為七班進行培訓。第一班，越南勞動黨，200多人，學委主任是中央宣傳部長黃頌。第二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巴基斯坦，20多人，學委主任是澳共政治局委員。第三班，印尼共，20多人，學委主任是吳英明（馬尤諾，政治局委員）。第四班，馬共，20多人，學委主任阿成。第五班，泰共，50多人，學委主任中央委員張元。第六班，緬共，70多人，學委主任楊光，中央委員。第七班，日共，700多人，後轉去天津分院，學委主任某中央委員。另外，還在其他省市設立了一些分院，學制兩年。¹

除了為亞洲各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幹部之外，中共還嘗試着建立亞洲和澳大利亞工會力量的聯合組織，加強工人運動的發展。在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和澳大利亞工會代表會議期間，在中國代表的促使下，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局決定，建立一個亞洲的聯絡局，總部設於中國北京，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印度工會大會、蘇聯工會、澳大利亞工會各派代表一人為委員組成，主要負責代表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委派的委員。其主要任務是：蒐集亞洲、澳大利亞各國情況的資料；加強亞洲、澳大利亞各國工人運動與世界工會聯合會的聯繫；

1 阿成：《我肩負的使命》，第15-37頁；第43-49頁；213-214頁。

給予亞洲、澳大利亞各國工人階級各種可能的切實援助。¹ 檔案文獻表明，在世界工聯亞洲聯絡局建立之前，中共曾就這一問題積極地尋求蘇聯方面的建議和指示，而且，這一機構的建立得到了蘇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支持。² 在亞澳工會代表大會之前，1949年8月14日，劉少奇專門就東亞民族革命運動的策略問題給斯大林寫了一份報告，請求斯大林的指示，以避免「策略上的錯誤」，在中共中央與亞澳工會代表會議以後所要成立的亞洲機構進行的接觸中，「使中共中央的意見能與蘇聯羣眾團體派到這些會議和機構中的蘇聯同志的意見取得一致。」1949年9月12日，劉少奇就召開亞洲職工和亞洲婦女代表會議問題的寫信給蘇聯職工總會主席古茲尼作夫，在蘇方9月9日來電所提意見的基礎上，將中共中央關於1949年11月在中國召開亞洲各國職工代表會議的最後意見向蘇方作了詳細的通報，並且表示，希望蘇聯方面促成世界職工聯合會及蘇聯總工會先派一二個負責代表立即來中國，以便與中國總工會的負責人進行協商。³

為了更好地了解東方各國的局勢，承擔起領導東方革命的責任，1950年2月，中共中央統戰部下設了東方各國革命問題研究會。李維漢任書記，廖承志、連貫、李韜梨、劉寧一、廖魯言、許立、王任叔等七人為委員，陳華為祕書。中共中央與東方各國共產黨具體的聯繫工作由二處（連貫）負責。隨着中共與亞洲其他國家共產黨聯繫的增多，日本、

1 1950年到1951年，澳大利亞工會代表桑頓、蘇聯工會代表考里班諾夫、全印度工會大會代表查特吉先後到北京就任聯絡局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委派的委員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寧一。1952年初，聯絡局正式開始工作。1958年3月，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決定撤銷亞洲聯絡局。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頁。

2 蘇聯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世界工會聯合會副主席和執行委員會總務委員合理事庫茲涅佐夫對中共建立聯絡局的看法表示了充分的支持。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二冊，第138頁。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0-55頁；第62頁。

印尼、緬甸、暹羅、越南、馬來亞各國共產黨都在北京派駐了代表。菲律賓共產黨與中共也建立了聯繫。印度共產黨雖然與中共尚無關係，雙方有大批材料往來。為了處理好與這些兄弟黨的關係，1950年8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向中央建議，由於「與東方各國兄弟黨的關係逐漸增多」，「最好設立一個國際部來管理這方面的工作」。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組建聯絡部，王稼祥被任命為部長。該部被委任的最重要的任務是與東方各國兄弟黨聯絡並幫助他們。配合這些工作的機關，則有工會、婦女、青年團體的國際聯絡部及外交部。¹

中共與亞洲各兄弟黨的聯繫雖然增多了，但這些兄弟黨與中國聯繫的主要目的是尋求國際援助，進行革命鬥爭。1950年初，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為尋求中國援助抗法鬥爭，祕密訪問北京。在與劉少奇會談之後，胡志明隨後到蘇聯訪問，與毛澤東、斯大林商談有關越南抗法鬥爭問題。在舉行的會談中，斯大林明確表示，中國是越南的鄰邦，熟悉越南情況，而蘇聯在二戰中損失較大，還要幫助東歐國家進行恢復和建設，希望援助越南的任務以中國為主，蘇聯可以在武器彈藥上提供支持。²根據斯大林的這一要求，中共隨後向越南派遣了軍事顧問，並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面臨艱巨的國內重建任務，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中共也感到了對所有這些亞洲兄弟黨的革命活動都提供實際援助的困難。³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在與尤金舉行會談期間，談到了向亞洲國家共產黨給予幫助的問題。毛澤東說，「現

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5-27頁；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00頁。

2 文莊口述，孟晨、郭一峰記錄整理：《風雨同舟話越南——出使越南經歷訪談錄（連三）》，《國際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125-126頁。

3 根據馬來亞共產黨駐中共代表阿成的回憶，對於馬共提出的經濟援助的要求，「一位姓李的革命老前輩」表示，中共能夠對兄弟黨提供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和道義上的幫助。對於中共不能向「僅有幾千兵力的馬共給予一些實質性的經濟援助」，他始終感到困惑。詳見阿成：《我肩負的使命》，第82-83頁；

在亞洲國家的所有共產黨都要求他給他們以建議和幫助，北京聚集了除印度共產黨以外的所有亞洲共產黨的代表。（我們）應當研究亞洲各黨的情況，給予他們建議和各方面的援助。但僅我們一家處理這方面事務有困難。」另外，毛澤東還說，我們中國出現了很多需要研究和解決的新問題，中共真誠希望蘇共中央也能對中共的問題和工作加以研究。據上所述，毛澤東鄭重提出了在中共中央領導下設立一個蘇共中央常駐代表的建議，並且認為，這一蘇共中央常駐代表應配備幾名自己的助手，以便能與中國方面的工作人員一起研究亞洲問題，並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提出這些問題，以便兩黨共同加以解決。¹ 這樣，毛澤東實際上提出了中蘇兩黨共同承擔對亞洲各共產黨進行幫助的任務，實際上是要求蘇聯也承擔起對亞洲革命提供援助的責任。1月3日，劉少奇在同米高揚進行的會談中再次提出了毛澤東前面所提到的那個問題，即關於有必要在北京設立中共領導下的蘇共中央常駐代表處。劉少奇認為，該蘇共中央代表處應以五人為宜，如果他們不是亞洲問題專家，但至少應對亞洲問題比較熟悉。1月20日，尤金把他與毛澤東和劉少奇進行會談的情況報告給了斯大林。² 但蘇聯方面沒有對這一要求作出回應。1951年5月初，在同到訪的王稼祥的一次談話中，斯大林談論了國際共運、亞洲革命形勢和中國情況等問題，並再次重複了早在1949年7月同劉少奇的談話中談論的內容，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高度評價，說蘇聯共產黨了解的主要是歐洲、西方的情況，亞洲、東方的情況還是中國黨熟悉。斯大林雖然再次提出了建立以中國為主的亞洲社會主義的聯盟的問題，但卻沒有回應中共提出的要求在中共領導之下設立一個蘇共特別代表處的要求，這充分說明，斯大林雖然希望建立東方情報局，但他希望的是由中共承擔起

1 Бухерт В.Г. 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В.Сталину и Н.С.Хрущеву. 1951-1957 г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4, с.16.

2 Бухерт В.Г. 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с.14-19

這一領導責任，蘇聯並不願過多地介入這一事務。斯大林的提議遭到了王稼祥的拒絕。¹ 在此之後，蘇共和中共方面都再也沒有提出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

三、建立東方情報局嘗試失敗的原因

在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被提出之後，蘇共和中共之間也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多次協商，中共為東方情報局的建立也進行了一定的努力，但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構想最終沒有實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蘇聯領導人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謹慎態度

雖然斯大林曾多次向中共提出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問題，但蘇聯領導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則是謹慎的。為了避免西方國家把這一組織的建立同蘇聯聯繫起來，斯大林則儘量避免承擔起建立這一組織的責任，他希望的只是由中國共產黨承擔起這一責任。為了促使中共承擔起這一責任，蘇聯領導人對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道路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不斷強調中共的國際主義義務，鼓勵中共承擔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

儘管在 1949 年 6 月同劉少奇舉行的會談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道路表示了高度的肯定，但這種肯定是值得懷疑的。1949 年 11 月，當劉少奇根據斯大林同其在 6 月份進行的談話的精神，在亞洲工會代表會議開幕會上的主題發言中，向亞洲國家的共產黨和工會代表們提出要走中國的道路，即通過武力來解決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問題，組建由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游擊隊，推翻那裏現存的「傀儡」政府並讓共產黨領導的

1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年，第 507-508 頁。

政府掌權，不僅亞洲國家的代表團和歐洲的代表團拒絕接受這一主張，認為它會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工人運動和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帶來危險，而且蘇聯代表團團長索洛維約夫也指出，亞洲國家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擺脫帝國主義列強的統治、爭取國家自由和獨立，在這一鬥爭中必須團結一切民主愛國力量，包括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解決國內問題不能靠武裝鬥爭，因為這只會對帝國主義列強、殖民主義列強有利。蘇聯代表團團長建議不要公開發表劉少奇的主題發言。蘇聯代表團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得到了蘇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批准的。對所有被派出參加國際會議或其他重要活動的蘇聯代表團都有這樣的規定，蘇聯工會代表團前來北京參加這次會議也不例外。他們在前往北京之前就應該得到了指示，他們對劉少奇上述發言的態度符合蘇聯領導人對待亞洲國家及其他擺脫了殖民和半殖民統治、正在爭取解放的國家的政策所奉行的原則路線。而且，斯大林在兩周前就通過科瓦廖夫得到了劉少奇的講稿。據瓦廖夫稱，斯大林同樣也對劉少奇的這一演說不滿意，並把它看作是一種左傾的表現。劉少奇的這篇演說被刊登在中國的報刊和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上，但在蘇聯卻遲遲沒有發表。雖然劉少奇早就向蘇聯方面提供了講稿的全文和譯文，但莫斯科於 12 月底要求劉少奇提供第二稿，即一份經審核的和經確認的譯文。這篇講稿直到 1950 年 1 月 4 日，即近乎兩個月之後，才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出來。¹ 值得指出的是，此時毛澤東正在蘇聯進行訪問，中蘇領導人在關於簽署新的條約問題上陷入僵持，毛澤東閉門不出，造成外界議論紛紛，都傳言他被斯大林軟禁了，此外，毛澤東有意向蘇方透露，中國最近準備與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談判建交問題。斯大林不願承擔與中國關係破裂的責任。²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真理報》發表劉少奇的這篇演講稿在很

1 Правда, 4 января 1950г.

2 參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頁。

大程度上應被看作是蘇聯領導人為了鞏固與中共的關係而對毛澤東作出的一種政治姿態，因為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蘇聯在遠東需要一個可靠的盟友，為其推行「間接戰略」服務。

在鼓勵中國擔負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的同時，在一些國際問題中，特別是在關於德國問題的爭論中，蘇聯仍然希望大國能夠合作。斯大林對國際力量對比有着十分清醒的認識，並竭力避免局勢複雜化，以免同美國發生衝突，導致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因此，在鼓勵中國擔負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的同時，斯大林也支持中國同西方發展一定的關係，特別是發展經濟關係，以減輕蘇聯的負擔。斯大林不斷鼓勵毛澤東與美國進行對話，以及尋求西方國家的貸款和發展同他們的交易。斯大林建議中共領導人，不要拒絕資本主義國家的貸款和同他們進行貿易，相反，應積極地同香港和其他外國資本案做買賣。¹ 1949年4月19日，斯大林通過科瓦廖夫轉告毛澤東，中國民主政府不必拒絕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與美國建立正式的關係，如果這些國家正式拒絕在軍事上、經濟上和政治上援助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在一定條件下不宜拒絕外國貸款和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活動。² 當1949年夏劉少奇訪問莫斯科之際，斯大林對他說，實行同帝國主義國家做買賣的路線是正確的。³

因此，蘇聯領導人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態度是極為謹慎的，儘管他們提出這一構想意味著蘇聯的對外政策開始向世界革命路線回歸，但并不願承擔直接領導世界革命的責任，而是實現其「間接戰略」的需要，為此，一方面，他們不斷向中共提出建議，希望中共承擔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另一方面卻避免直接介入這一問題。這就充分說明

1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82.

2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120-121.

3 斯大林同劉少奇的談話，1947年7月11日，見 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 №1, с.82.

了蘇聯領導人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矛盾態度：一方面是希望建立東方情報局實現自己的戰略目的，另一方面不願為建立這一組織承擔責任，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國際局勢急劇惡化的情況下，蘇聯不希望把自己同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聯繫起來，刺激西方進一步採取強硬的措施，也正因為如此，蘇共不願滿足中共的要求，設立一個駐中共的特別代表處，同中國一起承擔對亞洲各國共產黨提供援助的責任。

（二）斯大林對東方鐵托的擔憂

斯大林不願承擔建立東方情報局的責任，並把建立這一組織和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推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身上，但斯大林對中國領導人並不信任，至少在朝鮮戰爭之前，對東方鐵托的擔憂始終存在。

在國際局勢加劇和中國革命不斷取得勝利的情況下，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期望增加，極為重視中國革命。根據科瓦廖夫的回憶，斯大林把每項有關中國的事務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即使毛澤東發出的最地方化的最不重要的要求都只能送給斯大林。1949年年初，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向科瓦廖夫下達指示，要求任何有關中國的事務都直接和菲利波夫同志聯繫。¹ 斯大林把領導亞洲革命的希望放在中共身上，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也更加重視了，但斯大林通過共產黨情報局開展的反鐵托的運動不可能不影響對另一個鐵托的擔心，正如對東歐其他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擔心一樣，他擔心毛澤東會成為另一個鐵托。在與他派到毛澤東那裏去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進行的多次談話中，斯大林不斷強調共產黨的統一性必須是至高無上的。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這些國家都沿着同一條道路前進，那麼社會

1 菲利波夫，斯大林的化名。Ковалев И.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1, №6, 83-91; 1992, №1, с.77-91.

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就有了最終保證」，顯然，保證中共同蘇共走「同一條道路」則是極為重要的，而鐵托則偏離了這條道路，中國革命走的也是不同與蘇聯的另一條道路，因此中共有重蹈鐵托覆轍的危險。出於這種擔心，斯大林給科瓦廖夫下達指示，告誡他密切注視中共領導人對南斯拉夫「叛徒」的態度，注意中共黨內「鐵托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傾向。¹ 1948年12月，斯大林召回科瓦廖夫讓他彙報中國的局勢。在這次會談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關於中國對「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場問題，並要求知曉中國人站在哪一邊。幾個月後，科瓦廖夫在給莫斯科的報告中提出了如下狀況：在1947年，毛澤東將兩位高級助手：陸定一和劉寧一派往南斯拉夫，由此可以推論，毛試圖了解已宣佈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是如何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陣營嚴重對抗的條件下，找到一個方法和美、英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的。²

斯大林不相信毛澤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曾給毛澤東加了一個頭銜，稱毛澤東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³ 1949年2月，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返回之後，在一次小圈子內的午餐會上，斯大林表達了對毛澤東的疑惑：「毛澤東是什麼樣的人呢？他有一些特別的、農民的觀點，他似乎害怕工人，使自己的軍隊與城市居民分離。」尤其令蘇聯領導人感到不能理解的是毛的行動：當他的軍隊順利地向南方挺進，並接近上海的時候，在幾周的時間裏，他們沒有進攻上海。對於毛澤東就這個問題作出的答覆，即：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沒有能力養活600萬上海人。斯大林聽了這話之後很氣憤：這算什麼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自己

1 參見 Petrov, 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ol.13, №2, p.13.

2 科瓦廖夫個人檔案·第一卷·轉引自：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34.

3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張岱雲等譯，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659-660頁。

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不去幫助上海的工人，不想對他們的命運負責。¹ 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國家理論也被作為非正統傾向的證據，令蘇聯方面無法容忍。1940年代後期，蘇聯專家祕密地評論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所有含義，斷定毛澤東在馬列主義最重要的觀點上產生了偏移。宣揚毛澤東思想的斯特朗也於1949年1月在莫斯科遭到逮捕。²

蘇聯領導人對毛澤東成為另一個鐵托的擔心，毛澤東本人也是知道的。正如事後毛澤東回憶的，「在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後，斯大林仍擔心中國會變成另一個南斯拉夫，我會變成另一個鐵托。只是在1950年冬中國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之後，斯大林相信我們不是南斯拉夫，我也不是鐵托。」³ 為消除斯大林對東方鐵托的疑慮，中共作出了種種努力。在1949年6月劉少奇對蘇聯訪問期間，6月30日，毛澤東在其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宣佈並闡述了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僅明確表示要絕對服從蘇共中央和對蘇「一邊倒」，還在斯大林最為擔心的兩個問題——中共同美國的關係問題和毛澤東會否成為第二個鐵托的問題上主動表明立場，從而與美國和鐵托劃清了界線。7月11日，在同蘇聯領導人進行的會談中，劉少奇向蘇聯方面闡述了中共的如下立場：蘇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司令部，而中國共產黨只是一個分部。部分的利益應該服從於國際主義的利益，因此，中國共產黨服從於蘇共的決定，即使共產國際不存在，中國共產黨也不是歐洲共產黨情報局的成員。如果在某些問題上，在中國共產黨和蘇共之間出現分歧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將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之後，服從並堅決地執行蘇共的決定。中共希望，「蘇共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經常地、毫不客氣

1 Хрущев Н.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1997, с.340.

2 Borisov, *Iz Istorii*, p.52-53, 81; Salisbury, *New Emperors*, p.86-87. 轉引自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p.34, 37.

3 毛澤東在中央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01，目錄12，卷號119，頁碼1-6。

地給中共下達指示，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工作提出批評。」斯大林堅決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這種作風。根據當時駐中共中央的蘇共中央代表、出席了與劉少奇會談的科瓦廖夫的證明，斯大林指出，不能將蘇共方面所表達的某些想法理解為指示。蘇共只能提出兄弟般的忠告，蘇共可以給中共出主意，但這不是指示，中國的事情應該完全由中共自己做主。¹翌日，劉少奇將斯大林的意見電告毛澤東。7月14日，毛澤東覆電劉少奇，表示，中共關於兩黨關係的那種提法，是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一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一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如果蘇共認為有必要的話，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中國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先後向又馬林科夫、斯大林以及蘇共中央其他負責人就這一問題作了說明。²中共領導人為消除蘇聯領導人的擔心作出的努力由此可見。當然，中共領導人積極承擔起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與蘇聯領導人密切溝通，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為了消除斯大林對其成為東方鐵托的擔憂。

蘇聯領導人對東方鐵托的擔心還不僅僅體現在中共身上，他們對亞洲其他國家共產黨也不是完全都信任的。1949年2月，在西柏坡同中共領導人舉行的會談中，米高揚指出，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暹羅和緬甸這些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會中有許多美國和英國間諜，因此他提醒中國共產黨與他們共事時要小心謹慎。³而與此同時，共產黨情報局在歐洲加大反鐵托鬥爭的同時，也在號召亞洲各國共產黨警惕鐵托集團的陰謀。

1 ЛПРФ, Ф.45, оп.1, д.328, л.11-50, 轉引自 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с.24-25.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第21-22頁。

3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 Мясников В.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Книга 2, с.62-66.

1950年2月3日，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刊登題為「美國帝國主義者利用鐵托集團在亞洲從事間諜活動」一文，該文指出：「在美國國務院的命令下，貝爾格萊德正在制訂計劃，以建立一個南斯拉夫反共中心，來對抗亞洲各國共產黨，來瓦解並破壞那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計劃將這一中心設在印度。」¹從而號召亞洲各國共產黨警惕鐵托的陰謀，這也暗含對亞洲各共產黨的擔心。

蘇聯領導人對毛澤東成為另一個鐵托的擔憂，以及他們對亞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不信任態度說明，他們不可能真正地把領導亞洲革命的責任交給中共。

（三）亞洲各國共產黨面臨的困難狀況與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道路態度的轉變

斯大林建立東方情報局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中國共產黨承擔起領導亞洲各殖民地國家走上中國革命的道路，開展革命運動，為其「間接戰略」服務。但當時亞洲各國共產黨的發展狀況使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戰略目標很難實現。1951年1月3日劉少奇在與尤金舉行的會談中，談論了關於亞洲國家共產黨的發展狀況。這次會談中，劉少奇首先指出，亞洲國家的一些共產黨，如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共產黨內部各集團之間還懷有相互敵視情緒；日共內部存在分裂，日共中央目前主要是組織與黨內反對派的鬥爭，將那些為反對派提供支持的組織整體開除出黨。而反對派則指責中央不徹底承認情報局機關報上所指出的其當年所犯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指出，中共想請日本共產黨反對派的代表來北京，以便調和兩派之間的鬥爭，並制定出日共統一的活動路線。劉少奇着重談了印度共產黨的情況。他說，印共內部不斷發生分裂，領導

1 《人民日報》，1950年2月11日，第1版。

人更迭頻繁。其中一個集團一旦成為黨的領導，便將前領導集團的擁護者開除出黨。戰後印共黨員數量為 20 萬，而如今僅剩不到 4 萬人。劉少奇對印共的狀況感到憂慮，並請尤金向蘇共中央提出關於印共的現狀問題，以便其採取相應舉措來鞏固該黨，為此，有必要請印共代表來北京或去莫斯科，詳細研究該黨的現狀，並制定出印共的政治路線。劉少奇說，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共產黨內均存在着派別鬥爭。¹

鑒於亞洲國家共產黨面臨的這種困難狀況，實際上很難指望他們走中國式的革命道路，開展武裝鬥爭，為蘇聯的「間接戰略」服務。而且，它們面臨的這種困難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向它們號召中國的革命道路而引起的。因為正是這一號召導致了亞洲各國——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等國共產黨內部的分裂，一部分共產黨人仍然堅持莫斯科原來的政策路線，同本國的所有的愛國力量及政府合作，不管其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如何；另一部分共產黨人追隨毛澤東的路線——拒絕進行這類合作，靠武裝鬥爭來奪取政權。幾乎在每一個南亞和東南亞國家都出現了兩個共產黨或共產主義團體。例如，在印度，共產黨分裂為共產黨（親莫斯科的）和馬克思主義黨（親北京的），在緬甸，共產黨人分裂成「白旗」黨（親莫斯科的）和「紅旗」黨（親北京的）。² 這種情況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並開始對一些亞洲國家共產黨面臨的形式和任務，以及中國革命道路問題進行研究。

1951 年 2 月 3 日，在對從中共獲得的關於印度尼西亞國內經濟狀況的報告進行研究之後，斯大林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提出了對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黨綱草案的意見，其中指出，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近期的主要任務首先是消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將土地轉交給農民所有。其次是組織反對荷蘭帝國主義、爭取印度尼西亞完全獨立的統一戰綫。並且認為，草

1 Бухарин В.Г. П.Ф.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с.14-19

2 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83

案中提出的關於「同蘇聯、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聯盟」的表述是不適宜的。而關於「武裝革命」道路的問題，斯大林認為，在印度尼西亞的條件下，與中國相比，採取這種方法只能是非常有限的。因為，「採用游擊戰方法的要是一個大國，要擁有大量遠離鐵路和城市的一系列的山林。然而，印度尼西亞擁有的這些條件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印度尼西亞同志現在沒有任何軍隊」，印度尼西亞的這些特殊條件，限制了游擊戰爭方法、「武裝革命」方法的運用。¹

1951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同印度共產黨代表丹吉等人進行的會談中，再次特別談到了中國的革命道路和印度共產黨的革命路線問題。斯大林指出，中國的革命道路對中國人來說是一條好的道路，然而卻不適合印度。斯大林認為：「從中國同志的經驗中可以得出結論，解放區進行的游擊戰爭有巨大的缺陷，這些缺陷在於，游擊區總是很容易被包圍。要想克服這種包圍，並取得勝利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在與友好國家接壤的地區建立鞏固的後方，並把這個國家也變為自己鞏固的後方。中國人採取了理智的措施，轉向了滿洲。」因此，在斯大林看來，正是以蘇聯作為鞏固的後方，中國的游擊戰才有取得勝利的可能。但是，斯大林指出，印度的條件不同於中國，僅僅依靠游擊戰爭是不夠的。比如，「中國沒有像印度這樣密集的鐵路網，這對中國的游擊隊是非常有利的」，「在工業方面，印度比中國發達」，不利於游擊戰的開展，在印度的條件下，很容易會被孤立，而且印度共產黨「沒有像中國的游擊隊那樣擁有蘇聯這樣可以依靠的友好的鄰國」。斯大林認為，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游擊戰爭沒有大的意義，只有在中等發達的國家和在落後國家它才具有巨大的意義。「游擊戰會產生幫助，但是游擊戰本身也需要幫助。應該在人民、工

1 斯大林給劉少奇的電報，1951年2月3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15，л.51-56

人、軍隊、知識分子和農民中間開展更多的工作。應當把兩種形式的鬥爭結合起來——工人的鬥爭和農民的鬥爭，農民起義和工人遊行。」在表明中國的革命道路不適合印度的同時，斯大林認為，印度面臨的將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而應該是「消除封建的財產所有制並把土地分給農民所有」的「農業所有權的革命」，它「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性質」，而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並且，斯大林指出，印共的革命路線應該是：「鼓舞所有的農民和富農起來反對封建主義，把所有的農民都鼓舞起來孤立封建主義者；應該把社會輿論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所有進步階層都鼓舞起來反對英帝國主義，孤立英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集團。」¹ 斯大林對印共革命階段的這種認識說明，資產階級應成為共產黨統一戰線中的聯合力量。

斯大林對中國革命道路態度的轉變及其對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共產黨革命階段和革命路線的認識表明，蘇聯領導人已經放棄了通過在亞洲推廣中國革命道路、利用亞洲殖民地人民革命來加劇資本主義國家矛盾和削弱帝國主義力量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方情報局已經顯得沒有必要了。

蘇聯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的立場表明，1948年到1951年，隨着國際局勢的加劇，為了應對在歐亞面臨的雙重挑戰，蘇聯領導人進行了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企圖通過中共領導的東方國家共產黨的聯合來削弱帝國主義陣營，緩和蘇聯在歐洲面臨的壓力，同時應對在亞洲面臨的挑戰。但是，蘇聯領導人的政策仍然是極為謹慎的，特別是不願承擔建立東方情報局的責任，並始終擔心毛澤東成為另一個鐵托。在亞洲地區局勢不斷加劇，亞洲各國共產黨面臨困難狀況，以及在對亞洲國家共產黨面臨的局勢和任務進行研究之後，蘇聯領導人改變了在亞洲國家推

1 斯大林與印共領導人的談話記錄，1951年2月9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10，л.78-79；л.85；л.71-72。

行中國革命道路的看法，同時放棄了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

在放棄建立東方情報局的嘗試之後，斯大林把注意力轉向了由亞洲各國政府參加的區域聯合上，企圖通過這種聯合來對西方國家施加壓力，緩和國際局勢。1952年9月19日，斯大林在同到訪的周恩來會談時說：「聯合國已失去它應有的作用」，「我們應為新的聯合準備條件，應設法促成亞洲國家的區域聯合。如果成功，蘇聯亦可參加。」斯大林特別指出：「區域聯合是要政府參加的」，他還認為，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大會應以和平為中心，「一切圍繞着為爭取和平進行鬥爭，能爭取日本、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參加很重要。」斯大林告訴周恩來，「美國領導下的組織」聯合國，應該被悄悄地淡化。「一個單獨的亞洲國家共同體」和一個單獨的歐洲國家共同體應該建立起來，以抵消聯合國。¹這說明，蘇聯領導人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的想法已經被建立亞洲區域聯盟的想法所取代，斯大林在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已經改變了聯合的對象，不再僅僅是共產黨了。

1 斯大林同周恩來的會談記錄，1952年9月19日，Ostermann, C.F. et al. (ed.),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Document Read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p.522-523.

第八章 共產黨情報局的衰落 與機關報的出版

蘇聯領導人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之後，再也沒有提出這一問題。雖然共產黨情報局章程規定每 3 — 4 個月召開一次祕書處會議，至少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但是此後，無論是祕書處會議還是情報局代表大會一次也沒有召開，共產黨情報局開始衰落。到共產黨情報局解散之前，其活動主要是繼續出版機關報。

一、共產黨情報局的衰落

在放棄加強情報局職能的嘗試之後，蘇聯領導人對這一組織失去了興趣。蘇共中央對外政策委員會就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問題提出的建議大量減少，直到蘇共二十大前後，蘇共中央再也沒有就情報局工作問題進行討論並作出什麼重大的決議。¹

在蘇聯領導人對共產黨情報局失去興趣的同時，共產黨情報局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首先，在放棄擴大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之後，不僅醞釀中的共產黨情報局第四次會議再也沒有舉行，而且祕書處會議再也沒有召開。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情報局的機構活動僅限於祕書處辦公

1 參見 *Адибеева Г.М.*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Хлевник О.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 (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I,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室的活動，並且這些活動也僅限於一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關於南斯拉夫對外移民開展的反對鐵托的工作，關於自由南斯拉夫電台的工作，關於東歐國家刑事訴訟案件、關於東歐國家黨內建設和黨內生活的報告等等。比如，在科捷列涅茨給格里戈良擬定的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工作計劃的信件中指出，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在 1953 年 4—6 月的工作計劃是：1. 關於南斯拉夫愛國主義者即將在布列斯特召開的代表大會，同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國際部一起開展必要的組織準備工作；2. 對於在特別機構中工作的羅馬尼亞公民的個人案件進行仔細的檢查，就加強特別機構中可靠的幹部制定意見；3. 為《自由南斯拉夫》電台準備一些獨特的文章、簡訊和評論文章，就提高節目的政治思想工作提出建議；4. 就羅馬尼亞報紙對羅馬尼亞工人黨黨的建設和黨內生活進行的解釋擬定一份報告；5. 對於法國共產黨在法國各省報紙發表的文章「反對美國佔領者，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而鬥爭」寫一篇簡評；6. 為英國報紙《勒伊利工人報》上發表的文章「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政策，爭取民族獨立而鬥爭」寫一篇評論文章。¹

隨着共產黨情報局機構活動的減少，情報局機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大為降低，以致他們經常請求回國深造或轉到其他的工作崗位上，在 1953 年 4 月，情報局機關報編輯部人事調動頻繁，造成情報局內部黨員幹部的缺失，以致米京不得不在 1953 年 4 月 30 日給蘇共中央蘇斯洛夫寫信，要求派遣 2 名英國籍編輯人員。² 此外，情報局內部工作也出現諸多問題。比如在 1953 年 4 月 20 日召開的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米京對共產黨情報局黨組織工作的嚴重不足以及秘書處辦公室副主任布留哈切夫個人的錯誤進行了批評，³ 批評布留哈切夫缺乏集體主義觀念，在工作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133, л.17-19.

2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133, л.41.

3 布留哈切夫：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中央辦公室黨委書記，1952 年 5 月 14 日到布加勒斯特擔任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副主任。

中犯了一些錯誤；批評情報局領導幹部在黨員的學習中表現出了形式主義，「組織工作中對黨員、共青團員和無黨派人士的教育工作沒有做好，沒能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中培養一種感情，使他們把蘇共中央委託給他們的工作做得無可指責。在組織中存在漠不關心、麻痹大意、漫不經心的行為，這表現在他們在祕密文件和資產階級媒體材料的保存問題上違背紀律，過多的閒言亂語，有時候泄露工作上的或黨的祕密。存在着違背勞動紀律和黨的紀律的現象，違背關於在國外的蘇聯公民行為準則的現象，對國外同志的態度很不得體。在黨組織中，一些共產黨員之間——編輯部領導幹部之間不健康的相互關係還沒有完全鏟除。黨組織在日常生活中對辦公室會議通過的決議的執行情況的監督的力度不夠。」這就導致就黨內問題和共產黨員的業務工作問題作出的一些決議，以及「關於保證報紙的出版而採取的措施的決議」（情報局 1952 年 7 月 14—15 日會議上通過）中的一些條款以及「關於蘇共 19 次代表大會的結果」的一些決議完全沒有被執行。這兩個決議規定：為了提高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思想理論水平和業務水平，編輯部、黨組織和工會組織的領導人應該在每季度召開不少於一次全編輯部工作會議，討論報紙出版工作等問題；討論報紙的語言問題，風格問題，政治評論、小品文、社論和國外出版問題等；舉辦關於記者技能的晚會，同國外編輯部、翻譯的工作的組織問題等；為同行上課並就理論問題和一般的政治問題做一些報告。但是，除了為同行上課，其他的規定執行得都不能令人滿意，儘管已經向編輯部的領導多次提出了這些問題。工作會議召開得非常少，而關於記者技能的晚會根本就沒有舉行過，國外小組的編輯以及一些翻譯沒有不斷完善自己的語言知識，編輯部的許多領導幹部對一些國家和一些黨的狀況研究得不夠，對國際生活中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不夠。這就導致他們在準備出版材料的過程中經常會犯一些重大的錯誤，包括思想政治上的錯誤和語法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出現在報紙的樣版中，而且還

出現在發行的報紙上。在黨的教育工作方面，黨組織工作中存在重大的不足。不能經常組織宣傳員的講習班，沒有就交流經驗召開會議，沒有有計劃地對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材料進行學習研究；對黨員的教育工作監督得不夠。黨組織領導人沒有對黨組織工作予以應有的重視。很少就重要的黨內工作問題召開黨的會議，很少在一些重要的黨的工作問題上進行指導。很少召開會議交流黨員的工作經驗。¹

隨着情報局的衰落，儘管情報局成員（蘇共除外）仍然根據情報局章程的規定，把關於本黨活動的情報不斷地送交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但同以往相比，這些情報的數量已大為減少。1949年12月31日，情報局祕書處通過了祕書處辦公室準備了文件「關於情報局成員各黨之間情報互換的程序」，其中指出，情報局成員各黨中央每月不少於四次向情報局祕書處發送自己的機關報和雜誌，發送3份信息公報。至於各黨代表大會、中央全體會議以及黨的其他領導機構的決議、各黨中央應該根據決議的性質酌情送往情報局祕書處。此外，黨中央不應每月少於一次向情報局總部發送關於推廣情報局機關報的信息材料，關於黨的出版活動的材料，關於黨校工作和黨的幹部培養工作，關於國內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以及其他民主組織的活動，以及情報局祕書處有興趣的關於其他兄弟黨狀況的情報。但是，從情報局成員黨中央的通報材料還可以看出：從1951年開始，這些材料的數量急劇減少了。² 儘管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54年都召開了共產黨代表大會，但是其中沒有一個共產黨為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準備報告，儘管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133, л.40-47.

2 這些材料包括：1953年3月6日法共關於基層黨組織黨內工作狀況的材料，1954年5月21日法共關於基層黨組織領導工作的一些不足的材料。1954年5月28日，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駐《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代表把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關於故事影片工作的簡報、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關於推廣第十個首都企業的號召和關於保加利亞對外貿易部和國內貿易部黨的會議的簡報向蘇共中央進行了通報。詳見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79-180.

在布加勒斯特都有這些國家共產黨中央的代表。」¹ 對此作出的解釋是：隨着蘇聯領導人對共產黨情報局的興趣明顯降低了，各「兄弟黨」也放鬆了本黨在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

在送往情報局辦公室的材料明顯減少的同時，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在準備關於各成員活動的材料的工作中也存在重大的不足，以致在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會議上一些報告的撰寫者經常會由於他們「膚淺的」、「不能令人滿意」的分析材料受到自己領導的批評。在標明日期為 1954 年 8 月 13 日「關於共產黨情報局辦公室工作人員對兄弟黨和國外共產黨進行研究的報告」中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研究「很不深入且雜亂無章」；大部分報告的撰寫者都是「按國別」撰寫提要，但其中沒有主要的內容——「概括性的和系統的材料」。²

儘管情報局陷於衰落，但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也成為獨特的情報局成員各黨和非情報局成員各黨交換情報的中心。根據解密的俄國檔案材料可以看出，各黨經常會利用這種祕密的通信形式，比如以「祕密公函」的形式通過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傳遞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相互之間的通信和發送電報。到 1950 年代，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越來越扮演各黨之間「郵政總局」的角色。

除了收到情報局其他成員的材料，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還會收到其他國家公民和共產黨的一些材料，並被轉交給蘇共中央，比如，在 1954 年 7 月，共產黨情報局辦公室從羅馬尼亞公民彼得列斯庫那裏收到了關於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材料，請求情報局予以幫助。³ 1954 年 2 月，共產黨情報局收到了波多黎各共產黨中央給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信件，邀請情報局代表團參加波多黎各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這些

1 РГАНІ, ф.5, оп.28, д.156, л.74,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1.

2 РГАНІ, ф.5, оп.28, д.156, л.74,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с.181.

3 РГАНІ, ф.5, оп.28, д.166, л.30-41.

材料都被送交給了蘇共中央。¹

此外，共產黨情報局有時還把一些關於其他國家共產黨活動的材料送交蘇共中央，比如，1954年2月20日，卡扎科夫把關於墨西哥的工會運動等問題的材料送給蘇共中央斯捷潘諾夫。1954年6月25日，巴扎諾夫在給蘇共中央部的信件中，報告了關於危地馬拉的局勢以及危地馬拉勞動黨的活動的材料。² 1954年9月16日，巴扎諾夫在給蘇共中央部的信件中，提供了關於詩人塔索斯·里瓦季吉斯以及一些進步作家遭受的迫害的材料。1954年9月10日，巴扎諾夫把關於希臘共產黨員被逮捕和被判決的報告給了蘇共中央部。³ 1954年11月25日，巴扎諾夫把情報局機關報編輯部收到的關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材料送給了蘇共中央，12月2日，又把情報局機關報編輯部收到的關於印度尼西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在印尼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為加強印度尼西亞所有民族力量的團結而奮鬥」送給了蘇共中央；⁴ 1955年1月4日，卡拉什尼克把關於南斯拉夫軍隊1954—1955年政治和軍事訓練的綱領送給了蘇共中央；1955年1月6日、3月31日和4月14日，巴扎諾夫在給蘇共中央部的信件中，分別通報了關於南斯拉夫報刊和廣播電台在1954年12月25—31日、1955年3月10—25和3月25日到4月10日的內容。⁵

值得指出的是，在蘇聯領導人對共產黨情報局失去興趣、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陷於衰落的同時，經互會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儘管在經互會成立初期，斯大林對這一組織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在1949年1月經互會的成立儀式上，斯大林對那些被邀請來參加這一盛典的東歐官員們吐

1 在蘇共中央得到這一情報後，拒絕了波多黎各共產黨的要求。РГАНИ, ф.5, оп.28, л.194, л.36-37.

2 РГАНИ, ф.5, оп.28, л.194, л.39; л.103-159.

3 РГАНИ, ф.5, оп.28, л.235, л.111-126; л.144-145.

4 РГАНИ, ф.5, оп.28, л.244, л.18-23; л.24-47.

5 РГАНИ, ф.5, оп.28, л.342, л.1-10; л.79-88.

露自己的如下想法：可以通過使西歐各國特別是意大利和法國嚴重依賴蘇聯供應原料的辦法而將它們同美國拆開。他甚至認為經互會通過設立一個供應整個歐洲的原料基地……將會比共產黨情報局更重要。¹ 經互會的成立為蘇聯對東歐國家的控制提供了另一個工具，特別是它被蘇聯領導人用來對南斯拉夫進行經濟制裁。² 但是，到 1951 年，斯大林也開始對這一組織失去興趣，解密的檔案文獻顯示，它在 1951—1953 年也沒有召開過例會。

在斯大林對共產黨情報局和經互會失去興趣的同時，卻通過了另一種方式加強了對東歐國家的控制，這就是蘇聯在東歐各國顧問制的建立。到 1950 年代初，東歐各國已經建立了一整套的駐陸軍、空軍、海軍、國家安全機構、內務部、邊防站和海關的莫斯科軍事顧問系統。這個系統是以法律文件——雙邊協議和雙邊條約以及各政府部門的規範的法律文件為基礎的。總顧問在各國政府和重要的部長身邊工作，高級顧問和顧問——在各個部委、重要的工程和企業工作，在這些地方根據科技援助和合作的協議被派來的專家們隸屬於這些高級顧問和顧問們的領導。蘇共中央的代表負責對整個顧問系統進行最高的政治監督。蘇聯部長會議書記處的材料證明：假如沒有顧問們的參與，那麼這一地區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重大的社會經濟決定都不會作出並且也不會被付諸實施，無論是長期的發展規劃或者短期的發展規劃，還是「社會主義藍圖」

1 Karel Kaplan, *RVHP a Ccskoslovensko 1949-1955, The Council of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and Czechoslovakia*, Svedectvi, Paris, 15, no. 58, 1979, p. 287-288, 轉引自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57-58.

2 在經互會成立的當天，1949 年 1 月 5 日，在討論經互會的任務時，就提出了必須協調對南斯拉夫的行動這一個重要問題。在 1949 年 4 月 26-28 日經互會第一次協調會議上，根據蘇聯方面（莫洛托夫）直接提出的建議，會議通過了決議，要求經互會成員國在「最短時間裏」停止給南斯拉夫提供貸款和按以前信貸協定供貨，不再向南斯拉夫提供技術援助和通過南斯拉夫領土過境，把同它的貿易局限在只從南斯拉夫購買戰略原料上。由於這些目標明確的行動，蘇聯集團同南斯拉夫之間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中斷，而在此之前，南斯拉夫 50% 的外貿聯繫正是同這些國家進行的。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Адибеков Г.М. Сочине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с.524-525.

的構想，抑或是農業的合作化、社會管理組織的改革等其他方面的許多問題。蘇聯在東歐國家的非軍事顧問系統，也由於蘇聯部長會議在 1952 年 5 月通過的兩個規範文件而得以形成。這兩個規範文件是：「蘇聯部長會議關於改善對被派往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機關和企業去工作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的領導的決議」及其附件「對於在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波蘭共和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的機關和企業工作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的指示」。莫斯科在東歐各國建立的顧問系統已成為一個強有力的結構，這個結構將這個地區連接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並且使這個地區更加依附於蘇聯。對於蘇聯領導人來說，顧問系統是監督和控制同盟國家的國內政治形勢和社會經濟形勢發展的一種有效的方法。¹ 這樣，共產黨情報局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就被蘇聯在東歐建立的顧問制度所代替。

二、斯大林去世後情報局機關報的出版

共產黨情報局的組織活動在陷於衰落的同時，情報局機關報仍然在定期出版，直到 1956 年 4 月共產黨情報局宣佈解散。縱觀這一時期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的工作，其內容非常廣泛，主要是刊登一些關於蘇聯和東歐國家、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和經濟發展計劃，報道蘇共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其他國家共產黨的活動，在十月革命紀念日、列寧誕辰、斯大林逝世、東歐各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五一節等重大的節日發表一些紀念性的文章、刊登一些有關加強共產黨思想建設的理論性文章，刊登一些關於亞非拉國家共產黨的活動情況。這一時期共產黨情報局機關

1 *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1, с.110-112.

報的內容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對蘇聯的對外政策進行廣泛的宣傳，特別是為配合蘇聯領導人對西方國家發起的「和平攻勢」而進行廣泛的宣傳。¹ 這些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就結束朝鮮戰爭、簽署停戰協定進行廣泛的宣傳

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的對外政策也開始發生轉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和貝利亞很快把蘇聯外交政策轉到新的軌道上。在斯大林的葬禮上，馬林科夫展開了和平攻勢。他宣佈，沒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的問題。² 同一天，他們和前來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周恩來進行了會談，討論了關於怎樣停止朝鮮戰爭的問題。新的蘇聯領導人並不持有斯大林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宿命論的觀點，而且非常擔心艾森豪威爾政府會使戰爭升級。他們也密切關注華盛頓關於在朝鮮使用核武器的爭論。斯大林是西方和北京與平壤之間達成妥協的主要障礙。因此，他的去世打開了朝鮮和平的進程。³ 3月18日，莫洛托夫送交貝利亞和馬林科夫一份關於朝鮮戰爭新政策的提綱。第二天這個提綱就被馬林科夫簽署批准。⁴

隨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蘇聯領導人在朝鮮問題上的政策的變化，情報局機關報也開始改變在朝鮮戰爭問題上的立場，表現出就朝鮮問題進行和平談判、簽署停戰協定的希望。情報局機關報1953年第14期在「鞏固和平的新步驟」的標題下摘要刊載了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

1 關於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領導人發起的和平攻勢，詳見 Дж. Робертс Шанс для мир? Советская кампания в пользу заверше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53-1955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8, № 6, с.35-75.

2 Правда, 12 марта 1953г.

3 Vladislav M. Zubok, "Soviet Intelligence and the Cold War: The 'Small' Committee of Information, 1952-1953",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9, №. 3 (Summer 1995), p. 459-460; Kathryn Weathersby, "New Findings on the Korean War", *Bulletin of CWIHP*, №. 3 (Fall 1993), p. 15.

4 TsKhSD, f. 5, op. 58, d. 266, p. 130-131; APRF, f. 3, op. 65, d. 830, p. 60-82, 轉引自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155.

帥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將軍 3 月 28 日給克拉克將軍的覆信，對美國方面提出的關於互換戰俘的建議表示同意，同時發表中國外長周恩來 3 月 30 日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結束朝鮮戰爭並簽署停戰協議的聲明和蘇聯外交部部長莫洛托夫 4 月 1 日發表的完全支持中國外長建議的聲明。1953 年 4 月，第 17 期發表以「板門店談判」為題的文章，對板門店談判取得的初步勝利表示肯定，並期待早日簽署停戰協議。1953 年 5 月，第 21 期發表以「關於朝鮮停戰談判」為題的文章，揭露美國阻撓停戰談判的行為。1953 年 6 月，第 24 期發表「打開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道路」為題的文章，對就遣返戰俘問題達成的協議予以了高度評價，並希望之後能就停戰問題達成協定。1953 年 6 月，第 26 期發表以「南朝鮮李承晚集團的挑釁」為題的文章，揭露李承晚集團破壞停戰談判的挑釁行為。1953 年 8 月，情報局機關報第 31 期的一項中心內容是關於朝鮮停戰問題，並發表了以「和平民主陣營的巨大勝利」為題的文章，評述了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偉大意義。1953 年第 39 期則以「爭取徹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為題發表社論，認為美國統治集團正在企圖破壞朝鮮停戰，並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造成緊張的局勢。¹

（二）宣傳蘇聯的和平政策

隨着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領導人對外政策的新變化，情報局機關報更加突出了對蘇聯和平政策的宣傳。1953 年 7 月，情報局機關報第 27 期發表了題為「蘇聯——各國人民和平和安全的支柱」的社論指出，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保衛和加強國際和平的政策，是反對準備和發動新戰爭的政策，是國際合作和發展一切國家間的事務關係的政策」。1953 年 8 月，第 33 期刊載了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 8 月 5

¹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3 年第 14、17、21、24、26、31、39 期。

日舉行的會議上的演說全文，並報道了世界各國進步輿論對上述會議和演說的反應，指出「所有正直的人們都極為滿意地歡迎並衷心擁護」這次會議和這一演說。1953年12月，第48期在題為「當前的主要問題」的社論中提出了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問題，並指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着分別以蘇聯和美國為首的兩條對立的路線。社論指出，蘇聯政府提出了旨在和平解決一切國際爭端的建議，並提出了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德國問題、朝鮮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問題，美國在世界各地建立侵略基地問題，裁減軍備、特別是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問題等。1954年1月，第2期以「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正確道路」為題發表社論，對1月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對金·史密斯所提問題的答覆進行了高度評價，認為這一答覆「是蘇聯對加強和平與各國人民安全事業的又一巨大貢獻」，「它指出了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辦法。」1954年2月，第5期刊載了莫洛托夫1月25日在柏林四國外長會議上的發言全文。1954年3月，第9期刊載了莫洛托夫在柏林四國外長會議閉幕會議上的發言，並以「爭取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為題發表社論，綜述了蘇聯代表團在會議上提出的關於召開五大國代表會議、解決德國和奧國問題等許多有關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建議，以及西方國家外長不敢完全拒絕蘇聯關於召開五大國代表會議的建議而同意召開日內瓦會議的情形。1954年10月，第41期發表了題為「蘇聯對和平和國際安全事業的新貢獻」的社論文章，對蘇聯在聯合國提出的關於裁減軍備問題的新提案進行了評論。¹

1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3年第27、33、48、期；1954年第2、5、9、41期。

(三) 為反對西方國家擴大聯盟體系進行廣泛的宣傳

1952年5月26日，美英法三國與西德簽訂了波恩條約，5月27日，法、意、聯邦德國、比、荷、盧六國在巴黎簽訂歐洲防務集團條約，這兩個條約的簽署意味着西方聯盟建立的步伐明顯加快，因而遭到了蘇聯領導人的堅決反對。在此情況下，共產黨情報局也開始廣泛宣傳各國反對批准「波恩條約」和「巴黎條約」的活動與鬥爭。

1952年7月發表的情報局機關報總第147期刊載的題為「爭取簽訂對德和約，爭取歐洲持久和平」的社論指出，美、英、法與聯邦德國簽署的波恩條約是戰爭公約，在對這一條約進行揭露的同時，對蘇聯所建議的對德和約進行了高度評價。¹在揭露波恩條約的同時，情報局機關報還發表各國人民為反對這一條約，要求各國政府拒絕批准這一條約而鬥爭的文章。1952年7月，情報局機關報總第149期刊載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的文章「反對與波恩報復主義者締結單獨條約，反對重新軍國主義化，爭取和平」，表達英國共產黨要求英國議會拒絕批准這一條約的要求；該期還發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大衛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採取堅決的行動反對單獨的戰爭條約」的文章和比利時共產黨總書記拉爾曼的「比利時人民反對波恩單獨條約」的文章，表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比利時人民堅決抗議波恩條約和「歐洲防禦集團」條約的情緒；1952年9月，總第157期發表了德國共產黨主席雷曼的「西德人民羣眾反對波恩單獨條約的鬥爭」的文章；1952年9月，總第158期發表了荷蘭共產黨總書記格魯特的「反對波恩單獨條約，爭取荷蘭民族獨立」的文章。1952年9月，總第159期發表了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貝利奧茲的「法國人民採取行動反對波恩單獨條約和『舒曼計劃』」的文章；1953年第5期全文刊載了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法國共產黨中

¹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2年總第147期。

中央委員會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於1月27日發出的向德、法兩國人民呼籲反對批准波恩條約和巴黎軍事條約的聯合號召。1953年3月，第14期發表「反對奴役性的波恩條約，爭取公正的對德和約」為題的文章，對聯邦德國政府批准波恩條約和歐洲防務集團條約進行了批評，並報道了西德人民對批准這些條約的反對浪潮。1953年11月，第43期刊載的德國共產黨主席馬·雷曼的「德國共產黨為和平、民主和統一的德國而鬥爭」的文章指出，西德的工人、愛好和平的人們和所有的愛國者的頭等重要的任務就是：決不容許波恩和巴黎條約獲得批准，必須用行動來反對阿登納集團加深德國分裂的任何措施。該期還刊登了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弗·皮佑的「法國人民爭取和平，反對批准波恩和巴黎軍事條約」的文章，該文指出，參加反對批准波恩和巴黎條約的鬥爭的力量，超過了現在已經參加全國和平運動的力量。因此，阻止波恩和巴黎條約在法國批准是完全可能的。1954年4月，第12期刊登的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格羅提渥的「德國和柏林外長會議」的文章指出：每一個黨員的責任就是和一切愛國者聯合起來，積極參加反對批准波恩和巴黎條約的徵集簽名工作。反對「歐洲防務集團」必須成為德共注意的中心問題。必須盡最大力量為阻止批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而鬥爭。1954年4月，第14期刊載的荷蘭共產黨主席魏吉納的「荷蘭人民積極爭取和平，反對『歐洲防務集團』」的文章斥責荷蘭議會批准「歐洲防務集團」協定，並綜述了荷蘭人民展開爭取和平、反對「歐洲防務集團」的鬥爭的情形。1954年4月，第15期在題為「鞏固歐洲和平與安全的道路」的社論中指出：復活德國軍國主義是對歐洲各國人民（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的嚴重威脅。西歐各國人民堅決要求本國政府恢復符合本國民族利益的獨立自主的政策，摒棄建立「歐洲軍」的計劃。1954年5月，第19期刊登的意大利共產黨副總書記路·隆哥的「爭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爭取自由和社會進步」的文章指出，意大利共產黨的全體黨員和黨組織必須加

強和擴大反對批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的運動。1954年6月，第23期刊登的弗洛里蒙·邦特「法國的政治形勢」的文章，描述了法國人民堅決反對批准波恩和巴黎軍事條約，反對「歐洲防務集團」的愛國運動。1954年7月，第27期刊登的德國共產黨主席馬·雷曼的「新形勢和德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文章指出：德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反對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反對「歐洲防務集團」政策，爭取和平、全國統一和民主，爭取工人階級的社會利益。1954年第31期刊登的意大利共產黨中央指導處成員喬治·阿門多拉的「意大利共產黨人為改變意大利施政方針而鬥爭」的文章在談到意大利人民當前鬥爭的要求時指出：要爭取擺脫目前意大利因現行政策而在國際上所處的屈辱地位，爭取和平和民族獨立，反對批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1954年第34期刊載的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莫·克里埃歇—瓦爾里蒙的「法國解放十周年和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鬥爭」一文揭示了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的危險和法國人民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鬥爭。文章指出，法國人民要求斷然拒絕「歐洲防務集團」條約，接受蘇聯政府提出的保證歐洲各國安全的建議。1954年第43期刊載的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弗·皮佑的「法國人民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文章對「歐洲防務集團」條約和倫敦協定進行了批評。1954年第44期刊載了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的「在和平鬥爭的新階段中加強統一行動」的文章指出：法國人民反對以重新武裝西德為主要目的的巴黎各項協定的鬥爭，已經開始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新的階段。1954年第46期刊載的比利時共產黨總書記拉爾曼的「重新武裝西德是對比利時安全的致命威脅」的文章綜述了比利時人民反對「歐洲防務集團」的鬥爭和反對重新武裝西德的鬥爭。1954年第47期刊登的艾伯特·諾登的「西德軍火大王和巴黎協定」的文章指出，西德共產黨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把西德所有分散的反軍國主義的力量，特別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以及工會的力量，團結到為反對阿登納戰爭

政權和復活德國軍國主義而鬥爭的統一戰線中來。1954年第47期刊載的重要文章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理西羅基的「反對重建『國防軍』是歐洲各國人民的切身事業」，該文首先指出蘇聯建議召開全歐會議是爭取歐洲集體安全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鬥爭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接着談到了巴黎協定對歐洲和全世界和平的威脅。1954年第51期刊載了英國共產黨總書記哈·波立特的「英國人民反對倫敦和巴黎協定」的文章。1954年第52期以「提高人民的警惕，嚴防和平敵人的陰謀」為題發表社論指出：1954年世界緊張局勢有了某些緩和。但是，在美國統治集團的指揮下，若干西歐國家的政府已經簽訂了所謂巴黎協定。這一切造成了嚴重危害和平和各國人民安全的新的國際局勢。該期還發表了德國共產黨主席雷曼的題為「德國共產黨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文章，對阿登納簽訂的巴黎協定進行批評。1954年第53期刊載的一篇重要文章——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弗·厄斯納的「西德復仇主義分子和軍國主義分子的思想體系」的文章指出，當前的迫切任務就是制止批准旨在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巴黎協定。1955年第2期發表了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斐蓋爾的題為「法國愛國力量堅持反對武裝西德的鬥爭」的文章；1955年第8期發表了盧森堡共產黨中央委員基爾的「盧森堡人民反對重新武裝西德」的文章；1955年第10期刊載的民主德國總理格羅提渥的「德國人民的和平和統一的願望必須實現！」的文章指出，波恩聯邦議院批准巴黎協定是違背德國人民意志的，必須廢除巴黎協定。1955年第15期以「全世界人民堅持反對巴黎協定的鬥爭」為題發表社論，指出巴黎協定批准以後，整個國際形勢也起了根本的變化。各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緊張起來了，新戰爭的危險加劇了。¹

1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2年總第149、157、158、159期；1953年第5、14、43期；1954年第12、14、15、19、23、27、31、34、43、44、46、47、51、52、53期；1955年第2、8、10、15期。

從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的上述報道可以看出，進行反對武裝德國，反對把德國納入西方集團的條約的宣傳是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 1952—1955 年宣傳工作的一個重點。

（四）宣傳蘇聯提出的關於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倡議

為了應對在德國問題上面臨的挑戰，並解決歐洲的安全問題，蘇聯政府提出來了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1953 年 11 月 26 日，蘇聯在的答覆西方的照會中聲明指出：「蘇聯準備同其他歐洲國家一起繼續盡一切努力通過達成相應協定的方式來保障歐洲安全，該協定應包括所有的歐洲國家而無論其社會制度如何。」¹ 1953 年 12 月 22 日，蘇聯外交部在擬定的歐洲集體安全保障條約草案中寫道，所有的歐洲國家都應該簽訂集體安全條約，在遇到侵略時相互提供援助。² 儘管在四國外長日內瓦會議期間，蘇聯代表提出的關於建立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遭到了西方國家的拒絕。但蘇聯領導人從西歐人民對歐洲防務共同體日益增長的反對立場中、特別是從法國和西德人民的反對立場中看到了希望。如果廣泛地開展這種運動，西方大國之間的矛盾必將加深，這將促使他們放棄武裝西德的計劃，並接受蘇聯提出的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

在這種情況下，情報局機關報對蘇聯提出的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建議進行廣泛的宣傳。情報局機關報 1954 年第 31 期以「為了和平和人民的幸福」為題發表社論，高度評價蘇聯政府最近就歐洲集體安全問題致法、英、美三國政府的照會，同時還刊載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瓦·柯別茨基的「保障全歐集體安全的問題」的文章，再

1 Робертс Дж., Шанс для мира? Советская кампания в пользу завершени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53-1956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8, №6, с.47.

2 АВП РФ, ф. 06, оп. 13, п. 6, д. 42, л. 14-16, 轉引自 Робертс Дж., Шанс для мира? Советская кампания в пользу завершени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53-1956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48.

次對蘇聯政府就歐洲集體安全問題致法、英、美三國的照會進行了高度評價。1954年第32期以「加強歐洲和平的道路」為題發表社論，在對蘇聯提出的關於建立全歐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進行高度評價之後指出，全歐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意味着拒絕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政策，拒絕軍備競賽和建立某些歐洲國家組成的排他性侵略集團的政策，意味着承認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共處的可能性，意味着承認發展國際合作關係、在各有關國家之間建立廣泛的經濟關係的可能性。全歐集體安全思想的實現將保證歐洲各國人民的和平，對於維護普遍和平、消除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將有極其重大的意義。該期還刊載了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雅·杜克洛的「蘇聯的新的和平建議」的文章，該文指出，蘇聯關於締結全歐集體安全條約的建議明確表示了蘇聯的和平政策。法國人民必鬚發動一個有力的鬥爭來阻止「歐洲防務集團」條約的批准。1954年第33期刊載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卡·希德萬的「德國人民和歐洲集體安全」的文章，作者認為，蘇聯提出的締結全歐集體安全條約這一建議有效地幫助了愛好和平的力量進行反對「歐洲防務集團」條約和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鬥爭。1954年第38期發表的題為「為了所有歐洲國家的安全」的社論抨擊了美國統治者企圖在歐洲組織軍事集團，實現德國軍國主義的復活並和西德政府結成軍事聯盟的計劃。同時，社論指出，蘇聯提出的建立全歐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能夠解決德國的問題，保證和平和歐洲的安全。該期還刊登了意大利共產黨書記處書記莫·斯科奇馬羅的「反對重新武裝西德，爭取歐洲集體安全」的文章。1954年第44期以「為了和平和歐洲集體安全」為題發表社論，批評西方國家的統治集團繼續採取使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方針，指出倫敦和巴黎協定規定把重新軍國主義化的西德拖進北大西洋集團，使這一軍事集團具有更嚴重的侵略性，只能加劇國際緊張局勢。1954年第47期以「爭取歐洲集體安全，鞏固和平事業」為題發表社論，再

次強調了反對巴黎協定，建立歐洲集體安全以及解決德國問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¹

（五）對國際和平運動舉行廣泛的宣傳

斯大林去世後，在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發表的文章中，對國際和平運動的宣傳仍然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 1955 年，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表的關於和平運動的文章共計有 100 多篇），這些文章的內容廣泛，主要包括：

1. 廣泛宣傳世界和平委員會提出關於締結蘇、美、中、英、法五大國和約的建議。

1953 年 5 月，第 18 期、19 期和 20 期連續三期發表「爭取締結和平公約」的文章，刊登了蘇聯政府在 4 月 27 日對世界和平大會國際委員會提出的關於締結五大國和約的建議的答覆：蘇聯政府完全同意這一建議，並且認為，任何糾紛都可以在相關各國相互協商的基礎上和平解決，並且聲明，為達到國際和平，蘇聯政府願與各國進行合作。並刊登了中國、保加利亞、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政府、朝鮮政府對世界和平大會國際委員會對締結五大國和約的建議的積極態度，以及印度、法國的和平戰士和巴西人民的這一要求。1953 年 5 月，第 21 期發表的「人們要求和平公約」的文章表示，佔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都贊成世界和平大會國際委員會關於締結五大國和約的建議。並且指出，這一建議已經得到法國、意大利、巴西、阿根廷、奧地利的和平委員會的擁護，以及得到國際聯合國體和民主組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世界民主青

1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4 年第 31、32、33、38、44、47 期。

年聯盟等的支持。¹

2. 對世界和平理事會等組織爭取和平的運動進行宣傳報道。

1953年6月，第25期發表的「人們要求通過協商解決國際問題」的文章，報道了6月15日舉行的世界和平理事會的召開情況。1953年7月，第28期發表了題為「協商——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的道路」的社論，對世界和平理事會6月布達佩斯會議所通過的展開世界爭取協商運動的宣言和其他決議進行了高度的評價。1953年11月，第44期刊載了在維也納舉行的世界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各項決議，並以「加強勞動人民的國內和國際團結」為題發表社論，對世界工會第三次代表大會對提高億萬勞動人民爭取滿足切身要求的鬥爭，和爭取民主自由、民族獨立與和平的鬥爭的覺悟進行了高度評價。1954年6月，第22期發表「保衛和平與各國人民的安全」的社論，高度評價世界和平理事會在柏林舉行的特別會議通過的關於原子武器的決議、關於安全問題的決議以及文化委員會的建議。²

3. 宣傳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的鬥爭。

1953年5月，第22期發表「各國人民要求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的文章，報道了芬蘭和新西蘭和平擁護者爭取和平的運動和呼籲。1953年6月，第23期發表「爭取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的文章，報道了法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日本人民爭取和平的運動和要求。1953年11月，第44期刊載了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的「為法國人民所期待的並一定能實現的政策改變而鬥爭」的文章，敘述了當年8月法國工人的罷工運動和農民運動，以及他們反對法國統治集團把人民引向破產和戰爭的情況。1954年5月，第17期以「保衛和平是各國人民切身的事業」為題發表社論，對在過去五年中，世界和平運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評論。

1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3年第18-21期。

2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3年第25、28、44期，1954年第22期。

1954年5月，第18期發表的社論指出，各國人民爭取和平的努力已經成為當代的強大動力。愛好和平的力量主要任務就是爭取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盡力促進各國間的和平合作，爭取持久和平。1954年7月，第24期以「站在為和平與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前列」為題發表的社論指出，各國人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爭取和平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接着社論綜述了法國、意大利、德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為和平和民族獨立而鬥爭的情形。1954年7月，第27期在題為「為了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社論中指出，和平力量的主要任務就是粉碎侵略集團的計劃，爭取國際緊張局勢的進一步緩和。1955年第17期發表的題為「勞動人民國際大團結的節日」的社論指出，歐洲和亞洲，美洲和非洲各國的千百萬人民正在進行和平鬥爭。不斷擴展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在給帝國主義的殖民制度以毀滅性打擊。¹

4. 進行反對原子戰爭的宣傳。

蘇聯領導人在向西方國家提出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同時，還提出了禁止原子武器的問題。這主要因為西方國家發動世界大戰和對蘇進行原子打擊的威脅仍然存在，而且蘇聯領導人認為，西方國家相繼通過的巴黎協定會「為西德提供了無限制生產軍火和要求原子武器的機會」。²

為配合蘇聯領導人提出的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1954年底到1955年初，情報局機關報進行了反對原子戰爭的廣泛宣傳。1954年第52期發表的題為「為反對原子瘋子的罪惡陰謀而鬥爭——世界各國人民的事業」的社論指出，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對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侵略集團加緊準備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新戰爭的陰謀，都不能不感到強烈

1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3年第22、23、44期，1954年第17、18、24、27期；1955年第17期。

2 蘇聯向美英等國發出的照會，1954年11月13日，轉引自科拉爾·貝爾：《國際事務概覽（1954年）》，雲汀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第220頁。

的關懷和憤慨。蘇聯主張一勞永逸地取消這種武器。世界各國億萬男女已經在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斯德哥爾摩宣言上簽了名。此後，人民爭取實現這個要求的意志更加堅強了，日本、英國、法國、德國、印度和其他國家著名的公眾人士和政界人士和千百萬人民都在對發動原子戰爭的計劃提出抗議。和平擁護者的堅決的羣眾性行動和又有千百萬具有極其多樣的政見和社會地位的人參加禁止原子武器的鬥爭的局面，將有助於粉碎美國原子瘋子的陰謀。1955年第2期以「反對原子狂人的罪惡計劃是各國人民的事業」為題發表社論指出：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侵略集團變本加厲地陰謀加劇國際緊張局勢，準備發動一場使用原子彈和氫彈這類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新戰爭；侵略性的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理事會最近在巴黎舉行的會議上批准了制訂在歐洲進行原子戰爭的計劃，並且事實上給予美國將領任意決定在何時何地使用原子彈的「權利」。由於北大西洋集團的頭子們的冒險政策，發動原子戰爭的危險比以前大得多。和平擁護者採取堅決的羣眾性行動和吸引更多的千百萬政見和社會地位極不相同的人參加禁止原子武器的鬥爭，將有助於粉碎美國原子狂人的陰謀。1955年第3期刊載的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的「共產黨人爭取自由、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的文章指出，必須團結起來要求放棄原子戰爭計劃，要求實行和平政策。1955年第4期以「防止原子戰爭威脅！」為題發表的社論指出，美國等某些西方國家的反動集團正在竭力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復活德國軍國主義，準備發動原子戰爭。毫無疑問，這個反對原子武器的運動將毫無例外地擴展到一切國家，這個運動將把正在為制止原子戰爭而努力的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們包括進來。世界各國人民能夠而且必須禁止原子武器。1955年第5期刊載的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的「粉碎戰爭販子的計劃，改變法國的施政方針」的文章指出：每一個黨員應當盡力動員絕大多數人民反對重新武裝西德，反對原子戰爭的嚴重威脅。1955年第8期以「大力展開反對準備原子戰

爭的運動！」為題發表社論，呼籲世界各國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務委員會的號召，展開「告全世界人民書」的簽名運動，爭取和平。並使各國人民對戰爭販子的陰謀提高警惕，加倍地擴大積極分子的隊伍，並把更多的準備盡力防止戰爭和堅決為禁止原子武器而鬥爭的人團結在他們的周圍。1955年第9期以「婦女是爭取和平的強大力量」為題發表的社論指出，婦女是爭取和平的一支強大力量，世界各國的千百萬婦女越來越堅決地反對準備新的世界戰爭，反對復活德國軍國主義，要求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爭取世界和平。¹

總之，在共產黨情報局陷入衰落之時，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仍然在定期出版，為配合蘇聯的外交進行廣泛的宣傳活動。也就是說，這一時期情報局機關報的出版反映了蘇聯對外政策的變化，反映了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對西方國家發動的和平攻勢的內容。

¹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4年第52期；1955年第2、3、4、5、8、9期。

第九章 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

1950年代中期，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特別是隨着蘇南關係的改善，關於改革共產黨情報局工作的問題提上了蘇聯領導人的議事日程。面對種種關於解散共產黨情報局的輿論，在蘇聯的對歐政策遭受挫折，兩大陣營對抗加劇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最終提出了解散共產黨情報局、以建立四個區域性的共產黨聯合組織取而代之的構想。1956年4月，共產黨情報局宣佈解散。

一、1950年代中期改革共產黨情報局問題的提出

（一）斯大林去世後米京關於改組情報局工作的建議

在赫魯曉夫擔任新的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後，情報局領導人曾進行了許多努力來再次召開情報局全體代表會議，哪怕是召開祕書處會議。1954年1月4日，米京在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件中寫道：「兄弟黨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的代表多次問我，為什麼最近三年無論是情報局還是其常設機構祕書處都沒有召開一次會議。自然，對於這個問題我不能給予明確的答覆。」接着，米京提醒赫魯曉夫，按共產黨情報局章程，祕書處會議不應少於在3—4個月內召開一次，但是，自1950年10月以來，無論是情報局會議還是祕書處會議都沒有召開。米京繼續寫道：「當然，在當今的國際局勢下，或許不宜召開大範圍的情報局會議，並在媒體發表關於這些會議的材料，但是，為了使情報局及其

機關報的功能恢復常態，應該在不少於四個月的期限內召開一次祕書處會議，在會上交流共產黨和工人黨活動的意見和經驗。」米京建議在祕書處會議討論諸如情報局成員各黨的黨組織工作狀況和羣眾宣傳工作狀況、黨的教育狀況、新的知識分子的培養問題、農村黨組織工作問題、黨在意識形態戰線的工作問題等。接着米京寫道：「關於情報局祕書處會議沒有任何必要在媒體發表通報，關於祕書處會議的決議也不必發表。以編輯過的文章的形式在情報局機關報上對這些決議進行闡述就足夠了。」米京提議在 1954 年 3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一次祕書處會議，討論如下問題：關於羅馬尼亞工人黨黨組織工作狀況；關於匈牙利勞動黨的教育工作狀況和意識形態工作狀況。米京寫道，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這些問題不適宜討論的話，那麼可以把該信中列舉的其他一些問題納入會議的議程。

同一天，即 1954 年 1 月 4 日，米京另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短信，其中提議：

由於必須顯著改善蘇共中央從情報局祕書處辦公室得到關於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活動的情報的狀況，並考慮到如下情況：祕書處辦公室擁有黨組織領導人的決議、黨中央給地方黨組織的信件、報紙、雜誌等，這些都可以成為重要的信息來源，請求批准在祕書處辦公室設立負責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工作的科員，他們應該具有黨的工作經驗，同時配備一定數量的翻譯。

米京積極而堅定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他的計劃就是復興情報局祕書處的活動，並且希望得到政治局首先是得到赫魯曉夫的支持。1 月 8 日，米京給赫魯曉夫寫了第三封信，並在信中建議，在出版情報局機關報的同時，情報局還需要定期出版理論性的和政治性的雜誌。米京認為，他的建議是為了使共產黨今後在意識形態上和組織上得到加強，是

由於人民民主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複雜的問題，是由於工人階級團結運動的發展和所有為和平而鬥爭的民主力量的聯合，由於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和附屬國獨立性和自由民主的發展。這類雜誌應該闡述最為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對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實踐經驗進行概括，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宣傳問題及其在個別國家的創造運用進行概括。米京認為，許多共產黨都沒有自己的理論雜誌和政治雜誌，而那些年出版的理論雜誌和政治雜誌都存在不足，它們的水平都不高，沒有達到應有的理論水準。據不完全統計，這樣的理論性雜誌共有 60 餘種，總發行量大約 80 萬冊。但是，即使在人民民主國家出版的最好的雜誌，主要關注的是關於黨的建設問題、黨的教育問題和宣傳工作問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闡述得不夠。¹

（二）蘇南關係的改善與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命運的討論

蘇聯通過共產黨情報局開展了對南斯拉夫的鬥爭，並通過這一鬥爭對東歐國家進行了整肅，使這些國家的政權都掌握在那些比較服從莫斯科的領導人的手中，試圖遏制這些國家民族傾向的發展，保證蘇聯和蘇共的影響，並把這些國家的內外政策納入蘇聯的外交軌道。但是，另一方面，蘇南衝突帶來了深遠的國際影響，並使蘇聯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由於南斯拉夫所處的地緣政治狀況，在兩大軍事政治集團對抗的條件下，無論是對於「民主的」西方來說，還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東方來說，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蘇南衝突後，美國開始同南斯拉夫發展關係，開始向南斯拉夫提供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以便在東歐國家中打入一個楔子。從 1953 年開始，美國政府的官

¹ РЦХИДНИ, ф.17, оп.162, д.39, л.15-19, 轉引自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1947-1956гг., с.222-223.

方報告開始把南斯拉夫發生的變化看作是其成功分化蘇聯集團的開端。¹ 另一方面，隨着同南斯拉夫關係的發展，西方國家開始把南斯拉夫看作是北約南翼防禦體系的一個重要因素。1955年4月，華盛頓、倫敦和巴黎開始企望把南斯拉夫納入西方聯盟的軍事政治體系，巴爾幹公約條約的簽訂便是進行的這種嘗試（希臘、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軍事政治聯盟）。² 這不能不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擔心。此外，在蘇南衝突之後，南斯拉夫的國際地位得到提升，國際社會開始承認，南斯拉夫的社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於蘇聯的社會經濟體系，成了以蘇聯為首的統一的社會主義體系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的獨特道路還產生了示範效應，向留在蘇聯陣營的其餘國家，以及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證明了不同於蘇聯的另外一條發展道路。逐漸地，南斯拉夫問題不再單單是莫斯科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問題。³

無論是從維護蘇聯安全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加強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來說，改善蘇南關係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因此，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領導人便開始對蘇南關係重新進行評估。在被捕之前，貝利亞一直在支持蘇南改善關係，並建議與鐵托在莫斯科或貝爾格萊德舉行一次祕密會晤。⁴ 但貝利亞改善蘇南關係的努力，遭到了仍然執行斯大林路線的莫洛托夫的反對。主席團支持莫洛托夫的看法，並建議只准與南斯拉夫建立一種和蘇聯與北大西洋侵略集團相聯繫的資產階級國家相類似的關係。⁵ 儘管如此，蘇聯和南斯拉夫的關係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1953年6月，即斯大林去世剛三個多月，蘇

1 *Едемский А.Б.* От конфликта к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53-1956 годах,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8, с.7-8.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с.843.

3 *Едемский А.Б.* От конфликта к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с.8.

4 *Izvestiia TsK KPSS*, vol.1(1991), p.143, 轉引自 Zubok, Vladislav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158-159.

5 *Борис Старков* Сто Дней "Лубянского Маршала" // *Источник*, 1993, №4, 86.

聯就主動派出了新任駐南斯拉夫大使，打開了長期僵持的蘇南關係的局面。蘇聯對南斯拉夫政策的改變也使得殘酷的反鐵托和反南宣傳發生了明確的變化。雖然1953年春天蘇聯的宣傳仍然保持着敵對的格調，總的來說還重複着以前共產黨情報局和蘇共中央框架內所形成的提法，但蘇聯外交部的祕密文件及其他的一些文件卻反映了蘇南關係的一些新變化。米亞寧在1953年5月27日寫給莫洛托夫的信件中謹慎地描寫了「人民民主國家和南斯拉夫關係某種正常化」的可能前景。¹ 1953年5月18日，蘇聯外交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基爾薩諾夫向《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主編米京通報了在羅馬尼亞收縮反南宣傳的事實。² 降低反南宣傳標誌着蘇聯對南斯拉夫新政策的轉變。

隨着蘇聯新的外交方針的實施，1954年秋蘇聯領導人開始嘗試改善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儘管反對南斯拉夫仍然是共產黨情報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南斯拉夫國內也仍然在進行反蘇宣傳。對於同南斯拉夫改善關係的必要性，赫魯曉夫在1955年7月9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體會議上進行了深刻的論述。在這次會議上，在就蘇南談判進行的總結報告中，赫魯曉夫指出，蘇南衝突不符合蘇南兩國和兩黨的利益，不符合整個人民民主陣營的利益。而帝國主義則利用了這場衝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帝國主義者的盤算是：讓南斯拉夫脫離社會主義陣營，以此來突破我們兄弟共產黨的聯盟」，「引導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走上南斯拉夫的道路，使他們脫離蘇聯。」此外，赫魯曉夫認為，美國利用南斯拉夫企圖達到其軍事上的目的：

在南斯拉夫脫離社會主義陣營以後，他們盤算着把我們排除在地中海之外，建立起帝國主義國家的統一戰線。美帝國主義者

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 II, с. 913.

2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 II, с. 902–903.

致力於在西德、挪威、丹麥、比利時、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和其他國家建立起針對蘇聯的軍事基地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也希望在南斯拉夫建立這樣的軍事基地。這樣一來，美帝國主義者就在西部建立起了反對蘇聯的聯合防線，正如他們所說的，他們需要這樣的防線來遏制共產主義和把共產主義的勢力推回去。」

面對這種情況，蘇聯領導人面臨的任務是，應該考慮利用那些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同蘇聯有分歧的力量，使它們不能成為反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並把這些力量積極地站到自己一邊，至少要使他們中立。赫魯曉夫認為，「如果美英帝國主義國家成功地實現了他們在南斯拉夫的圖謀，那麼，「巴爾幹的局勢將更加複雜化」，西方集團的地位將會得到加強。¹ 蘇聯領導人對巴爾幹局勢的擔憂也不是偶然的。因為在北大西洋聯盟不斷得到加強，並企圖把西德納入這一聯盟的同時，美國還在世界各地加強建立反蘇聯盟，其中包括積極建立巴爾幹聯盟，而建立這一聯盟的目的是在東南歐這一戰略位置部署自己的軍事力量，使其同北約聯繫起來，並利用巴爾幹聯盟對相鄰的人民民主國家施加壓力，首先是使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脫離蘇聯。在美國的努力下，1953年2月，希臘、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經過長期的談判，簽署了「友好合作條約」，並於1954年8月組建了巴爾幹聯盟，規定締約國之間相互承擔軍事義務。² 但是，隨着1955年蘇南關係的改善，在對巴爾幹聯盟的性質及其任務問題上，南斯拉夫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南斯拉夫聲稱不願在巴爾幹聯盟的框架內發展三方軍事合作，更不要說是建立同北約建立聯繫的某種聯盟了。南斯拉夫在巴爾幹聯盟的性質和任務問題上的立場引起了西方大國的不安。這就為蘇聯利用南斯拉夫改善自己的安全處境提供了機

1 РГАНИ, ф.5, оп.30, л.88, л.105; л.133.

2 РГАНИ, ф.5, оп.28, л.285, л.144-146.

遇。1955年11月25日，在蘇聯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列維奇金同南斯拉夫公使艾吉奇進行的會談中，南斯拉夫方面主動提出了關於巴爾幹條約的地位問題。艾吉奇向蘇聯大使通告說，當南斯拉夫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關係急劇得到改善的時候，巴爾幹公約已經不再具有它建立之初的意義了。這一條約正在失去其軍事意義，主要開始越來越具有擴大和加強各成員經濟和文化聯繫的意義。在會談中艾吉奇強調，巴爾幹條約必須保留，但是南斯拉夫利用這一條約是為了使希臘和土耳其的進步力量活躍起來。¹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把南斯拉夫爭取過來，蘇聯不僅可以消除巴爾幹聯盟的威脅，而且還可以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鞏固蘇聯在巴爾幹的地位。

對於蘇聯領導人改善與南斯拉夫關係的努力，南斯拉夫領導人也持肯定的態度。在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不斷得到改善。1954年10月，蘇聯和南斯拉夫在貝爾格萊德簽署了兩國貿易互換協議，結束了蘇聯對南斯拉夫為期六年的經濟封鎖。1955年1月5日，兩國在莫斯科舉行貿易談判，簽署了1955年蘇南貿易協議和支付協議。在政治領域，從1954年9月29日開始，針對鐵托政府的「自由南斯拉夫」電台結束了廣播。²

隨着斯大林去世後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蘇南關係在逐步改善，但在兩國關係改善的過程中還是遇到了一些障礙，其中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問題，特別是關於對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和第三次會議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的評價問題。1955年5月26日到6月2日，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黨和國家代表團訪問了南斯拉夫，在兩國領導人舉行的會談中，南斯拉夫方面表示，同意與蘇聯在各方面實現關係正常化，但是，他們要求蘇聯方面承認，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是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06, л.57; л.146.

2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42, л.76-77.

錯誤的。並且要求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蘇南關係。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在南斯拉夫問題上的錯誤，赫魯曉夫認為，共產黨情報局在對南斯拉夫進行批評時採取了不正確的方法，比如號召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和南斯拉夫人民起來推翻南共領導人，因為這超出了共產黨情報局的職權範圍。赫魯曉夫也認為，1949年11月共產黨情報局通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殺人犯和間諜手中」的決議是不公正的、錯誤的，這一決議主要依據的就是「拉伊克案件」的材料，而現在已經搞清楚「拉伊克案件」和關於這些案件的「材料」都是偽造的，並且蘇共中央主席團已經向參加共產黨情報局的兄弟黨建議撤銷這份決議。但是，蘇共代表同時認為，在共產黨情報局第二次會議上討論南共問題是有益的，對其他共產黨具有教育意義。蘇聯方面仍然認為，在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通過的「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局勢」的決議中，在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活動的一些原則問題上的批判是正確的，其目的是改正南共中央的錯誤，捍衛馬列主義思想的純潔性。¹ 在同南斯拉夫改善關係的時候，蘇聯代表團全體成員，特別是赫魯曉夫一再強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精神，強調要解決黨的關係以及南斯拉夫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態度問題。認為「應該以蘇聯為首，組織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只有它才能抵禦帝國主義的進攻。」²

蘇南兩黨在對情報局活動的評價問題上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實質性的分歧。其原因在於，對情報局就南斯拉夫問題作出的決議的評價問題實際上關係到蘇聯與其他國家共產黨的關係問題。蘇聯不可能放棄通過情報局對一些犯了錯誤的成員「進行批評」這種形式，因此，蘇聯領導人堅持情報局第二次會議對南斯拉夫共產黨進行批評的方式是正確的，會議通過的決議以及對南斯拉夫共產黨在一些原則問題上的批評是正確的。

隨着蘇南關係的改善和兩黨在對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的分歧的出

1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88, л.125-129.

2 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第162-163頁。

現，在南斯拉夫出現了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命運的討論。1955年8月5日，南斯拉夫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發表了一篇由南共高級戰略家、中央委員會委員維爾科·弗拉霍維奇署名的文章「關於社會主義力量合作的形式」，在這篇文章中，弗拉霍維奇譴責共產黨情報局「企圖復活第二國際」，並且認為，共產黨情報局已經「失敗」得沒有希望補救了，因為它沒有考慮到由於原子能的發展和加速的生產工具而產生的社會變化。文章評論說，社會主義的前途在於，不問信仰如何把一切社會主義政黨和運動團結在一個國際協會中，並且在這樣做時應該沒有「意識形態上的仲裁」。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將「理所當然不得不尋求各種辦法同一切願同他們合作的人們進行合作」。文章指出，「中國革命和南斯拉夫革命是以十月革命為開端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繼續」，這表明，社會主義的發展是有不同的途徑而不是只有「一種單一的途徑」，這樣就產生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具體問題；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公理的矛盾就被「社會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所代替，這一規律今後應當決定「各種特色的社會主義力量」在國際組織中的和諧關係，這一國際組織將不再談論「意識形態上的仲裁」，將會允許每個黨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願，而不會有「已經落伍的霸權思想」。這種狀況已使「世界分成兩個對立的集團——資本主義集團和共產主義集團的原則失效了」。該文指責了「復活第二國際和籍共產黨情報局來復活共產國際的企圖」，聲稱「設立一個中央機構來指導各個國家的工人組織是不可能的，是特別危險的」。¹ 弗拉霍維奇的理論的基礎以及得出的結論是，迄今為止，「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平衡」被看作是一個規律。弗拉霍維奇斷言，社會主義的發展不止一條道路，如果為了把所有可能的社會主義形式和不同共產黨的所有活動都屈從於克里姆林宮、共產國際或共產黨情報局，而把社會主義局限於一點或一條

1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5年第182期，第71-72頁。

歷史經驗，比如局限於十月革命的經驗，那就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弗拉霍維奇在進行分析的時候，對蘇聯「壟斷」馬列主義辯證法及其錯誤進行了猛烈的批評。用弗拉霍維奇的話來說，應該重新審視現存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依據恩格斯建立第一國際的原則，為社會主義力量在最大範圍內聯合各類組織創造有利條件，建立的新的組織應該在意識形態上「沒有任何仲裁」，將會允許「各種特色的社會主義」。弗拉霍維奇還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了評價，在他看來，馬克思的思想沒有考慮到迅速發展的現代性。在準備工人運動的時候這一思想過於堅持關於奪取政權的問題。在指導運動的時候，馬克思的思想忽視了現代社會發展和現代社會關係的新現象，此外，他對原子時代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力量的轉變估計不足，在原子時代，社會生產的方法在不斷地得到改善。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些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馬克思列寧主義被禁錮於一種革命戰略，完全自然的是，這種革命戰略迫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把各種社會運動致於一個中心的嚴格控制之下，這一中心要保持對意識形態的壟斷。同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被歪曲了，現在必須承認，「舊的合作形式不能滿足現代社會主義力量合作的要求和需要。」換句話說，如果社會主義注定是為了完成一個中心的指示，那麼社會主義將不會發展。最近幾年，共產黨發生了一些危機，這些危機源於對革命進行壟斷的國家和其他國家，比如和南斯拉夫之間爆發的衝突，他們各自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度是不同的。弗拉霍維奇不僅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還是南共較有威望的理論家之一，他在《共產黨人》雜誌發表的這篇文章中提議，建立新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被稱為「新的社會主義國際」，並要求為此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廢除一國對國際工人運動的領導。¹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42, л.260-262; л.61.

弗拉霍維奇的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成了「歐洲和巴爾幹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轟動一時的事情」。法國報紙《世界報》於1955年8月7日發表了題為《南斯拉夫共產黨贊成解散共產黨情報局並建立新的共產國際》的文章，對維爾科·弗拉霍維奇的這篇文章進行了評論。評論認為，弗拉霍維奇發表的這篇文章將會引起巨大的反響，「如果人民民主國家的辯論家不能馬上推翻這篇文章的結論，那麼它就會使現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得到完全新的表述形式。」文章認為，莫斯科現在打算在各個黨內實行「集團領導」的原則，如果克里姆林宮現在允許在國際活動中也實行這一原則，那麼就會發生非常令人驚奇的變化。這篇文章也指出了尼赫魯對共產黨情報局的猛烈批評，「先是在萬隆，然後在他對莫斯科進行訪問的前夕，今年6月1日，都對共產黨情報局進行了猛烈的批評。」正如南斯拉夫人一樣，尼赫魯也認為，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同共處的原則是不相容的。¹

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命運的討論也引起了英國輿論界的注意。早在1955年6月11日，合眾社就援引外交界的消息表示：俄國可能願意解散「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作為和西方國家進行合作的討價還價的一部分。報道援引從「鐵幕背後」得來的消息認為，俄國可能答應解散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作為它目前使用的新的「軟手法」的手腕之一。克里姆林宮可能會像解散共產國際一樣，表示願意正式解散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作為對西方的一種姿態。並且認為，共產黨情報局在組織莫斯科的「和平運動」和西方國家中的左翼反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德國重新武裝的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²

世界輿論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命運的報道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注意。8月11日，巴扎諾夫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中，詳細報告了關於法國報紙

1 РГАНІІ, ф.5, оп.28, д.342, л.259; л.260.

2 新華社編：《內部參考》1955年第136期，第231-233頁。

《世界報》就《共產黨人》雜誌發表的弗拉霍維奇的這篇關於共產黨情報局命運的文章。8月17日，蘇聯情報局副局長波波夫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中，也報告了緬甸的《國家報》關於南斯拉夫駐緬甸大使館二等祕書馬爾科維奇就情報局問題發表的看法，報告指出，在緬甸青年幹部講習班上馬爾科維奇聲稱，南斯拉夫和共產黨情報局分裂的主要原因在於「俄國共產黨人自私的政策」。¹

二、蘇聯領導人改組共產黨情報局的嘗試 與情報局的解散

南斯拉夫共產黨對共產黨情報局的否定態度以及國際輿論界關於解散共產黨情報局的言論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關注。

對於南斯拉夫對共產黨情報局的否定態度，蘇聯領導人持批評的態度。在赫魯曉夫對南斯拉夫進行訪問之後，蘇斯洛夫、波諾馬廖夫、葛羅米柯給向蘇共中央提交了一封信件，該信件在對蘇南關係正常化進行總結的時候，對南斯拉夫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態度進行了批評。並且提到了弗拉霍維奇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的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文章。信中指出，「如果說在最近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中，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批判還比較隱蔽，那麼弗拉霍維奇在其文章中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批判就很公開了，他在這篇文章中公開要求解散共產黨情報局。根據各種材料可以認為（根據鐵托同米高揚的談話判斷），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意見是：共產黨之間建立任何統一的機構都是根本不需要的。」報告認為，南斯拉夫方面的這種觀點完全是錯誤的。但是，蘇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42, л.258; л.268.

共中央仍然認為，「不應該同南斯拉夫同志在關於他們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原則問題上進行公開的爭論」，同時也認為，「為了使事情取得進展，應該一步一步、耐心、仔細地喚醒南斯拉夫同志，使他們改變自己的錯誤政策。」¹

在批評南斯拉夫在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的立場的同時，蘇聯方面在國際共運問題上也採取堅定的立場。在日內瓦會議前夕，1955年6月15日《真理報》在發表的評論文章中指出，杜勒斯一再主張政府首腦會議討論「東歐國家問題」和「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問題，這種意見是毫無道理的。杜勒斯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活動」問題顯然主要指的就是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針對這一問題，塔斯社在發表的聲明中指出，那麼請問：如果有人有四國會議上提出譬如「國際資本主義活動」的問題，杜勒斯先生會採取什麼態度呢？²看來，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蘇聯領導人的態度是毫不妥協的。這種態度還不斷表現出來。在1955年秋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赫魯曉夫宣稱，把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作為共產黨之間進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種形式保存下來是合適的。³1955年12月14日，在德里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赫魯曉夫在談到輿論界提出的關於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問題的時候指出：沒有理由「要共產黨放棄這種大家所公認的國際交往和合作的形式」，蘇聯向來主張，今後仍將主張「加強和發展旨在保衛全體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為和平事業而鬥爭的工人階級的國際合作」。1955年12月29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兩院聯席會議上再次談到了關於共產黨情報局今後的存在問題。「資產階級不喜歡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希望共產黨情

1 РГАНІ. ф.5, оп.30, л.170, л.13; л.20.

2 Правда, 5 июня 1955г.

3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933.

報局不再存在，但是這並不能由他們決定。」¹

在斯大林去世之後，蘇聯的對外政策開始向緩和的方向發展，並就建立歐洲的集體安全問題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但是，蘇聯領導人為什麼還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努力加強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呢？畢竟，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輿論界還是政治界對共產黨聯合組織的擔憂仍然遍存在。²

蘇聯領導人在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的這種毫不妥協的立場主要同當時國際局勢的變化有關。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領導人確實作出了一些緩和國際局勢的努力，但是這些努力並沒有達到蘇聯領導人預期的結果，特別是蘇聯方面提出的建立國際集體安全的建議多次被美英法所拒絕。1954年10月23日，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簽訂了《巴黎協定》，吸收聯邦德國加入西歐聯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此，蘇聯政府向23個歐洲國家和美國政府發出照會，要求他們不要批准《巴黎協定》，並建議召開歐洲集體安全會議，討論「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復活」等問題，並締結《歐洲集體安全條約》，但蘇聯的這些建議都遭到了西方國家的拒絕。他們拒絕的理由是，接受蘇聯提出的這些建議將會導致西方集團「防禦體系」的解體。在1955年10—11月舉行的日內瓦四國外長會議上，美英法代表聲稱，它們的政府仍然打算把自己的歐洲政策建立在保持和加強它們建立的軍事和政治集團的基礎上。在拒絕蘇聯提出的建立歐洲集體安全的建議的同時，西方國家建立的反蘇聯盟仍然在不斷加強，他們不僅企圖把西德納入北大西洋公約，而且，美國統治階層越來越堅持

1 《人民日報》，1955年12月16日，第4版；1956年1月1日，第7版。

2 1955年7月23日，在同到訪的朱可夫元帥舉行的會談中，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等人著作中的許多學說是永遠也不會被蘇聯領導人否定的，而這可能就是導致美國人民憂慮的一個原因」，「馬克思的學說宣揚的仍然是要以暴力推翻資本主義制度。」РГАНИ, ф.5, оп.30, д.116, л.125.

把弗朗哥西班牙也納入北大西洋集團。美國的計劃是讓西德、西班牙和土耳其也加入這一集團，使這一集團更具侵略性。而且美國還加大了努力，致力於在巴爾幹、地中海、東南亞等地建立反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聯盟體系。¹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開始不斷加強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聯合。1954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蘇聯同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在莫斯科舉行歐洲國家保障歐洲和平和安全會議，會議通過宣言聲稱：如西方國家批准巴黎協定，蘇聯和東歐國家將在組織武裝力量和聯合司令部方面採取共同措施。1955年3月，上述八國又就締結集體友好互助條約的原則、組建聯合武裝力量及其統帥部等問題進行了協商，並取得了一致意見。在巴黎協定被批准後。5月14日，蘇聯與阿、保、匈、民德、波、羅、捷在華沙簽署了《華沙條約》，並建立了華沙條約組織。也就是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的特點仍然是集團對抗。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更加注重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發展，更加注重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聯合。也正因為如此，蘇聯領導人在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採取毫不妥協的立場。

隨着蘇共二十大的召開，關於改組情報局工作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1956年2月7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向蘇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期間同兄弟黨代表團就情報局的今後工作和各國黨接觸和聯絡的方式問題交換意見情況的報告。對外聯絡部認為，利用邀請兄弟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蘇共二十大的機會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問題交換意見是必要的。波諾馬廖夫在報告中指出，從上次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召開到現在已經過了六年了。蘇共和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306, л. 146-147.

其他國外共產黨基本上保持着經常的聯繫；但國外共產黨相互之間的聯繫很少，並且他們就自己的工作相互通報得還不夠。前來莫斯科訪問的許多共產黨代表在就共產黨情報局工作提出問題的時候指出，除了出版報紙，共產黨情報局幾乎沒有任何工作，然而，各國共產黨之間存在一些共同的問題，並且需要就這些問題相互交換意見。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55年10月7日致蘇共中央的信中指出，「1947年情報局成立的原因和前提條件仍然存在。」此外，還出現了關於情報局的組成問題，共有八個共產黨加入情報局，但中國共產黨以及其他一些較大的黨沒有加入，其中的一些黨，比如德國統一社會黨、芬蘭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等多次提出了關於他們加入情報局的問題。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認為，在蘇共二十大期間同一些兄弟黨代表團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問題交換意見是必要的。並其認為，第一，預先可以同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王稼祥進行會談，並弄清中國同志對可能參加情報局這一問題的態度。在蘇共二十大期間，同加入情報局的共產黨代表就召開情報局例會的可能性問題交換意見，預先確定會議召開的日期和議事日程。報告建議，下一次情報局會議可以在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開，並建議討論如下議事日程：1. 同社會黨擴大聯繫和合作。2. 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經濟狀況及共產黨在捍衛工人階級生活利益方面的工作經驗。3. 情報局的工作問題：（1）關於擴大情報局人員組成的可能性；（2）關於《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紙工作；（3）關於出版情報局機關的理論刊物。在情報局會議上討論第一個問題，即討論關於擴大同社會黨之間的聯繫問題是合適的，與此相關的是一些社會黨同共產黨的聯繫有增加的趨勢。1956年3月在社會黨國際委員會會議上將討論這個問題。現在，第二個問題更加迫切，這是因為一些共產黨把自己的力量都集中到了同維護和平和民族獨立而鬥爭的問題上，削弱了對工人階級經濟利益的關注。第二，需要同前來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一些代表團進行會

談，以便弄清他們已經成熟的、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問題的想法，弄清他們對於在現代條件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方法和可能的聯繫形式的願望。在這些會談中可以提出關於按照共產黨所在的國家羣體建立相互聯繫的建議，比如，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共產黨、墨西哥共產黨、阿根廷共產黨等等），斯堪得納維亞國家（芬蘭共產黨、瑞典共產黨、挪威共產黨、冰島共產黨），西歐的一些國家（法國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葡萄牙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等等。蘇共二十大期間關於共產黨代表團之間的會談和會見都不應發表任何通報。¹ 這樣，對外聯絡部的報告實際上再次提出了關於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問題：加強共產黨情報局工作和建立區域性的共產黨聯合組織。

1956年2月22日，蘇共中央就波諾馬廖夫提交的報告作出了決議，決定委託蘇共代表同兄弟黨就情報局工作問題交換意見，對擬議於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情報局會議這一建議提出討論意見。會議還通過了波諾馬廖夫在報告中提出的會議日程，並且決定委託波諾馬廖夫預先同中共中央委員王稼祥同志進行會談，並弄清中國同志對可能參加情報局這一問題的態度，決定在國外共產黨代表團在莫斯科期間就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問題進行會見和會談。在會談中提出共產黨之間按照地區建立聯繫的建議：拉丁美洲國家（巴西共產黨等等），斯堪得納維亞國家（芬蘭共產黨等等），西歐的一些國家（法國共產黨等等），會議還委託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就前來參加蘇共二十大的國外共產黨提出的問題準備建議。²

蘇共中央主席團在2月22日還通過決議，委託赫魯曉夫、米高揚和蘇斯洛夫首先同前來參加蘇共二十大的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在小範圍內就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工作以及今後各國共產黨工作聯繫的組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с. 200-202.

2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с. 202-203.

織相關問題舉行會談，並把會談情況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報告。主席團還決定，在同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舉行會談之後，在更大的範圍內召開會議，討論共產黨和工人黨工作的聯繫問題；最後，委託米高揚、蘇斯洛夫和波諾馬廖夫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交換意見的基礎上向蘇共中央準備一份提議。¹

關於蘇共中央代表同其他兄弟黨代表舉行的會談情報，還沒有得到相關的檔案材料。但根據陶里亞蒂的回憶，在蘇共二十大前幾個月，參加情報局的各黨領導人之間就已經談到關於情報局繼續存在是否適宜的問題，並且經過幾個月的交換意見，大約到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時期，這種交換意見便告結束。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期間，大家達成了初步的原則性協議。² 那麼，達成的這一初步的原則協議究竟是什麼呢？

這一原則協議可以通過在蘇共二十大前後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就共產黨情報局工作問題給蘇共中央的信件以及蘇共中央就情報局工作問題通過的相關決議得出相應的結論。2月22日，蘇共中央在就波諾馬廖夫的報告作出決議的同時，還收到了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就情報局工作的問題給蘇共中央祕書處的信件，在這封信件中，陶里亞蒂提出了意共對共產黨情報局今後的存在問題的意見，意共認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今後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同時，陶里亞蒂也提出了「關於共產黨情報局是否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功能這個問題」，應該討論關於怎樣改善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這個問題。意大利代表團認為，為了討論這個問題需要召開情報局各黨代表會議，並且至少要讓那些尚未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西歐國家共產黨也參加這次會議；陶里亞蒂也提出，如果蘇共中央祕書處認為，不適宜召開這樣的會議，那麼意共可以以書面的形式闡述對改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с. 199-200.

2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二卷，第56頁。

善情報局工作的想法，「以便使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有更緊密的聯繫和能夠更好地交換意見。」¹可見，陶里亞蒂認為，共產黨情報局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但是沒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改善共產黨情報局工作的重點是要加強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的聯繫。

1956年3月2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關於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問題」的決議，決定委託蘇斯洛夫、謝皮洛夫和波諾馬廖夫根據中央主席團會議交換的意見，制定關於中止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活動的報告，同時還委託他們制定關於社會主義陣營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繫的建議並在5天內向蘇共中央提出這一建議。²由此可見，蘇共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態度就是：解散共產黨情報局，並尋求社會主義陣營共產黨和工人黨建立聯繫和接觸的新形式。應該注意的是，這裏提出的是加強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聯繫，法共和意共等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顯然被排除在外，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顯然需要建立的是另外一種聯繫和接觸的組織形式，正如陶里亞蒂在2月22日致蘇共中央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

蘇共中央關於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分別建立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聯繫機構與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聯繫機構的建議得到了一些共產黨的贊同。1956年4月5日，烏布利希在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赫魯曉夫的信中指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活動既不符合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發展和任務，也不符合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的發展和任務，他同意關於解散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提議。同時，烏布利希贊成關於設立人民民主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繫機構的建議；贊成陶里亞蒂提出的關於建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繫機構的建議，建議《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紙的改革應該儘可能注重到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問題，注重同西方對人民民主國家反動的意識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с.205-206.

2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16-117, с.933.

形態作鬥爭的問題；建議創辦一份雜誌，使亞洲和近東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能夠相互交流經驗。¹

在就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作出決議之後，1956年4月13日，波諾馬廖夫給蘇共中央寫信，建議通過蘇聯大使館通知英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印度、印度尼西亞、敘利亞和黎巴嫩、日本共產黨中央，以及加拿大工人進步黨（這些黨都參與了《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報紙工作或在自己的國家再版這份報紙）關於即將中止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及其機關報的出版的決定，建議通過拉美國家的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通知他們這一決定。同日，蘇共中央通過了這一建議，並批准了關於通知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信件的本文：

根據最近幾天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相互達成的協議，通過了關於中止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活動及其機關報《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報紙的出版的決議。這一決議是在就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相互交換意見之後作出的，其理由如下：在解散共產國際之後於1947年成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為消除各個共產黨之間的孤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共產黨情報局在一系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加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今後團結工人階級和所有勞動者為爭取持久和平、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重要因素。共產黨情報局及其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為發展和鞏固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兄弟關係、為他們相互交流經驗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它針對各國的具體問題闡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問題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這些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組織方面都使兄弟黨得到了加強，加強了共產黨在羣眾中的影響。同時，近年來國際環境發生了一些變化：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л.471, л.16-17.

社會主義突破了一國的框架，打破了被孤立於世界體系的狀態；在歐洲和亞洲出現了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愛好和平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都組成了廣闊的「和平地帶」；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尚未獨立的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共產黨力量都得到了增長和加強，他們正在同消除戰爭威脅和反對派進行積極的鬥爭，正在為和平、為勞動人民的生存利益展開積極的鬥爭，正在為自己國家的民族獨立展開積極的鬥爭，最後，目前出現的任務是：在為了順利地開展和平鬥爭、為了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過程中克服工人運動中的分裂，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這為共產黨和工人黨的活動創造了新的條件。無論是從共產黨情報局的組成，還是從其活動的內容來說，它都已經不再符合這種新的條件，它已經完成了自己的功能。加入共產黨情報局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認為：每個政黨或黨派，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共同目的和任務、根據自己國家的民族特點和條件開展工作的過程中將會找到新的、更加完善的有益形式，相互之間建立聯繫和進行接觸。這種形式或許可以是西歐國家共產黨聯繫局、拉美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繫局、東南亞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繫局，無疑，今後將會根據具體的條件和自己的活動就共同的問題交換意見，為和平、民主、社會主義而鬥爭，捍衛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的利益，把勞動羣眾動員起來反對戰爭的危險，也可以考慮同傾向於社會主義的政黨和黨派進行合作的問題。所有這些都將使共產黨和工人黨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合作更加鞏固，使他們兄弟般的聯繫更加鞏固，有助於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根據上述設想，提議近期在《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上發佈關於中止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活動的通告。

決議的最後是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的簽名。¹

1 ПІАНН, ф.5, оп.28, л.381, л.101-105.

在蘇共中央給保加利亞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波蘭統一工人黨、匈牙利勞動黨和羅馬尼亞工人黨的信中都還提到了關於在近期舉行會議，討論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接觸和聯繫的方式問題。¹

1956年4月17日，情報局機關報發表了蘇共中央通過的關於結束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活動的公報，與蘇共中央通過的決議不同的只是，該公報的最後是情報局八個成員中央委員會的署名。

4月18日，《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重要決議」的評論文章，對發表的關於結束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活動的決議進行評論。《真理報》指出，這個決定的作出是由於有必要使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和合作的方式符合於已經改變了的歷史情況。這個決定充滿了對進一步發展和鞏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它表明，各國共產黨在列寧的關於工人階級政黨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要看具體歷史情況的特點而定的這一著名理論的指導下，創造性地對待關於制定相互聯繫的形式的問題。《真理報》在指出了情報局的歷史作用，以及在目前情況下它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聯繫形式已經過時了以後說：在現代歷史中已經第一次出現了通過愛好和平的國家和民族的共同努力來防止新戰爭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機會。各個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前景已經打開了。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必須前所未有地注意自己國家的特點和條件。只有當共產黨人在保持工人階級政黨本色的同時又充分代表本國人民的民族願望和利益的時候，他們才能團結自己國家的一切民族民主分子。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面臨着如下任務：找出充分符合本國人民的特點和傳統的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和形式，並引導羣眾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在今天的條件下，共產黨人面臨着特殊的任務，這就是消滅勞工運動中的分裂，建立工人階級的團結，以便為爭取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權利、為爭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16-117.

取和平和社會主義而鬥爭。工人的政黨和組織，首先是當今工人運動的兩大派別共產黨和社會黨，一道共同奮鬥的客觀條件現在已經成熟了。雙方都必須在這方面採取必要的步驟。不久以前，共產黨曾經再一次宣佈它們願意同社會黨人一致行動。它們建議共同制定兩黨都可以接受的綱領。為了拯救人類免受新的戰禍，為了進一步發展國際社會主義，都迫切需要加速工人運動中的一切隊伍的團結，都迫切需要建立合作，以便為實現工人階級當前的和最後的目標而鬥爭。《真理報》着重指出：關於結束情報局的活動的決定毫無疑問將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目前所面臨的任務的完成。不用說，結束情報局的活動絕不意味着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的削弱。沒有一個共產黨人會想要否認工人階級政黨之間的聯繫和合作的必要和好處。密切的兄弟般的聯繫、對彼此經驗的興趣、就迫切問題交換意見等等，一向是、而且將來也是各國共產黨工作的必要條件。《真理報》說，大家知道，社會黨和天主教黨派，工會和其他人民團體相互之間是進行合作的，是定期舉行國際大會和會議、互派代表團、建立諮詢機構等等的。沒有理由認為共產黨在這一方面應該是例外。相反，由於它們的利益和世界觀的完全一致，更加密切的聯繫和合作應該是它們的特點。《真理報》表示，相信在情報局結束活動以後，各國共產黨將為它們的相互聯繫和在保衛工人階級利益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為它們的活動的配合找到新的有效的形式。《真理報》最後說，把各國工人階級團結成為一支爭取持久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強大力量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偉大原則，將繼續指導各國共產黨。¹

在共產黨情報局解散之後，4月26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波諾馬廖夫和副部長莫舍托夫給蘇共中央寫信，就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和中止《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紙的後續安排工作提出建議，主

¹ Правда, 18 апреля 1956г.

要是關於情報局所屬財產的處理，關於情報局機關工作人員工作的安排，關於檔案的保存，關於清算報紙訂閱者的費用等。建議根據共產黨情報局成員之間的協商，請求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暫時保管共產黨情報局及其機關報的財產（印刷機、圖書館等）；建議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報紙編輯部、出版社的機密檔案交由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保管，而簿記檔案交由蘇共中央管理部保管。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報紙編輯部、出版社的其他檔案轉交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保管；大多數共產黨情報局秘書處辦公室和報紙編輯部的工作人員從5月1日開始返回到蘇聯。在布加勒斯特留下一個工作小組，把相關檔案和財產移交給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保管。共產黨情報局和報紙編輯部的一些工作人員將回到他們到布加勒斯特以前的工作崗位上。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蘇共中央管理部同蘇共中央其他部門一起安排從布加勒斯特返回的其他蘇聯工作人員的工作。¹自此，共產黨情報局徹底解散。

三、蘇聯領導人建立共產黨區域聯合組織的 設想和嘗試

在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問題上，蘇共中央的考慮是，以建立四個區域性共產黨國際聯合組織來取代共產黨情報局。2月22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在作出了「關於舉行因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而抵達莫斯科的共產黨代表的協商會議」的決議之後，就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進行了討論，從會議記錄來看，以建立區域性的共產黨國際聯合組織來取代共產黨情報局的主張得到了主席團各成員的一致贊成。大會上，米高揚提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71, л.19-21.

出，讓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的共產黨員和工人黨建立聯合組織；讓西歐國家的共產黨建立共產黨情報局；讓北歐國家也建立共產黨情報局；並建議同巴西人進行協商，成立拉丁美洲國家共產黨情報局；讓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建立聯合組織，並建議加強這些國際聯合組織的力量。莫洛托夫也支持成立區域性的聯合組織。蘇斯洛夫的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不應該封閉自己，不能喪失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卡岡諾維奇認為，把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區分開來將會很有益，必須建立強大的中心，為此，應該召集前來參加蘇共二十大的各國代表團領導人進行協商。伏羅希洛夫也認為應該進行協商，按照黨的系統把（社會主義陣營）聯合起來，以及進行區域性的聯合。赫魯曉夫也對建立區域性的聯合完全贊同，並提出了取消共產黨情報局，成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以及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絡委員會」，並且認為，意大利和法國共產黨退出情報局是件好事。主張通過區域性聯合組織進行接觸，最好由蘇共來提供報紙，出版學術雜誌和書籍。大會委託米高揚、蘇斯洛夫和波諾馬廖夫在2月23日之前提交建議。¹ 從蘇共中央主席團2月22日的會議記錄來看，蘇共領導人已決定建立四個區域性的共產黨聯合組織來代替共產黨情報局。首先就是在歐洲建立西歐國家的共產黨聯合組織和社會主義國家的聯合組織。這樣就使東歐那些已經執掌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尚未掌權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區分開來，因為，在蘇聯領導人看來，他們的鬥爭路線是不同的。

在建立西歐國家共產黨的聯合問題上，蘇共的意見是讓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人商量決定，而蘇共不提供任何建議。² 根據蘇共中央關於

1 後來《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取代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8—1991年期間，它在布拉格用34種語言出版，並在145個國家發行。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06-107, с.927.

2 韋利科·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達洲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0年，第35頁。

建立西歐國家共產黨聯合組織的意見，法共和意共開展了相應的工作。1956年5月3日和4日法共和意共代表團就建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組織舉行了會談，在交換意見之後，雙方解決了以下五項原則性問題：1. 法共和意共之間的關係；2. 兩黨之間需要討論的問題；3. 相關所有各黨之間的關係；4. 同其他工人黨、民主黨派可能建立的聯繫；5. 可能建立的出版機構。

在這次會議上，意共和法共就今後兩黨之間以及兩黨同西歐其他共產黨之間的聯繫問題達成了協議。從協議的文本可以看出，法國共產黨承擔了對英國共產黨、比利時共產黨、荷蘭共產黨、盧森堡共產黨和葡萄牙共產黨的活動進行監督並對其予以幫助的責任，而意大利共產黨承擔了對奧地利共產黨、希臘共產黨以及瑞士勞動黨的活動進行監督並對其予以幫助的責任。關於建立出版機構的問題，兩黨代表團都決定避免組建統一的出版機構，在他們看來，共同的出版機構會不可避免地成為統一的組織中心，而這是不受歡迎的。同時兩黨代表團都認為，必須填補由於《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報紙的停刊而出現的空白，希望通過兩黨相關的雜誌交流經驗，這樣做是必須的，但是也是不夠的。最好是兩黨中的每一黨都擁有自己的出版物，出版一些理論文章，發佈一些國際文件，以及各國保存的一些文獻。在這兩個出版機構中，或許還應該有一份用德語進行出版的刊物，刊登一些大家都感興趣的文章，以便使相關各共產黨擁有情報機構，對其活動予以指導。在會議結束的時候，兩黨代表團都對舉行的這種兄弟般的坦誠的交換的意見感到滿意，他們都認為，這次會談的結果對兩黨以及整個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都是非常有益的。兩黨商定今後將加強這種友好合作。¹ 儘管法共和意共為建立西歐共產黨的聯合進行了一些嘗試，但是，建立西歐國家共產

1 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7, л.53-56.

黨聯合組織的設想仍然沒能實現。根據陶里亞蒂後來的論述，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在當時進行的這些嘗試，「沒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結果，這條道路就被放棄了，以後在任何場合再也沒有談到它。」¹

如果說，蘇聯領導人對建立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聯合組織持消極態度，那麼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之間建立國際聯合組織的態度則要積極得多。在1956年3月28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在通過的「關於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問題」的決議中，在決定解散共產黨情報局的同時，明確提出了關於尋求社會主義陣營共產黨和工人黨新的聯繫方式的問題。²但是，蘇聯領導人在這一問題上卻遇到了障礙。

在建立社會主義陣營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聯合組織中的重要一環就是把南斯拉夫重新納入這一組織。解散共產黨情報局顯然可以滿足南斯拉夫領導人的有關要求，有利於蘇南關係的改善。為了了解南斯拉夫共產黨在建立新的共產黨聯合組織問題上的意見，3月29日，赫魯曉夫同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米丘諾維奇舉行了會談。根據赫魯曉夫的談話，在蘇共二十大期間，蘇共同各國黨，首先同共產黨情報局成員黨舉行了會談，決定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同時，赫魯曉夫提出，在解散共產黨情報局之後，還必須為各國共產黨的合作建立一個組織。首先必須為歐洲掌權的共產黨的合作建立一個新組織。至於建立亞洲國家共產黨的聯合組織，赫魯曉夫認為，中共的意見非常重要，因此派米高揚就這個問題同中國人和其他人會談。另外，赫魯曉夫提出還要以某種方式解決同南北美洲各國共產黨進行合作的問題。在這次會談中，赫魯曉夫提出了蘇共中央曾討論過的關於為各國共產黨的合作建立四個新的地區性聯合組織的想法：歐洲建兩個，亞洲建一個，美洲建一個。赫魯曉夫要求米丘諾維奇向鐵托報告蘇共中央的這些看法，顯然是希望得到南斯拉夫的支

1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三卷，第150頁。

2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16-117, с.933.

持。然而，米丘諾維奇當場對赫魯曉夫提出的這些建議表示反對，在他看來，「如果組織四個新的共產黨情報局來代替目前的一個共產黨情報局，就使西方有了新的可乘之機，來發動攻勢，攻擊共產主義現在比斯大林時期更富侵略性。」對此，赫魯曉夫的答覆是，「不必害怕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在局勢要求我們的時候，我們就發動鬥爭」，「應當把我們的所有力量聯合起來，使自己得到保障，我們應當有一個相應的組織」，「對於法國人和意大利（共產黨人）來說，這一切是另一碼事，但是對於陣營各國來說，必須有一個新組織。」米丘諾維奇的消極看法對赫魯曉夫是一個打擊，正如米丘諾維奇所認為的，在關於建立新的、地區性共產黨聯合組織問題上，他的消極態度使赫魯曉夫發生了動搖。儘管如此，蘇聯領導人仍然沒有放棄原有的打算。4月3日，布爾加寧在同米丘諾維奇進行談話的時候，再次提出了關於建立新的共產黨國際聯合組織的問題，並表示要在鐵托對蘇聯進行訪問的時候再同鐵托研究這件事。¹

從赫魯曉夫同米丘諾維奇的談話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還是從陣營對抗的角度來看待建立新的共產黨情報局組織的，希望使南斯拉夫重新回歸到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無論是在陣營問題上還是在關於建立新的共產黨聯合組織問題上，南斯拉夫的立場都是令蘇聯領導人感到失望的。5月24日，在鐵托對蘇聯進行訪問前夕，鐵托在同合眾社記者進行談話時指出，蘇聯和南斯拉夫將為社會主義和世界和平而主張「積極共處」，南斯拉夫同蘇聯的關係「將是權利平等的國家間的關係」。鐵托認為，他即將對蘇聯進行的訪問，不會使南斯拉夫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任何改變，同時他還表示，希望西方國家了解南斯拉夫的獨立態度，希望南斯拉夫同西方國家的關係變好。並且，據記者報道，鐵托反對建立新的共產黨組織以代替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² 1956年6月，在鐵托訪

1 韋利科·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第35-38頁。

2 《人民日報》，1956年5月26日，第4版。

蘇期間，蘇聯領導人對他進行了熱情的招待，並且在會談中進行了令南斯拉夫人感到「目瞪口呆」的自我批評，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對改善蘇南關係的重視。儘管如此，南斯拉夫方面最終仍拒絕對陣營承擔任何義務，不同意在意識形態團結上簽字畫押。最後兩國簽署的《莫斯科宣言》既沒有提「意識形態上的團結」，也沒有提「社會主義陣營」。¹

在力圖把南斯拉夫共產黨納入新的共產黨聯合組織方面遭受挫折的同時，蘇聯在建立亞洲共產黨聯合組織方面也遇到了困難。1956年3月，米高揚在對印度、緬甸後訪問之後來到北京。在同中共領導人舉行的會談中，米高揚提出，蘇共中央建議各國聯合出版一個刊物，還提到要成立聯絡局。毛澤東明確表態：不贊成辦刊物和設立機構。毛澤東說，過去情報局搞刊物，結果並不好，第三國際和情報局給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現在搞聯絡局，那麼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也會害怕。並且，毛澤東指出：過去共產黨情報局「干涉了內政，決議強迫執行，現在不能這樣做了。」毛澤東的建議是：「有事開會商量」，召集人當然是蘇聯比較好。「你們召集會議我們到，有事開會，無事不開。」²

南斯拉夫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都反對蘇聯領導人提出的關於建立新的共產黨聯合組織的建議，都對共產黨情報局的工作方法表示了反對，這就表明，需要建立的新的共產黨聯合組織必須改變以前的工作方法，而毛澤東提出「有事開會」的建議顯然對蘇聯領導人產生了影響。1956年6月2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參加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會議的共產黨人和工人黨人之間聯絡方式」的決議，決議指出，關於中止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活動事先規定的前提條件是，各社會主義國

1 韋利科·米丘諾維奇：《莫斯科的歲月》，第78、85、87頁。

2 毛澤東同哥穆爾卡談話記錄，1957年11月6日、11月15日，轉引自《中蘇關係史綱》，第208頁。

家共產黨領導人需要就他們之間可能進行聯繫的形式交換意見。蘇共中央認為，這種聯繫的形式可以是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定期召開會議，就他們工作中的共同問題交換意見，對具體的代表共同利益的黨的問題和經濟建設問題進行集體討論。如果某個黨為了交換意見、為了交流現有的經驗，希望就他們感興趣的問題進行集體的討論，並就這些問題同相關國家的共產黨協調行動，都可以提議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各黨代表會議。會議召開的地點可以通過相互協商來確定。會議不需要一定都通過決議，但是可以提出得到與會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議。決議還提出了出版刊物的建議，「可以每兩周或者最初每一個月出版一期雜誌，來解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解釋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作的道路和經驗，推廣和發展馬列主義理論，研究和闡釋國際工人運動問題以及各民族為爭取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問題。」這一期刊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機構，不必接收他們的指示，但是每位編輯都可以從自己所在的國家得到指示在雜誌上簽名，這指的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黨都可以在編輯部中有自己的代表。如果大會在原則上能夠贊同這一決議，那麼可以委託各黨代表（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等）小組制定具體的建議（出版的地點、雜誌的名稱、預算等等），並同各黨領導人進行協商。¹ 這樣，蘇共中央就確定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之間新的聯繫方式問題。

為了實現蘇聯領導人提出的關於建立共產黨聯合組織的新構想，6月24日，在莫斯科召開了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了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相互接觸的形式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關於這次會談的詳細記錄，來確定東歐各黨對蘇聯領導人新構想的反應。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這次會議上，赫魯曉夫向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領導人通報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с.346-347.

了關於與南斯拉夫黨和政府代表團的談判情況。6月2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了關於把這些情況通報給中國、意大利和法國共產黨，以及蘇聯基層黨組織的決定。根據這個決定，1956年7月13日，向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寄出了蘇共中央的祕密信函，其中強調了應該注意與南斯拉夫代表團之間的分歧，南斯拉夫方面拒絕聲明與蘇聯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思想統一，以及南斯拉夫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南斯拉夫共產黨追求在與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相互關係中獨立的意圖，遭到了蘇聯共產黨的尖銳批判。¹

從蘇聯領導人對南斯拉夫進行的批評可以看出，蘇聯領導人還是希望建立新的聯繫機構，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的。因此，6月3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蘇共中央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草案」，對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做了許多限制性解釋，同時提出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之間建立聯繫的必要性：「在新的歷史情況下，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這樣的工人階級國際組織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這絕不是說，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上的革命的兄弟政黨的國際團結和接觸的必要性已經失去了意義。」恰恰相反，現在「各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團結和兄弟般的團結尤其是必要的」。²正在蘇共中央緊鑼密鼓地與各國共產黨協商這一問題的時候，爆發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來。

波匈事件之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團結和統一顯得更加重要了。為加強這種團結，蘇聯領導人開始考慮對構成蘇聯同東歐聯盟國家之間關係的基礎和約束這種關係的原則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在1956年10月30日的政府宣言中有所體現。這個宣言與早些時候的假設相反。它是

1 Фурсенко А.А.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43-145, с.947-949.

2 Аймерихер 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352-368.

在波蘭和匈牙利動亂之前——10月中旬——形成文字的，後來只是根據新的政治形勢發展作了相應的更新。該宣言為闡明蘇聯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提供更為公平的基礎。¹

蘇聯領導人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努力得到了中共領導人一定程度上的支持。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同前來出席中共八大的德國共產黨領導人烏布利希舉行的會談中，毛澤東一方面對共產黨情報局進行了批評，認為在共產國際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在共產黨情報局中也存在，「情報局做了許多壞事」，另一方面指出，在情報局解散之後，共產黨之間仍要合作，仍要以蘇聯為中心，「社會主義陣營中只有一個頭，這就是蘇聯。」²1957年1月11日，周恩來與波蘭領導人會談時，一方面對蘇聯領導人企圖建立共產國際或是情報局性質的國際組織進行了批評，表示各共產黨之間要有平等的夥伴關係，另一方面周恩來也強調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並建議召開兄弟黨的實質性的會見，會後可以就共同達成協議的問題發表一個總結性的文件。對於共同出版一份意識形態雜誌，周恩來也談到了中共的看法。「中國同志認為共產黨和工人黨出版一份這樣的雜誌是多餘的。他認為，蘇聯可以自己出版一份這樣的雜誌，兄弟黨的代表可以把文章寄給他們。」³

在中共和蘇共的共同努力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於1957年11月14—16日期間在莫斯科舉行，12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會後一致通過了宣言，宣言對當代國際局勢進行了分析，並闡述了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任務以及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的關係問題。重申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無產階級

1 Békés,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WIHP Working Paper*, No16, 1996.

2 毛澤東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56年9月23日，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11卷，第2766-2779頁。

3 周恩來與哥穆爾卡的會談記錄，1957年1月11日，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係：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11卷，第2766-2779頁。

國際主義原則是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國共產黨之間相互關係的基礎，承認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應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尊重國家獨立和主權、互不干涉內政等原則以及互利和互助的基礎上。在這次會議之後，11月16—19日，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舉行了會議，最後通過了和平宣言。根據這次會議的決定，國際共產主義雜誌《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開始出版。¹

1957年莫斯科會議，無論是會議的規模，還是其對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影響來說，都具有里程碑的意義。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次會議上提出了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任務，並通過了和平宣言，這就為今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這也意味著，在蘇共二十大以來確立的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總路線指引下，蘇聯最終放棄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長期奉行的世界革命戰略。

在這次會議之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作為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新的聯繫方式就被確定下來，1957、1960和1969年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國際會議成了各國共產黨進行聯合的最重要的形式。²

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這種新的聯合形式的建立是國際共運發展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標誌着各國共產黨獨立性的進一步加強。正如陶里亞蒂於1957年11月在六十四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關於意共政策的發言中所指出的，「今天在許多國家，可以看到達樣的過程，即共產黨正在變成羣眾性的黨，它們正在展開廣泛的政治行動，打開爭取多數的新途徑，制定新的、當前口號，等等。只要舉印度、印度尼西亞、芬蘭、某些拉丁美洲國家和西班牙的例子就夠了，其中，西班牙黨雖然處於祕密狀態，但它證明有開展政治活動和鬥爭的巨大能力，等等。我們應當促進這

1 第1期雜誌於1958年9月出版。

2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с.116-117, 933.

一過程，而不應妨礙它。加強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國際聯繫和團結，將有助於解決我們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遇到的一切問題。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必將更加有力和更加順利地展開。但是，在目前，為了使我們的運動發展成為大規模的羣眾運動，就要求各國黨在根據本國具體條件制定自己的口號和確定同其他政治力量實行合作的形式方面，發揮高度的自主。對具體情況考慮得越多，這種政治行動就越有效。因此，不應急於成立新的國際機構。應當善於把每個黨的自主發展同我們整個運動的最大程度的團結一致結合起來。」¹

在 1957 年莫斯科會議的召開以及在各國共產黨之間建立新的聯合形式的問題上中共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總體來說，中蘇雙方都認為莫斯科會議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在這個成功的背後，卻蘊藏着一種危機。中蘇關係在其蜜月的最高峰正漸漸進入一場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鬥爭中。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上升，大有取代蘇共領導地位的趨勢，對蘇共的地位構成了挑戰。而蘇聯在 1956 年的黨內鬥爭結束以後，國內政治趨於穩定，農業和工業生產都在穩步增長，特別是蘇聯在航天領域取得的輝煌成就更加增強了蘇聯領導人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長期以來國際共運的領導者，蘇共領導人是無論如何是不願看到中共影響力的這種增長的。於是，莫斯科會議之後，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便一個接一個地顯露出來，最終導致了中蘇分裂。²

1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二卷，第 297 頁。

2 參見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第 221 頁。

結 語 對共產黨情報局的評價

在共產黨情報局解散的時候，在蘇共於 4 月 13 日發給各國共產黨的關於解散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的信件中，在共產黨情報局機關報發佈的關於結束共產黨情報局的公報中，以及在《真理報》關於解散共產黨情報局的評論文章中，都給予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積極的評價。但是，即使在當時，人們對共產黨情報局活動的評價並不都是肯定的，正如在 1955 年蘇南改善關係的時候，南斯拉夫共產黨對情報局的否定態度，毛澤東對共產黨情報局進行的批評等等。在共產黨情報局解散之後，人們對共產黨情報局進行了各種評價，其中以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的評價最具代表性。

在共產黨情報局解散之後，陶里亞蒂在其發表的演講中多次談到共產黨情報局，並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進行評價。1956 年 4 月，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陶里亞蒂指出，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不是對情報局活動的否定看法。他認為，關於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應該考慮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初幾年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所處的條件。當時各黨都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和鬥爭，並取得不同的結果。當時國際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是非常不確定的。各共產黨彼此隔離很遠。「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各個領導中心發動了冷戰，其基本目的是要攪亂和擊敗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而首先是攪亂和擊敗聚集在我們各個黨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先進和最堅決的部分。當時需要緊密團結隊伍，明確和有力地確定共同目標，更積極地交流經驗。」陶里亞蒂認為，共產黨情報局已經完成了各國共產黨交流經驗的任務，「這是情報局所進行的工作的積極方面。」在

對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進行肯定的同時，陶里亞蒂也指出了共產黨情報局的消極方面。他認為，這一消極方面在於共產黨情報局重蹈了共產國際的錯誤，「純粹為了互通情報和交流經驗的情報局，在1948年和1949年時，當它硬要從外部干預南斯拉夫黨問題時，則犯了錯誤。」總之，在陶里亞蒂看來，在其活動的整個歷史中，共產黨情報局主要做了兩樁事情：第一樁是好事，第二樁是壞事。第一樁就是正確指導整個工人運動抵抗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計劃。第二樁是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不幸的干涉。¹

在陶里亞蒂看來，共產黨情報局的經驗不是很成功的，「這不僅是因為在1948年它同南斯拉夫決裂了，而且是因為情報局沒能很好地完成各成員交流經驗的功能。」他認為，情報局的成員是偶然組成的，意大利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的鬥爭的道路，實際上和東歐各共產黨的鬥爭道路並沒有多少共同點。情報局各成員的經驗都太不相同，互換情報的任務本身執行起來就有困難。例如，意大利共產黨，除了在情報局成立會議上，從來都沒有在國際會議上討論過自己的政策。戰後意共採取的一切主動都純粹是自己做的。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也許並不總是充分理解這些主動的，因為這些主動依據的是意共在意大利工作的條件，完全特殊的條件。另外，交流經驗，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辯論和磋商，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並不能經常進行。對於相互的經濟問題了解很少，難以根據各成員國的具體經濟情況，制定一個共同計劃來進行經濟活動方面更高程度的協作，在進行政治、文化和其他的討論方式方面，也可能表現出差異和距離。在情報局存在的年代裏，意大利共產黨幾乎一點都不了解其他國家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而其他一些共產黨也有意隱瞞自己遇到的困難和缺點。情報局發表的宣傳性文章並不總是有益的。在

1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二卷，第56頁；第90頁。

這種情況下，情報局的活動幾乎不可避免地成為乾巴巴的，而不再令人滿意，因此它就被解散了。¹ 儘管陶里亞蒂認為，情報局存在的那幾年裏，曾犯了一些錯誤，對某些國家產生了不利的後果，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也表現出某種教條主義，例如，由於這種教條主義，對走向社會主義不同道路的探討受到了批評。這些批評使一些黨在開展鬥爭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方面產生了猶豫不決和陽奉陰違的現象，但是，在陶里亞蒂看來，這些消極因素是大大次於情報局在引導整個工人運動採取行動反對冷戰、反對把冷戰變成熱戰的企圖以及反對帝國主義的整個政策方面所給予的積極推動力。²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各國共產黨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和新的發展道路，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共產黨所關心的是，各黨能夠通過制訂新的政策和羣眾的大規模行動，在一條新的道路上前進。他們認為，對於向革命過渡和接近的形式的探討應表現為爭取新型民主的鬥爭，而這個鬥爭應以符合歐洲和世界範圍的各國中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現實的方式靈活進行。這個過程在當時已經顯示出是個困難、複雜和在質上是多種形式的過程，與此同時，一些共產黨變成了執政黨，殖民主義宣告崩潰，這種崩潰後來在印度的獨立和在中國革命的勝利得到了最大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由一個單一的中心來領導和掌握這種性質的過程已經變成真正的不可能。而這一點早在共產國際解散的時候就已經被提出來了並被遵循，人們逐漸日益明顯地肯定它，並拒絕了「領導國」和「領導黨」的概念，因為這個概念會從另外的道路使一個集中的領導得以產生。³ 儘管早在共產國際解散的時候蘇聯領導人就很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仍然在 1947 年 9 月建立了具有協調職能的共產黨情報局，其原因就是冷戰。

1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二卷，第 90 頁；第 296 頁；第 56 頁。

2 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三卷，第 161 頁。

3 參見陶里亞蒂：《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三卷，第 159 頁。

戰後，隨着蘇聯與西方國家矛盾的發展，蘇聯領導人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確立的大國合作戰略不斷受到挑戰。這些挑戰具體表現在蘇聯與西方國家在歐洲問題和近東問題上的矛盾和鬥爭，表現在蘇聯為歐洲各國共產黨確定的聯合政府政策的遭受的失敗，表現在東歐各國民族主義獨立傾向的發展，表現在蘇聯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諸多挑戰。面對上述種種挑戰，蘇聯的對外政策不斷向冷戰對抗的方向轉變，並開始醞釀建立起共產黨情報局，加強對東歐各國的控制，馬歇爾計劃的提出加快了這一進程，於是，具有協調職能的共產黨情報局被建立起來。

蘇聯共產黨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加強對情報局各黨的控制，消除東歐各黨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蘇南衝突的爆發以及蘇聯領導人通過共產黨情報局對東歐各黨開展的整肅進一步加強了蘇共對其他各黨的控制。但即使在兩大陣營冷戰對抗的新形勢下，蘇共之外任何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都不認為可以向後轉，重新建立國際工人運動的統一的領導中心。這是導致蘇聯領導人在 1950—1951 年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20 世紀 50 年代中期，在兩大陣營對抗加劇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提出了解散共產黨情報局，建立四個區域性的共產黨聯合組織取而代之的設想，其主要目的是要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而沒有真正考慮到各黨的獨立自主。蘇聯領導人雖然付出了很大努力來實現其關於建立共產黨聯合組織的新構想，尋求建立新的共產黨之間進行聯繫和接觸的形式，但這種形式最終只是以 1957 年、1960 年和 1969 年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國際會議這種形式進行。而且從 1957 年莫斯科會議開始，蘇共的地位就開始受到中共的挑戰。因此，1947 年成立的新的國際共運中心——情報局的解散是必然的，因為它的存在本身是對肯定各黨的自主的一種限制。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以及蘇共建立新的地區性的共產黨聯合機構的嘗試的失敗表明，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下降了。

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控制力減弱了，當時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雖然對此有所認識，但是他們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矛盾，特別是對中蘇矛盾的估計卻是不足的。在1959年7月20日美國中情局在擬定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高級研究報告中指出，1956年共產黨情報局解散後，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蘇聯領導人，希望組建一個牢固穩定的、有利於鞏固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與統一的組織。但是蘇聯領導人的這一想法可能會受到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尤其是中國、波蘭以及自由世界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的反對。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開了所謂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是對共產國際某種形式的繼承，二者間有一條割不斷的紐帶。中情局雖然看到共產黨情報局與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雖然有不可分割的聯繫，但顯然沒有看到二者重要的區別。因而認為：無論是否組建一個新的共產國際，任何削弱蘇聯共產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控制的企圖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中情局雖然認為，「中國共產黨是這個國際組織中唯一可以挑戰蘇聯權威的政黨」，但卻通過中共對蘇共「領導作用」這一原則所作出的表態認為，中共不會挑戰蘇共的權威。通過中共對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強調、對鐵托所表現出的蔑視以及對蘇聯的依賴，中情局認為中國共產黨會繼續支持蘇聯在陣營中起領導作用。¹正是對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控制力下降的認識估計不足，美國政策制定者才沒有看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發生的重大變化，沒能預料到60年代初開始發生的中蘇分裂。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這種認識同時也說明，在冷戰對抗的條件下，陣營對抗的思想已深入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頭腦，而不能對社會主義國家採取有區別的政策。

長期以來，作為國際共運的領導者，蘇共以國際主義為準則來處理與其他共產黨的關係，並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把蘇聯的國

1 中情局關於1965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高級研究報告，1959年7月20日，沈志華主編：《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華解密檔案（1948—1976）》第10卷，東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102頁。

家利益等同於世界革命的利益，這就必然導致蘇聯以「老大哥」的身份控制、干涉其他共產黨的內部事務，要求它們不顧本國的條件，隨蘇聯外交政策和策略的轉變而轉變，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事業造成了危害。共產國際解散的教訓是深刻的。戰後，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蘇共之外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執掌了國家政權，成為了執政黨。這些共產黨領導人首先需要維護的是自己的民族利益。但是，蘇聯領導人在對外關係方面仍然要求東歐人民民主國家、西方國家的工人運動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都無條件地維護以蘇聯為中心的無產階級的國際利益，強調「只有義無反顧地擁護蘇聯者才是國際主義者，因為不擁護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國際工人革命運動諸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¹ 這樣蘇聯要求各國共產黨遵循的國際主義便與各國共產黨自身的利益，特別是與東歐各黨的民族利益發生了顯著的矛盾。雖然蘇聯領導人通過共產黨情報局展開了一系列的整肅，使東歐各國的政權都掌握在了那些比較服從莫斯科的領導人手中，但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獨立傾向並沒有消失。共產黨情報局的解散以及蘇聯共產黨與其他各國共產黨之間新的聯繫方式的建立表明，蘇共與其他共產黨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雖然蘇聯領導人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對這些關係進行了一些調整，強調與其他共產黨建立更加平等的關係。但新的關係準則並沒有建立，單純的國際主義並不能成為他們之間發展關係的紐帶。這就使得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分歧無法通過合理的渠道解決，最終導致了中蘇分裂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

共產黨情報局存在的時期正值蘇聯對外政策發生急劇轉變的時期，也是冷戰爆發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作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共產黨情報局的活動反映了蘇聯對外政策向冷戰方向轉化的過程。但從共產黨情

1 沃茲涅先斯基：《戰時及戰後蘇聯經濟》，吳清友譯，中華書局，1949年，第3頁。

報局活動的整個過程來看，在這一政策轉變過程中，蘇聯領導人是非常謹慎的。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是蘇聯領導人在其確立的大國合作戰略面臨挑戰的情況下作出的一種反應，而不是蘇聯領導人革命樂觀主義的表現，它同共產國際有着原則性的區別。共產黨情報局建立之後，面臨北約的建立和西方聯盟不斷加強的趨勢，蘇聯領導人並沒有利用共產黨情報局採取針鋒相對的對抗措施，而是把阻止西德等加入西方聯盟體系、延緩戰爭爆發的希望寄託在大規模的羣眾性和平運動上，共產黨情報局在這一運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1951年，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蘇聯領導人再次產生了世界革命的思想，並為此進行了擴大共產黨情報局職能的嘗試，但這種世界革命的思想並未得到法國共產黨和意大利共產黨的支持，此外，出于對國際局勢的擔憂，他們最終不得不放棄這一嘗試。在建立東方情報局問題上蘇聯領導人的態度更是謹慎的，始終不願意為建立這一組織承擔直接的責任，承擔起對亞洲國家革命運動進行援助的責任，在對亞洲各國共產黨制定綱領的過程中，蘇聯領導人認識到中國革命和「武裝鬥爭」的道路是不適合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的，並最終放棄了這一嘗試。

附錄 主要外國人名翻譯

一、俄語人名翻譯

阿季別科夫
Адибеков

埃夫里爾·加里曼
Аверела Гарриман

艾吉奇
Айттич

艾米里·哈比比
Эмиль Хабиб

艾奇遜
Ачесон

安季波夫
Антипов

昂熱
Энтжес

奧本海默
Оппенгей

巴拉諾夫
Баранов

巴列什
Бареш

巴魯克
Барух

巴什科夫
Пашков

巴扎諾夫
Базанов

貝爾曼
Берман

貝利亞
Берия

貝奈斯
Бенш

貝文
Бевин

彼得列斯庫
Петреску

別爾金
Белнин

波波夫
Попов

波波維奇
Попович

波利亞科夫
Поляков

波諾馬廖夫
Пономарев

波普多莫夫
Поптомов

博列伊沙
Борейши

布爾加寧
Бурганин

布哈林
Бухарин

布留哈切夫
Брюхачев

昌科夫
Чанков

戴高樂
Шде Голль

丹吉
Данге

杜克洛
Дюкло

杜勒斯
Даллес

多列士
Торез

多諾弗里奧
Э.Д.Онофрио

法爾卡什
Фаркаш

法戎
Фажон

範登堡
Ванденберг

馮·勃勞希奇
Фон Браухич

馮·帕本
Фон Папен

伏羅希洛夫
Ворошилов

戈爾希奇
Горшин

戈林
Геринг

哥穆爾卡
Гомулк

哥特瓦爾德
Готвальд

格里戈良
Григорьян

格羅（格洛）
Гэре

葛羅米柯
Громыко

哈利·霍普金斯
Гарри Гопкинс

哈羅德
Гарольд

赫魯曉夫
Хрущев

惠勒
Вилер

霍查
Жоджа

霍多什
Ходош

霍爾瓦特
Хорват

基爾薩諾夫
Кирсанов

基什尼奧夫斯基
Кишневский

吉比揚斯基
Гибнанский

季赫爾 Зихерл

季諾維也夫
Зиновьев

加里曼
Гарриман

加米涅夫
Каменев

金日成
Ким Ир сен

金斯別利·斯密特
Кингсбери Смит

居約
Гюйо

卡德爾
Кардель

卡岡諾維奇
Каганович

卡拉什尼克
Калашник

卡扎科夫
Казаков

凱珀
Кеппер

科捷列涅茨
Котеленец

科斯托夫
Костов

科瓦廖夫
Ковалев

克拉米諾夫
Крамнов

克列姆涅夫
Кремнев

庫西年
Куусинен

庫茲涅佐夫
Кузнецов

拉夫連季耶夫
Лаврентьев

拉科西
Ракоши

拉伊克
Райк

李奇微
Риджуэй

李維諾夫
Литвинов

立賓特洛夫
Риббентроп

列別傑夫
Лебедев

列寧 Ленин

列維奇金
Левычкин

隆哥
Гонге

羅斯福
Рузвельт

羅索夫斯基
Лозовский

洛維特
Ловетт

馬蒂
Мартн

馬爾科維奇
Маркович

馬卡羅夫
Макаров

馬里寧
Малинин

馬林科夫
Маленкскв

馬努伊爾斯基
Мануильский

馬祖爾
Мазур

邁斯基
Майский

麥凱勒
Маккеллар

米高揚
Микоян

米古尼斯
Микунис

米京
Митин

米克拉伊契克
Миколайчик

米亞寧
Зимянин

莫洛托夫
Молотов

莫舍托夫
Мошетов

尼赫魯
Неру

諾維科夫
Новиков

帕特拉什金
Патрашкан

皮克
Пик

普赫洛夫
Пухлов

喬治·科尼奧
Жорж Коньо

喬治·馬歇爾
Жорж Маршалл

丘吉爾
Черчилль

日丹諾夫
Жданов

瑟尼
Сеньи

舍夫利亞金
Шевлягин

什特科夫
Штыков

施韋爾莫娃
Швермова

舒米洛夫
Шумилов

斯大林
Сталин

斯捷潘諾夫
Степанов

斯蘭斯基
Сланский

斯皮魯
Спиру

斯仁坦·茹約維奇
С.Жуйович

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Стаффорд Криппс

斯特魯奇科夫
Стручков

蘇斯洛夫
Суслов

索科洛夫斯基
Соколовский

塔夫脫
Тафт

塔索斯·里瓦季吉斯
Тасос Ливадитис

台爾曼
Тельман

陶里亞蒂
Тольятти

鐵托
Тито

托洛茨基
Троцкий

瓦爾加
Варга

維爾科·弗拉霍維奇
Велько Влахович

維辛斯基
Вышинский

沃茲涅先斯基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烏布利希
Ульбрихт

西多羅維奇
Сидорович

希特勒
Гитлер

謝佳
Секья

謝皮洛夫
Шепилов

休·約翰遜
Хью Джонсон

雅科夫列夫
Яковлев

葉菲莫夫
Ефимов

葉夫多基緬科
Евдокименко

葉戈羅娃
Егорова

尤金
Юдин

約翰遜
Джонсон

朱可夫
Жуков

佐林
Зорин

佐澤
Дзодзе

二、英語人名翻譯

阿里明
Alimin

埃利奧特·羅斯福
Elliot Roosevelt

艾森豪威爾 Eisenhower

安東尼·艾登
Anthony Eden

奧爾加·切喬特金娜
Olga Chechetkina

巴基羅夫
Bagirov

比亞卓
Biagio

布爾茹瓦
Bourgeois

達亞爾
Dayal

厄內斯特·貝文
Ernest Bevin

蓋迪斯
Gaddis

格羅查
Groza

哈羅德·史塔生
Harold Stassen

胡志明
Ho Chi Minh

華萊士
Wallace

霍爾蒂

Horthy

吉拉斯
Djilas

季米特洛夫
Dimitrov

加斯貝利
Gasperi

金一
Kml H

凱芹
Kitchen M.

拉達克里希南
Radhakrishnan

蘭科維奇
Rankovic

毛雷爾
Maurer

普利舍夫斯基
Plishevskii

普列沙科夫
Pleshakov

喬治·比道爾特
George Bidault

喬治烏·德治
Gheorghiu-Dej

史密斯
Smith

湯姆·康納利
Thomas
Connally

瓦西里·季米特洛夫
Vassily
Dimitrov

瓦西里·庫茲涅佐夫
Vassily Kuznetsov

威廉·克萊頓
William Clayton

武元甲
Giap

西爾維奧·龐斯
Silvio Pons

約翰遜 Johnson G.

祖博克
Zubok

參考文獻

一、檔案和文獻

РГАНИ (俄羅斯當代史國家檔案館) · ф.5

РГАСПИ (俄羅斯社會政治史國家檔案館) · ф.558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七、十九、二十二、二十三卷)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02 年

沈志華收集和整理：《蘇聯歷史：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第 1—26 卷 ·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藏 · 未刊

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國檔案原文複印件彙編：中蘇關係》第 1—22 卷 ·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藏 · 未刊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Адибеков Г.М., Андерсон К.М., Роговая Л.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ВКП (б) Повестки дня заседаний 1919-1952, Каталог, Том III, 1940-1952,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4-1953, Т.2, 1949-1953,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Едемский Б. Возможны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по проблемам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19 декабря 1953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5, №5-6

Зубкова Е.Ю. и т.д. Советская Жизнь, 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Крекотень П. Дело Сла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я, 1997, №3

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Н.С.Хрущева, 1954-1956гг., Москва, 1995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 Россия. XX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4

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 (под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9-1952, Россия. XX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6

Стрижов Ю.И. Англия должна иметь право решающего голоса в Греции// Источник, 2003, №2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

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6

Хлевнюк О.В., Горлицкий Й.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 (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1953,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Чернев А.Д. Нужно идти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не прямо, а зигзагами,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И.В. Сталина с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СЕПГ, Декабрь 1948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2, №5

二、著作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一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費南德·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卷，方光明等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赫爾穆特·格魯伯：《斯大林時代共產國際內幕》，北京：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年

《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二卷，（內部參考），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63年

《陶里亞蒂言論集》第三卷，（內部參考），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1963年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沈志華：《斯大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沈志華主編：《冷戰時期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年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1947–1956гг., Москва: Россия молодая, 1994

Андерсон К.М., Чубарьян А.О. Коминтерн и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8

Быстрова Н.Е. СССР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блокового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 Европе (1945–1955 гг.), В 2 кн.,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1944–1948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3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Покивайлова Т.А. Москва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типа (1949–1953)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в. 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СССР и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 в 1944–1949 гг.,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Данилов А.А., Пыжиков 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1

Едемский А.Б. От конфликта к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советско-югослав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1953–1956 годах,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8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ИВИ РАН, 1998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Лельчук В.С., Пивовар Е.И.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род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архивов, 1995

Марьина В. В. (отв. ред.)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 1944–194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Марьина В.В. (Отв.ред.)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транах формирующегос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1944–194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Пыжиков А.В. Поиск пут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1945–1964) // *Петров Н.Л. зав. ред.* Россия в XX веке, реформы и революции, Том 2, Москва, 1997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отв 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 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 1998

Сергеев С. 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Москва: Внешторгиздат, 1956

Фатеев 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 Москва: Ин-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1999

三、論文

沈志華：《共產黨情報局的建立及其目標 —— 兼論冷戰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沈志華：《斯大林與1943年共產國際的解散》，《探索與爭鳴》2008年第2期

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 —— 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東歐中亞研究》1996年第6期

張盛發：《50年代初斯大林重建國際共運中心的努力及失敗》，《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1998年第3期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ак готовилось перв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Адибеков Г.М. 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 (1943-1944 г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 7

Адибеков Г.М. Молотов и попытки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1951 годах//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9, №7

Адибеков Г.М. Начало конца Коминформ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пытка коминтернизации Коминформа в 1950г., По новы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4-5

Адибеков Г.М. Почему Тольятти не стал генеральным секретарем Коминформ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 №4

Акстунт Ю. Почему Сталин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 союзниками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предпочел конфронтацию с ними?//*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

Бьяджо А.Ди.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Нар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талинской модел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Боларии (1944-1948гг.) //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Отв.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В. Сталин и сме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Кремля в конце 40-х годов: от компромиссов к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с.10-22

Гибианский Л.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в период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 в 40-е годы//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1995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Долгий путь к тайнам: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конц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4, № 6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ак возник Коминформ. По новейшим архивн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 4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1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2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Коминформ в зените активности: созд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третье совещание//*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От первого ко второму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Гибианский Л.Я. СССР,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блока//*Марьина В. В.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Тоталитариз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интермецц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 финалом, 1944-1948,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2

Егорова Н.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угроза” НАТО в оценках стали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Егорова Н.И. НАТО и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Егорова Н.И.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45–1948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4

Ереценко М.Д. История, которую остановили за кулисам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Советское влияние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послевоен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Румынии) // *Гибанский Л.Я. (отв.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Желицки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2

Желицки Б.Й. Трагическая судьба Ласло Райка, Венгрия 194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3

Зубинов Ю.Ф. Болгария в сфере советских интересов//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2000, №3

Крекотень П. Дело Сла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7, №3

Лебедева Н., Наринский М.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43 год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4, №5

Марына В.В.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февраль” 1948 г,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вид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 10

Мурашко Г.П. Февраль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3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Т. Костова и Л. Рай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Мурашко Г.П., Носкова А.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45–1949// *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 №1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Чехословакия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а //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отв 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 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 1998

Нежинский Л.Н., Челышев И.А. О доктринальных основах советской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 1

Носкова А.Ф. Московские советники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45–1953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 №1

Орлик И.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9, №5

Орлик И.И. 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й кризис в феврале 1948 года и политика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Н. (отв ред)*, Февраль 1948, Москва и Прага, взгляд через полвека,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 и балканистики РАН, 1998

Печатник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 совет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47//*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Поис С. Сумерки Коминформа//*Адибеков Г.М. и т.д.*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1948/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8

Поп И.И., Россовская М.И. Тяжелая тень восточного сосед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чехословак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Гибиацкий Л.Я. (Отв.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Робертс Дж.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 Шанс для мира? Советская кампания в пользу завершения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53–1956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8, №6,

Смирнова Н.Д. Сталин и Балканы в 1948г., Проблем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Гайдук И.В., Егорова Н.И., 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9

Стыкалин А.С. Стали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о-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Венгрия//*Гибиацкий Л.Я. (Отв.ред.)* У истоко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дружества”

Чубарьян А.О.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дискуссии// *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 и т.д.* Восток–Россия–Запад,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2001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5

Яжборовская И.С. Вовлечение Польши в сталинскую блоковую политику: проблемы и методы давления на поль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40–е годы//*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талин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осква, 1998

Biagio, Anna Di,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minform, June–September 1947”,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Dimitrov, Vesselin, “Revolution Released: Stalin, the Bulgari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inform”,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s.) ,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Egorova, Nataliia I., “Stal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ominform, 1947-1953”,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 ed.,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Gibianskii, Leonid, “Stalin Polic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ominform, and the First Split in the Soviet Bloc”,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Stalin and the Cold War, 1945-1953”*, Yale University, 23-26 September 1999

Békés, Csaba, “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WHP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Gori, Francesca and Silvio Pons (eds.) ,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53*, New York: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1996

四、回憶錄

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9, №1

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4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1945-1963,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3

Чернявский Г.И., Дневники Г.М. Димитрова//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 5

Чувахин Д.С. С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ей в Албании, 1946-1952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1

五、報刊資料

《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中文版），1950 — 1956 年

《人民日報》，1947 — 1956 年

「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

世界革命的最後努力：

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興衰（1947—1956）

沈志華 主編 崔海智 著

責任編輯 王春永

裝幀設計 鄭喆儀

排 版 賴豔萍

印 務 劉漢舉

出版 開明書店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一樓 B
電話：(852) 2137 2338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20-248 號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版次 2024 年 7 月初版
2024 年 9 月第二次印刷
© 2024 開明書店

規格 16 開 (240mm×160mm)

ISBN 978-962-459-362-4

「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 第一輯7種

沈志華 主編

對抗與革命：

冷戰與越南的印支戰爭（1945—1991）

游覽 著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

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軌（1945—1949）

郝江東 著

世界革命的最後努力：

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興衰（1947—1956）

崔海智 著

陌生的兄弟：

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史初探（1949—1965）

葛君 著

從握手到冰封：

冷戰前期中蒙關係史研究（1949—1968）

谷繼坤 著

敵友之辨：

跨陣營交往下中的法關係（1949—1969）

高嘉懿 著

蘇聯的最後歲月：

從制度危機到聯盟解體（1985—1991）

余偉民 著

開明書店更多好書，請見



微信公眾號



FACEBOOK

- 共產國際為什麼在1943年5月突然解散？
- 這一舉措與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又有什麼關係呢？
- Коминформ各成員會把什麼樣的材料送往布加勒斯特總部？
- 是什麼因素導致蘇聯領導人要使Коминформ一定具有協調中心的職能呢？
- 最初建立Коминформ的時候是否存在關於建立東方情報局這一問題呢？
- 斯大林為什麼突然產生了必須「加強」、「擴大」Коминформ職能以及對其進行「改組」的想法？
- 蘇聯的冷戰政策怎樣影響了Коминформ的籌建、內部衝突、主要活動和發展道路以及最後的解散？



ISBN 978-962-459-362-4



聯合出版集團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同創出版

定價：HK\$128 NT\$578

建議上架分類：世界史/冷戰史